

教师必读文库  
《外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译  
总主编 冯克诚

---

(第二辑·第十八卷)

[苏]安·谢·马卡连柯  
(А·С·Макаренко 1888—1939)

人格教育思想与教育论著选读  
《普通学校的苏维埃教育问题》等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出  
学苑音像出版社 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第二辑/北京师联教育科学  
研究所主编. —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05. 11

ISBN 7 - 80135 - 733 - 7

I. 外... II. 北... III. 教育名著 - 作品集 - 世界文  
学 IV. 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1422 号

外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第二辑  
马卡连柯人格教育思想与教育论著选读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译

总主编 冯克诚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出版发行  
学苑音像出版社

★

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印刷

2006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1/32 印张: 180 字数: 4677千字

ISBN 7 - 80135 - 733 - 7

全二十册定价 526.00 元(册均 26.30 元)

(ADD 北京市朝阳区三间房邮局 10 号信箱)

P. C. 100024 Tel 010 - 65477339 010 - 65740218(带 Fax)

E - mail webmaster@BTE - book.com Http ://www. BTE - book.com

教师必读文库  
中外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  
**出版说明**

教师职业化、专业化是当今世界教育改革共同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问题之一。教师职业素质素养达到基本要求和提高,是当前教育改革和课程改革的急迫要求。为此,我们组织相关专家重新系统地、较完整地遍选、编译、评注了这套适合中小学教师职业阅读的《中外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其编选原则和方针是:

1. 从古至今,各时代、各地区和国家有代表性,和对当代及后世教育发生直接影响的教育家及其教育思想的代表作品、经典论述。教育家的教育实践风范和教育思想对当代和后世的影响远大于制度影响,同时,对现实教师的成长也有借鉴和参考作用。作为职业教师,总听说、总涉及但在学校图书馆里总缺乏的那些著作是我们这次系统编选的重点。

2. 全套分中国卷 100 种、外国卷 100 种,每二十种为一辑,共十辑,约 200 种,同时出齐。每种含教育家的生平、教育事迹、教育成就、教育思想评析和经典教育论著选读及注解解读导读两部分。这对于全面深刻和原原本本地了解学习、运用教育家的思想和著作是十分有益的。

编者  
2005 年 11 月



## 上 篇

## 马卡连柯人格教育思想与教育著作评析

马卡连柯生平和教育活动 .....	(1)
马卡连柯的教育思想 .....	(2)
(一)尊重与要求相结合——一条重要的教育原则 .....	(3)
(二)在集体中发展个性——“公社”的教育 .....	(5)
(三)劳动与教育结合——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	(7)
(四)纪律——集体的面貌,教育的结果 .....	(10)
马卡连柯人格培养思想 .....	(12)
(一)马卡连柯人格教育的思想基础 .....	(13)
(二)马卡连柯人格教育的内容 .....	(15)
(三)马卡连柯人格教育的途径 .....	(17)
(四)马卡连柯人格教育的方法 .....	(22)
马卡连柯教育思想的基本原则 .....	(25)
(一)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原则 .....	(25)
(二)要求与尊重的结合原则 .....	(28)
(三)平行作用原则 .....	(30)
(四)整体施教原则 .....	(33)
马卡连柯的智育思想 .....	(35)
马卡连柯的美育思想和实践 .....	(40)

马卡连柯论教师 .....	(45)
(一)教师的地位和作用 .....	(45)
(二)教师工作的特点 .....	(46)
(三)教师集体的形成 .....	(50)
马卡连柯论教师的教育技巧 .....	[苏]Ю·Л·勒沃娃(52)
马卡连柯教育思想与《教育诗》 .....	(58)
(一)《教育诗》各部的主要内容 .....	(59)
(二)《教育诗》阐明的教育方法 .....	(61)
(三)《教育诗》的主要教育思想 .....	(62)

## 下 篇

### 马卡连柯教育论著选读

《普通学校的苏维埃教育问题》 .....	(79)
第一讲 教育方法 .....	(79)
第二讲 纪律、生活制度和奖惩 .....	(102)
第三讲 个别影响的教育方法 .....	(132)
第四讲 劳动教育。集体的关系、作风和步调 .....	(159)
教育的目的 .....	(192)
苏维埃学校里的教育问题 .....	(203)
学校里学生的性格教育 .....	(208)
我的教育经验中的若干结论 .....	(213)
论共产主义道德 .....	(237)
意志、勇敢和目的性 .....	(245)
共产主义的教育和行为 .....	(252)

# 上 篇

马卡连柯人格教育  
思想与教育著作评析



## 马卡连柯生平和教育活动

安·谢·马卡连柯(A·C·Макаренко1888—1939年)是苏联杰出的教育家。他于1888年3月1日生在俄国哈尔科夫省别洛波里城一个铁路工厂的油漆工人的家里。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1898年,他进入克列勉秋格市立学校学习,毕业后,升入一年制师资训练班,1905年毕业,并被派到克留科夫铁路学校任教。在这里,他接触了工人,并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这对他形成无产阶级世界观有重要的意义。

由于他在学校的进步活动,引起当局对他的怀疑,1911年,他被调到南部铁路线上多林斯卡亚站铁路学校任教,在这个学校工作了三年。1914年,他升入波尔塔瓦师范专科学校,1917年毕业后到克留科夫村高级小学任校长。这时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来临了。1920年至1928年,他领导高尔基教养院的工作。《教育诗》描写了这个教养院培养新人和创立新的教育理论的全过程。1928年以后,他负责捷尔任斯基公社的工作。他在《塔上旗》这部著作中,有系统地阐述了捷尔任斯基公社的生产和发展的过程,并论述了集体教育的理论。总之,他在高尔基教养院和捷尔任斯基公社长期的教育实践中,取得了显著的教育成果。他把三千多名违法者、流浪儿童改造为社会主义新人,成为热爱祖国、热爱劳动的苏维埃公民。在他们中间,有不少人成为有名的工程师、教师、科学家、医生、劳动模范等。所以,1933年1月30日高尔基在给马卡连柯的信中说:“照我看,您那有伟大意义的十分成功的教育试验具有世界意义。”

1935年7月,马卡连柯改任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全部劳动公社管理局副局长。1937年2月以后,他致力于文学创作,把自己从事

教育工作三十多年的经验加以总结。由于他对苏维埃教育有卓越的贡献,苏联最简苏维埃主席团在1939年2月奖给他劳动红旗勋章。1939年4月1日,马卡连柯逝世。

## 马卡连柯的教育思想

十月革命之后,在苏联建设第一批社会主义的学校期间,马卡连柯创建了两个著名的、专门对流浪儿童和少年违法者进行教育和再教育的机关——高尔基工学团和捷尔任斯基公社。在这里,他倾注了全部心血,进行大胆的教育试验,以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基础,“按照新方法造就新人”<sup>①</sup>,把三千多名流浪儿和违法青少年改造成为新人,使他们“成了有学识、有专业技能的人……成了共青团员”(《马卡连柯教育文集》(上卷),简称<sup>±</sup>,下同,P.35)从而走上生产建设第一线。马卡连柯在其富有创造性的教育实践过程中,进行理论探索,形成了具有创新意义的教育思想体系,并集中反映在他的多达一百多篇(部)数百万字的教育理论和文艺作品中。它们在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教育规律,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科学。

应该指出,马卡连柯的教育实践活动,是在苏联国内战争,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和帝国主义的包围时期进行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正是依靠全体人民团结一致的忘我劳动,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铁的纪律来恢复经济与开始建设的,建国初期,思想与哲学领域中的斗争十分尖锐。在这样的环境下所进行的教育实践,决定了马卡连柯教育思想的某些特点。

高尔基对马卡连柯的教育活动给予高度评价,他说,“您的劳动

<sup>①</sup> 《马卡连柯全集》第1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年,第14页。

果实是难以估价的,“……照我看,您那有伟大意义的和十分成功的教育试验具有世界意义”。<sup>①</sup>的确,马卡连柯的组育思想,不仅已成为苏联教育科学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是国际范围内教育理论的共同财富。

## (一)尊重与要求相结合

### ——一条重要的教育原则

革命前马卡连柯就受到马克思主义和进步思想的影响,作为从师专毕业不久的一位教育工作者,他以极其兴奋的心情迎接新社会的到来。同时也深深意识到肩负的重任。他指出,“我们的教育应当是共产主义的,并且每一个被我们教育过的人都应当对工人阶级事业有益的。”(上 P.6)因为他感到,他的教育对象将是国家未来的公民,也是世界的公民,历史将由他们去创造。正是怀着这种历史责任感,马卡连柯勇敢地挑起改造一批“被社会遗忘的孩子”的重担。他说,“我没有权利只限于对他们表示同情和怜悯”,“我没有权利逃避它”。<sup>②</sup>

然而,马卡连柯从他的新学员身上看到,由于曾被“社会所抛弃”,这些流浪儿童与违法青少年已习惯于社会上对他们的自发的敌视态度,并且已习惯处在这样的环境中而并不感到惶恐不安。对他们来说,这是他们跟世界之间已经习以为常的关系。马卡连柯认为,这是“这个时代的可怕悲剧”。使马卡连柯不安的,不仅是被抛入深渊的那些儿童的难以形容的痛苦生活,而且是他们的精神创伤和畸形心理。但是,马卡连柯从高尔基的作品中得到了重要的启示,这就是:“肯定人的价值,洗清资本主义制度在人身上遗留下的污

① 同上第7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第376页。

② 同上,第300页。

稗,帮助人站起来”(《马卡连柯教育文集》(下卷)<sup>下</sup>,下同,P.318)。正是基于高尔基所强调的对“人的价值”的肯定,马卡连柯的信心“增强了十倍”,决心要在每个人身上发现人的优秀品质和精神力量,表现人应享有最好的命运和最好的社会制度”。(下 P.321)

因此,马卡连柯提出了他在工作中的一条重要的教育原则:如何更多地尊敬一个人,如何更多地要求一个人。根据这条原则,马卡连柯对他的学员表现出尊重他们作为人的尊严,尊重他们的人格,又从各方面严格地要求他们,进行有步骤的“矫正心灵”的工作。他既反对教育工作中极端严厉与压制,又反对放任自流。马卡连柯在阐述要求与尊重二者的辩证关系时说,“对个人所提出的要求,表现了对个人力量的可能性的尊重,而在我们的尊重里,同时也表现出我们对个人的要求”。(下 P.47)因为,“没有要求,那就不可能有教育”。(下 P.48)

马卡连柯主张的尊重与要求相结合的教育原则,是基于他对人的发展、变化的可能性的最大信任,对社会主义条件下教育的巨大潜力的坚定信念。他一方面承认,“性格的改造和矫正必须经过长时间的逐渐演变”(上 P.129)又坚信“不能教育的儿童是完全没有的”(同上)。马卡连柯把这些学员看作是和他同样平等的人,同样具有充分享有幸福权利的人,有才干、有能力生活、工作和进行创造的人。因此,马卡连柯从不认为他的教育机关所从事的工作是任何专门的教育改造任务,而只不过是通常的任务,是把一个人教育成为真正的苏维埃人,成为有良好品行的人。在这里,充分表现了他对教育工作的乐观主义态度和坚定的信念。

马卡连柯把“尊重与要求”作为教育原则的最终目的,就在于唤起学员们身上一切美好的东西,使他们从心底萌发欢乐的种子,从而感到安全、相信自己的力量,形成上进的愿望。曾经在马卡连柯领导的“工学团”和“公社”教育集体中生活过的青少年,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和精神状态走向社会的。昔日的流浪儿与违法少年,重新教育成为社

会的建设人才,这一成功是对马卡连柯创造性劳动的最好评价。高尔基称赞他“是一个很有天才的教师”,是青少年“忠实的朋友”。

## (二)在集体中发展个性

### ——“公社”的教育

马卡连柯在其教育试验中,在探索新人的培养过程中深感,“只有创造一种方法,它既是总的和统一的方法,又是使每一个单独的個人能发挥自己特点,保持自己个性的方法,这样的组织任务才无愧于我们的时代,无愧于我们的革命”。(上, P. 79)这里指的就是集体教育方法,即组织培养教育性集体,在集体中培养个人,这是马卡连柯教育思想体系的核心,并贯穿在他的全部著作之中。

马卡连柯的集体教育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个人与集体的统一”的思想为依据的。还在科学社会主义萌芽时期,马克思就指出,“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sup>①</sup>马卡连柯反对资产阶级人本主义把个性看成是某种完全内在的、不变的,与周围环境没有联系的实体。依据马克思主义观点,在以社会主义公有制原则组织起来的新型社会中,人们都不是彼此孤立的、游离于集体之外的。只有当一个人长期地参加合理组织的、有纪律的集体生活之中,才可能培养起集体主义思想信念和行为习惯。因此马卡连柯在其长期教育实践中之执著追求的,就是解决集体和集体机构的建立与组织问题。“建立合理的集体,建立集体对个人的合理影响”,(上, P. 29),这就是马卡连柯所领导的教育集体的教育方针。

在关于什么是集体的本质问题上,马卡连柯批判并摒弃那些关于集体的错误偏见,指出,集体并不是一群个别人的偶然集合,也不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2页。

是压制和束缚个性发展的某种外在力量。“集体是以社会主义的结合原则为基础的人与人的相互接触的总体”(上, P. 15),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细胞”。(上, P. 16)根据这个观点,马卡连柯分析了作为集体所必须具备的如下特征:

(1)集体有共同的奋斗目标,为实现这个目标把集体团结、组织起来,从而形成集体的伟大力量。

(2)组织性和纪律性是建立和巩固集体的根本条件之一。在集体中,个人的目的必须服从集体的目的,个人的利益必须服从集体利益。

(3)具有一定的组织制度和管理机构,它有权代表集体,并行使各种职责。

(4)有正确的集体舆论。

马卡连柯进而分析了集体成员之间所应具备的责任依存关系,把它看作是建立集体关系的主要原则。他认为,集体成员之间是由共同的目的、义务和一定的职权责任联系起来的。因而集体成员之间的关系不是个人与个人的关系,而是同志关系,是集体的一个成员与另一成员的关系。基于这种责任依存关系,个人在集体中是以特有的地位出现的,“个人在这里是以一种新的教育立场出现的,他不是教育影响的对象,而是教育影响的代表者,也就是教育的主体,但他之所以成为主体,只因为他反映了整个集体的利益”。(上, P. 32)为了能够建立起这种集体关系,马卡连柯要求教育工作者培养学员善于命令,善于服从,勇于负责和乐于接受集体的委托,使他们习惯于过有组织、有纪律的生活。

马卡连柯从他规定的集体成员与集体之间的关系出发,进而提出了“平行教育影响”的理论。这是一种教师采取通过集体以影响个人的方法。正如马卡连柯在《教育目的》中所阐明的,“每当我们给个人一种影响的时候,这影响必定同时应当是给集体的一种影响。相反地,每当我们涉及集体的时候,同时也应当成为对于组成集体的每个个人的教育”,这种教育原则的实质,在于教育个别儿童同教育

儿童集体是同时进行的。

按照马卡连柯上述教育理论精神,教育者的任务在于,一方面要培养集体,使之成为教育职能的体现者;另一方面要提高学员的集体主义觉悟水平,使每个成员能在集体要求的前提下,逐步对自己提出自觉的要求。这个教育思想的意义是十分深刻的,因为通过集体教育,使教育影响变成了儿童道德行为的内部因素,使他们不仅是教育的对象,而且成为教育的积极自觉的主体。

马卡连柯在组织教育性集体的理论中,关于集体发展运动的辩证观点也是十分引人注意的。他主张,为了使集体巩固、发展,永葆青春活力而不致停滞、消极、颓废,就必须根据儿童的年龄特征、心理特点以及集体发展的水平等因素,在集体面前不断提出新的任务,展示一个又一个前景,把集体引向新的为实现崇高目的的高峰,以鼓舞集体在追求前景中前进。这就是马卡连柯提出的集体前进运动的规律,或“前景教育”的理论。他认为,这同时也是使集体中的每个成员能战胜前进中的困难的力量和勇气所在。

高尔基工学团和捷尔任斯基公社就是成功地试验与贯彻马卡连柯集体教育方针的典范。

### (三)劳动与教育结合

#### ——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劳动教育是马卡连柯整个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内容,他认为,集体教育体系如果与劳动教育脱节,就失去了实践的基础。他在谈到劳动教育的意义时说,“劳动永远是人类生活的基础,是创造人类生活和文化幸福的基础。……因此,在教育工作中,劳动也应该是最重要的根本因素之一”。(下, P. 179—180)

然而,在实践中,马卡连柯对劳动教育的潜在作用,对劳动过程的组织、劳动方式、方法等问题的认识,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马

卡连柯在劳动教育理论方面的主要贡献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 第一,劳动与教育“并进”

最初,马卡连柯曾认为,“劳动”在字义上是如此悦耳,对我们是如此神圣和正当,以致他把任何劳动过程都当作是正确、肯定与合理的。但事实证明,采用的劳动因方式不同,可能产生不同的教育效果,不是有了劳动,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劳动过程可以作为惩罚手段或以培养奴隶而实施强迫劳动,也可以单纯为锻炼筋骨而进行机械的操练。马卡连柯在论述社会主义劳动教育的目的时指出,只有劳动和劳动过程,并不一定会自发地产生教育作用。劳动本身的价值是同青少年政治上、道德上的成长,同儿童集体的形成,同集体关系的建立和学生一般修养的提高密切相关联的。劳动不仅创造物质财富,同时也是精神文明的体现。马卡连柯从亲身教育实践中得出结论:“在任何情况下,劳动如果没有与其并行的知识教育——没有与其并行的政治和社会的教育,就不会带来教育的好处,会成为不起作用的一种过程”。(下, P. 13—14)在马卡连柯看来,只有把劳动纳入教育总体的一部分时,只有使劳动与教育“并进”,才能发挥劳动的巨大教育作用。

### 第二,生产劳动与教学“平行”

马卡连柯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理论,通过多年的教育实践总结出,只有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才具有更大的教育作用和教育意义。他说,“一般地说,我不仅是劳动教育的拥护者,而且是生产教育的拥护者”。(上, P. 231)

在马卡连柯领导的高尔基工学团和捷尔任斯基公社,学生每天4小时参加农业或工业劳动,进行生产劳动教育,5小时进行在十年制学校里文化课学习。他使学校与工厂并存,使劳动与教学“平行”。特别到了三十年代,在组织捷尔任斯基公社时期,由于苏联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公社”也有了现代化工厂。在实践中他更

加认识到劳动教育与现代科学知识,与现代技术基础的关系。“公社”的劳动操作有严格的规程要求,学员必须具备一定的生产知识与生产技能。

从主张向学生进行一般的劳动教育到进行生产性劳动教育,马卡连柯在认识上是有一个真正的飞跃的。他回顾这个过程时说,“有一个时候,我曾是‘劳动过程’的拥护者。我们都认为儿童在劳动过程中能给自己的劳动本能找出路。我也有这样的想法:为了使儿童具有劳动特性,劳动过程是需要的。以后我才明白,儿童应当学习某种生产劳动,应当获得某种熟练的技术”。(上, p. 238)的确,马卡连柯在组织生产劳动中,通过劳动与教学“平行”,劳动与生产知识、生产技能教育相结合,“工学团”与“公社”的学员们既具有中等学校的文化程度,又有工农业生产技能;既可以从事体力劳动,又可以从事脑力劳动,实现他所倡导的“中等教育和七级铣工”的技术这种最好的教育结合。(下, p. 110)体现了马克思关于在正常情况下,儿童应从9岁开始参加劳动,并把劳动与学习结合起来,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主张。由于马卡连柯所处的时代,生产劳动与生产知识、生产技术的结合水平还是有很大局限性的。

### 第三,生产劳动与经济教育并进

马卡连柯组织生产劳动的又一特点,是他十分注意培养学生具有劳动组织者和承担者的品质,注意进行经济学观点和组织才能的教育。他充分发挥学生劳动集体或集体的全权委托者的组织作用(包括利润分配、工资计算、决定物质与精神鼓励等方面)。为此,马卡连柯重视使学生在生产中了解生产的全部复杂过程,特别是了解生产计划。他看到,劳动分工和生产计划是以新技术为基础的生产理论的核心,认为,“生产计划就是生产定额和生产关系之间的极细微的紧密联系,是车间之间的紧密联系。要事先注意到材料品质的适当选择,注意到材料的供应,注意工具的配置、锉磨和补充以及监督要求等等。……这是人的活动的最复杂的装备,就应当以这样的

‘装备’来培养我们的公民”。(下, P. 102)他预见到,我们的青少年将来不是参加手工业的生产,而是参加用最新技术组织起来的大规模的国家范围的生产。

在马卡连柯领导的集体中,由于贯彻上述的劳动教育思想,“结果获得了最健全、最自然的配合。教育出来的人,懂得生产,懂得生产组织,也懂得生产过程,此外,还是一个具有中等教育水平的有教养的人”。(下, P. 110)虽然由于马卡连柯当时受所处时代中生产技术水平与国家经济条件的限制,但马卡连柯的劳动教育理论,在当前苏联中等教育改革和加强劳动教育中仍然得到反映。

## (四)纪律

### ——集体的面貌 教育的结果

马卡连柯有关纪律教育的理论是与他的集体教育理论密切联系的。他多次论述了纪律教育与集体教育的辩证关系,认为,集体的建立与发展有赖于纪律的形成与提高,纪律的加强又有助于集体的巩固发展,“纪律是达到集中的目的的最好方式”。(下, P. 36)马卡连柯把集体的纪律形象地比喻为“集体的面貌,集体的声音,集体的美妙,集体的活动,集体的姿态和集体的信念”。(下, P. 143)他认为,集体的一切都摆脱不了纪律的表现形式。

马卡连柯在探讨纪律的本质时分析道,纪律是一种政治、道德现象。社会主义的纪律绝不是旧社会那种抑制性、奴役性的纪律,而是使集体统一步调向前迈进的保证。马卡连柯的纪律教育的总目的,就是实现真正自觉的纪律。

怎样的人才算是具有自觉纪律的人呢?根据马卡连柯的理解,就是“一个人能够愉快地去作自己所不喜欢的事情”。(下, P. 46)他认为,这样的纪律才称之为将深刻的自觉性和非常严格的要求的一种充分结合起来的纪律。在这里,马卡连柯深刻地说明了纪律既是

自觉的,又是要有严格纪律形式的一种辩证认识。所以自觉纪律会使集体充满愉快、自由、生动活泼的气氛,纪律也是集体美的一种表现形式。

综上所述,集体教育、劳动教育和纪律教育是马卡连柯教育体系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

纵观马卡连柯的教育理论与实践,可以看出,他是一位以马列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教育革新家。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伊始,并不会立即诞生现成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与教育理论。正如马卡连柯所说,理论应该从眼前所发生的全部现实事件里去归纳出来。马卡连柯正是这样一位不惧怕困难与阻力,大胆实践、勇于创新的典型。他在1937年所写的《第三个十年的前夕》一文中,曾以自己卓有成效的体验号召教育工作者们,“为了更有成效地造就青年的布尔什维克的性格,为了不养成死守公式的习惯,为了以极大的勇气和责任心去发现影响儿童的最好方法,甚至去发明创造新的方法,教育应具有必要的勇气”。(下 P. 88)

同时,马卡连柯也是一位出色的辩证法专家。他的关于“集体与个性”、“劳动与教学”、“纪律与自由”诸关系的论述中,充满了丰富的辩证思想。他的整个教育思想体系充分反映了他自己的教育信条:“教育学是最辩证、最灵活的一门科学,也是最复杂、最多样化的一门科学。这种见解就是我的教育信念的基本标志”。(下 P. 15)马卡连柯敢于老老实实承认教育工作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他善于从各种教育现象中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及其不断发展变化中去研究教育现象。他不上一次对教师们讲,“请大家不要把我的话当作万应灵丹,当作法则,当作结论。……我的经验和作法,显然和你们的经验和作法一样,仍然在形成的过程中”。(下 P. 128)

马卡连柯的教育思想蕴涵着深刻的教育哲理与教育智慧,体现了教育的普遍规律,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值得注意的是,1986年以来苏联展开的教育大辩论中,也特别提出要发扬马卡连柯的教育

思想。但是,正如本文开头所指出的,马卡连柯的教育思想体系,产生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历史背景下,当然它还不是尽善尽美的。目前,许多教育基本问题在理论研究上都大大向前推进了(如儿童集体的发展问题,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问题,个性全面发展的问  
题,以及情感、需求、动机和远景意向的培养等)。当前,我们在研究推广马卡连柯的教育思想过程中,应该持发展的观点去认识和丰富它。正如苏联教育学者们所说,对待马卡连柯的教育遗产,不能停留在高度的评价上,研究有待深化。

马卡连柯的教育思想在我国已传播了三十多年,起过积极的作用。我们相信,在纪念马卡连柯诞辰一百周年之际,重温马卡连柯的教育思想,在教育改革的形势下,进一步开展对马卡连柯教育遗产的创造性研究,定会促进我国教育科学的发展与繁荣。

## 马卡连柯人格培养思想

在马卡连柯教育思想体系中,人格教育思想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五十年代初,苏联《文学报》编辑部在总结“论马卡连柯的教育学遗产”的讨论中指出:“马卡连柯的教育学遗产中,没有一种著作对整个教育问题作过完整系统的叙述。就是将马卡连柯的著作合为一本书,也得出不了详尽的‘教育学教程’。”<sup>①</sup>这个评价是不正确的。因为,马卡连柯对人格教育问题的论述是完整系统的。在他的著作中,不论是教育论文,还是教育小说,到处都闪耀着人格教育的思想光辉。

<sup>①</sup> 维格多娃等:《论马卡连柯的教育学遗产》中文版 145 页

## (一)马卡连柯人格教育的思想基础

马卡连柯生长在工人家庭。他十二岁时,进了一所全是小官吏和商人的子弟学校里读书,门门功课都得五分。父亲夸奖他说:“好让他们看看,工人的儿子也可以读书嘛!”这些经历使他懂得了人的尊严的重要。马卡连柯十七岁时便开始从事教育工作。最初几年,正值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马卡连柯在工人群众中组织家长委员会,并同家长一起进行了反对反动学校当局的斗争。他还秘密阅读了布尔什维克的传单、小册子以及一些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这对他的世界观形成有重大影响。

在马卡连柯的世界观形成过程中,高尔基的著作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高尔基的苦难经历,高尔基作品对黑暗社会的揭露和对光明的向往,都引起他强烈的共鸣,“就象突然间一支火箭划破了我们黑暗的天空”它教会他如何热爱人类,尊重人,理解人内心的美丽。他说:“他(指高尔基)的活动,他的著作以及他的动人生活成了我们思想和修养的源泉。”

苏联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成立不久,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抵抗外国武装干涉的结果,许多儿童失去父母,流浪街头,甚至成为犯罪分子。苏联政府非常关切这个问题,特地成立了以捷尔任斯基为领导的“儿童生活改善委员会”。马卡连柯被任命为波尔塔瓦幼年违法者工学团的领导人。马卡连柯具有时代的紧迫感和责任感,把这看成是“尖锐的政治任务,真正的社会主义任务”坚定大胆地“用新方法造出新人”,把工学团办成了模范的教育集体。

由此看出,马卡连柯人格教育思想来源于工人家庭的熏陶、布尔什维克的教育以及共产主义教育实践。他在《我的第一位导师》一文中写道:“我们这些在一九〇五年开始劳动生活的人,是通过马克思主义学说,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斗争培养了我们的思想和意志

的,我们的感情,人的内在本质的形象和图画是由于马克西姆·高尔基的创作而形成的。”

马卡连柯的人格教育思想体现在他的人格教育的政治方向上。马卡连柯认为新的教育科学必须符合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要求,他明确而具体的指出:“我们必须培养出健全的一代,他们能够自觉地,有毅力地并且有成效地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捍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他强调在教育战线上应当保证不出废品,他认为动容许有百分之一废品率的人,“可以称他为人民的敌人”。可见,马卡连柯非常注意人格教育的政治方向。

为了把握人格教育的政治方向,马卡连柯指出:“教育机关和每个教师,永远要清楚地体会到教育过程的种种目的,教育过程的目的应当成教育工作的主要基础,对广泛的目的没有体会,进行任何教育活动都是不可能的。这些目的,就应当是设想的个人品质和个人性格的全貌以及明确地为每一个个别人指出的那些品质和性格发展路线。”他深深认识到,一分钟也不能忘记这个目的,否则,整个教育工作就要迷失方向,就无法取得应有的社会效益。

马卡连柯的人格教育思想还体现在他的人格教育信念中。他认识到自己所献身的是共产主义教育事业,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崭新事业。他说:“我手里并没有什么现成的科学和理论,理论应该从我眼前发生的全部现实事件里归纳出来。”<sup>①</sup>因而,他以饱满的政治热情,用马列主义辩证唯物的方法论的武器,去观察、分析和研究一系列教育现象和青少年个性形成规律,总结出了著名的“尊重与要求相结合”的教育原则。这是他的人格教育思想的精髓,也是他的人格教育信念的光辉体现。

尊重儿童是马卡柯人格教育思想的显著特点。他对儿童的发展可能性充满无限的信心,认为儿童是“国家未来的公民,也是世

<sup>①</sup> 《给捷尔任斯基公社理事会的报告书》

界的公民,他们将创造历史”。在实际工作中,他总是对学生予以极大的尊重、尊重他们作为人的尊严,又从各个方面来严格要求他们,激起了少年违法者和流浪儿童的自豪感。一批批有种种劣迹的青少年,经过马卡连柯领导的工学团的集体影响和教育,都成了社会各个岗位上的有用人才。其中不少人成为著名的工程师、医生、教师、科学家、飞行员、农艺师、劳动模范和战斗英雄,有不少人荣获了国家勋章。

## (二)马卡连柯人格教育的内容

马卡连柯向学童们提出了明确要求:“你们要作真正的人”。什么是“真正的人呢?他说:“通常我们看人最着重的就是一个人的力量和美。”“如果集体的成员把集体的前景看作个人的前景,集体愈大,个人也愈美愈高尚。”<sup>①</sup>在马卡连柯看来,“真正的人”就是具有人格美的人,懂得人的价值,能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人。那么,什么是人格呢?其定义更有50多种说法,但较为一致的看法是:人格一般包含有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人的意识倾向,二是稳定的行为模式。对此,马卡连柯均有精辟的论述。

首先,马卡连柯论述了在人格的意识倾向中,人格的道德修养与共产主义劳动态度、集体主义精神的相互关系。他说:“只有参加集体劳动才能使人对人有正确的和道德的态度——对一切劳动者保持亲属般的爱护和友谊,对懒惰分子和躲避劳动的人表示愤慨和谴责。”“劳动的最大益处还在于人们的道德上和精神上的发展。”<sup>②</sup>在马卡连柯看来,人格道德修养是人格意识倾向的核心。它来源于集体劳动的共同行动和共同目标,并表现在把自己和集体结合起来履

① 《教育过程的组织和方法》

② 《儿童教育讲座》

行社会义务的具体实践中。他认为,只有“把个人的要求和希望看作集体主义者的要求和希望”的人,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人”。

其次,人格的道德修养含有道德意识、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三个有机成分,马卡连柯对这些都作过充分的论述。他说:“凡是服务于解放劳动者的这个任务的,服务于革命任务的都是道德的。不服务于这个任务都是不道德的,这是共产主义原理的总尺度。”<sup>①</sup>在这里,马卡连柯既强调了道德的原则性,又指明了人格美的道德意识的高标准要求。人格的道德情感集中表现在崇高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以及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马卡连柯把苏维埃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作为共产主义道德的主要内容。他指出:“每个学生应该是勇敢的,刚毅的,诚实和爱好劳动的爱国主义者。”同时,还要尊重其他各个民族和各个国家的劳动人民。“整个世界都在他的思考之中,他有远大的眼光,他观察、注意和关怀整个地球所发生的事情,他作为一个世界公民,体验到在西班牙,在中国发生的那些灾难。”马卡连柯也非常重视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他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就是尊重劳动人民,关怀劳动人民,重视作为社会主义社会成员的每个人。他教育学生一方面要养成热爱人民的高尚思想,另一方面,也要使他们具有对敌人无限憎恨的情感。

再次,马卡连柯认为,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任务,不只限于培养共产主义道德意识和道德情感,还必须保证学员们能够在自己的生活实践中体现出这些观点、信念和情感,从而形成十分巩固的行为和习惯,也就是人格美的行为模式。他十分强调教育目的应该表现在教育对象的“实际品质上”。他在《教育家莫明其妙了》一文中对人的实际品质作了说明:“我们希望培养出有文化的苏维埃工人。……他应当感觉到自己的尊严和平阶级的尊严,并引以自豪。他应当感到自己对本阶级的义务。他应当善于服从同志,也应当善于命令同

<sup>①</sup> 《共产主义的教育和行为》

志。他应当善于做一个有礼貌的、严厉的、善良的人,必要时,由于他的生活和斗争的条件,善于做一个无情的人。他应当是积极的组织者,也应当是不屈不挠的和经受锻炼的,他应当能够约束自己并且影响别人,如果他受了集体的惩罚,他应当尊重集体和尊重惩罚。他应当是快乐的,精神饱满的,紧张的,能够斗争和建设的,能够生活和热爱生活的,他应当是幸福的,他不仅在将来,而且在现在每天也应当是这样的。”这就是说,人格的行为美表现在修养美、气质美、习惯美、纪律美、仪表美、生活美多个方面,是人的德、智、体、美、劳诸方面的统一与和谐发展,人的内在美与外在美的辩证统一和协调一致。这就是马卡连柯人格美的行为模式的丰富内容。

### (三)马卡连柯人格教育的途径

马卡连柯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尤其是关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基本观点,认识到“人是被整个社会教育着的,社会中的一切事件,它的工作,前进运动,它的生活,成功与失败——这一切都是这样强大并且是这样复杂的教育因素,只有作了专门的研究才能适当地显示出这些因素作用。”<sup>①</sup>马卡连柯所说的“复杂教育因素”就是他呕心沥血所探索的人格教育的途径。

马卡连柯认为将来自四面八方的被苦难生活折磨的少年违法者改造为新人,只采用个别教育的方法是行不通的。他在《我的教育经验若干结论》中指出:“要教育整个集体,这是正确的教育的唯一途径。”因为集体生活是培养人格的熔炉。“……优良的品质要好多年才能培养起来。想用某种特殊的,迅速生效的方式和方法培养性格,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只有当一个人长时间地参加了有合理组织的,有纪律的,坚忍不拔的和有自豪感的那种集体生活的时候,性格

<sup>①</sup> 《儿童工学团工作方法的经验》

才能培养起来。”<sup>①</sup>那么,如何教育集体和建立集体机构,如何将培养人格的熔炉烧得烈火熊熊,让集体充满勃勃生机呢?马卡连柯为此探索三十多年,紧张地工作了二十万小时,从理论上确立了人格教育途径必须遵循“在集体中,通过集体和为了集体而进行教育”的原则,总结了许多行之有效的集体教育的途径和方法。大致可以归纳为如下三个方面:

### 第一,加强教师自身职业修养,发挥教师主导作用,制定集体的远景规划

马卡连柯根据自己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证明团结一致的教师集体,是建立学校正常教育秩序和取得良好成绩的必要条件。因此,马卡连柯对教师的职业修养提出了一系列要求:要有明确的无产阶级的政治目的;要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和崇高的精神境界;要有丰富的科学知识和文化修养;要有对工作的高度责任感;要认真研究教育理论,懂得教育规律;要掌握教育和教学的技巧,等等。马卡连柯特别强调教师集体在教育工作中的巨大作用,教师集体应当负责培养学生集体,团结和巩固学生集体。他对涣散的教师个人之间“个人主义和倾轧纠纷”深恶痛绝。期待每个教师都要做到“使自己本身的成就辉煌灿烂起来。同时,使整个集体的成就也辉煌灿烂起来。”

马卡连柯认为,一个坚强的学生集体绝不是自发地形成的,而是在教师不断关怀指导下成长起来的。教师的主导作用就是集体的灵魂。为此,教师必须仔细地注视儿童的集体生活,并就集体中的一切事件提出中肯意见;教师应当机敏而巧妙地发挥儿童工作和生活的积极性和创造;教师必须深入地了解儿童的个性,并善于把这些个别特点和集体的崇高生活目的结合起来;教师应代表集体意志,坚定地代表集体利益而行动。马卡连柯所创办的高尔基工学团和捷尔

<sup>①</sup> 《我的教育观点》

任斯公社之所以朝气蓬勃,是因为他身体力行,团结教师充分发挥主导作用,通过组织学员从事生产劳动和学习文化,把他们引导到广阔的生活大道上前进。

马卡连柯认为一个集体的形成,必须有一个教育过程。通过具有明确目的和有计划的一系列教育措施,使每个成员由不同的认识达到统一认识,形成一种共同的、积极向上为集体作风和心理气氛。因而,制定集体的远景规划对正确地组织集体和保持勃勃生机是至关重要的。马卡连柯将称之为“集体运动规律”,他说:“一切毛病都出于停滞,在集体生活中是不容许停滞的。”<sup>①</sup>在集体面前应当经常有着一个或几个新目标,并要努力完成这些任务,集体应当永远以充满紧张,力求达到一定自标的愿望来生活。在集体面前应当有自己未来快乐的前景的道路。翻开《教育诗篇》我们可以清晰看到,马卡连柯和他的教师集体与学员们同劳动同欢乐,有着一股催人上进的力量,他们一步一个脚印地实现既定的目标,一次又一次地迎接新任务的到来。

## 第二,建立集体组织,健全生活制度,形成自觉纪律

马卡连柯认为,为了保证集体共同目标的顺利实现,保证集体的组织性和纪律性的进一步加强,必须建立一定的组织制度,拥有集体的组织机构,有一定的集体活动的准则以及集体成员对各项准则的遵守。马卡连柯在他创办的工学团和捷尔任斯基公社里有军事化的严密的组织系统。基层集体是由七至十五人组成的担负着不同任务的分队,分队有分队长,由分队长组成决策机构——队长会议。最高权力则是由全体社员组成的社员大会。每日有值日队长管理当天全公社一切事情。此外还有旗手、号手、卫生委员,生产混合组等各种组织设施。各负其责,尽心尽职。

<sup>①</sup> 《教育诗篇》

马卡连柯特别重视健全生活制度。他认为“生活制度首先是一种手段,集体用这种手段来组织行动的外在形式,让每个学生用内在的内容来充实这些形式。”工学团的生活制度是相当丰富的。“例如精确性,守时,说话不含糊,明确的要求和明确的答复,必须用伦理的观点而不仅用事物的观点来检查。”学员有参加俄罗斯文学小组、自然科学小组、外国语小组、戏剧小组、舞蹈小组和美术小组等17个课外小组活动的义务,定期举行学习汇报会和演唱会。在体育运动中有达不到标准降格降队的制度。还有卫生健康制度。每当公社重大集体活动,乐队演奏,庄严升旗,敬重旗帜等等一整套制度。

马卡连柯认为,组织性和纪律性是建立集体和巩固集体的根本条件之一。他说:“学校的集体如果没有好的纪律是很难想象的”,“纪律是集体的面貌,集体的声音,集体的美妙,集体的活动,集体的姿态和集体的信念,集体中的一切,归总起来,都摆脱不了纪律的形式。”<sup>①</sup>马卡连柯强调必须划清苏维埃“自觉纪律”与旧学校“抑制性纪律”的界线,“苏维埃纪律是战胜困难的纪律,是斗争和前进的纪律,是趋向一定的目的并为这个目的进行我们真正需要的斗争纪律。”<sup>②</sup>显然,这种纪律不同于旧的纪律,它是道德和政治现象,它伴随着自觉和充分的理解。马卡连柯认为,在学生间树立良好纪律,教师负有重大责任。因此,他要求教师要有极大的创造性,要有崇高的精神和人格,要把自己人格贯注在这件事情上。

### 第三 培养积极分子,建立优良传统,形成集体舆论

马卡连柯认为,积极分子是集体团结的核心,组织的中心。他指出:“积极分子是儿童教育机关中,健康和必需的后备队,他们在集体中保证

① 《关于我的经验》

② 《我的教育观点》

各辈之间的继承性,保持集体的作风、情调和传统”。他在各种活动中考察每个学员的品质,从中挑选那些热爱集体,勇于负责,有牺牲精神和创造精神的学员担负分队长。在指导积极分子工作,分配他们担负主要工作的同时,还对他们提出严格的要求。他委托做各种工作的那些优秀社员,常常会因为一点小事情坐禁闭。马卡连柯晚年还深情地说:“队长会议在十六年来一直帮助我进行工作,我现在还是很感谢的,而且也对这样的组织抱着郑重的、莫大的尊重。这样的组织逐渐在变化着,但保留下了某种同一步调,同一面貌和同一活动。”

传统是集体过去优良经验的继续、保持和巩固。它可以把个别的人团结在集体周围,为了集体的前途而共同斗争。马卡连柯特别重视传统对团结集体和巩固集体的巨大作用。他指出:“一个学校的集体应当能树立传统和内部标准,甚至可以有使本校同其它学校不同的传统和标准。最好是在学校中施行若干美化校容的办法:队列,乐队,敬礼,人人必说的某些礼貌话。”<sup>①</sup>在马卡连柯的教育实践中,他对传统的自发形成路线和自觉形成路线都予以极大的重视。他鼓励学童们建立传统的创造精神,又在传统的基础上去培养集体的工作作风。在马卡连柯领导下的集体中,有尊重旗帜和旗手的传统;分队组织传统;穿着整齐漂亮制服的传统;公社值日生制度传统;把最困难最不愉快任务分配给最优秀的分队传统;举行高尔基诞辰纪念会传统。这些优良传统交织起来,使工学团学员过着美丽而富有内容的生活。

马卡连柯认为,“儿童集体里的舆论力量,完全是一种物质的,实际上可以感触到的教育因素。”<sup>②</sup>集体舆论形成的过程一般是:最初当集体和集体舆论尚未形成时,集体领导者必须“以不许反对方式”提出绝对的要求,而后引导并促使更多的积极分子逐步转向集体领导者这方面来;

① 《关于学校和我们的儿童的几点意见》

② 《苏维埃学校里的教育问题》

最后,当由集体提出要求来的时候,集体舆论便形成了。有很高的权威性和值得敬爱的学校集体的舆论的监督,能够锻炼学生的性格,培养学生的意志,能就学生的个人的行为培养起有利于整体的习惯,能培养学生因为学校,因为自己是这个光荣集体而自豪的精神。

#### (四)马卡连柯人格教育的方法

马卡连柯从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出发,在理论和实践上对教育方法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他指出:“方法体系本身永远不应当是死的东西,不应当是凝固的东西,它应当变化着,永远发展着。”他认为“再没有比教育学更辩证的科学了”。马卡连柯是善于因材施教的杰出典范,他说过:“心理学的知识,对儿童性格的了解,能帮助我们把方法在某种情况下运用得更合适些,在另一种情况下运用得更完善一些。”马卡连柯基于共产主义教育的目的和任务,在自己的教育实践中,创造出了既是总的和统一的方法,又使每一个人能发挥自己特点、能保持自己个性的方法。我们可以把他这些人格教育的方法归纳为:心理相融法和心理适应法;心理平衡法和心理愉悦法;心灵震撼法和心理内省法。

心理相融法和心理适应法。马卡连柯把自尊心看作是儿童集体作风的特殊标志。强调必须尊重儿童的人格,信任他们的力量和能力,珍视他们活动和劳动成果,正确估计他们的自觉性和独立性。这种教育方法可以称之为心理相融法。马卡连柯说:“在我们公社里,无论谁从来也不提自己的过去,在教育集体中,无论谈话或正式的问题也都严格禁止提到这一点。我们完全有意识地避免对过去的犯罪行为进行任何考虑和任何记载,由于这一切,过去的事情在我们这里已经彻底被消灭了。”<sup>①</sup>这种做法效果很好,工学团的学员不久也忘

<sup>①</sup> 《给捷尔任斯基公社理事会的报告书》

记了过去。大家一同从事劳动生产,随着工学团机构速迅速而紧张地运转。一同就业,为自己新的劳动生活而骄傲。这种理解人、尊重人、信任人,心心相印,气氛相融的方法,滋润了“儿童的生命之花”,结出了新人之果。

在工学团里,马卡连柯处处以身作则,严格要求,努力使自己行为正确。这样,他才能在集体生活中要求学员在纪律、生活制度和奖惩诸方面都能做到心理适应。马卡连柯认为,这种心理适应教育方法应该具有明确性和合理性,坚定性和彻底性,全面性和量力性,连贯性和前进性。他运用心理适应的方法,在工学团里创造了一个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纪律又有自由的人人心情舒畅的局面。使学生既乐于接受集体的意愿,又落实到个人的行动实处,使集体事业得到蓬勃发展。

心理平衡法和心理愉悦法。马卡连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了在培养新人的教育过程中,有一个由新的要求引起的心理不平衡到心理平衡的辩证发展规律。教师必须善于以某种目标来激励学生集体和每个成员,当目标实现之后,应当不停止在已有的成就上,而提出更高的,更有社会意义的目标。这是一种动态的心理平衡教育方法。这种方法既反映了青少年大胆幻想,勇于探索的心理特征,又培养了他们积极改造现实的进取精神。

马卡连柯说:“人类生活中真正的刺激剂是未来的欢乐。在教育技术中,这种未来的快乐是它最重要的工作对象之一。”<sup>①</sup>这种在集体面前展开明日欢乐的光明道路,鼓舞集体成员为了明日欢乐而共同前进的方法,可以称之为心理愉悦法。这种方法一般是:从个人路线,从眼前的满足建立近景开始,发展到在较长时间里集体活动目标实现的中景,进而追求遥远将来集体事业的远景。中景应当与近景、远景密切联系,使中景加强和美化每一个近景,而又令人向往着更美丽的远景。心理愉悦法旨在引导学员坚持不懈地把比较简单的

① 《教育诗篇》

快乐,转变为比较复杂的和对人类有意义的快乐。

心灵震撼法和心理内省法。马卡连柯指出,在已有良好集体的前提下,在已形成强大的集体舆论气氛中,为了促使落后思想的转变,可以用“爆炸式的方法”,突出“一瞬间的突然影响,这种影响转变一个人的一切愿望和一切志趣。”<sup>①</sup>这可以称之为心灵震撼法。马卡连柯在“征服库良日”的战役中,成功地运用威武雄壮、整齐耀眼,庄严热烈的欢迎会的“闪电一击”,给混乱不堪的库良日工学团二百八十名道德败坏的青少年心灵极大的震撼。他们不由自主接受了高尔基工学团的新编队,瞬息之间便投入了新的生活。工学团有最高的奖赏,庄严地向全公社宣布嘉奖的命令,并记载在分队日记和公社日记里,公布在红榜上。也有最严厉的处罚,必须通过全体社员大会来执行“开除”,并当众宣布:“我们开除你,是因为你是没有用的东西,留在这里会侮辱和妨碍我们,干脆说,你简直够不上做一个人。”这些都是心灵震撼法的具体运用,并收到极好的教育效果。

马卡连柯认为,教育个别儿童与教育儿童集体是同时进行的。“每当我们给个人一种影响的时候,这种影响必定同时应当是给集体的一种影响。相反,每当我们涉及集体的时候,同时也应当成为对于组成集体的每一个个人的教育。”<sup>②</sup>这种平行教育影响,可以称之为心理内省法。这种方法可以使学员们置于火热的集体之中,在集体舆论影响下有恻隐之心,对自己的不足产生内疚。在教育实践中,马卡连柯常用心理内省法以奖励集体为主,使在优秀集体里的个别掉队者因无功受奖,感到无形的道德约束力,会使他们加倍努力,去达到先进的标准。同样,他往往就个人发生的问题责备集体,通过集体再教育个人。马卡连柯强调在运用惩罚时,应以对学生的人格抱

① 《关于我的经验》

② 《教育的目的》

(以上篇目均见《马卡连柯全集》七卷本)

尊重、关切和爱护态度为基础,对优秀学生惩罚得较严,对一般学生则惩罚得较轻或免除惩罚。由于运用心理内省法,适当采取惩罚措施,也起到了巩固集体,教育个人的作用。

马卡连柯终身献身无产阶级教育革命事业。他在培养年青一代的斗争中的革命毅力与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以及大胆的革新精神,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在长期教育实践中总结出的人格教育思想的不仅揭示了挽救失足青少年教育工作的规律性,而且对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具有普遍的深远的指导意义。直至今日,马卡连柯人格教育思想仍然光彩夺目,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目前在我国,青少年的人格教育仍然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任务。大量调查材料证明,忽视了青少年的人格教育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人格低劣者会走上犯罪道路;人格病态者会造成心理障碍。据天津有关方面统计<sup>①</sup>,全市五万名大学生中,竟有16%以上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推而广之,人格低劣和人格病态的青少年的数量是相当大的,应当引起我们的警惕和深思。当今的青少年是跨世纪的、对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肩负重任的接班人,他们的人格教育,应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

## 马卡连柯教育思想的基本原则

### (一)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原则

马卡连柯的共性与个性统一观,实际上就是他的教育目的论。

<sup>①</sup> 《中国青年报》1988年1月23日

他强调,教育的“目的应当成为教育工作者的主要基础”(P. 227)<sup>①</sup>“教师的任何一个活动,都不能离开既定的教育目的”(P. 251)。

众所周知,马卡连柯是在跟教育领域的错误思潮和倾向作坚决斗争的过程中来阐述教育目的的。这种错误思潮和倾向就是:有人立于“儿童学”的立场,从生物遗传和环境决定论出发来引出教育目的,而否定教育目的的社会决定性,否定教育的阶级性、党性和政治方向性。正是在这个背景下,马卡连柯针锋相对地强调教育目的的社会阶级性。他说:

——教育工作的目的是从什么地方产生的呢?当然,这是从我们社会的需要、从苏维埃人民的意向、从我们革命的目的和任务以及我们的斗争的目的和任务产生的。正因为如此,目的的形成当然也就既不能出之于生物学,也不能出之于心理学,而只能由我们的社会历史中、由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得出来(P. 234)。

——普通学校中的苏维埃教育问题是不能够根据那些脱离苏维埃社会生活和苏维埃政治历史的理论来下结论的。想借助于心理学或生物学等科学结论的演绎来建立教育技术理论的那种企图,一定是毫无希望的。这决不是说,这些科学的理论跟建立苏维埃教育技术理论没有关系,不过,它们只应当起辅助作用,只应当完全服从由苏维埃社会生活中的政治情况所决定的那些目的(P. 225)。

马卡连柯强调,在人的社会因素、生物(生理)因素、心理因素的发展上,社会因素是居主导、决定、制约地位的。在考虑教育目的时,首先要以社会需要为出发点,要把政治大方向置于首位。

值得注意的是,马卡连柯为了论证教育目的,还引进了“一般目

<sup>①</sup> 引语和资料均出自马卡连柯的教育论文选集《论共产主义教育》中译本(即安·谢·马卡连柯著,符·耶·格牟尔曼等编,刘长松等译:《论共产主义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以下同,不另注,只标页码。

的”和“个别目的”两个概念。他说：“苏维埃教育的一般的和个别的目的，应当是我们在直接的、积极的活动中所力求实现的那些必然的目的”（本文着重号是引者加的。P. 229）。这里的一般目的，即是马卡连柯所一再强调的那种出自社会需要、社会定货的目的，而个别目的，从他多处所作的解释看，就是指个人的天赋、倾向、特长等。他指出，教育目的“应当是设想的个人品质和个人性格的全貌和明确为每一个个别人所指出的那些品质和性格发展的路线”（P. 227—228）。这样，他把教育目的落实到具体的品质和性格及其发展途径上。在此基础上，他又引进了“一般品质”和“个别品质”两个概念。他写道：“我们对每一个受教育者所设想的个人的这些品质，可能是一般的，也可能是局部的和个别的”（P. 228）。所谓一般品质，即是社会需要和社会定货所决定的、被马卡连柯称之为“典型品质”、“典型性格”的东西（详见 P. 228）。他强调：“苏维埃人的这种典型性格的培养，应当作为教育工作的主要目的之一”（P. 228）。所谓个别品质，即“个人教育的目的在于确定和发展个人的能力和志趣——不仅在知识方面，而且在性格方面”（P. 251）。

可见，马卡连柯不是像有人误解的那样只强调教育的社会目的和功能，而忽视个人本身发展（即个人生理、心理及其特殊才能的发展）的目的和功能。相反，他把二者辩证地、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了，即既强调共性，又强调个性。

不仅如此，在具体操作上，马卡连柯把教育目的落实为“人的个性的培养计划，人的性格的培养计划”（P. 238）。纳入这种计划之内的，既有共性，又有个性。按他的说法就是：“我把个性方面的一切内容，都包括在性格的概念中，这些内容就是：外部表现和内心信念的性格，政治教育，各种知识，人的个性方面的整个面貌”（P. 238）。马卡连柯在自己的教育工作中既有培养个性的一般“标准”计划，又对这个计划同时加以个别修正（参见 P. 239）。在他的个性培养计划里，同样把共性与个性作了辩证的处置。他指出，人毕竟是非常多种

多样的材料,被我们所制成的“产品”也将是多种多样的。个人的一般品质和个别品质,在教育者的设计中能够形成为十分错综复杂的形态(参见 P. 40)。马卡连柯还强调必须防止两种偏向:一是把一切都视为同一的,把人硬套进一个标准的模型里,培养一系列同类型的人;二是消极地跟着每个人跑。他认为这两种偏向都不是苏维埃式的,不能指导苏维埃教育学,因为前者接近于旧时代的官定规格,后一种则使教育学接近于“儿童学”(参见 P. 40 P. 112)。

人们中有一种误解:似乎马卡连柯反对“儿童学”就意味着,他根本否定心理学、生物学研究成果对教育学的意义。实则并非如此。他只是反对当时有人脱离政治目的单纯从心理学、生物学原理引出教育目的的错误倾向。他称这种倾向是“儿童学倾向”(P. 225)。他曾指出:“现在,像心理学和生物学这些科学在教育上的意义,研究得还是很不够的。很显然,最近的将来,在这方面我们一定会亲眼看到很广泛的研究和发展,那时候,我们就能够更周到地、更正确地来利用这些科学的道理,以达到我们的政治目的”(P. 225)。

此外,人们中还有一种误解:似乎马卡连柯反对“儿童学”,就等于他不重视儿童在生物(遗传)、生理、心理方面的发展。实则这是两码事,虽然他反对前者的理论,却承认儿童于生物、生理、心理诸方面发展的事实。如上所述,他是把人在社会方面、生物方面、生理方面的发展辩证地结合在一起的,视以上各方面的发展构成为个性整体的发展,也就是确认人的共性与个性的和谐发展。

## (二)要求与尊重的结合原则

在教育理论和学校实践的历史和现实中,往往存在形而上学的两个极端,即要么要求而不尊重,要么尊重而不要求。马卡连柯则把要求与尊重辩证地结合起来。他反复强调说,他的教育经验的本质,他的基本原则(同时也是苏联教师的基本原则),就是尽量多地要求

一个人,也尽可能地尊重一个人。这种对个人的要求和对他人的尊重的结合,并不是两件各不相同的事情,而是二而一、一而二的。他确信自己坚持的是辩证法。他说,在这个辩证法里,这两者是一个东西,对我们所不尊重的人,不可能提出更多的要求。当我们提出更多的要求的时候,在这种要求里也就包含着我们对这个人的尊重,正因为我们向他提出了要求,正因为他完成了我们的要求,所以我们才尊重他(参见 P. 270, P. 400—401)。

某些人爱抽象地谈“尊重”,马卡连柯则把它具体化。即第一,尊重的基础是相信和热爱孩子,哪怕是违法和犯罪的孩子。他曾说,“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儿童既然犯了罪过,性格上就会向犯罪这一方面发展……我所以没有这样想,是因为我对人信任——更确切地说是因为我对人热爱——的缘故”(P399)。第二,所谓“尊重”,不是尊重什么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的东西,而是尊重被要求者的“力量和可能性”,是尊重共同劳动、共同工作的“同志”和“活动家”(P. 270)。

马卡连柯认为,正是出于这种尊重,就可以对人要求严而又严,他指出,如果没有对个人的要求,那么无论建立集体还是建立集体纪律,都是不可能的事情(P. 271)(如果没有要求,就不能教育人,许多东西不能靠教育上的幻想,而要靠提出要求才能够生长起来(P. 383)。

马卡连柯特别强调通过要求来建立并发展集体,即,使集体及其成员从被要求者发展成自我要求者,从教育的客体转化为教育的主体,从接受外部教育转化为自我教育。例如在集体发展的如下四个基本阶段上,要求为主、客体逐步转化:集体最初形成阶段,由集体的组织者提出要求;第二阶段,在积极分子核心业已形成的基础上提出要求;第三阶段,集体自己提出要求;第四阶段,每个集体成员提出自我要求(以上参见 P. 295—296)。马卡连柯认为,自第三阶段之后,参加要求的人们,即每个成员,在这里就是以一种新的教育立场出现了,他不是教育影响的对象,而是教育影响的代

表者即主体了(参见 P. 61)。

这里还涉及集体对其成员的不良行为的严厉责备和严峻惩罚问题。马卡连柯认为,这种“严厉”和“严峻”是对人可能提出的“最大的人道主义”(P. 60)。相反,害怕“惩罚”、“警告”,梦想不采取任何措施就提高纪律,那是一种“虚伪的人道主义”(P. 354—355)。因为严格要求和严厉处分旨在保护集体的利益,而这同时就“保护了个人,并且保证个人以最有利的发展条件”(P. 61)。

我们从马卡连柯的实际做法中看出,他的确是通过既要求又尊重的辩证结合去达到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结合的。例如“社员”契连秋克,在马卡连柯及其领导下的集体的严格要求下,跟其他社员一样,具有合乎统一标准的共性,是个勇敢的、刚毅的、诚实的、热爱劳动的爱国主义者。而同时马卡连柯也深深尊重契连秋克的一种特殊个性——“十分罕见的喜剧演员的天才”,而为了使这种特殊个性得以发展,他甚至召开公社大会对已进工业大学半年之久的契连秋克提出要求 and 命令:改上戏剧专科学校。契连秋克服从了集体的要求。于两年后成了出色的演员,获得了一般人十年里才能获得的成就(P. 239—240)。

可见,要求与尊重的结合,共性与个性的结合,以及这两类结合的结合,具体实现起来是十分复杂多样的,很难有万能的应用模式。但只要掌握了二者结合的辩证法,就会得心应手的。

### (三)平行作用原则

平行作用的教育学,堪称马卡连柯的教育独创。它导源于共性与个性的结合、要求与尊重的结合,是实现后者的有效手段。他曾指出:“要创造一种方法,它既是一般的和统一的,同时又能使每一个人有发展自己的才能、保持自己的个性、按照自己的意愿前进的可能”(P. 1137 另见 P. 40—41)。这个方法就是平行作用法。

关于“平行作用”的内涵,马卡连柯有两个说法。第一个说法是:“学校集体……首先应当成为教育工作的对象。在教育单独的个人的时候,我们应当想到整个集体的教育。在实践中,这两个任务只有同时用一个共同的方法来进行才行。每当我们给个人一种影响的时候,这影响必定同时应当是给集体的一种影响。相反地,每当我们涉及集体的时候,同时也应当成为对于组成集体的每一个个人的教育”(P. 41)。——这里,似乎构成一幅横向平行的图景,按中国话说叫做“一举两得”。

如果说,这种横向平行的原理,像马卡连柯说的,是“众所周知”的话,那么在马卡连柯那里还创造了一种似乎是纵向平行的逻辑。他指出,“苏维埃教育学不是直接发生教育作用的教育学,而是平行发生教育作用的教育学”(P. 215)。意思就是:作为公社中心的马卡连柯,以及公社一级的领导机构,不直接和个别社员发生关系,而只和分队发生关系(P. 292, 293)。更具体地说就是:把集体当作教育的对象,把有组织的教育影响针对着集体。这种情况下对个人的最实际的工作方式,就是把个人保留在集体内,使个人认为他在集体里是按自己的愿望,是自愿的,其次,使集体也是自愿容纳这些个人。集体是个人的教师(P. 58)。——显然这是一种纵向平行作用,即教育者施加影响于集体,集体再施加影响于每个人。

如果说,上述横向平行作用原则是大家所能接受的,那么纵向平行作用原则,实践表明,就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接受的。因此,我们想提出自己的两点看法。

第一,首先要理解这种纵向平行作用的本质是什么。马卡连柯自己强调说,“我们只和分队发生关系,我们和个人并不发生关系,正式的公式就是这样的。实际上,这正是影响个人的一种形式,但公式和本质是并行不悖的。我们事实上和个人是发生关系的,但我们要确信我们没有及于个人的任何事情”(P. 293)。那么为什么要把这种本质让形式遮掩起来呢?为什么要用纵向“平行作用”取代“个

别对待”呢？其目的是为了使受教育的集体和每一个成员不感到光是教育的客体，光是“未来个人的萌芽”（P. 58），光是为未来生活作准备而不是现在就生活着的人（参见 P. 61）；与此相反，应当感到自己是教育的主体，每个成员都感到自己是劳动集体的一员，是“社员”，是作为“公民”的人，然后才是受教育的客体——学生（P. 215—216, P. 293）。依我们看，理解了马卡连柯纵向平行教育原则的这个本质，理解了它为了更好地变教育客体为教育主体的这种宗旨，就不难接受这个原则了。同时，关键还在于“集体是个人的教师”（P. 58）。因为，“没有在集体中的专门练习，是不可能培养出共产主义的意志、共产主义的勇敢和共产主义的目的性的”（P. 52）。这就是说，唯有集体才利于共性的发展。所以，马卡连柯把他的公社教育方针概括为：“建立合理的集体，建立集体对个人的合理影响”（P. 58）。如上所分析的，纵向平行作用既利于变教育客体为教育主体，又利于发展人的共性。

第二，从古至今，先进的教育家们都在探寻最优化的教育方式，即欲求费时费力尽量地少，而效果尽量地高。马卡连柯的纵向平行教育学恰恰具有这个特点。他讥讽师生一对一地“个别对待”是“手工业式的教育方法”（P. 215），是一种“狭隘的和有限的因素”（P. 58）。从这种方法费时费力的角度看，从目前一般都是一名教师对几十名学生来看，从教育社会化的角度来看，马卡连柯的讥讽并非不无道理。其次，纵向平行作用教育学把目标对准全体每一个学生，而非个别学生，这能做到“大面积丰收”。

总之，平行教育原则（包括横向平行与纵向平行）是马卡连柯整个教育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因素，不能抽出来孤立地分析。如上所述，这个原则服务于共性与个性的和谐发展，反映出一种新型的从教育客体到教育主体的转化观，体现出一种高超的教育艺术（省时省力而又效果极高的最优教育方式），并且该原则本身也是辩证法的巧妙运用。因此很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 (四)整体施教原则

共性与个性的统一,要求与尊重的结合,平行作用的教育学,都离不开作为整体的施教体系。马卡连柯建立了这个体系,并竭力宣传和推广这个体系。其指导思想就是整体施教观。它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马卡连柯看来,人是一个整体,因此宜于用整体施教观对待之。他说:“一个人不能够一部分一部分地来教,而是由人所经受的种种影响的全部总和综合地教育出来的”(P. 227)。这里把整体的人与整体的教育联系起来考察,就显得更有新意、更有理论和实践价值了。

第二,在马卡连柯看来,正是从整体的人出发,德、智、体、美、劳诸方面的教育应当构成一个整体,从而发挥整体系统的效应。例如他指出,在任何情况下,劳动如果没有与其并行的知识教育及政治的、社会的、道德的教育,则劳动只能成为一种中性的过程,不会有积极有益的效果(P. 236)。因此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只有把劳动作为总的体系的一部分时,劳动才能成为教育的手段”(P. 236)。

第三,马卡连柯建议,为了更利于作为整体的个性的发展,必须建立学校、家庭、社会三方面紧密联系的整体。当地看到一些学校只有班集体而无全校统一的集体时,又当他看到学校、校外教育机关、家庭三方面的各自“集体”彼此毫无联系时,他感到“惊奇”、“不能理解”。所以,他提出:正确的苏维埃教育应当以建立统一的、有力的和有影响的集体的方式来组成。而他首先强调学校应当是一个统一的集体,在这里组成全部的教育过程。他主张,领导儿童教育的统一的儿童集体应当是学校,其他的机关都应服从学校(以上参见 P. 263—267),建立以学校为中心的、由学校、家庭、社会三方组成的统一施教体系,以利于儿童整个个性的发展。

第四,为使对儿童整个个性的影响更有效,他强调各种教育方法也应处于整个体系中。他指出,一般地说,任何的方法,不管哪一种方法,如果离开其他的方法、离开整个体系、离开整个综合影响来单独分析的话,那就既不能认为是好方法,也不能认为是坏方法。诸如惩罚的方法、说服的方法、集体影响个性的方法、师生个别影响(个别谈话)的方法等等均如此。再者,任何方法体系都不能认为是绝对不变的体系,而是处在动态中(以上参见 P. 237)。

在以上马卡连柯的教育整体观中,既涉及个性的整体性,又涉及德智体美劳各育的整体性,还涉及各个施教单位(学校、家庭、社会)的整体性,也涉及教学教育方法的整体性,而后三者都服务于个性的整体性。——这种充满辩证思想的整体施教观无疑对后人很有启发意义。

综合上面四个方面的考察,不难看出,马卡连柯辩证的整体施教观具有极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首先,马卡连柯在方法论上总是辩证地、整体地看待任何教育现象,这是他对教育方法论的极大贡献。不论过去或现在,不论在教育理论或教育实践中,关于共性与个性、要求与尊重、客体与主体、个别教育因素与教育因素体系的相互关系问题,往往不能予以正确的、恰如其分的解决,原因是不能辩证地、整体地看问题。而马卡连柯,如上所述,无时无处不坚持这种方法论。大概可以说,这是他的教育事业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因而也是他对教育理论和实践的最大贡献之一。

其次,在此方法论前提下,马卡连柯成功地解决了教育理论和实践中最棘手的问题,例如上述有关共性与个性的关系,要求与尊重的关系,客体与主体的关系,个别教育因素与教育因素体系的关系等诸多问题。这无疑也是马卡连柯对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具体贡献。

再者,马卡连柯成功地运用辩证法和整体观这一事实本身,给我们以极大的启发和激励:只要掌握了正确的方法论,教育工作者就可

以去大胆地创造、创造、再创造！就可以不断地有所发现、有所创新、有所前进！这里也包括根据当今时代的新特点创造性地进一步发展马卡连柯的教育学说。

此外，马卡连柯的整体施教观以及他的全部教育思想遗产具有三大特点：

- 一是鲜明的阶级性和党性。
- 二是反映客观教育规律的科学性。
- 三是主动具体的实践性。

这就是为什么马卡连柯的教育思想如此有力地吸引着世界各国教育工作者的原因。所以马卡连柯的贡献是国际性的。

最后，马卡连柯其人，其革命英雄主义，其乐观斗争精神，也是给后人留下的一笔永不磨灭的珍贵遗产。他坚决抵制各种错误的政治思潮和教育思潮，他不畏众多“权威”的抨击和围攻，敢于在逆境中创立社会主义的教育学说，在斗争和批判中探寻社会主义的教育真理。如今，他终生为之奋斗、为其服务的社会主义苏联虽已解体，但他的人品，他的斗争精神，连同他的教育遗产，将永远激励苏联广大教育工作者去做自己应做而又力所能及的事情。对于坚守社会主义阵地的中国教育工作者来说，结合当前现实改革的需要去继承、捍卫、发展马卡连柯的教育思想，则是责无旁贷、极有意义、无上光荣的使命。

## 马卡连柯的智育思想

有一些马卡连柯教育思想的研究者，认为马卡连柯只重视德育，不重视智育。例如，苏联研究马卡连柯权威麦丁斯基就是如此。他在《马卡连柯的教育学说》一书中，甚至介绍了体育和美育，但就是

对智育只字不提,似乎在马卡连柯的教育思想中是没有什么智育的。

诚然,在马卡连柯的教育著作中,相对于德育来说,智育确实是谈得很少的。这是由于他所领导的是违法儿童的教育机构,其主要任务是教育、培养和改造那些“不是天生的犯罪者”。这个现实的课题就决定了他把主要的智慧和精力放在德育问题的研究上,放在教育过程、教育原则和教育方法的研究上,因而就对智育问题,对教学过程、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问题探讨得很不够。但是,我们却不能由此而得出马卡连柯不重视智育的方面结论。

其实,无论从马卡连柯的教育著作还是教育实践来看,他对智育都是非常重视的。在他所领导的教育集体中,办有十年制的完全中学,让学生半工半读,让他们把学习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让他们打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鸿沟等事实,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马卡连柯通过自己辛勤的教育工作,把数以千计的所谓犯罪儿童培养成为“有教养的、有学识的人”,“使他们懂得生产,懂得生产组织,也懂得生产过程,此外,还是一个具有中等教育水平的人。”在他的学生当中,有很多人成了“技师、医生、教师、飞行员、无线电报务员、演员”。例如,有一个女学生,她学完了历史系的课程,又有五级铣工的资格,有五级的光学专门技术的资格,并且还将要获得史学家的资格。试问,只凭德育、技术教育,没有智育,能教育出“有这么多资格”的有用人才吗?

有人根据马卡连柯主张把教育过程和教学过程、教育方法和教学方法区别开来的观点,就指责“他对教育在教学过程中的重要意义却估计不足,对这个问题作出了错误的解释”。我们认为,这种指责是很不公正的。因为马卡连柯的这一观点的本来意义并非如此,而是针对那种借口所谓教学同生产联系使实施普通教育的学校的任务简单化的错误思想提出来的,是把斗争的矛头指向那种企图取消教育方法、把教育方法归结为教学法的错误思想的。试看看他所说的这样一段话便一清二楚了:“我们现代的教育思想家和个别的教

育工作组织者有一种信念,认为教育工作不需要有任何特殊的和个别的方法,认为教学法、各科教学法本身就应当包含全部教育思想。我是不同意这种看法的。我认为,教育范畴—纯粹的教育范畴—在某些情况下是有别于教学法的一种个别范畴’“把教育的工作缩小为教养的工作,我认为是不可以的。”

根据马卡连柯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他并不否认教学的教育意义,并不否认学校的教育作用。相反,他认为学校、教学在培养和改造人的工作中具有特殊的意义。他明确地指出:“在工学团的制度里,学校是最有力的教育手段……我是重视十年制完全学校的,并且我坚信,真正的再教育工作—保证不再犯的完全再教育工作,只有完全的中学里才有可能。”

由上所述,很清楚地表明,马卡连柯主张把教育过程及其方法与教学过程及其方法相对地区分开来,不仅没有错误,反而是他既重视德育也重视智育的一种表现。马卡连柯写道:“在知识、学习和教学各方面,我们有自己的规程、要求和目的,并且,这些要求应当同等地去满足每一个人。”这一段话也证实我们的这一分析并非是无根据的思辨性的产物。

马卡连柯反对学校和生产一致,主张劳动和教学不能生硬联系。也有人便据此而指责他在这点上犯了错误。犯了什么错误呢?据指责者说:他的这种主张违背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则。

果真如此吗?否,绝非如此。

马卡连柯是坚决维护并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一马列主义教育原则的。不过,他所理解的结合,不是形式上的机械的结合,而是实质上的有机的结合。具体地说,是“有教养、有学识”与“有高度熟练技术”的结合,是“懂得生产、生产组织和生产过程”与“十年中等教育”的结合,是“历史学家、地质学家、医师、工程师、设计师”与“研磨工、金属工、五级铣工、五级的光学专门技术”的结合。下面再让我们举一个由马卡连柯培养出来的这种“结合”的典型人才吧。

他是这样写的：

不久以前，有一个医师来看我。我还记得他从前是我们的巨大的研磨车床上的研磨工。每一个零件在这个车床上要做到最精细的程度，精确度要达到百万分之一米。他是这样进行工作的，工长对他说：

“请你作，要百万分之一米的精确。”

他把零件放在车床上、不必作任何检查，不用任何测量仪器，接着就说：

“看吧！这就是百万分之一米”

他的眼睛、手和车床，已经能做到那样的协调一致——不必进行检查就可以工作了。运用车床的灵敏，完全到了纯熟的程度。

这个优秀的研磨工现在成了医师，但是，在他的认识中，我现在还感觉到他对精确性是很重视的。因此，当我看到离开公社的社员们的时候，我立刻就看出他们所经历过的一切组织工作和生产工作上所获得的那种熟练技巧的反映。

马卡连柯关于教学劳动不能生硬联系的正确主张，是在与资产阶级的所谓“单元教学法”的斗争中逐渐形成起来的。这种单元教学法妄图用逻辑推理的方法来说自己会得到良好的结果，用演绎臆断的方法来给自己的脸上涂脂抹粉。马卡连柯对之是深恶痛绝的。他郑重地指出：“我深信，现在所流行的那种学校和生产一致的宣传，是相信单元教学法的残余思想，我是始终反对这种单元教学法的。”

这种单元教学法是极其幼稚可知的。它强调：比如学生做一只凳子，就必须让凳子跟俄语一致，跟地理打交道，跟数学相结合，一句话，劳动过程应当和教学计划联系起来，否则，就是教育与生产劳动脱节。马卡连柯愤怒地指出，这是一种教育偏见。他并且自豪地说：“以后，我总算由这种教育偏见里摆脱出来了。”同时，他又进一步地讽刺说：“在这个伤脑筋的问题上，我们真是费尽了心机。例如孩子们做一个凳子，就应当使这个凳子跟地理、教学联系起来（笑

声)。参观团来了,没有发现凳子跟俄语之间有一致的关系(笑声),我还感到很不好意思呢!以后,我放弃了这种看法,我直截了当地肯定这两者之间不应当有联系。”

“两者之间不应当有联系”这是愤激之语,不免有些“矫枉过正”。但不过正就不足以矫枉。马卡连柯的这一主张的基本精神仍然是正确的,是无可非议的。我们只要看看“四人帮”横行时的所谓“以典型产品带教学”、“结合战斗任务进行教学”的种种作法,便不难发现马卡连柯这一主张的现实意义了。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他的这一主张是对智育问题的一项宝贵贡献。

马卡连柯对智育的重视,不仅表现在理论方面。同时还表现在实践方面。众所周知,在马卡连柯所领导的捷尔任斯基公社中,社员一边在设备完善的工厂里参加生产劳动,一边要接受完全的十年制中学的教育。而且从一九三〇年起,公社的学校是按照机器制造学院工农专修班的教学大纲来讲课的。他们很重视基础课程,如俄语、文学、数学、物理、化学等科目的教学,这些课程占有主要的教时,并由最优秀的教师讲授。为促进劳动技术教育,开设了材料制造法、电工学、机床、生产组织、铸工、制图等专业课程。为使数学、物理、化学的讲授不仅停留在口头上,广泛地采用了实验室作业。数学、物理、自然、化学、制图等课程的教学,在当时看来是在拥有最优良设备的教室内进行讲授的。是聘请了那些由高尔基工学团毕业后升入大学肄业的学生协助教学工作的。

最后,我们还应当指出一点,马卡连柯很重视青年一代的文化工作。这种文化工作的很多方面是属于智育的,也有一些方面属于美育和体育。在《教育过程的组织方法》一文的十七节中,有专门一节谈“文化工作”。在这里,他介绍了十七个课外活动小组,其中俄罗斯文学小组、民族文学小组、自然科学小组、物理学和化学小组、外国语小组等都与智育直接有关,其余一些小组也与智育有一定的联系。又在《儿童教育讲座》一书的八讲中,有专门一讲谈《儿童习惯的培

养》。在这里,他较详尽地研究了报纸、书籍、戏剧、博物馆、展览会等方面的问题。很明显,其中报纸和书籍直接与智育有关,其余几项也与智育有一定的联系。

## 马卡连柯的美育思想和实践

马卡连柯(1888——1939)是列宁、斯大林时代培养出来的共产主义教育家,他的教育理论和方法曾对我国的教育工作发生过很大的影响。我们现在仅就其美育的思想和实践方面,概括地作一些分析。

马卡连柯非常重视美育。他本来计划在四卷的《双亲读物》的第二卷中详细研究美育问题,可是由于某种原因,只写好第一卷便搁笔了。

马卡连柯也非常重视美学。他主张美学应贯穿到人的生活和教育的一切方面中去,认为美好的生活“就是和美学联系起来的那种生活。”他并且恳切地指出,“决不能够看不起生活上的美学这一方面。而正是我们作教师的对美学方面常常犯一些虚无主义的毛病。”在他的教育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些富有深刻教育意义的术语,如生活的美学、集体的美学、纪律的美学、军事化的美学、军事生活的美学、游戏是“儿童集体里所必需的一种专门的美学”等等。

马卡连柯还非常重视美。他主张生活的美、集体的美、行为的美、环境的美,等等。不仅如此,更有价值的是他把各种美的表现,都区分为两个方面,一为内在的(本质的、内容上的)美;一为外在的(表面的、形式上的)美。以集体的美为例,所谓内在的美,是与集体内部的协调一致、旺盛情绪、愉快活泼、乐观主义、奋发前进等等相联系的,而外在的美则是与集体外部的仪式、整洁、美观、外表秩序等等相联系的。又如行为的美,其内在的美表现在精确性、责任感、善于

克制自己等方面 ;其外在的美表现在文明、有礼貌、仪态大方、说话有分寸等方面。

马卡连柯既然重视美育、美学和美 ,那么这三者的关系如何呢 ?根据他的言论和实践来看 ,所谓美育 ,就是和美学联系起来并与美学规律相符合的那种教育 ,也就是把美学观点贯彻到教育工作的各个方面 ;所谓美育 ,就是教育工作的美化 ,或美化的教育工作。在马卡连柯看来 ,美化生活、美化集体、美化行为、美化环境等等都是美育的内容。

提到美育 ,一般人只想到音乐课和图画课。当然 ,这两门课确实是进行美育的两项重要内容和基本途径。但如果把美育和这两门课程等同起来 ,那就未免太片面、太狭隘了。其实 ,美育的内容和途径非常广泛 ,而马卡连柯就正是这么理解的 ,也正是这么实践的。

在马卡连柯所领导的教育集体中 ,他除掉把图画、音乐列入美育的内容和途径外 ,还把更多的项目列入了美育的内容和途径。

(1)广泛地组织课外活动小组。例如 ,马卡连柯在《教育过程的组织方法》一文中向教育工作者推荐的十七个课外活动小组中 ,就有八个组是与实施美育有关的。这八个小组的名称是 :合唱队、戏剧小组、管乐小组、弦乐小组、响乐器小组、美术小组、舞蹈小组、摄影小组。

(2)创造舒适和美好的学习环境。马卡连柯要求用审美的观点来考虑学校的建筑和设备 ,主张必须让儿童、少年和青年在舒适和美好的环境中生活和学习。他为此曾多次提出 ,创建一所学校 ,一定要有良好的校舍 ,“里面要有充分的阳光 ,要有很好的厕所、洗浴室、淋浴室。房子里面空气充足 ,宜于在里面学习、工作和生活”。其次 ,一定要有很好的设备、家具和教具 ,要有很好的实验室和图书馆 ,要有很好的生产条件。最后 ,还一定要在学校里进行合乎审美要求的各种装饰 ,要有“必需的和最低限度的陈列品”。

看到这里 ,也许有人会问 ,这样按照审美的要求来办学校 ,不是有些资产阶级化了吗 ?根据马卡连柯的意见 ,这种做法正是从“把

培养健康的一代的任务放在首要的地位”来考虑的,是合乎社会主义的要求的。相反地,“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恰好是这样的干法的:让儿童在很好的工厂里工作,但他们却住在极坏的茅屋里”。也许又有人会问,在办学校时没有条件(如缺乏经费)做到这一点怎么办?马卡连柯说:“我们倒不以为非得这样不可”。但我们必须朝着这样的目标去努力,去斗争,经过一定的时间之后,这样的目标不仅必须达到,而且是一定可以达到的。

(3)保持整洁。马卡连柯认为整洁具有非常重大的教育意义。整洁可以美化生活、美化集体,“可以发展对细节和整体的注意力”。因此,他要求“教会儿童不仅愿意清洁和爱好清洁,而且经常善于保持清洁,要求清洁”。

马卡连柯对整洁的要求是很高的。在他所领导的教育集体中,到处都摆着花盆,不仅窗台上、走廊上有,而且楼梯上也有。他绝对不许在学校里到处堆放乱七八糟的杂物。他甚至认为,如果一个学校到处挂着蜘蛛网,那它就不可能是一所好学校。他建议由全体学生轮流打扫厕所,因为“厕所的状况也能评定一个机关的文化水平”。他建立了严格的整洁检查制度,检查时用一条洁白的手帕到处去擦,如果手帕上沾上了一点灰尘,便判定为不整洁,并且要给予相应的处罚。

(4)注意仪表。马卡连柯认为一个人的仪表必须合乎审美的要求,这在其生活中具有很大的意义。他说:“很难想象一个肮脏的,马马虎虎的人,他竟能注意自己的行为”。所以他要求学生的皮鞋要擦得发亮,头发要梳得美观,衣服要穿得整洁,“年龄较长的学生应当常常仔细地刮脸。”并且认为这一切都“是儿童集体里应该做到的事情”。甚至说,“皮鞋应当经常刷干净,办不到这一点事情,那还能谈到什么教育?”但是,他反对那种过分追求仪表美观的不正当做法,例如他指出:“对于女生使用化妆品,梳过于时髦的复杂的发式,染红指甲,都应当加以禁止。”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出制服在美育中的地位问题。马卡连柯认为,“儿童们应该穿漂亮的衣服,漂亮到引起他们的惊奇。”我们“将不惜一切努力,要使每一个学校的学生都有漂亮的制服,这是团结集体的一种很好的‘胶着物’。……一个集体,只要你使它有很好的服装,那里在管理上就有50%的把握了”。

(5)培养文明的行为和习惯。马卡连柯把培养文明的行为和习惯也纳入了美育的范畴。就是说,他非常注重学生行为上的美,或行为的美学。在这方面,他认为最有意义的是培养有礼貌的行为,而这种仪表上的有礼貌的形式“是必需的,有益的,能特别使集体美化起来。当外表上的有礼貌的形式使集体美化的时候,它就起着辗转重复的作用,就已经使集体在美学方面具有吸引力量。”此外,他要求学生不大喊大叫,不乱蹦乱跳,不随地吐痰,不用两个指头擤鼻涕,甚至不扶着栏杆上下楼梯。这些在一般人看来都是小事情,但在马卡连柯看来,“在集体生活中,像这样的小事是很多的,集体里所应有的行为上的美,就包含在这些小事情上”。

(6)实行纪律和军事化。纪律和军事化似乎与美育无关,这是一般人的见解。但马卡连柯却认为,纪律和军事化都能美化儿童的生活,也能美化儿童的集体,所以它们具有很大的美育价值。

马卡连柯把“纪律能美化集体”作为“应该给儿童暗示或提出的一个重要理论”,是关于纪律本质的第四个定理。他认为,“纪律这一方面——纪律的美,纪律的美学——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他要求“纪律不单单成为外表的装饰”,而要“使纪律的美产生在纪律的本质中”。即使纪律成为愉快的、有吸引力的、生动活泼的教育因素。

马卡连柯认为“应当有军事生活的美学,应当整饬、精确”,这样就“能保持集体的力量,能防止不整齐、不协调的行为,能防止行动中的松懈和散漫”。什么是马卡连柯的军事化?在他看来,军事化并不是严格的操练,干任何事都要排队。他认为军事化是儿童教育机关里的游戏的一种形式,通过这种形式,可以培养会走、会站、会

说、有礼貌等的美好行动,也可以培养准时开会、严守岗位等精确性和责任心的美好品质。

(7)建立各种传统。根据马卡连柯的意见,充满着各种优良传统的集体,才会是美丽的集体;同样只有为各种优良传统交织起来的生活,才会是美丽而富有内容的生活。因为传统能给集体以外在的美的形式,同时也能赋予集体以内的美的内容。例如,在马卡连柯所领导的集体中,尊重旗帜的传统,穿着整齐漂亮制服的传统,值日队长的公开报告不受检查的传统,把最困难的任务分配给最优秀的分队的传统等等,都显然具有这种作用。正如马卡连柯自己所指出的一样,“这样的传统,能美化儿童的生活。……我以为,没有这样的传统,要有正确合理的苏维埃教育是不可能的”。

(8)开展各种活动。在马卡连柯所领导的集体中,除掉组织各种课外活动小组以外,还经常有计划地开展各种活动,如举行各种晚会、进行校外参观、组织暑期旅行等等。通过这些活动,使学生能够比较广泛地获得表现美、欣赏美和创造美的机会。

(9)注意德、智、体、美、劳的和谐发展。在马卡连柯看来,德、智、体、美、劳各方面统一而和谐的发展,亦即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的本身就是美。因此,在他所领导的集体中,就自觉地把美育和其他方面的教育结合在一起。其经验可概括为“四寓”,即寓美育于德育、智育、体育、劳动教育之中。

(10)要顾及儿童的年龄特征。根据马卡连柯的意见,从儿童幼小的时候起就要开始进行审美教育,如美妙的摇篮曲、故事、游戏、图画、小人书等等,这便是儿童美育的第一步。其次就是电影、戏剧、俱乐部、绘画陈列室、艺术作品的朗读、大量种植花木,以及上述的其他各种方法。

马卡连柯还指出,在进行美育时,要把儿童和成人区别开来,不能用对成人的方法去对待儿童。

综上所述,完全可以看出,马卡连柯对美育的理解是非常广泛和

深刻的,很值得我们学习。当然,在某些具体作法上,我们应当因时因人因地制宜,切不可生搬硬套。

## 马卡连柯论教师

安·谢·马卡连柯(1888—1939年)是苏联著名教育理论家和教育实践家。他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苏联的教育事业,并以自己非凡的才能,探索社会主义教育的理论和方法,从而创立了一个崭新的教育体系。他的七卷本全集约有200万字,内容丰富,取材广泛,深入地论述了教育理论的各方面。今天,在纪念这位伟大的教育家诞辰100周年之际,学习他关于教师问题的论述,对于加强教师的修养,提高教师的素质,搞好当前的教育工作,是十分有意义的。

### (一)教师的地位和作用

马卡连柯把教育看作是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一项崇高的事业。它关系到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兴旺。而“不好的教育是我们将来的痛苦、辛酸,是我们对其他的人们和整个国家的罪过”。(《马卡连柯教育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下卷129页。以下只注明页数者,均见此书)在整个教育工作中教师是一支不可缺少的主力军,是责任最重大的工作。因此,他指出:“教育家在我们苏联是最受尊重的工作者。教师的任务是最光荣的任务——为我们生活中各个部门造就许多干部”。(上卷24页)

马卡连柯不仅从理论上说明教师工作的意义,而且以自己全部教育实践活动为人民教师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先后从事教育工作30多年,他的一生是忠诚地为人民教育事业服务的一生。十月革命

前,马卡连柯在铁路职工子弟小学工作了10年(1905—1914),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1917年,马卡连柯作为成绩优异的学生毕业于师范专科学校,相继担任克留科夫铁路小学和市立小学校长。从1920—1935年,先后主持创办“高尔基工学团”和“捷尔任斯基公社”。当时苏联国内战争刚刚结束,国民经济百孔千疮,国家不可能有充足的经费用于教育事业。但是,生活的艰苦、设备的贫乏、工作的困难,并没有吓倒马卡连柯。相反,他十几年如一日,呕心沥血,辛勤操劳,以惊人的毅力和非凡的组织才能,克服重重困难,探求并实验新的教育方法和组织形式,把高尔基工学团和捷尔任斯基公社建成了一个模范的教育单位,把三千多名流浪儿童和少年违法者教育成为社会主义有用的公民。其中不少人成为工程师、医师、教师、科学家、劳动模范和战斗英雄。马卡连柯的教育实践活动,就其惊人的成就来讲,不仅在苏联教育史上写下了新的一页,而且也是世界教育史上的杰出的成就。正如无产阶级文学家高尔基在1933年评价马卡连柯的教育成就时所说:“照我看,你那有伟大意义和十分成功的教育试验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今天,我们学习马卡连柯的教育思想,首先要学习他公而忘私,忠诚人民教育事业的献身精神,为发展我国教育事业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 (二)教师工作的特点

马卡连柯不仅指出了教师工作的重要意义,而且进一步论述了教师工作的特点。这些特点主要是:

### 1. 教师工作的目的性

教育工作的根本自的是培养什么人的问题。但是,苏联当时有许多教育工作者不重视教育目的问题。马卡连柯对此提出批评说:“最可怪的是教育工作目的几乎变成被遗忘了的范畴”(上卷71页)他认为确定教育目的是教育工作中最主要的问题,“如果我们不向

自己提出一定的政治目的,那我们简直就不能去教育人,也就没有权利进行教育工作”。(下卷 11 页)这就是说,教师工作不是为教书而教书,而是教书育人,把青年一代培养成社会主义社会有用的公民。他说:“教导员和学生初次会面的时候,应当给自己提出一个实际的目的:把这个男孩子或女孩子教育成为真正有教养的苏维埃人、劳动者、有技术、有学识、有政治修养和高尚道德的身心健全的公民。教导员永远不应当忘记自己工作中的这个目的,简直连一分钟也不应当忘记。”(上卷 328 页)当教师明确自己的工作目的以后,应该努力工作,为达到这个目的而顽强奋斗,绝不允许有任何不负责的态度。

## 2. 教师工作的创造性

马卡连柯认为教育学是最辨证、最灵活的一种科学,也是最最复杂、多样的一种科学。因为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揭示如何培养青少年的客观规律的一门科学,而青少年又是各不相同、形形色色的。所以,教师工作不能墨守成规、死搬硬套,而应勇于创造。他说:“在我们教育工作中,我们有权拒绝创造吗?不能够,我们决不能拒绝教育工作中的创造性”(上卷 104 页)马卡连柯一生的教育活动,可以说是创造性的活动。当年,他创办高尔基工学团时,旧的经验已不适用,新的经验又没有出现。可以说,没有任何捷径可循。但是,他并没有退缩,而是不断探索、不断创造。他不是以书本上的公式出发,而是分析实际情况,以新的教育原理代替陈旧的原理,以新的方法造就新人,从而总结出许多有价值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例如追求远景的方法、平行影响的原则、要求与尊重相结合的思想等等,丰富和充实了苏联教育学。

## 3. 教师工作的示范性

马卡连柯认为教师的自身行为在教育上具有重要意义,教师行为的每一瞬间,都在教育着儿童。因此,作为一个教师必须严格要求

自己,处处为学生作出表率。凡是要求学生做到的,教师首先要做到。一个教师靠什么取得学生的信任、从而影响学生呢?是靠动听的言词、空洞的说教吗?不是,而是靠教师的实际表现。他说:“假如你的工作、学问和成绩都非常出色,那你尽管放心,他们全会站在你这一边;……相反地,不论你是多么亲切,你的话说得多么动听,态度多么和谐,不论你在日常生活中和休息的时候是多么可爱,但是假如你的工作总是一事无成、总是失败,假如处处都可以看出你不通业务,假如你做出来的成绩都是废品和‘一场空’——那末除了蔑视之外,你永远不配得到什么”。(《马卡连柯全集》一卷231页)

#### 4. 教师工作的技巧性

马卡连柯认为教育工作是一项复杂、细致的工作,要正确地组织教育过程,培养一代新人,就必须掌握教育技巧。教师是否掌握教育技巧,关系到教育效果的好坏。为什么在许多学校里,有的教师上课时,学生很安静地听,有的教师上课时情形就会很坏。“这只是因为一个教师有教育上的技巧,而另一个教师没有教育上的技巧”。(上卷109页)

马卡连柯认为教育技巧是多方面的,作为一个教师应掌握以下一些主要技巧:

##### (1)教师要善于组织学生集体。

他曾多次指出只有在坚强自觉的集体中,才可能有真正的共产主义教育。“教师的使命就是建立这种模范的组织,爱护它,改进它,把它传给新的教师”。(上卷81页)组织学生集体的教育技巧包括正确选择集体的干部,形成集体的正确的舆论和优良的传统,善于唤起集体生活的乐趣,把比较简单的快乐变为更复杂的快乐,使学生集体生活保持朝气蓬勃。同时,教师还要善于组织集体的活动,例如课外阅读活动、节假日活动、文体活动、学生会议等等。

##### (2)教师要善于观察青少年的个性特征。

他认为一个教师应该了解每个学生的志向、兴趣、弱点和长处,

这样才能更好地进行教育工作。如果不了解青少年的个性特征,就会“忽视人的多样性和硬把教育的任务问题放进对所有的都适用的一句话里面,那会是不可思议的粗枝大叶”。(上卷6页)在这方面,马卡连柯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他善于观察学生的各种表情、行为,从而了解每一个学生的复杂心理活动。正如高尔基所说的,马卡连柯了解他的每一个学生,他能用五句话说明每一个学生的特点,就象用快相照出的一样。

### (3)教师要善于处理教育实际工作中的各种问题。

他认为教师需要以极大的勇气和责任心去发现最好的影响儿童的方法,决不允许用一种刻板公式对待学生。在马卡连柯的著作中,我们随时可以看到他善于处理各种实际问题的事例。例如如何对待青少年违法者?马卡连柯从来不把自己的学生当作过去的违法者看待,而是看作具有积极力量和可能变化的人。每当新学员入学时,马卡连柯总是要讲“应该忘记过去,应该不断地前进”。他的基本原则是尽量地多要求一个人,同时也要尽可能地尊重一个人,辩证地处理要求与尊重相结合的问题。

### (4)教师要善于控制自己的行为、声调和表情。

马卡连柯在这一方面论述很多,他说:“高等师范学校应当用其他的方式来培养我们的教师。如怎样站、怎样坐、怎样从桌子旁边的椅子上站起来、怎样提高声调、怎样笑和怎样看等等‘细枝末节’”。(上卷109页)他认为如果没有这些技巧,那就不能成为一个好教师。

教师的工作技巧如何获得呢?马卡连柯认为只要热爱教育工作,通过工作的实践锻炼和主观努力,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教育能手。他说:“技巧是可以获得的东西,正象可以作一个有名的施工,可以作一个出色的医师一样,教师也应当并且一定能够成为一个呱呱叫的能手”。(上卷120页)为了使教师获得教育技巧,他建议“高等师范学校应当坚决地改进自己的教学大纲。它们应当培养出非常有修养的、有学问的教育技术家”。(上卷23页)马卡连柯的这些观点,

对于我们当前纠正忽视师范教育的特点,改变轻视教育专业训练的倾向,仍有现实的意义。

### (三)教师集体的形成

为了发挥教师在教育工作中的主导作用,马卡连柯还进一步提出建立教师集体的问题。集体教育理论是马卡连柯教育体系的中心思想,贯穿在马卡连柯的全部教育活动和全部教育论述里。在他的集体教育理论中,包括建立教师集体的问题。他说:“教师集体和儿童集体并不是两个集体,而是一个教育集体”。(上卷 107 页)

马卡连柯认为教师集体在学校教育工作中有重要的作用。这表现在:

建立教师集体有利于形成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学校教育是对青少年所施予的一种有目的、积极的影响。青少年正是在有目的、有系统的教育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他认为如果学校教育工作没有确定的方针,而教师的力量又很涣散,这种情况就会导致教师工作效率降低和教学秩序混乱。因此,他提出“一个教师集体,要有统一的工作方法,要不但能集体地为‘自己的’班级负责,而且能为整个学校负责,如果没有这样团结一致的教师集体,那么,所谓正常的学校教育工作是很难想象的”。(上卷 91 页)

建立教师集体有利于形成学生集体。一个自觉的学生集体如何形成呢?马卡连柯认为它不是自发形成,而是与教师的关怀、培养分不开的。教师集体的统一意志、统一部署、统一工作步骤,对形成学生集体关系甚大。如果没有良好的教师集体,就不可能培养出良好的学生集体。他说:“如果十五个教师每人根据自己的能力和意愿来进行教育工作,那是不能够培养出集体来的,因此,也应当有教师集体,这是很明显的”。(上卷 106 页)

建立教师集体有利于发挥教师个人的才能。每个教师个人的能

力是有限的,而在教师集体中,教师之间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团结起来的力量是巨大的。“如果有五个能力较弱的教师团结在一个集体里,受着一种思想、一种原则、一种作风的鼓舞,能齐心协力地工作的话,那就要比十个随心所欲地单独工作的优秀教师要好得多”。(下卷 81 页)

那么,怎样才真是一个良好的教师集体呢?马卡连柯认为一个良好的教师集体应该有共同的目的、真诚的团结、坚强的领导、统一的行动。

所谓共同的目的,就是教师集体要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和信念。集体的每个成员,要自觉地为实现这个共同目标而努力工作。在集体的实践中,常常发生个人的目的和集体目的对立的问题。如果在集体中能感觉到共同目的和局部的个人目的之间存在着这种对立,这就说明这种集体组织得不好。因此,他主张“应该有这样的教师集体:有共同的见解,有共同的信念,彼此间相互帮助,彼此间没有猜忌,不追求学生对个人的爱戴。只有这样的集体,才能够教育儿童”。(下卷 81 页)

所谓真诚的团结,就是集体和成员为着实现共同的目标,齐心协力,共同奋斗,他认为教师集体的团结统一是有决定意义的一件事。在这个集体里,年轻教师与年长教师、有经验的教师与缺少经验的教师之间应当维持友好的关系,加强团结,反对个人倾轧。他说:“再没有任何东西比教师集体里的个人主义和倾轧纠纷更可怕的了,再没有任何事情比这样的现象更可恶、更有害的了”。(上卷 218 页)

所谓坚强的领导,就是整个教师集体要在校长统一的领导下进行工作。他说:“要想使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员成为善尽职责,严肃认真的教师,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把他们团结在一个集体里,团结在教师集体里的一定中心人物——校长的周围”。(下卷 83 页)马卡连柯主张学校实行校长负责制,反对多元领导,学校的领导人应该是全权代表学校的校长。他认为学校工作的责任中心,分散在几个

负责人手里 ,是一种不可理解的作法。

所谓统一的行动 ,就是教师集体对学生的影响应该是一致的、统一的。他要求教师集体要统一自己的思想、行动、计划和步骤 ,反对教师个人脱离集体的行动 ,去追求所谓学生的爱戴。如果各个教师对学生提出的要求不一致 ,甚至互相抵触 ,就会使学生无所适从。因此 ,为了建立统一的学校集体 ,“需要有统一的学校利益 ,统一的学校工作方法 统一的学校自治”。(下卷 271 页)

以上三方面是一个良好的教师集体的基本标志。它们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缺一不可的。共同的目的是建立教师集体的基础 ,真诚的团结是建立教师集体的思想条件 ,坚强的领导是建立教师集体的组织保证 ,统一的行动是教师集体的共同意志表现。

## 马卡连柯论教师的教育技巧

[苏]Ю·П·勒沃娃

A·C·马卡连柯是最早提出关于提高教师的职业修养 ,关于教师掌握教育技巧问题的人之一。他写道 ,在教育工作中 ,教学法问题 ,甚至连调音叉、和音 ,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他确信 ,组织教育只是“指望于热心人、苦行僧 ,或者是积善心”未必是恰当和令人信服的。(《马卡连柯全集》,1957年莫斯科出版 ,第一卷 ,第660页)他向来强调 ,只指靠于灵机一动的教师的天才 ,这是不能容许的。特别当前在中等教育具有现代规模的情况下 ,尤其不能指靠于这点。马卡连柯坚信 ,教学和教育工作能否取得成就 ,取决于以技能、业务水平 ,掌握教育技术的水平为基础的教师的技巧。

对教育技巧感到极大需要的首先是青年教师 ,按职业上的要求在行地备好了的课 ,往往就是由于教师不善于支配自己的感情 ,控制自己精神状态 ,运用自己的创造力而不能产生必要的效果。多少青

年教师,甚至中年教师由于自己在情绪上没有准备成熟,没有训练好而蒙受损失。在研究尔沃夫市五百名青年教师的工作时,每四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认为自己在职业修养上的主要缺点是不善于控制自己的心理状态。他们说得对,因为对自己的心理器官、感情自我培养的研究,某些情绪的发展,控制情绪的方式等,还没有成为培养未来教师的不可缺少的部分。年轻的专家往往简直不懂得教育的演技是他工作获得成功的不可少的条件。遗憾的是,作为教师职业所必要的演技,无论在高等学校的任何一个教学大纲里,无论在每一本教育学或教育心理学课本里,都尚未作出规定。

马卡连柯认为,在我们高等师范院校里,需要按新方式来培养未来的教师。必须使他们懂得怎样站,怎样坐,怎样从桌子旁边,从椅子上站起来,怎样提高声调,怎样笑,怎样注视学生,怎样注视整个班级。他断言,这就是重大的技巧,能够而且必须学会这种技巧。这种技巧的实质是什么呢?马卡连柯所拥护的教育技巧的内容之一,这就是表演。表演不是作为一种娱乐的形式,而是要求教师掌握戏剧艺术的演剧的表演。他写道:“这里,我们会触及众所周知的演剧方面的……技巧。”(见《马卡连柯全集》第5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56年版,第229页——译者注)其次,“做教师的决不能够没有表情,……要善于运用表情,……。不过,不能单纯地作舞台式的、表面的那种表情。要有某种的传动带,这个传动带应当把你们的完善的人格和表情结合起来。这种表情不是死板的表情,不是机械式的表情,而是我们心灵里所具有的那些变化的真实的反映。”(同上书,第268至269页——译者注)马卡连柯本人就掌握了这个“传动带”——他善于运用表情。有关征服库良日的《教育诗》中著名事件之一,是这一点的最好证明。(参考《马卡连柯全集》,第一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年出版,第518页至519页——译者注)教育工艺的异常精细和教育演技的复杂性,在这里表现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与教师真情实感有关的教育技巧的“传动带”,就是他的调皮,逗弄人的满

不在乎的样子,使学生大吃一惊的意外事。马卡连柯完全有根据指出:“我习惯于克服自己的情绪”。——而且把“我们的道路只有一条,那便是在行为中进行操练。”(见《马卡连柯全集》,第二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57年出版,第203页——译者注)这样一个思想,作为遗嘱给我们留下来了。说到教师的表演时,我们必须着重指出,按照自身职业的特点,教师的表演,根本不同于演员的表演,教师并不扮演按脚本所指派他的角色,不是每一次都体现为新的舞台形象,而永远是一个教师。正是教师的思想上的明确方针,教师所具有的个性品质,教师高尚的情操,是教师教育技巧的主要力量。教师为了有效地实现预期的教育影响,需要有演员的艺术,需要戏剧化。他力图不“等待奇迹”,而是以认准的教育心理的技巧来作为顺利实现这个预期影响的基础。

按照马卡连柯的意见,教育工作由无数不停顿的工序所组成,其中有“教育力学、物理学、化学,甚至教育几何学。”同时还有演员的技巧。有时这些工序得拖延一年或几年时间,有时在二、三天时间内进行,而有时却具有闪电式活动的性质,但是,所有这些工序都不依它的时间长度为转移,而是基于复杂的导演艺术:首先,它应当追求主要的目标是对整个集体的教育影响;其次,它应当善于既把领导,又把教师集体置于某种和谐的状态。

马卡连柯指出,要能合乎理想地完成每道工序,需要极大的努力和善作表演。比方说,在重新教育任何一个学生的工作中,马卡连柯一般作平心静气的表演,但有时候这种表演却要采用毫不掩饰的、最后通牒的声调。在公社社员迎接自火车接收来的流浪儿童的组织工作中,我们看到了按照舞台艺术规律精彩上演的教育戏剧,给那些流浪儿童的心理以闪电式的影响。这是一个有六十个喇叭的乐队,隆重打着旗帜,公社社员们又都穿着特别讲究的制服,特别炫耀体态和端正的姿势,并且象征性地烧掉流浪儿童的“厄运”,——这一切戏剧性动作,不能不振奋新到来的人的精神。旁人由于异常感动而掉

下眼泪来,但是我们明白,这就是表演,其中教师所表演的每一场,在表演中都具有特别的意义。

马卡连柯一再指出,在准备和讨论任何集体措施时,教师丰富的经验和指导作用都会压制学生的积极性和独立性。因此,他劝告教师,必要时假装束手无策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怎样做更好,……。那时,学生就会比较积极地投入关于集体未来行动的共同思考,甚至最沉默寡言的人也提出自己的建议,而最消极的人也开始表现出主动精神。教师与学生谈话,这是个别感化学生极可靠的方式。关于这一点,安东·谢敏诺维奇写道,谈话对没有经验的教师来说,仿佛是教育技巧的极高表现。而实际上这是最原始的教育方法,因为学生很“不喜欢那些专门的教育手段,尤其不喜欢人家对他们净谈些教育的好处,把每一种批评都变成道德的说教。”(见《马卡连柯全集》,第五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56年出版,第84页,——译者注)

马卡连柯在自己实践中详细制订出即将到来的谈话的独特的导演计划,这种计划考虑到学生的状况,他的性格、交往的声调、教师自身的行为。如安东·谢敏诺维奇所指出,谈话可以在犯规后当着高年级学生的面立刻进行,可以在犯规后立刻地,但是与学生面对面地谈话,也可以是有意推延时间的,也是面对面的谈话。马卡连柯认为,任何谈话都需要选择适当的地点、时间、环境和声调,即要求教师有一定的表演技巧。有关事后的谈话,马卡连柯写道,需要在晚上较晚的时间进行,以便谈话不会被中断。进行谈话,一般需要采用亲切的声调,详细地、留心地去听,但是,不容许不恰当的微笑、讽刺、不成功的玩笑。这样的谈话应当预先邀请,使学生焦急不安,因而对自己行为多加考虑,跟同学谈一谈,对严肃的谈话作好心理上的准备。不只教师的举止,而且他的声音,面部表情,都决定着谈话的结果。

马卡连柯在教师感情的整个表现手法中看出使举止、行动、面部表情戏剧化的必要性:从一般的不满到气愤,从一般的表扬到对学生行为深感满意。马卡连柯有这么一段名言:“……要善于这样说话:

使孩子们从你们的话里感到你们的意志,感到你们的修养,感到你们的个性。”(见《马卡连柯全集》,第五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56年出版,第238页——译者注)必须学习这样做。在《我的教育经验中的若干结论》一文中,在强调掌握语言、声调、声音的表演艺术对教师劳动的作用时,安东·谢敏诺维奇写道:“我知道用冷静沉着的口气说‘你好’和用安详温和的口气说‘你好’究竟表示什么意思:我知道用严厉冷淡的口气说‘没事了,可以走了’。和用稳重而柔和的口气说‘没事了,可以走了’。究竟是表示什么意思。……如果你们向自己提出这样的若干有趣的问题,并进行练习的话,这样做并不是不好的。我常常教我的同事们作这样的练习。……这里没有适当的声调的运用,没有适当的脸色的表情,是什么也作不好的。”(见《马卡连柯全集》,第五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56年出版,第241页——译者注)这就是说,象这样一类的练习是需要的!这就是说,编有练习用的习题,习题解说,完成习题的方法,这一类的参考书是需要的。如果我们认真想把优秀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应用于现实生活,就自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探讨马卡连柯关于作为教育技巧因素的善于表演这个原理时,不能不指出他极其注意举止的方式。他认为对教师来说,最重要的是愉快的心情、朝气蓬勃、内部情绪的乐观主义。为此,应当作一些表演,应当增加一些“机警灵活,满面春风——不是要作出某种笑容来,纯粹是一种和蔼可亲的笑容。”(同上书,第216页——译者注)我想,注意教师外表美的表现,也属于教师的演技,这首先表现在服装上。按照马卡连柯的意见,服装的朴素、严整、严守一定的风格,是保证教师内心端正和精神上充分动员的极好帮助。因此,在A·M·高尔基工学团和Ф·З·捷尔任斯基公社里,甚至在生活困难时期都惯于穿着比较好的制服来工作。

马卡连柯曾一再把教师工作同演员的工作加以比较,这种比较在《教育诗》一书中,听起来带有讽刺性的忧郁和温和的幽默声调。

“为什么会有这样不公平的事，……我不是做了一件有益的事吗？这岂不要比在俱乐部的晚会上唱一支罗曼斯曲一千倍地困难和一千倍地有价值，甚至比在一个好戏里扮演一个角色，甚至比在“莫斯科艺术剧院”演出都要困难吗？……为什么那边有成百上千的观众向演员们鼓掌，为什么演员们可以怀着关怀和感激的感觉回家睡觉，而我却要在这漫长的黑夜，满腹苦闷地坐在这被遗弃在田野里的工学团里，为什么连冈察里夫卡的居民都不向我鼓掌呢？……。”（见《马卡连柯全集》第一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年出版，第427页）我们研究关于教师的教育演技资料时，发现马卡连柯的原理和K·C·斯坦尼斯拉夫斯基（1863—1938年，著名的苏联导演、演员、教育家，戏剧理论家——译者注）的体系异常一致，这种一致性表现在理解演员和教师个人的思想性和道德水平之中，表现在对演员集体和教师集体的道德的高标准的要求之中，表现在理解演员和教师都必须顽强地作自身努力之中，表现在两者都被崇高目标所激发而为完善技巧而进行的斗争之中。

显然，马卡连柯醉心于莫斯科艺术剧院和对斯坦尼拉夫斯基的理论著作很感兴趣，这不是偶然的。天才的教育家研究过优秀导演所问世的每一篇文章，逼真地领略过有关他的劳动特点，有关戏剧教育学和演员创作的叙述。战斗性的革新精神，对教育学中形式主义、蒙昧无知所作的彻底的、不受妥协的斗争，在寻求教育技巧的客观科学基础中的唯物主义的明确方针，使马卡连柯的学说与为提高职业水平和技巧奋斗不息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体系的创造发明和科学实质互相接近。他们两人都明白，在人类技能的机构中没有简单的依赖性，他们寻找精确的技术手段，以能保证一个演员，一个教师的感化人们的工艺。这一切为考虑创作象一种关于马卡连柯的教育演技的文选的可能性和合理性提供根据。

在提高青年教师业务水平方面我们二十年的工作经验中，我们遵照马卡连柯的遗著，始终不渝地特别注意教育技巧问题。我们力

求做到使所有他的有关教育技巧的原理为青年教师所掌握,并创造性地把它运用于他们的实践活动。这常常会产生良好的结果。青年教师认清了教育技巧的意义后,他们力求作为有效工作的必要条件来掌握它。根据我们的观察,他们的教学教育活动在情感上逐渐变得更加卓有成效。教师们学习马卡连柯著作的这些观点,在争取提高自己的劳动质量的斗争中无疑将得到强有力的帮助。

## 马卡连柯教育思想与《教育诗》

《教育诗》(1933—1935年)叙述了教养院的流浪儿童,从不遵守纪律的一群乌合之众,在一种新的教育理论和方法指导下,逐渐转变为团结战斗的集体,成为苏维埃新人的故事。此书1925年开始写作,1935年全部脱稿,全书共分三部61章。第一部于1933年首次刊登在莫斯科《苏维埃文学》第3号上,1934年莫斯科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第二部和第三部于1935年发表,而后再合订或单行再版多次。仅到1953年为止,已在前苏联印了41版,印数达1225000册,以后,又多次再版并被译成法、英、德、波兰、捷克、西班牙、中文等多种文字在众多国家和地区发行出版。1956年,前苏联基辅艺术电影制片厂把《教育诗》拍摄成同名彩色故事片搬上银幕。中国长春电影制片厂于1957年译制在中国发行放映。可以说,《教育诗》是一部不朽的杰作,是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最宝贵的教育学遗产,在世界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马卡连柯撰写《教育诗》之时,正值他担任高尔基儿童劳动教养院和捷尔任斯基公社的工作。他根据自己和流浪儿童实际接触的切身体会,分析研究了各类犯罪儿童不同的心理情绪和生命烙印,经过长期的教育实践和艰苦复杂的创作过程,以诗一般的激情创作而成,

是一部优美而动人的教育工作记录。它由回忆录、随笔、特写、日记、政论、中篇小说等多种不同的文学体裁所组成。作者以明快幽默的语言,创造了一系列生动的艺术形象,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教育诗》生动地体现了马卡连柯的新型的教育观点,真实地反映了他的创造性的教育工程。他突破了传统的教育理论的框架,给前苏联教育史写下了崭新的一页。高尔基对马卡连柯的教育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1928年,高尔基访问了儿童教养院之后,在《苏联巡礼》一文中写道,“这几百个受了生活那样残酷的、侮辱性的蹂躏的孩子,是谁能这样改造他们,使他们变得不可认识了呢?教养院的组织者和院长安·谢·马卡连柯”。

## (一)《教育诗》各部的主要内容

第一部描写的是教养院的初建过程。年轻的苏维埃政权为了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也为了孩子们,决心把大批犯罪的流浪儿童收留下来,进行改造教育和培养。1920年9月,办起了“高尔基儿童劳动教养院”。学院的条件十分艰苦困难,没有人员,没有校舍,没有资金、没有设备,吃穿成了问题,学童们染上了盗窃、流氓、抢劫、赌博等恶习。到处是愚昧无知的人,周围又多土匪。但马卡连柯确信,孩子们是可以教养好的,尽管他手里并没有现成的科学方法和理论,他说“理论应该从我眼前发生的全部现实事件里去归纳出来”。

马卡连柯根据自己在十月革命前从事教育工作的经验,分析研究了流浪儿童堕落的根源,确认少年儿童犯罪是由于沙皇俄国的社会条件造成的。另外,他摒弃了旧的儿童学者以惩罚为主的教育理论,采取循循善诱的办法教育儿童。工作中马卡连柯虽然也有过走投无路的时刻和绝望的念头,但他没有放弃事业,始终不渝地战斗在自己的岗位上,正如他写的“无以复加的穷苦、虱子、冻伤了的脚,都不能妨碍我们幻想美好的未来”。书中也描写了马卡连柯摸索着建

立并锻炼学生集体的经过,注意在集体中培养民主的风气,以及为教养院争得了建立共青团的权利。

第二部写的是高尔基儿童劳动教养院健康成长的过程。到教养院建立的后期,教养院扩大到特烈普凯田庄,开垦了60多亩土地,种上了冬小麦、春小麦、马铃薯、甜菜……摆脱了饥饿处境。而且租到磨坊、买到马匹、建立养猪场,出乎意料地使人感到教养院竟一天天显著地富有起来,具有殷实的、有条不紊的先进企业的气派。“教养院的面貌焕然一新,变得有文化……没有一个学童再会怀疑学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了”。教养院从初期的简单上课,讲故事,进而成立剧团,建立剧院,提高了孩子们使用语言和表演的能力,也提高了其文化素质。同时,教养院里萌发了文明建设的幼芽:修整院落,购买新家具,建立花园,学童们自觉地纠正起村民们的秽言秽语来。当然,这一切的变化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凝聚着马卡连柯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

第三部写的是教养院迁往库里亚日及其改造的过程。搬到库里亚日不久,教养院很快征服了它,建立起了更庞大、更坚强的集体,在新学校建立了马房、猪圈、金属加工坊……孩子们成长很快。这些都与教养院有个好的集体息息相关,正如马卡连柯所指出的“风格和格调永远遭到‘理论’的白眼,然而这都是集体教育中一个最主要的部分”,“许多儿童机关之所以会失败,就是因为他们里面没有形成一种风格、没有形成习惯和传统”。教养院的成功,引起大学生、工人、新闻界和国外的注意,高尔基也曾亲自到教养院来参观。

马卡连柯认为“教师沉默寡言算不上什么缺点,实事求是,不辞劳苦,有真才实学,有工作能力,孩子们就会对他表现出最大的敬意和爱戴;相反,不管你多么亲切,说话多么动听,态度多么和蔼,工作却一事无成,处处表现出不通业务,那么除了蔑视之外,你永远不配得到什么。这种蔑视有时是宽大的,含着讽刺,有时是暴怒的,含着无比的憎恨,有时是执拗的,含着侮辱。”

## (二)《教育诗》阐明的教育方法

《教育诗》作为一部教育著作,阐述了新教育法:

(1)流浪儿是可教育的。前苏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旧俄国,就有200万以上的流浪儿童,革命后经历了战乱和饥饿,人数又大大增加了,也成了一个社会问题。苏联政府决心拯救和教育流浪儿童。马卡连柯成功地执行了这一任务,并且创造了教育上的奇迹。可是对于这样一个任务,人们的看法大不一样,教育家也是各说不一。至今人们也有只怀鄙视,认为不可教也的。其实,儿童生来是一样的,不能把失足儿童看成不可救药,有些儿童染上了坏毛病,总有其根源,教育的任务之一,就是从恶源里把儿童争取过来。著名教育家乌中斯基,就“人是教育的对象”写过专著。从这一点出发,流浪儿童是可以教育的,不是没有科学根据的。只是这一工作加倍的辛苦、困难而已。

(2)建设学生集体,让学生在集体中自我教育。书中叙述了马卡连柯建立和锻炼学生集体的经过。他对学生的性格、脾气、优缺点看得细致、准确。把学生分成几个连队,指派队长,有意识地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每个人也逐渐养成热爱集体生活的习惯。马卡连柯认为,学生的成长必须有良好的集体。使学生有归属性和纪律性,这是教育工作得以开展的前提。在学校教育中,教师的影响是非常关键的,但是教师的影响也是有限的。建立学生集体,通过集体的规章制度和大家的互相影响,它有教师不可取代的作用。学生有集体组织,他们就会在集体活动中得到自我教育,这叫做“平行影响”。

(3)前景教育方法。马卡连柯不迷信各种各样的犯罪记录和大包小包的档案,而是依靠对儿童的实际表现作出判断来进行工作。他认为:在改造过程中,不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过去的错误上,而应引导他们看到美好的未来。他强调说:“一个人向前瞻望的时候,如

果看不到一点快乐的远景,他在世界上就活不下去,人类生活中真正的刺激是未来的快乐”。

(4)教师要以身作则,为人师表。工学团的教师用肝胆照人的模范行动完成了对学员的道德影响。所以,他在总结组织教师集体的经验时说,“主要完全是因为我们教师的工作是那样充满自我牺牲的精神和那样地艰苦,因此,自然而然地引起了大家的尊敬。所以除了极少的例外,学员们跟我们的关系是很好的”。

(5)惩罚的方法是必要的,而且要对每个少年犯罪者作具体分析,对症下药。马卡连柯认为“在集体和集体机构没有成立之前,在传统没有形成,最起码的劳动习惯和生活习惯没有养成之前,教师可以有权采用强迫的方法”。如对懒惰者的善意惩罚就是一个生动的事例。马卡连柯故意让一个有些做精的孩子去领导一个特别懒惰的人进行劳动,结果是使他们双方都看到了这种惰性的不可容忍,从而促使双方痛改前非,树立起劳动观念和习惯。

### (三)《教育诗》的主要教育思想

#### 1. 热爱学员、信任和尊重学员

一九二〇年,当马卡连柯来到波尔塔瓦创办高尔基教养院时,他就确定了教养院的工作目的。在《教育诗》第一章“和省人民教育委员会主任的谈话”中,提出“要培养我们自己的人”,要培养新社会的人。这种人是受过锻炼的、坚强的人,是集体主义者。可是,教养院的学员都是流浪儿童和违法者,这就是说,要“用坏的原料制造出好的东西”,这就是苏维埃政府交给马卡连柯的任务。马卡连柯认为,这是“政治上迫切需要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任务”。

要完成这个任务,就必须热爱学员。马卡连柯认为,学员本来都是好的,“实际上他们都是普通的孩子”,“没有违法的儿童,而有的只是那些和我一样充分享有幸福权利的人”。在这种思想指导下,

马卡连柯对第一批来到教养院六名曾经犯有抢劫、偷盗罪的学员,不是歧视、原恶他们,而是欢迎他们,鼓励他们“应该忘记过去,应该不断前进”。有的学员来到教养院时,身上脏得要命,骨瘦如柴,生着疥癣。可是,助理医生兼护士葛利高里叶芙娜总是不辞劳苦地替他们收拾,象“亲娘”一样对待他们,表现了教养院的教师对学员的爱。特别是高尔基对学员的热爱和关怀,对学员“思想的转变”有重大影响。当马卡连柯向学员讲述高尔基的“童年”时,学员们真是“听得呆住了”。他们排命地问:“这样说起来,结果高尔基是和我们一类的人吗?嘿,真好极了!”这件事使学员们深深地感动,使他们十分喜悦地自称“我们是高尔基人”。所以,马卡连柯写道:“只有童年丧失家庭、在漫长的生涯中心里没有储藏一点温暖的人,才会深深地知道……一个伟大人物,一个有着一颗慷慨的、对人类充满热爱的心的人所给予的关怀和亲切,是多么值得珍贵。”

热爱学员,就要善于从学员身上发现极因素并引导他们前进。例如,学员卡拉邦诺夫常偷东西,被认为是“不可救药”的人。然而,马卡连柯仍然看到他积极的一面,指出:卡拉邦诺夫工作的时候非常有魄力,而且充满热情。在他的手底下真可以说是迸发出活力和灵感的火花。又如,对“童犯”塔拉涅茨,马卡连柯认为他活泼、机智,并且有出色的组织能力。还有,在“每个跳蚤都有它的用处”一章中,记述了马卡连柯在人民教育委员会遇见了一个名叫波列旋楚克的“童犯”,这个儿童被缺陷儿童教育科认为是一个“精神病患者”、“疯子”,可是马卡连柯一眼就看到这个学员“身上充满了精力”。那时,他觉得“每个跳蚤都有它的用处”,何况是一个人,是一个能过合理生活的人,于是他就把波列旋楚克带到教养院。经了解,这个学员父母双亡,家境贫苦,性格孤独,不爱说话。马卡连柯针对他的性格特点进行教育,把他培养成为一个优秀的学员。在“高尔基教养院”,马卡连柯改造、培养了几百名象卡拉邦诺夫、塔拉涅茨、波列旋楚克这样的学童,使他们成为“高尔基人”。这些“高尔基人”以后有

的成为工程师,有的成为医生,还有飞行员、产业工人、科学家等等。“教养院收到最完美的果实”。

马卡连柯还认为,不仅要热爱学员,善于发现他们的优点,而且要尊重他们,严格要求他们,因为“当我们对一个人提出很多要求的时候,在这种要求里也就包含着我们对这个人的尊重。”在教养院里,对学员的热爱尊重与严格要求是统一的。在《教育诗》里,马卡连柯阐明的严格要求原则的具体内容是:学员一定要遵守教养院这个大集体的规则和要求,遵守严格的纪律,积极参加生产劳动,执行联队和队长会议制度,执行教养院共青团支部的决议,并努力去执行宁最艰苦的任务。同时,要信任学员。在“谢苗的苦难历程”一章中,马卡连柯记述了谢苗逃离教养院,经过一段时间的流浪后又回到教养院了。然而,马卡连柯仍然信任谢苗这个学员,令他到财务处去领取五百卢布。当时,谢苗“瞪着眼睛”,不知所措,完全出乎意料之外。临行前,马卡连柯把一支手枪及三颗子弹一起交给了谢苗。过了十分钟以后,谢苗回来了。他把五百卢布交给了马卡连柯。过了两个星期以后,马卡连柯又令谢苗去领取二千卢布。还是给他一支手枪,一匹马。当时,谢苗和马卡连柯有这样一段对话:

“两千?要是我取了钱不回来呢?”

“你少说这种傻话!既然把委托书交给你,你就去取。”

谢苗的确是吃惊了,并说:“你不可能这样信任我。”然而,马卡连柯却对他说:“你年轻力壮,马又骑得好。”同时,“我知道你这个人是我一样诚实。”那时,谢苗走出办公室,高声唱起来:

高山背后,  
飞出一群老鹰,  
它们边飞边叫,  
寻找着美好的生活。

通过这段对话,马卡连柯不仅揭示了学员谢苗内心的变化,同时说明谢苗由于得到对他的信任在思想上的根本转变,而这个转机使

他增强了上进的信心,从此以后,谢苗不断前进而成为优秀学员。

坚持对学员严格要求的另一个方面是要用新的教育方法改造存在学员心上的各种恶习。马卡连柯不仅要求学员按时参加生产劳动,而且严禁喝酒、赌博、偷东西。因为他认为,要“用坏的原料制造好的东西”,“要想使美丽的花朵结出丰满的果实来,光停留在亲吻、叹赏上是无济于事的,还必须坚决地及时地剪去枯枝、铲除野草,杀死害虫”。那么,是谁去剪枯枝、剪除野草而使幼苗茁壮成长呢?就是教师。教养院的教师为了改造流浪儿童,努力工作,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所以,马卡连柯在“精选的种子”一章中写道:“对于我们的教师们在那个艰苦的时期所表现的那种非常的毅力和纪律性,我真是怀着无限的敬意。”教养院的各项工作取得显著成绩,是全体教师共同努力的结果。

显然,马卡连柯关于热爱学生、信任和尊重学生的教育观点,对我们做好挽救迷路的学生的的工作有现实的意义。目前,在我们的中小学里,也有一些不遵守纪律、偷东西、抽烟、赌钩、打人的后进生,他们被称为坏孩子。我们教育工作者不应该厌弃这些犯错误的孩子,而要象马卡连柯那样,热爱学生、信任和尊重他们,把他们教育好,使他们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人才。

## 2. 在集体中、在劳动中改造和教育学员

《教育诗》描写的是从六个犯过偷窃抢劫罪的学员来到教养院接受改造,然后逐步扩大发展,从而建立一个有四百个学员的集体的历史。在一九二〇年创办教养院时,从各处送到教养院的流浪儿童和童犯们,他们“非但根本否定我们的教育方法,而且根本否定全部人类文化”。他们好逸恶劳,偷摸扒窃,不仅在教养院内偷窃糖、钱、脂油,而且在夜里拦路抢劫,因而使教养院带上了“强盗窝”的色彩。面对这样的状况,马卡连柯并没有动摇自己的信心,而是坚信:流浪儿童是可以教育好的。他通过组织学员参加劳动、修房子等工作逐渐地组织学员集体。当时进行这项工作是很艰苦的,因为学员在教

养院仍是偷东西、打架并且毒打犹太人学员。有一次,学员卡拉邦诺夫和米嘉庚逃离教养院了。这件事,对教养院的影响很坏,有的教师也动摇了。马卡连柯在“精选的种子”一章中写道:“过去常说的我们的工作是没有希望的,对‘这样的’孩子们实行社会教育是不可能的,这种工作是徒然浪费精力等等论调,现在又抬头了。”那时,教师伊凡诺维奇曾经对马卡连柯说:“应该放弃这一切”。但是,马卡连柯仍然坚信改造流浪儿童这项工作一定能取得“最完美的果实”。学员米嘉庚对马卡连柯说:“我反正还是要去做贼。”马卡连柯坚定地回答说:“这个习惯是可以改掉的。”他认为,为了教育学员,首先必须找学员忘记过去,重新做人。他说:“我认为改造罪犯的主要方法的基本精神,是应该完全不管他过去的历史”,这样,才能使“那些肮脏的痛苦的对我们抱有敌意的生活的阴影也从我们生活里渐渐消逝。”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把学员的集体组织起来。

从《教育诗》第一部的内容来看,马卡连柯认为组织学员集体的第一步是要引导学员了解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并且通过对学员进行说理教育而逐步形成集体的舆论。在“内部的斗争”一章里,马卡连柯记述了教养院内部的失窃事件,连他自己六个月工资的一包钱也被窃了。开始,学员总觉得不知是谁偷了东西,与自己无关。针对这一点,马卡连柯与教师一起,引导学员认识教养院的糖、脂油、钱被偷,是关系到每一个学员的事,因为每对个学员都是集体中的一个成员。为了把小偷查出来,马卡连柯进行了侦查,终于查出了布隆这个“贼”,学员们都责斥了他,集体舆论发挥了教育作用。

马卡连柯还认为,为了组织学员集体,必须要有一个核心,而集体的核心要有学员中的积极分子和共青团员组成。他认为“在我们的艰苦的事业里,这个领导核心显示出他们好象一架非常准确精密的机器。”这个机器的运转就能带动集体前进。同时,在集体核心的周围,还要有一批接近核心的积极分子这样的学员,这些人是一些优秀学生。

然而,在组织学员集体时,马卡连柯特别重视的是集体的机构、

“集体的形式这个问题。他说：“我在自己的十六年的苏维埃教育工作中，把主要的力量，都用在解决集体和集体机构的建立、解决权能的制度和责任的制度等等问题上。”在《教育诗》第一部分的“队长制教育法”一章中，马卡连柯写道：“一九二三年冬天给我们带来许多重要的组织上的发现，这些发现在今后很长的一个时期里确定了我们集体的形式。”这种形式就是教养院的联队和队长制度。马卡连柯把全部学员编入各种联队，并挑选最优秀的学员担任队长，凡是重要的事情都要在队长会议上商量之后才实行。有趣的是，各队队长采用轮换制。这样，“大部分学员不但要参加一般工作，还要参加组织工作。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恰恰也是共产主义教育所需要的。”各队队长没有任何特权，他们要带领学员耕田，并在铁工场、制鞋场里干活，还要与队员一起，保卫国家的森林，捉拿偷国家木材的罪犯等等。可见，实行队长制不仅锻炼了队长，而且锻炼了每一个学员。在教养院里由于实行了队长制，使学员集体逐渐形成巩固起来。经过三年时间的教育和锻炼，“教养院里所有性格鲜明的学员已经形成一个非常亲密的团体，要拉出其中的一个，就等于割掉他们身上一块肉。”高尔基教养院是一个非常亲密团结的集体，这是很清楚的。

应该特别注意的是，马卡连柯指出，一定要引导集体“向前行进”。在《教育诗》第三部的“在奥林普的山麓”一章中，他明确地提出了个人远景和集体远景的教育问题，并且从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来阐述它们之间辩证关系。他说：“假如一个人的行动是由最近的远景——由今天的（正是今天的）午餐——来决定的，那他就是一个最软弱的人。假如他只以个人的远景，纵然是远大的远景为满足，他这个人可能显然很强有力”。“如果集体的成员把集体的远景看作个人的远景，集体愈大，个人也就愈是美，愈是高尚。”<sup>①</sup>但是必须建立起整个集体的远景，使它逐渐扩大，一直扩大到

① 马卡连柯：《教育诗》，许磊然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739、页

全苏联的远景。马卡连柯以这种理论为指导,不断引导学员“向前行进”,从教养院创建初期想夺取一个“铁桶”,以便建立一个简陋的浴室,一直到建立一个有四百人的大集体。这个事实说明了“高尔基人”在精神上、政治上的成长和苏维埃集体主义教育的成果。

在《教育诗》中,马卡连柯在阐述集体教育理论时,还着重指出必须注意集体的传统及其继承性问题。他认为,在一个联队或班组集体中,可以采用“老学员带新学员”的方法,把集体的优良传统保持下来。只有这样,才不会由于学员的交替、变换、毕业而使集体的传统中断。对这个问题,他在“第一束麦子”一章中讲得很清楚。当学员们在农田里要动手割麦之前,老学员布隆与小学员左连有这样一段对话:

“你把这一捆麦子从我手里接过去,你要好好地工作和学习,希望你长大之后能够做一个共青团员,并且也能获得我所获得的荣誉——收割第一捆麦子”。

“谢谢你,葛里茨柯!我一定要好好地学习和好好地工作,等我长大成为共青团员的时候,一定也争取到这样的荣誉——收割第一捆麦子,再把它交给年纪最小的孩子。”<sup>①</sup>通过这段对话,马卡连柯说明,在集体中,老学员也是幼小学员的老师,采用“老学员带新学员”的方法,可以有效地把集体的传统继承下来,保持下去,这对于集体的巩固是很重要的。

马卡连柯为了把流浪儿童培养成为热爱生活、热爱集体、热爱劳动的新人,他是把培养学生的集体与组织学员的生产劳动结合在一起的。劳动教育与劳动锻炼,是改造流浪儿童的手段。马卡连柯认为:“正确的苏维埃教育,不可能是不劳动的教育,集体必须要和生产劳动连在一起。”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教养院创办初期,虽然学员不情愿参加生产劳动,但马卡连柯还是对学员提出严格要求,并组织他们动手修房子、打柴、耕田、打铁、修理马车,以及运载粮食、食品等

<sup>①</sup> 马卡连柯:《教育诗》,许磊然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766页

劳动。经过一个阶段的教育和锻炼,学员对劳动的认识提高了,就能积极参加生产劳动,他们每人从农田回来时满身都是泥土。学员伏龙诸娃也是“专心致志地从事农业工作,把它看成自己未来的事业”。但应该指出的是,组织学员参加生产劳动的工作是很艰苦的,因为初到教养院来的新学员好逸恶劳,没有养成劳动的习惯。例如,库里亚日的孩子不愿意参加劳动。他们不去上工,总是找个地方躲起来。因此,对学员必须坚持严格要求,通过联队组织和共青团组织对他们进行教育,并组织他们进行锻炼,才能逐渐养成劳动习惯。而在他们养成劳动习惯之后,他们就会热爱劳动,热爱生活。这样,学员们就会“珍惜在工作和紧张中度过的每一天,盼望节日似的盼望明天的到来”。卡拉邦诺夫曾经说过:“啊,我是多么喜欢在农田里工作啊!”特别重要的是,马卡连柯在《教育诗》中着重提到,学员卡拉邦诺夫由于积极参加劳动,他的手已经有老茧了。把违法儿童那双偷摸扒窃的手,改造成为长满老茧的手,不仅显示了教育的力量,而且说明了教养院的学员再也不是童犯,而是劳动生产者了。马卡连柯的教育理论的生命力就在于此。

教养院的教师为了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在组织学生参加生产劳动时,自己总是以身作则,在农田和工场里干活。马卡连柯写道:“农艺师谢烈不遗余力地耕种那六十亩田地”,他“跟大家一样,身上又脏又是汗水”。同时,“教师们都要在工场里做工、砍柴、耕田、种菜、做修葺工作”。<sup>①</sup>事实说明,教师以身作则,参加劳动,这是教养院的劳动教育取得成效的秘诀,也是教养院改造、教育流浪儿童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

今天,我们为了挽救“落水”的儿童,在对他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也应吸取马卡连柯的工作经验,注意集体中、在劳动中教育学生。因此,搞好班级基层的建设,抓好班集体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sup>①</sup> 马卡连柯:《教育诗》,许磊然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98页

### 3. 教师要用自己的心血去塑造学员的灵魂

《教育诗》是一部记述马卡连柯和教养院全体教师用革命思想去哺育学员的诗篇。它的特点是通过教师、农艺师等各种人物的对话和行动举止向学员讲明是非观念,使学员懂得荣誉、羞耻、美丑和善恶,培养他们热爱集体、热爱劳动的精神以及遵守纪律的优秀品质。马卡连柯在“攻取共青团”一章中说:“我们认为单单改造一个人还不够,我们应该用新的方法教育他,就是说,应该把他教育成新时代积极分子。”<sup>①</sup>为此目的,就必须对学员施行共产主义教育。事实上,“高尔基人”成长的过程,就是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马卡连柯从活生生的苏维埃现实出发,说明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给那些受蹂躏的流浪儿童带来了新的生命,使那些被抛弃的人、流浪街头而无人痛爱的孩子能成为苏维埃的新人。

通过《教育诗》我们也可以看到,无产阶级杰出的作家高尔基对教养院的学员的关怀,他的作品,特别是他童年的生活事迹,也是教育与鼓舞学员前进的力量。所以,马卡连柯说,高尔基的作品很少来到我们这里,但它却像一枝火箭突然划破了我们的天空,照亮了学员们前进的道路。而高尔基的著作,成了教养院医治学员的灵魂的良药。高尔基是以经常同学员通讯的途径来教育学员改正错误、向前行进的,因此,马卡连柯认为,高尔基的信件和信中所阐明的哲理,是改造和教育流浪儿童最有效的教材。所以他常常朗读高尔基给教养院的信来鼓舞学员前进。一九二八年七月,高尔基曾经访问了教养院并在那里住了三天。马卡连柯写道:“这三天在我们的生活中或孩子们的生活中都是幸福的日子。”因为高尔基是我们生活的导师。

马卡连柯仔细地了解每一个学童。他在《教育诗》各章节中通过对各个学员的外形的描绘和个性品质的记述来表现学员的性格特

<sup>①</sup> (同上书)第273页。

征。例如,他描绘学员高尔柯夫斯基时,就指明这个学员聪明机灵,纪律性很强,随时准备行动,对一切事物都有自己的看法,对人的判断迅速准确。<sup>①</sup>又如,他曾指明:学员吐夫耿尼耶夫是一个好团员,是一个快活的、坚定可靠的同伴,但是在他的举止谈吐里还可以看出当年在街头和改造所的惊涛骇浪的日子的痕印。马卡连柯说:“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道路,……在我们的手里,我对这许多道路的开端,都了如指掌。”<sup>②</sup>针对这一点,高尔基曾经说过,马卡连柯“熟悉每个学员,可以用五个字形容他,使人感到仿佛是给他的性格拍了个快照。”由于马卡连柯熟悉每一个学员,所以他在进行思想教育时,就能根据各个学员的性格特点对症下药,因材施教。他善于根据学员的性格和能力挑选联队的队长,安排各联队的成员,组织教养院的共青团支部,选送进入工农中学的学生等等。

教养院的教师也遵循苏维埃政府的要求,努力做好学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塑造学员的灵魂。农艺师谢烈组织学员耕种农田,种植马铃薯,并通过各种农业劳动培养学员的劳动观点和劳动习惯。美术教师布察衣在教养院里建立画室,并指导学员画好每一张画。而葛利高里叶芙娜则很善于运用最简单的话、最富有人情味地跟孩子们谈话,谈他们的生活以及长大了做什么,对他们进行前景教育。每天的值班老师都要认真地组织好教养院各联队的劳动、生活、学习等工作。总之,各个学员在道德上、政治上的成长,都是在教师们的苦心培育下获得的。所以,马卡连柯在《教育诗》第一部最后一章“胜利进行曲的开始”中写道:“我在教职员身上感到了以前没有感到过的巩固和可靠:季洪·涅斯托罗维奇、谢烈和彼得·伊凡诺维奇,还有我们的老战士们,都真正地为我们的事业服务。”<sup>③</sup>

① (同上书)第568页。

② (同上书)第434页。

③ (同上书)第286页。

有趣的是,马卡连柯在《教育诗》中提出:有“真才实学、有本领、有技术、手艺高超、沉默寡言、实事求是”的人,是最受学员欢迎的老师,这个意见一直到今天对我们仍然有其现实意义。

在《教育诗》里,马卡连柯阐述了“新的教育法”。其中主要的方法有:(1)坚持说服教育,反对以力压人。有一次,由于学员偷窃、打架而使马卡连柯怒发冲冠,因而他以暴力对待学员。可是,这种行动失败了。他在总结自己的错误时说:必须立足于教育,因为“我没有一分钟认为我已经在暴力中找到了一种全能的教育法”。以力压人是不能把流浪儿童改造好的。学员终究是人,应该尊重一个人,所以不能以暴力来压服学员,而应该坚持说理教育。(2)教师要以身作则。马卡连柯认为,榜样具有教育的力量。所以,在劳动、生活、纪律等方面,教师不仅要坚持严格要求的原则,而且要以身作则,为学员作出榜样。他在总结组织教师集体的经验以及说明师生之间的关系时说:“主要完全是因为我们教师的工作是那样充满自我牺牲的精神和那样地艰苦,因此自然而然地引起了大家的尊敬。所以除了极少的例外,学员们跟我们的关系总是很好。”<sup>①</sup>(3)惩罚的方法是必要的。马卡连柯认为,“集体和集体机构没有形成。之前,在传统没有形成,最起码的劳动习惯和生活习惯没有养成之前,教师可以有权采用强迫的方法。”<sup>②</sup>但教师运用惩罚的方法时,应注意具体条件,因为这种方法只有在“受到舆论的坚决判决所支持时,才能发生有益的作用。”(4)要充分发挥共青团组织的作用。在“攻取共青团”一章中,马卡连柯说明了在教养院建立共青团支部的意义。教养院的共青团支部成立时,只有九个团员。但马卡连柯十分重视共青团组织的作用。他挑选优秀团员担任联队的队长,让他们带领学员做好劳动、学习、生活管理等各方面的工作。一九二三年夏天,教养院就有

① (同上书),第71页。

② (同上书),第159页。

了政治指导员。这样,共青团组织就在改造与教育流浪儿童的工作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总之,新的教育方法的基本精神是坚持说明教育,启发学员的自觉性,并且通过集体组织,特别是共青团组织来促进学员在道德上、政治上的成长,以达到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目的。

#### 4. 尽力提高学员的科学文化水平

马卡连柯不但在教养院里做好学员的思想教育工作,为了把流浪儿童培养成为有教养的人。他也尽力提高学员的科学文化水平。他说:“我非常重视自己的教学事业。”在安排教养院的生产劳动、生活等各项工作时,“无论如何首先总要把功课学好。”<sup>①</sup>事实上,教养院实行的是半工半读制度。学员们都是半天做工,半天上课。尽管当时进入教养院的学员的文化程度实在太低,但马卡连柯和教师们还是组织学员学习文化知识。在“钉子”一章中,马卡连柯记述了到库里亚日时教导学员学习文化的情况。马卡连柯对学员薇拉说:“我们那里不论男孩子女孩子都念书,你也要念书。那时候你就会拥有美好的生活。”<sup>②</sup>其实,学员里面有许多人很有才能。有的学员十分爱读书,比如柯耳卡的手里总是捧着一本书。他在铁工场干活时,情愿拉风箱,这样就可以有一只手空着翻书,便于学习。又如,学员韦尔尼希尧夫就有一种惊人的本领,可以整天整天读书。至于布隆,他的天赋较差,那怕是“解答最简单的小问题,文法上的规则、某一类的算题,都要他付出极大的努力。”然而,布隆学习非常努力,他居然超过了他的同学们。

由于学员们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于是马卡连柯向他们提出了一个令人振奋的、美好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工农中学。那时,学员们也都怀着进入工农中学的憧憬。当第一批学员考进哈尔科夫工

① (同上书),第353页。

② (同上书),第563页。

农中学后,学员们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的积极性更高了。马卡连柯写道:“学员们对学校采取的新态度使教养院的面貌焕然一新起来。教养院变得更有文化、更接近正规的学校。已经没有一个学生再会怀疑学习的重要性和必然性了。”<sup>①</sup>学员们“对功课都显著地用功起来”。象勃拉谦柯、盖奥尔吉叶夫斯基、奥萨德契等人,都公开向工农中学的目标走去。他们相信:只要努力学习,“每个人都可以进工农中学。教养院里建立了图书室,为学员们学好文化科学知识创造了条件。马卡连柯说:“我们的课程给了学员们许多丰富的知识。”经过了教养院的教师八年辛苦的工作之后,可以说,教养院的文化工作的根也扎得更深了。所以,在《教育诗》第三部“尾声”中,马卡连柯在总结教养院的文化教育工作时说:“在这段时期里,我们的人民长出了新的肌肉,我们的新的知识分子也成长了。”<sup>②</sup>总之,高尔基教养院是一方面组织学员参加生产劳动;另一方面组织学员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因此,教养院的历史经验是:采用既劳动又学习的方法,挽救青少年,培养人才。在《教育诗》第三部的“第一束麦子”一章中,马卡连柯介绍学员布隆时这样写道:“还有一点是来宾们看不出的:今天的这位割麦队队长是医学院的一位大学生,在这样两者的结合之中,也就特别有力地闪耀着我们苏维埃风格的路线。”<sup>③</sup>

《教育诗》是一部以挽救“落水”儿童为内容的诗篇,是一部说明组织儿童集体并通过集体对儿童进行教育的诗篇,是一部歌颂人民教师用自己的心血去塑造学生的灵魂的诗篇,也是一部歌颂粗野的流浪儿童变成为大学生的诗篇。《教育诗》的突出特点是诗意与教育科学原理相融合。马卡连柯在《教育诗》里精雕细刻地描绘了一个个难以教育的流浪儿童转变为“高尔基人”的形象,并通过这些人

① (同上书)第461页。

② (同上书)第830页。

③ (同上书)第763页。

物形象显示了教育的力量。而作为《教育诗》这部作品第一人称的“我”——马卡连柯——在他身上体现了苏维埃政府对青少年的关怀,也体现了改造与培养流浪儿童的决心,并且通过“我”和教养院全体教师的努力,终于实现了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目的。十分清楚,马卡连柯在《教育诗》一书中所总结的教育经验,对我们当前做好教育犯错误的后进生的工作是有现实意义的。学校领导干部、班主任和教师,都不应该把犯错误的学生列入另册,认为他们是不可救药的人,而应该象马卡连柯那样,下大力抓好犯错误的后进生的转化工作,把青少年培养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下 篇

马卡连柯教育论著

选 读



# 《普通学校的苏维埃教育问题》

(讲 演)

## 第一讲 教育方法

我们将要谈谈教育这一个题目。请同志们注意,我是一个从事实践的教育工作者,因此,我所谈的当然就要偏重些实际。我认为,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实际工作者对科学原理予以很好地修正的时代。在我们苏联,这样的实际工作者就叫做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我们知道,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实际工作者——在比我们的科学甚至还要更准确些的许多原理上,不知作了多少的修正;我们知道,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在劳动生产率上,在劳动工作和专门技术的操作上,不知创造了多少新纪录。这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并不是由于单纯增加劳力的支出,而是有赖于新的工作方法、新的逻辑、劳动要素的新的配置。因此,劳动生产率是要靠发明、发现和钻研这些办法来提高的。

在我们的生产事业方面——教育事业方面,无论如何是不能够脱离这种一般的苏维埃运动的。在我们的教育事业方面,也必须有种种的发明,甚至在个别的工作中,在细枝末节中,都要有发明,尤其在很多的细节中,在整个体系中,在体系的各部分中,更是需要发明。这一点是我一生深信不疑的。当然,这样的发明,不仅理论战线上的工作者能够做到,就是象我这样一个普通的、平常的工作者,也能够做到。因此,我很坦然地来叙述自己的经验和从这些经验中得到的结论。我认为,我的经验的意义应当包含在实际工作者对一定的理

论成就所作的修正范围之内的。

我能拿出什么东西来和大家谈呢？

许多人认为我是教育流浪儿童的专家,这是不对的。我整整作了32年的教育工作,其中16年是在学校里,16年是从事教育流浪儿童的工作。确实,我在学校里一直是在特殊的条件下工作的,即在经常受工人和党的各级组织影响的一个工厂学校里工作的……

我从事教育流浪儿童的工作,也同样决不是专门的流浪儿童的教育工作。第一,从我从事教育流浪儿童的第一天起,我就对这种工作有一个设想,我认为对流浪儿童并不需要采用任何特殊的方法;第二,我在很短的时间里,就顺利地使流浪儿童达到了正常状况,使继续教育他们的工作和教育正常儿童完全一样了。

我在哈尔科夫近郊内务人民委员部所属的捷尔任斯基公社工作的最后时期,已经有了正常的集体——有了十年制学校,并追求着我们一般学校所追求的通常目的。在这个集体里的儿童都是以前的流浪儿童,本质上和正常的儿童没有任何的差别。如果说有差别的话,那也许就是属于好的一方面了。因为在捷尔任斯基公社的劳动集体中的生活,额外地对他们进行了很多很多的教育,甚至于比家庭作得还更多些。因此,我的实际结论不仅可以适用于不好教育的流浪儿童,而且可以适用于所有的儿童集体,因而也就可以适用于一切教育工作者。

这是要请大家注意的第一点。

现在,来谈一谈我的实际教育逻辑的本质。我获得了若干信念,这些信念的获得,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也不是迅速顺利的,而是经过了若干相当令人苦费心思的疑难和错误阶段的。我获得了若干结论,这些结论有人看来会感到奇怪,但我有充分的论据来大胆地把它们报告出来。这些结论中的一部分是具有理论性的。我在开始叙述自己的教育经验以前,先简略地把这些结论一一地列举出来。

首先是关于教育科学本质的问题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我们现代的教育思想家和个别的教育工作者中间有一种信念,认为教育工作不需要任何特殊的和个别的方法,认为教学法、各科教学法本身就应当包含全部教育思想。我是不同意这种看法的。我认为,教育范畴——纯粹的教育范畴——在某些情况下是有别于教学法的一种个别范畴。

什么东西使我特别相信这一点呢?使我相信的是以下的事实。在苏维埃国家里,受教育的不仅是儿童,不仅是学生,而且每一个公民随时随地都能受到教育。他们或者用特别的组织方式,或者用广泛的社会影响的方式去接受教育。我们国家里的每一件事,每一种运动,每一种过程,总是不只伴随着专门的任务,而且也伴随着教育的任务。关于这一点,不久以前我们所经历过的最高苏维埃的选举,就是充分的证明。在这次选举中,包含着触及千百万人的广泛教育工作,甚至连仿佛与教育工作无关的人也都受到了教育。教育工作甚至把最消极被动的人也推动了起来,使他们积极地参加选举活动。

我要特别强调指出苏联红军的成功的教育工作。你们大家都知道得很清楚,每一个参加红军的人,在那里都被培养成了新人,不仅有了新的军事知识、新的政治知识,而且具有了新的性格、新的作风和新的行为方式。当然,这一广泛的苏维埃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在步调上、作风上和趋向上自然是统一的,而且也当然具有一定的教育方法。苏维埃政权二十年来所采用的这一教育方法,已经可以作出结论了。如果在这一教育方法上再补充上我们的普通学校、高等学校和幼儿园、儿童之家等另一种类型的教育机关的教育成就上的丰富经验,那么,我们就具有极其丰富的教育工作的经验了。

如果我们拿久经考验、早已确定和早已准确地阐述了的教育方法,拿我们的党、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各种决议和章程,拿列宁和斯大林同志的言论来说的话,那么,说实在的,我们现在确实完全

可能编制一部苏维埃教育事业的全部原理和公理的真正的大法典了。

我个人在实践中也不得不把教育的目的作为主要的目的。因为,委托我干的是所谓违法者的再教育工作,摆在我面前的首先是教育任务,甚至于任何人都没有向我提出教养这一个任务。交给我教育的是些违法的男女儿童,照旧的说法,这就是犯罪者。这些男女儿童的性格都具有极明显的和可怕的特征,因此,我首先提出一个目的,就是改造这种性格。

起初,我觉得所谓主要的东西就是某种个别的教育工作,尤其是劳动教育。这种极端的主张我坚持得并不长久,但公社里其他同事们对于这种主张坚持了很长时间。甚至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在旧的领导人时代)所属的几个公社里,这种主张是占优势的。

这种主张是在仿佛完全被默认的一种论点的帮助之下得到贯彻的,这种论点就是:谁愿意在学校里学习,谁就可以学习,谁不愿意学习,谁就可以不学习。实际上,结果就变成了谁也不去认真学习。只要一个人在班级里遭到了某种失败,他就可以行使他的权利:“不愿意学习”。

我很快就相信了,在工学团的制度里,学校是最有力的教育手段。最近几年来,因为我坚持学校是教育手段这一原则,曾受到工学团管理处的个别工作同志的攻击。这些年来我是重视十年制完全学校的,并且我坚信,真正的再教育工作——保证不再重犯的完全再教育工作,只有在完全的中学里才有可能。直到现在,我仍然相信教育的方法具有自己的逻辑,它在某种程度上不依赖于教养的逻辑。教育的方法和教养的方法,据我看来,构成两个部分——教育科学的两个或多或少地独立的部分。当然,这两个部分应当保持着有机的联系。不消说,班级里的一切工作,总是属于教育工作,但把教育工作归结为教养工作,我认为是不可以的。下面,我还要更详细地来谈谈这个问题。

现在,就教育方法的基础问题说几句话。

首先我相信,教育工作的方法决不能从邻近科学,如心理学和生物学的命题中引申出来,不管这些科学经过如何的分析研究,尤其是生物学,自从巴甫洛夫的著作问世以后,更不能够这样做。我认为我们没有权力从上述科学中直接得出关于教育方法的结论。这些科学对教育工作确有巨大意义,但决不能作为据以作结论的前提,而是作为检查我们实际成就的起监督作用的原理。

此外,我认为教育方法只能够由经验中获得(经过心理学和生物学等科学理论的检验和确定)。

我的这种论断,是根据以下的见解得到的:教育学,特别是教育理论,首先是在实践上适应一定目的的科学。如果我们不向自己提出一定的政治目的,那我们简直就不能去教育人,也就没有权利进行教育工作。没有明确的、广泛的和人所共知的目的的教育工作,会变成脱离政治的教育工作,在我们苏联的社会生活里,证实这个论点的例证是随时随地都能够遇到的。苏联红军在教育工作方面取得了巨大的、宏伟的、甚至在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成就。红军的教育工作自始至终永远是适应着一定的目的,而红军的教育者也永远知道他们要培养什么样的人、要获得什么样的目的,所以才会有这样巨大、宏伟的成就。不久以前寿终正寝了的儿童学,就是没有一定目的的教育理论的最好例证。从这种意义上说,可以把儿童学看作跟苏维埃教育意向完全敌对的一种东西,这是一种没有目的的教育工作。

教育工作的目的是从哪儿产生的呢?当然,这是从我们社会的需要、从苏维埃人民的意向、从我们革命的目的和任务以及我们的斗争的目的和任务里产生的。正因为如此,对目的的表达当然也就既不能根据生物学,也不能根据心理学,而只能根据我们社会的历史、我们社会的生活。

同时,我以为要在证实教育方法这一方面一般地规定与生物学和心理学的这种关系,这在目前是不可能的。心理学和生物学正在

不断发展,也许在今后十年内这两门科学能够提出关于人们的个人行为的准确原则,到那时候,我们就可以更多地依靠这样的科学了。我们的社会需要和我们的社会主义教育的社会目的与心理学和生物学理论的目的和材料之间的关系,应当永远处于经常不断的变化之中,也许,这种关系甚至可以变化成使心理学和生物学与我们的教育工作经常发生关系。我坚决相信的是什么呢?我相信,无论从心理学中还是从生物学中,都不能够用演绎的方法、用简单的三段论法的方法、用形式逻辑的方法得出结论来,不能够得出教育方法来。我已经说过了,教育方法首先应当从我们的社会和政治目的中产生出来。

我相信在目的这一方面,在适宜性这一方面,教育理论首先犯了错误。我们的教育工作中的一切错误、一切偏向,总是发生在适宜性的逻辑这一方面。我们姑且把这个称为错误。

在教育理论中,我看到了这些错误的三种类型,这就是:演绎臆断类、强调伦理概念类和孤立方法类。

我在自己的实践工作中,为了跟这种错误进行斗争而饱经忧患和痛苦。第一种错误是,有人采取了某种方法,就肯定地说这种方法能产生如何如何的结果,我们以大家都知道的单元教学法的历史为例。提出一种方法——单元教学法,想用逻辑推理从这种方法中侥幸地得出定论,说这种教学方法会得到良好的结果。

关于单元教学法能得到良好结果的这一论断,在被经验证实以前就已肯定了,但一定要肯定地说结果必然会是良好的,说在心理的某些秘密的角落里会隐藏着良好的结果。

当谦逊的实践工作者提出要求说“让我们看看这个良好的结果”时,就遭到了这样的反驳:我们怎能打开人心来看呢?由于单元教学法的协调,课程的各部分的联系,那里应该有良好的结果。课程各部分的联系必然会在人的心理上留下良好的结果。

这就是说,这里连经验的证实在逻辑上也是不允许的。结果,就得到这样的循环说法:有好的方法,就会有好的结果;只要结果好,那

就表示方法也好。

这样的错误是很多的,这是由于过分重视演绎逻辑所产生的错误,不是由于过分重视实验逻辑。

所谓强调伦理概念类的错误也很多。我以劳动教育为例与大家谈一谈这个问题。

在这一点上,我也犯了这样的错误。“劳动”在字义上是如此悦耳,对我们是如此神圣和正当,以致劳动教育也使我们觉得仿佛完全是正确的、肯定的和合理的了。而以后却证明“劳动”的字义并没有包含某种唯一正确的和完整的逻辑。最初,劳动被理解为单纯的劳动,被理解为自我服务的劳动,以后又把劳动看作没有目的、徒劳无益的劳动过程——耗费精力的操作。于是,“劳动”一词就这样说明逻辑,仿佛逻辑是没有错误的,虽然随时随地都表现出来真正没有错误的东西并不存在。但是,人们相信术语本身的伦理力量,相信到认为逻辑也仿佛是神圣的东西了。然而,我的经验和许多学校里的同志们的经验,都证明从术语本身的伦理概念的渲染中不可能对某种方法作出结论,并证明劳动应用在教育上,其应用方式可能是各种各样的,并且在每一个别的场合里,可能产生各种不同的结果。在任何情况下,劳动如果没有与其并行的知识教育——没有与其并行的政治的和社会的教育,就不会带来教育的好处,会成为不起作用的一种过程。你们可以随意强迫一个人去劳动,但是,如果不同时从政治上、道德上去教育这个人,如果这个人不参加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那么,这种劳动就只能成为一种不起作用的过程,不会产生积极的结果。

只有把劳动作为总的体系的一部分时,劳动才可能成为教育的手段。

最后,还有一种错误,这就是孤立方法类的错误。人们常常说:某种方法必然会得到某种结果。有一种方法,乍看起来仿佛是最不容怀疑的一种论断,教育刊物上也常常发表这样的东西,这就是关于

惩罚的问题,我们就拿这个问题来说吧。例如惩罚是培养奴隶的,这是确定无疑的公理。不成问题,在这种论断里,所有的三种错误就都包括进去了。这里既有演绎臆断的错误,也有强调伦理概念的错误。这是因为在惩罚上,逻辑是由对这一个词的本身的渲染开始的。最后也有孤立方法的错误——惩罚是培养奴隶的。但我认为任何一种方法都不能离开整个体系来单独分析。一般地说,任何一种方法,不管哪一种方法,如果我们脱离其他的方法,脱离整个的体系,脱离整个的综合影响来单独分析的话,那就既不能认为它是好的,也不能认为它是坏的。惩罚可以培养出奴隶,但有时也可以培养出很好的人来,可以培养出自由和自豪的人来。大家注意,在我的工作实践中,当提出培养人的尊严和自豪精神的任务时,我就是通过惩罚来达到这种目的的。

我下面要谈的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惩罚能培养出人的尊严。当然,这样的结果,只有在一定的环境里,也就是在同时使用其他方法的一定的环境里,并且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中,才可能产生。任何的教育方法,甚至象暗示、解释、谈话和公众影响等我们通常认为最通行的方法,也不能够说是永远绝对有益的。最好的方法,在某些情况下,必然会成为最坏的方法。我们就拿集体影响——集体影响个人——这个方法来说,有时候集体影响是好方法,有时候又是坏方法。我们拿个人影响——教师和学生个别谈话的方法——来说,这种方法有时是有益的,有时却是有害的。任何一种方法都不能够脱离整个方法体系,单从有益和有害的观点予以分析。最后,任何的方法体系都不能认为是绝对不变的体系。

我想起了捷尔任斯基公社的历史。捷尔任斯基公社在1928年成立的时候,是一个八年级的男女儿童的集体。这是健全愉快的一个集体,但这还不是1935年时代的捷尔任斯基公社——接收了20岁以下的青年,有了很大的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当然,这样的集体所要求的就完全是另外的一种教育方法体系了。

我个人相信这样的情况：譬如说一所普通的苏联学校，把它交给优秀的教师、组织者和教导员，这所学校将办上二十年，那么，在这二十年的过程中，这所学校在优秀教师的支配下所走过的路程应是非常了不起的，这就是教育方法的体系自始至终，彼此之间是极不相同的。

一般地说来，教育学是最辩证、最灵活的一门科学，也是最复杂、最多样化的一门科学。这种见解就是我的教育信念的基本标志。我并不是说，一切都经过了我的经验的检验，完全不是，我还有许多不能明白、不能确定的问题，我所以这样说，只是作为工作上的假定，这种假定要随时予以证实。对我个人来说，要亲身用我的经验来证实这种假定，但是，这当然还要用广大的苏维埃社会的经验来予以检验。

同时，我相信我所说的逻辑是不会和我们苏联的优秀学校以及许多优秀的儿童集体和非儿童集体的经验相矛盾的。

这就是我预先要说的总的意见。

现在我们来谈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关于确定教育目的的问题：教育目的由谁来确定？怎样确定？什么时候才能确定？什么是教育目的？

我所理解的教育目的就是人的个性的培养计划、人的性格的培养计划，而且，我把个性方面的一切内容都包括在性格的概念中，这些内容就是：外部表现和内心信念的性质、政治教育、各种知识，即人的个性方面的全貌。我以为，我们作教师的应当有这样的人的个性培养的计划，我们应当力求实现这种计划。

我在自己的实践工作中不能没有这样的计划。任何东西都不能象经验那样地教育人。就在捷尔任斯基公社的时候，曾经交给我几百个人，我看到每一个人的性格中都有深因而可怕的倾向，都有根深蒂固的习惯，我应当想一想，他们的性格究竟是怎样的？为了把这些男女儿童教育成公民，我应当向哪一方面努力？我一经思考，就看到这个问题决不是几句话所能够回答的。如何培养好的苏维埃公民，还没有人给我指出道路。我应当着手研究关于培养人的个性的

更广泛的计划。刚接触到培养个性的计划,我就遇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培养个性的计划对所有的人都应当是一样的吗?我应当把每一种个性,都归纳在统一的培养计划中吗?应当把每一种个性都列入一致的标准里,并追求实现这种标准吗?如果这样做的话,那我就要舍弃个性方面的个别的优点、个别的特性以及特殊的美好之处。要是不肯舍弃的话,那我的培养个性的计划能是什么样呢?我不能那样简单地、抽象地解决这个问题,而是在十年的实践工作过程中解决了它。

我在自己的教育工作中,看到了应当有培养个性的一般的“标准”计划,还应当有对这个计划的个别修正案。对我来说,还没有产生过这样的问题:我的学生应当成为勇敢的人呢?还是我应当培养胆怯的人?这里,我假定好了“标准”,即每一个学生都应该是勇敢的、刚毅的、诚实的和爱好劳动的爱国主义者。但是,如果遇到了象天才这样的个性上的细微之处时,那该怎么办呢?有时候,当遇到天才的时候,会对它产生很大的怀疑。有一个男孩在十年制学校毕业时,我就有过这样的情形,这个孩子的名字叫捷连秋克。他学习很好,成绩是全五分(我们学校当时采用五级制记分法),以后他想进高等工业学校。我早已发现他有很大的演员天才,而且是非常稀有的喜剧演员的天才,特别机智聪明,有天赋的悦耳的声带,富于表情,是一个聪慧的喜剧演员。我观察到只有在演剧工作这一方面,他才能够取得很大的成就,如果上工业学校,他就是一个平常的学生。但是,当时有那么一种爱好,所有我的“孩子们”都想作工程师。如果说到作教师的话,大家当面就会笑起来。“为什么偏要去作教师?”“那就去当演员。”“您说到哪儿去了,演员算什么工作?”于是,捷连秋克进了工业学院,我深信我们失掉了一个出色的演员。我让步了,归根结底,我没有权力挽回这件事情。但是,我总是不能释然于怀。他学习了半年,来参加我们的戏剧小组。我想了又想,最后决定召他参加社员大会,我说我要就捷连秋克的问题向大会提出申诉,因为他

不服从纪律 ,上高等工业学校去了。全体大会上大家说 :“你怎么不害臊 ?给你说了 ,而你不服从。”大会最后决定 :“不许他上工业学院 ,决定把他送到戏剧专科学校去学习。”他很不高兴地走了 ,但他不能够不服从集体。他得到了奖学金和公共宿舍。现在 ,他成了出色的演员 ,已经在一个有名的远东剧院演出了 ,在两年中 ,他获得了一般人十年才能获得的成就。现在 ,他非常感谢我。

但是 ,如果现在我再遇到这样的问题 ,我还是没有解决它的把握。谁能了解捷连秋克 ?我有什么权力硬要用强制办法呢 ?改变这种志趣的权力对我来说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不过 ,我深信每一个教师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教师是否有权干涉学生性格的发展 ,并引向正确的发展方向呢 ?还是只应当消极地跟随着学生的性格走呢 ?我以为 ,问题应该这样解决 ,那就是 :有权干涉。但是 ,应该怎样作才对呢 ?个别情况要个别处理 ,因为 ,有权力是一回事 ,而能够作得好是另一回事 ,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今后我们在培养干部时 ,很可能就是要教他们怎样做转化工作。培养医师 ,就应该教他怎样施行穿颅术。在我们现在的条件下 ,可能将教教师怎样来作这样的“穿颅术”(也许比我作得更机巧些、更成功些) ,教他们怎样根据个人的品质、个人的爱好和个人的能力 ,引导人向他最需要的那个方向发展。

现在我们来谈谈在我的经验中和我的其他同事们的经验中的那些实际工作方式 ,我认为这些方式最成功地体现在教育工作中。教育工作的最主要方式 ,我认为就是集体。关于集体问题 ,在教育著作中似乎已作了不少的论述 ,但总感到有些不够明确。

什么是集体 ?我们对集体干预的界限在哪里 ?现在我正在参观莫斯科和基辅的许多学校 ,我没能经常看到学生集体。有时能看到班级集体 ,但我几乎从来没有看到过学校集体。

现在 ,我简单地讲几句 ,把我和我的同事们所培养出来的集体告诉大家。请注意 ,我所处的环境和普通学校的环境是不相同的 ,因

为 ,我的孩子们都过着共同的生活 ,都从事生产工作 ,大多数没有家庭 ,也就是说 ,没有另外的集体。因此 ,自然而然 ,在我所管理的范围内 ,集体的教育方法就要比普通学校用得更多些。但我并没有因为有了这样的良好条件作基础就松懈起来。当时我有一个学校——工厂(车厢工厂)学校 ,我这里仍然是有学生集体的。

在当时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旧式领导之下的学校实际工作中 ,我看到许多很奇怪的现象 ,这些现象 ,以我的教育眼光来看是完全不能理解的。例如 ,昨天我到过一个文化休息公园 ,那里有区少年宫。在这一区里还有单独设立命名为小巴维尔·莫罗佐夫的少年馆 ,也就在这同一区里还有 13 所学校。所以 ,我昨天就看了三种机关——学校、少年宫和莫罗佐夫纪念馆 ,看到了这三个机关怎样把儿童们分为各种不同的集体。这里 ,儿童们是没有集体的。他们在学校里是一种集体 ,在家庭里是另一种集体 ,在少年宫里走第三种集体 ,在莫罗佐夫纪念馆里是第四种集体。他们在各集体间跑来跑去 ,可能早晨选择一个 ,晚间选择另一个 ,午间又选择第三个。昨天我就亲眼看到过这样的事情 :在少年宫里有一个舞蹈小组 ,其名称还是老的叫法——旋律舞蹈小组 ,在那里就是单纯地跳舞。有一个学校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小组长申明说 :“我们不准女孩子参加旋律舞蹈小组。”学校的校长拍着胸膛说 :“大家看 ! 团小组长申明不准女孩子参加 !”校长拖着团小组长去诉诸公论。“事情就是这样的 ,请大家看 ,他干的是什么事。”但团小组长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 :“就是不准 !”于是发生了冲突。这里 ,我想起了我们公社里所发生的类似的另一件争吵的事情。我们有许多严格认真的各种不同的小组 ,有真正的滑翔机 ,有骑兵团……有一次 ,有一个男孩子——很好的一个孩子 ,是少年先锋队队员 ,通过少年先锋队组织加入了哈尔科夫少年宫 ,并且在那里参加了北极考察工作 ,在那里表现得很好 ,少年宫奖励他和其他的孩子一同去穆尔曼斯克出差。这个孩子叫米沙·佩克尔 ,他在公社里说 :

“我就要到穆尔曼斯克去了。”

有一个年龄大一点的社员问：

“你要到哪里去？”

“到穆尔曼斯克去。”

“谁叫你去的？”

“少年宫派我去。”

在全体大会上，年龄大的一些社员们说：

“叫米沙·佩克尔解释一下，是谁派他去？他要到哪里去？”

米沙说：

“是的，我要到穆尔曼斯克去考察北极，少年宫派我去的。”

大家都喊起来：

“少年宫怎敢派你去！也许，我们明天要把你派到非洲去。第一，我们要到伏尔加河去旅行，而你是我们的吹黑管的，第二，就是你不吹黑管，你补的是什么空子？你又要在这里干，又要在那里干。不行，你哪里也不能去。你事先就应该问问全体大会，问明白你可以不可以在那里接受所有的奖励。”

米沙听从了大会的意见。但少年宫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知道了这件事，少年宫提出了意见：“捷尔任斯基公社干的是什么事？我们要派人去北极，而他们那里偏说：你要吹黑管，因为要去伏尔加河旅行。”这件事情，一直闹到乌克兰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但说实在的，实际上一切全都解决了，因为，公社的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说：如果米沙应该去的话，当然，我们不会把他拉住，我们也会给他津贴等等，请吧，转到少年宫去，作少年宫的队员去……如果我们有需要，我们自己也会派我们需要的人到北极去，进行必要的考察，也会有助于征服北极的工作。在当前这段时期内，在目前来说，这是没有列入我们计划以内的事情。你们说什么施密特、施密特，到北部的施密特还少吗？但全苏联的人不会都到北部去，因此，不能证明说，每一个人都应当到北极去。很显然，米沙是想争一争的，但大家

对他说：“行啦。吵上了一阵子，该停止了。”于是，米沙说：“我自己也并不想去。”

这里还有第二个问题。我曾到过莫斯科近郊的几个夏令营，这都是很好的夏令营，在那里生活得很好、很愉快，当然，这是最有益于健康的机构。但我很吃惊，在这些夏令营里汇集着各所学校的儿童，这一点，我是不明白的。我认为这样做就破坏了教育上的某种和谐。一个孩子是一定的一个学校集体的成员，而夏天把他送到一个混合的集体里，这就说明，他的学校集体在他的夏季休息的组织里，没有参加任何的工作。你们看，正象我给你们说过的一样，在少年宫和其他地方，感到有摩擦和倾轧的现象。我知道，这种倾轧是怎么会发生的。

应当通过建立统一的、有力的和有影响的集体来组织正确的苏维埃教育。学校应当是一个统一的集体，在这里组织全部的教育过程，这个集体的每一个成员也应当感觉到自己对集体的依靠，应当忠于集体的利益，应当维护这种利益，并且首先要重视这种利益。如果让每一个成员选择对自己更适宜、更有益的人，但并没有为此借助自己所属的集体的力量和手段，出现这样的情况，我认为是不对的。这会造成怎样的后果呢？所有的各个城市里的少年宫的工作都做得很好，莫斯科的少年宫做得尤其好。少年宫的许多工作者和工作方法是值得赞赏的。不过，虽然他们这样好好地工作着，虽然我们的社会帮助他们这样好好地工作着，但这还是使有些学校有可能逃避一切额外的工作。许多学校中没有少年宫里的那些小组。一般地说来，校外工作当真变成“校外的”了，学校也就认为有权拒绝这种工作。不成问题，借口总是可以找到的，比如说，我们没有大厅，我们没有拨款，我们没有专门工作人员等等。在一个集体里应该组织全部的教育过程，我是赞成有这种过程的集体的。

我个人希望有这样坚强有力、设置完善和装备良好的集体制度，但这仅仅是集体组织的外表形式……

这样的少年宫和儿童俱乐部，可以说，能够和学校一起来进行工

作,但其中的组织工作,仍然应当归学校。学校应当对这种工作负责,各学校应当在工作中联合起来。反对女孩子参加旋律舞蹈小组的那个团小组长是正确的,如果团小组长要对本集体里的儿童的教育负责的话,那么,他就应当关心他的孩子们在少年宫里究竟作些什么事情,并要对此负责。如果教育过程分散在各个机构和个人之间,而且这些机构和个人没有被相互的责任和一长制联系在一起,这样的过程就不可能带来好处。

我知道,设置完善、装备良好的统一的儿童集体,当然要花很多的钱,但也很有这样的可能,即组织得比较好的儿童集体,也是能够节省出资金的。

这都是有关集体本身组织的问题。总之,我坚决主张,领导儿童教育的统一的儿童集体应当是学校。其他所有的机关都应当服从学校……

我相信,如果一个集体没有目的,那就不会找到组织这一集体的方法。应当向每一个集体提出总的集体的目的——不是向个别的班级提出,而是必须向全校提出。

我们集体里有500个人。成员是八岁至十八岁的孩子,也就是一年级到十年的学生。当然,他们彼此之间是有很多不同的特点的。第一,年龄大一点的儿童是比较有教养的,在生产上是比较熟练的,也是比较有文化的。年龄小的儿童,因为脱离流浪生活不久,当然就粗野无知。最后,还有一般的儿童。但是,尽管如此,在我最近几年的工作中,所有这500个人,确实形成了统一的集体。我从来不允许自己剥夺集体成员的权利,剥夺任何一个公社社员的投资权,不管他们的年龄和发展程度如何。公社社员全体大会真正是实际的领导机构。

全体大会是集体的领导机构,这引起了我的批评者和上级的反对与怀疑。他们说:不可以让这样的大会来决定各种问题,不可以把领导集体的事情交给一群孩子。当然,这种说法是对的。但是,问题

在于应当争取做到,不是一群孩子的全体大会,而是集体成员的全体大会。

使“群”变成“全体大会”的方法和手段是很多的。这不是用什么人工方法可以办到的,也不是在一个月之内就能做到的。一般说来,在这样的情形下想追求速效,总是要失败的。我们以学校为例:如果学校里没有任何的集体,一切都是散漫无组织的,往好处说是每班都过着孤独的生活,遇到了其他的班级。就象我们在街道上遇到了普通的人们一样,那么,要想把这样一群无组织的儿童变成一个集体,当然就需要经过一番长期的(不是一年、二年)坚忍不拔的和耐心的工作。可是,一旦集体建立起来,如能爱护它,如能注意它的活动进展,那么,这样的集体就可以永远保持下去。这样的集体——特别在有八岁至十岁儿童的学校里,应该说是最可宝贵的、最美好的教育工具……

儿童集体的力量是强大的,其强大程度几乎是无与伦比的。但是,这样的集体,自然也是容易解体的。种种错误、领导的种种更替,能够使集体变为人群。但是,集体存在得越长久,集体变得越坚强,那它就越容易延续下去。

这里,我们要谈一件重要的小事情,这件小事情我是要特别坚持的。这是什么呢?这就是传统。任何东西,也不能象传统那样地巩固集体。培养传统、保持传统是教育工作中极其重要的任务。一所学校如果没有传统,当然就不会是好学校,而凡是我所见过的好学校——就拿在莫斯科见过的好学校来说——都是具有传统的。什么是传统呢?我曾遇到过反对传统的说法。我们的一些老教育工作者说:一切法令、一切规章都应当合乎情理,应当在逻辑上是明白易懂的,而你却承认已经失去了理智和逻辑的传统。一点也不错,我是承认传统的。例如当我还年轻的时候,当我还没有很多工作的时候,我在公社里每天是早晨六点钟起床,并且每天要作一次检查,也就是说,要同值日队长一起去寝室检查,各队都喊“全队立正”的口令向

我敬礼。每天一开始,我检查一次分队人员和分队情况。这时,我是被看作公社的首长,我就可以以首长的身分审查一些事情,并予以惩罚。除我以外,公社里任何人都没有惩罚的权力,当然,全体大会是除外的。但是,我不可能每天都参加检查。我第一次下了通知,明天我不能够作检查,由值日队长担任检查工作。

这种方式,逐渐就变成通常使用的方式了。这样,就形成了传统:值日队长在检查的时候,是被当作首长看待的。起初对此是懂得的,但以后就不清楚了。新来的人都知道值日队长有惩罚的权力,可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权力呢?那就不清楚了。这一点,老人是完全明白的。值日队长说:“做两天值日!”大家就回答他:“是,两天值日。”如果在其他的时候,不论白天或晚上,这个值日队长要使用这样的权力,那回答他的就是:“你是什么人?”这样的传统保持下来了,它对巩固集体起了很大的作用。

另外还有一个传统,这也是不能拿逻辑来解释的。很久以前曾发生过一次纠纷。值日队长晚上作报告时说:“伊凡诺夫吃午饭时破坏了纪律。”而伊凡诺夫说:“没那事,我没有破坏纪律。”我检查事实以后说,依我看,伊凡诺夫是没有破坏纪律。其他的人也同意我的看法,可是值日队长却坚持自己的意见。我把这件事情搁了下来没作处理。值日队长在全体大会上指责了我的作法,他说:“安东·谢妙诺维奇没有权力审查我的报告,我并不是私自悄悄地给他说话,我是当着所有的其他队长‘立正’敬礼,给他作报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不相信我的报告,他就不应该相信值日办法。如果我的每一个报告都要用审查口供的办法加以检查,那还要值日干什么?”

全体大会作了决定:安东·谢妙诺维奇不对,值日队长的报告是不需要审查的,如果是低声耳语,那就自然可以审查了。这样的决定,在这十年的过程中,就成了法律。一天里随便想说什么都可以,但当作报告时,那就确实确实是正确无误的:他敬了礼,举了手,这就表示报告是正确的、真实的。如果你事实上并没有错,那你心里知道

值日队长错了就行啦。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优良的传统,它使工作变得容易进行了。第一,任何一个值日队长都不肯说谎,因为他知道大家都相信他;第二,用不着再因为检查费时间、费精力了。也许,值日队长当真会有错误,但不走运的受屈者,还是应当服从的。有一次,一个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曾说过:“这是什么规则,应当取消它。因为,我去工作时确实没有迟到,而值日队长却在报告里说我迟到了十分钟,并且告诉我说,是不会调查的了。这时候,大家就给他作了解释:也许你是对的,也许你确实准时去工作,但是,对我们来说,对你来说,纪律和信任值日队长,比起你的对来是更为重要的。因此,你还是把自己的对牺牲了吧。如果我们要检查每一个值日队长说的是什么,这就不是值日队长,简直是奴才了。而我们需要的是值日队长。在我的集体里,象这样的传统是很多的,简直可以举出好几百来。这些传统,我并不知道,但孩子们是全部知道的。孩子们知道这些传统,不是得自记载,而是凭借某种直接的感触。这样做是应该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老社员是这样做的。老社员的这种经验,尊重老社员的逻辑,尊重老社员建立公社的劳绩以及最主要的——尊重集体的权利和集体的全权代表,这是集体的最重要的一种美德,当然,它是要靠传统来维持的。这样的传统,能美化儿童的生活。儿童们生活在这样的传统网里,会感觉到自己是在具有特殊的集体规律的环境中,并因此而自豪,力求改善这种集体规律。我以为,没有这样的传统,要有正确合理的苏维埃教育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尊重自身美德、感到自己集体面貌的坚强的集体,正确的苏维埃教育是不可能有的。

我可以说出许多有趣的传统来,并且可以举出一些例子。这既是传统,也是很可笑的事情。卫生委员会的值日员每天担任值日工作,臂上带着红十字的袖章,他有很大的权力——直接下命令的权力,他可以让任何一个共青团员或集体成员从桌子旁站起来去洗手,

而对方就要服从他。他可以到任何一个工程师、工作人员和教师的寝室里去,可以在全体大会上报告某某教师的寝室脏。在这一方面,是有过决议的——无论什么时候也不必细分什么样的脏,如谁泼了水,谁的窗台上有尘土,谁的椅子背靠上有尘土等等。大家决定从来不作过于详细的报告,不描述杂乱无章的情况,只简单地说一个字“脏”。就警惕防止不清洁这一点说,这样做是完全够了。根据传统,这个发号施令的人,一定要从女孩子当中选出——一定是一个女孩子,一定是一个小女孩,而且一定是一个很干净的女孩子。究竟是从哪里得来的这种传统,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例如,提议选出某一个女孩子,有人就说:“你怎么啦,她已经十七岁了。”谁也不明白,为什么不能选举十七岁的女孩子当值日卫生委员。“从前有一次她出去的时候,她的长统袜子松下来了,所以不能当。”为什么必须是女孩子呢?据说,男孩子总是不能经常好好地把自己收拾干净;其次,按一般的道理说,女孩子厉害一点。如果女孩子一说话,那么,她无论对谁——不管对朋友,不管对仇人——总是不肯放过的。这一点,我是反对的:“你们就不害臊,为什么要剥夺男子的这种权利呢?怎么表现出她是爱干净的或不爱干净的?”大家一致同意了我的意见,但是选举的时候,有人推举出女共青团员作候选人,大家都反对,说不行。那就推选女少先队员吧。选举出来的女少先队员完全是个小孩子,怎能委托她担任这样的工作呢?大家都说:“不,她是合适的。”这样的卫生委员会委员真不好惹,同她们生活在一起是很麻烦的。谁要是同这样的十二岁的女孩子在一起,谁就成天不得安宁了——无论吃饭、工作或睡觉,任何时候都是这样。大家都责骂她:“闹得简直没法活下去了。她在寝室里找尘土,找来找去,一点儿尘土也没找到,但她翻过椅子来说:

“这是什么?”

“挂了一根细头发丝。”

于是,她在报告中说:第十五寝室脏。再也无法子辩解了,因为

这是事实。偏偏这是尼娜,一个小孩子,她说:“是你梳的头发,你的头发飞开来了,莫非我应当替你来掩饰吗?”

这样的小孩子报告着,成年的小伙子们看着她。她叙述着她巡查了多少次寝室,作了多少次通知等等。“工作得很好吗?”“很好。”于是,大家又选举了她,忘记了自己因为她而吃的苦头。

这是一种传统。象这样的小女孩子,是最不放松小节、最纯洁、最诚实的,对任何诱惑都不动心。集体觉得正是这样的女孩子,才可以把卫生委员会委员这样的工作委托她去做。这种传统,是很根深蒂固的,就是在共产主义青年团委员会里也这样说:“不行,这样做不合适。还是教克拉娃这个女孩子干吧,她年纪小,她干净,她能担任这样的工作。”

孩子们就是创造这种传统的惊人能手。

应当承认,在创造传统中,要利用某种轻微的本能上的保守性,但必须是优良的保守性,也就是相信昨天,相信创造了某种价值并不愿意因为我们今天的任性而破坏那种价值的那些同学们。

在这些传统中,我最看重军事化的传统——各种游戏……这不应当是军事法典的重复。无论如何,也不应当摹仿和抄袭。

有一些年轻的教师们,很爱好经常作整队行进——到食堂里去要整队行进,去工作时要整队行进,到处是整队行进。我是反对这种做法的。这样做并不美,也没必要。但在军队生活中,特别是在红军的生活里,有许许多多美的、吸引人的东西,我在自己的工作中,也越来越相信这种军事化的美学的益处。儿童们更善于美化这种“军事化”,使它更适合儿童、更愉快。我的集体在某种程度上是军事化了的。第一,名称上有一些军事用语,如“队长”就是。名称有很重要的意义。例如把普通学校叫做不完全中学,这一点我并不是完全同意的。我觉得关于这个问题,还应该多想一想。一个学生在普通学校学习,而学生所在的学校的名称却叫做不完全中学,这表示什么呢?这是一种不全面的名称。名称本身对学生应该有吸引力,我对

名称是很注意的。当我提议用作业组长这个名称时,孩子们说这样不妥当,什么叫作业组长,组长是生产工作部门的名称,而在我们分队里,应当叫队长。“其实你干的还是同样的事情。”“不,这看怎样说,我可以发命令,而作业组长要是发命令,大家就会对他说:你不是队长,你是作业组长。”在儿童集体里,一长制是组织得非常好的。

例如拿“报告”这个用语来说,当然,可以随便听取孩子们的报告。但我以为,给这种报告定出若干规矩,是特别能吸引儿童的。规矩是这样的,队长来作报告时应当穿制服,不能穿工作服,不能穿整天跑来跑去所穿的那种衣服。当某一个队长作报告的时候,他必须敬礼,我也没有权力坐着听报告,当时所有在场的人都要敬礼。大家都清清楚楚地知道,举手敬礼,是大家对分队的工作、对整个集体的工作表示敬意。这样就强调了一种荣誉——斯大林同志所说的那种劳动的荣誉。

其次,在集体生活中,在集体的活动中,可以采用军队生活中的许多作法。例如公社里具有关于全体大会如何开始的优良传统。全体大会经常只能由值日队长宣布开会。值得令人注意的是,这样的传统,已经习以为常,牢不可破了,即使当公社里来了高级首长——连人民委员会委员也包括在内,仍然是谁也不能宣布全体大会开会,而只有值日队长才能宣布开会。而且,根据传统,整整十年来举行的全体大会,必须有一定的规程。召集全体大会是用号声作为信号。吹号以后,安置在露台上的乐队演奏三遍进行曲。第一遍是让大家听的,这时可以坐着,可以谈话,也可以进来出去。当演奏完第三遍时,我必须来到大厅,我知道我是不能不到场的,如果我不到场,我就要受到指责,大家会说我破坏了制度。进行曲全部演奏完了时,我必须喊口令:“对旗敬礼,立正!”这时候,我并没有看见旗子在哪里,但我知道旗子就在附近,我知道我一发出了口令,它就会被带进来的。当旗子拿进来的时候,全体必须起立,这时乐队演奏专用的行升旗礼的乐曲,当旗子插在台上时,大会就算开始了。值日队长立刻进来宣

布：“大会开始。”

十年来,任何一次全体大会,都没有采用过其他方式来开始,如果改变了方式,那就有人要说我们没有制度,说我们不知在搞些什么把戏等等的话了。

这种传统能够使集体更美,它为集体建造了外表的骨架——能够在那里美满地生活因而具有吸引力的那种“外表骨架”。红旗就是这种传统的优美的内容。

根据这种传统,旗手和副旗手由全体大会选举品行优良的社员来担任,一经选出,“毕生不变”。这就是说:只要你在公社生活,你就要当旗手或副旗手。旗手不能受任何的惩罚,旗手有单独的房间,有特制的礼服,当旗手持着旗子的时候,不能够用“你”而要用“您”称呼他。

这样的传统究竟是从哪里来的,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们的社员中只有一个人得到了军功勋章,这就是旗手。旗手在公社里是最受尊敬的人物,这一个事实就是证明。

在学校里尊敬旗帜是最好的一种教育手段。在捷尔任斯基公社里,对旗帜的尊敬表现为:如果立着旗的房间需要修理而要将旗移到另一个地方的时候,那就必须把整个集体整队集合起来,由乐队奏乐,隆重地把旗移到另一个地方去,只许这样做,决不能用另外的办法。

我们差不多到过了全部的乌克兰、伏尔加、高加索和克里米亚,红旗一分钟也不会没有人守护的。我的教师朋友们知道了这件事情后曾经说:“你们干的什么事?孩子们晚上是需要睡觉的。你们作的是保健运动——行军,但孩子们却在晚上给你们守旗。”

我们的看法是各不相同的。我不明白,在行军的时候,怎能让旗子没人守护呢?

在公社的入口处,总是站着守卫的,带着很好使的步枪。我甚至不敢提到这件事。当然,站岗人是不带子弹的,但他有很大的权力。站岗的常常是十三、四岁的孩子,他们是轮流换班的。站岗的在门口

检查每一个外来的人：来的是谁？他需要什么？他为什么要来？并有权用枪挡住来人的去路。公社的大门，在夜间是不关的，站岗的也要站几小时，有时候会胆怯、会害怕，但总还是要站够自己的两个小时。有一次，由乌克兰教育人民委员部来了一个女儿童学者和一个肃反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他们之间发生了一场很有趣的谈话：“他为什么老这样站着？”“就这样站着。”“他会寂寞的，给他一本书读读吧！”肃反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说：“什么？让哨兵读书？”“那为什么不行？应该利用时间、求取知识。”这是两种不同的人，女儿童学者惊讶的是站岗的什么也不干，而肃反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对让哨兵在哨位上读书的建议感到惊讶。惊讶的内容是大有径庭的。象站岗这样的设置，是集体必要的职能，起着集体教育的作用。

我们有这样的一种规矩，也是一种传统：下楼梯时不能扶着栏杆。我知道是因为什么才采取这种办法的。很好的楼房的梯子，开始踏脏了，哪里有栏杆，哪里就踏得很脏，因此，孩子们作了决定：为了保护梯子，不准靠近栏杆走。但是，大家一下就把这个决定忘记了。新社员来了，他们问：“为什么不准扶栏杆？”大家告诉他们：“应该靠自己的脊椎骨支持，不能靠栏杆来支持。”其实，起初注意的并不是为了锻炼脊椎骨，而是为了保护梯子。

应当有军事生活的美学，应当整饬、精确，但无论如何，不应变成单纯的步法操练。

至于军事训练，并不完全和这种军事生活的美学相同。军事训练是射击活动、骑马活动和军事学科的学习，而精确和美学在儿童团体里也是完全需要的。它好就好在能保持集体的力量，能防止不整齐、不协调的行动，能防止行为松懈和散漫。从这种意义上说，制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一点，大家比我知道得更清楚，教育人民委员部和党在这一方面也有了一定的看法，所以我不再多说了。但是，只有当制服整洁好看、合身的时候，它才能是美的。在我作到了多少有了合身好看的制服之前，我常因为制服问题遭受许多不愉快

和失败。

不过,关于制服我还想再多说几句。我认为孩子们应该穿漂亮的衣服,漂亮到能让他们引起惊奇。在旧时代里,军队穿得很漂亮,这是特权阶级的一种豪华表现。我们的社会里有这样的特权阶层,有权穿得很漂亮,这就是我们的儿童。我将不惜一切努力,要使每一个学校的学生都有很漂亮的制服,这是团结集体的一种很好的“粘合剂”。我在这一方面曾作过一定的努力,但我受到了阻难。我们的社员有金银色的花纹字,有宽边的刺花小圆帽,有熨平的白凸花棉布领子等等。一个集体,只要你使它有很好的服装,那你在管理上就有50%的把握了。

## 第二讲 纪律、生活制度和奖惩

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纪律、生活制度和奖惩。我想再提醒大家一次,我所讲的道理完全根据我个人的经验,这些经验是在比较特殊的条件下,主要是在违法者的工学团和公社里得到的。但是我相信,不仅我发现的一些个别结论,而且我发现的一般方法,都可以应用在正常的儿童集体里。在逻辑上尤其是这样。

在我主持违法者教育机关的十六年的工作中,我认为最后的十年——也可以说是十二年——是一种正常的工作。全部问题在于,我深信,男女孩子们所以成为违法者或“不正常的人”,都是由于受了“违法的”和“不正常的”教育的缘故。正常的教育、积极的教育和具有一定目的的教育,能很快地使儿童集体变成完全正常的集体。任何天生的犯过失的人,任何天生的不良性格,是绝对没有的。在我个人的亲身经验中,这种道理的确凿性,达到了100%。

在捷尔任斯基公社的最近几年里,我是坚决反对认为我的集体是不正常的集体、是违法者的集体的那种想法的。因此,我今天向大家介绍的结论和方法,我个人认为适用于教育正常的儿童。

什么是纪律呢？在我们的实践中，某些教师和教育思想家，有时候往往把纪律说成了教育的手段。我认为，纪律不是教育的手段，而是教育的结果，并且应当和作为教育手段的生活制度有所区别。生活制度是协助教育的一种固定的手段和方法。教育的结果正是纪律。

在这一点上，我以为要把纪律理解得比革命前稍微宽泛一些。在革命前的学校和革命前的社会里，纪律只是表面的现象。这是一种统治的形式，是压制个性、压制个人意志、压制个人志趣的一种形式，最后，在一定的程度上，纪律又是一种统治的方法，是使个人屈服于权力的一种方法。所有我们体验过旧制度的、读过小学、中学和实科学校的人，都是这样看待纪律的。并且大家知道，我们作教师的对纪律也有一种同样的看法，那就是：纪律是必须遵守的一些章则的法典，为了便利，为了秩序，为了纯外表的某种安宁与其说道德方面的安宁不如说交际方面的安宁，这些章则是必不可缺的。

在我们的社会里，纪律是一种道德的和政治的现象。但我同时看到一些教师，他们现在还不能抛弃对纪律所持的旧观点。在旧社会里，一个不守纪律的人，不会被认为没有道德的人，不会被认为是破坏某种社会道德的人。你们也许记得，在旧时代的学校里，我们都把这种不守纪律看作一种英雄行为，看作一种了不得的功绩，或者，至少看作一种聪明活泼的表现。一切调皮捣蛋的行为都被看作某种活泼性格的表现，或者是某种革命作法的表现，不仅学生，甚至教师都是这样认为的。

在我们的社会里，没有纪律性、不守纪律的人就是反对社会的人，我们看待这样的人，不仅要从表面的技术上便利的观点出发，而且也从政治和道德的观点来看待他。每一个教师对纪律必须持这样的观点，但这只有把纪律看作教育的结果，才有可能。

首先，正如大家所知道的，我们的纪律永远应该是自觉的纪律。在二十年代，正当自由教育理论——至少是自由教育倾向——大受欢迎的时候，人们广为宣传自觉纪律的公式，认为纪律应当产生于自

觉。我从自己以往的经验中,已经看到了这种说法只能够遭受失败,也就是说,要用说服一个人的办法,使他相信应该遵守纪律,并希望在这种说服的帮助下,就能够使他遵守纪律,这是意味着要冒只有50—60%成功的危险。

纪律不能由自觉来决定,因为纪律是整个教育过程的结果,而不是个别的特殊方法的结果。指望用形成纪律的某些专门方法来建立纪律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纪律是教育作用的全部总和的产物,这里既包括教养的过程,也包括政治教育的过程,既包括性格形成的过程,也包括在集体中、在友爱信任过程中和一切教育过程中冲突和纷争发生和解决的过程,同时这里也包括体育和身体发育等等的过程。

如果指望仅用说教和解释的办法就能够建立起纪律,那就可以说所期待的结果一定是微不足道的。

因此,想借助讨论和说服来培养纪律,那就只能变为一种无穷的争辩。同时,我首先坚决主张:我们的纪律不同于旧的纪律,它是道德的和政治的现象,应当伴随着自觉,也就是说,要充分认识什么是纪律,为什么需要纪律。

用什么方法才能获得这种自觉纪律呢?

在我们的学校里,没有道德理论,没有道德理论这一门科目,也没有人讲授道德理论,谁也没有义务根据一定的大纲向儿童传授这种理论。

在旧时代的学校里,有神学课程,这一门课程不仅学生反对,连神父往往也并不赞成,他们看待这一门课程象看待什么不值得尊敬的东西一样。不过,在这一门课程里,同时也包含很多的道德问题,这些问题总是不免要触及课业的。这一理论有没有良好的结果,那是另一个问题,但是,在阐述理论时,要在一定程度上向学生提出道德问题,也就是说,要讲这样的一些问题:“不可偷窃,不可杀生,不可辱骂,要尊敬长者,尊敬父母。”基督教道德依靠的是信念,宗教信仰,在阐述理论时揭示了其基督教道德的这些方面,尽管是以旧的宗

教形式,但还是向学生提出了道德要求。

我在自己的实践中,深深体会到阐述道德理论对我们是很必要的。在我们现在的学校里没有这样的一门课程。但全体教师、共青团组长、少年先锋队辅导员如果愿意的话,是有可能对学生讲授系统的道德理论和行为理论的。

我相信,在我们学校的发展中,我们将来必然也要采取这样的方式。我在自己的实践中,已经不得不以一定的方式,以纲要的方式向我的学生提出道德理论。我自己是没有资格教道德这一门课程的,但我亲自编好了一个教学大纲,并利用各种机会,在全体大会上向我的学生们讲述。

我在自己的试验中,甚至已经制定出进行这样的道德理论方面的谈话的提纲,有时间去稍微改善自己在这一方面的工作,并且我已经看到了这种道德理论所能产生的很好而又丰硕的成果。当然,这种成果比起某个神父——即使是最进步的神父——控制的旧式学校所获得的那种结果,自然是大大得无可比拟的。

我们拿盗窃问题的例子来说。我们有可能以无限的说服力,以十分严密的逻辑,以极大的感化力来发展诚实的理论,来发展对自己的、他人的和国家的财物应持的态度的那种理论。对待财物的一切具体的行为的理论,根据自己的信心和力量来制止盗窃的理论,是不能跟旧的空谈作比较的。旧的那一套空谈说:不可盗窃,因为,这是老逻辑,即不可盗窃,否则上帝就要惩罚。这种逻辑是说服不了什么人的。这只能动摇盗窃的意念,却不能起阻止的作用。

谨慎自持、尊重妇女、尊重儿童、尊重老人、尊重自己以及属于整个社会和整个集体的一切行为理论,都可以用特别具有说服力的有力方式告诉我们的学生。

我认为这样的行为理论,苏维埃的行为理论,在社会生活中,在我们的社会实践中,在我们的国内战争史中,在我们苏维埃人的斗争史中,特别是在共产党的历史中,有许许多多可供我们取用的资料,

只要稍作努力,象行为理论——道德——这一门课程,就能够轻而易举地、美满地 and 具有说服力地教授给我们的学生。

我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对一个集体阐述这样的道德理论,这个集体不成问题会接受这一切的,并且,每一个学生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也能给自己找到某种必须遵守的道德形式和公式。

我记得,在用这样的道德题目作过唯一的一次谈话以后,我的集体在个别情况和个别问题上是如何迅速地、愉快地活跃起来了。许多次的谈话,许多次连续性的谈话,在我的集体里,立刻形成了很健康的哲学观点。

什么样的一般原则能够作为这样的道德理论的论据呢?

我对于一般的道德原则,作了如下的归纳。首先,纪律是使我们获得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幸福的一种方式,应该要求集体有纪律。不能够指望只靠表面的措施、方法或只靠个别的几次谈话,纪律就会自然而然地形成。不能这样,对一个集体,应当直接地、清楚地和确定地提出纪律的任务、纪律的目的。

纪律的这些论据和要求,提示出这样的一些因素。首先,每一个学生应当相信纪律是达到集体目的的最好方式。达到整个集体的目的的那种逻辑,即肯定没有纪律,集体便不能达到自己所期待的目的的那种逻辑,如果解释得明晰、热情(我反对对纪律作冷淡死沉的讨论)那么,这样的逻辑,就会成为一定的行为理论的第一块基石,也就是说,会成为一定的道德理论的第一块基石。

第二,我们的纪律的逻辑,肯定纪律可以使每一个性、每一个人达到更有保障、更加自由的境地。请大家注意,这种奇怪的论断——纪律是自由——儿童自己是很容易了解的,儿童在实践中能够想到这个论断,随时随地都可以证实这种说法是对的。并且,在儿童们积极拥护纪律的发言中,许多人都说:纪律是自由。

集体中的纪律正是对每一个人的充分的保障,这正能使每一个人对自己的权利、道路和可能的发展有充分的信心。

当然,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在我们苏维埃的历史中,可以找到许多证明这个原则的事实,而我们的革命本身,我们的社会本身,就是这种规律的证明。我们就是为了这一点进行了革命,革命就是为了让个人自由,但我们的社会形式,就是纪律。

这是应当向儿童集体提出的第二种类型的一般道德要求,这类要求以后能帮助教师解决各种纷争。在任何情况下,破坏纪律的人不仅要受到我的指责,而且要受到整个集体的指责,指责他破坏了集体的其他成员的利益,剥夺了集体的其他成员有权享受的那种自由。

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也许是由于我以前的那些流浪儿童和违法者恰好多半是在没有纪律的儿童集体里生活过的,他们都亲身尝受过那种无纪律生活的一切可怕的沉重苦痛。这是由于当时所谓“剥削者”的那些首领的权力所造成的,这些首领是年龄较大的、比较厉害的流浪儿童,他们指使年幼的儿童盗窃、耍流氓手段,他们剥削这些年幼的儿童,因此,对于这些由于无纪律而遭受苦痛的年幼儿童来说,纪律正是一种真正的拯救,正是人类繁荣的一个现实的条件。

如果有时间的话,我想给大家讲许多很突出的事例——由于一个孩子到了有纪律的环境里,差不多是一瞬之间就使人性复活的那些突出的事例。不过,我现在只说一件。

1932年,我遵照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指示,在哈尔科夫车站从所有经过哈尔科夫的快车上收来50个流浪儿童。我是在很困难的情况下收领他们的。首先令我惊奇的,是他们彼此都互相认识,虽然我是从各种列车上,主要是从高加索和克里米亚来的列车上收领的,但他们还都是一些相识者。原来这是一个“休养团体”,这个团体有时分散、有时相遇、有时相交,是有某种内部联系的。

当我把这50个人领了来,给他们洗了澡、理了发,等等。第二天他们彼此就殴打起来了。显然,他们是有很多“旧账”的:这个偷了那个,那个辱骂了另一个,另一个说话不兑现。我立刻看出这50个

人的团体里 ,有领头的、有剥削者、有有权力的 ,也有被剥削的、被压迫的。这不仅是我看出来 ,就是我的社员们也看出来。我们看到如果把这 50 个人聚合在一起 ,企图让他们单独组织起一个集体 ,那就错了。

第二天晚上 ,我们把他们分配在其他的 400 个社员中间 ,而且分配的时候 ,遵循这样的一条原则 :谁凶恶些 ,就把他分配在较强的集体里 ,谁柔和些 ,就把他分配在较弱的集体里。

在一个星期的时间内 ,我们看到他们彼此遇见的时候 ,还是要力图算“旧账”的。在集体的压力下 ,这些算“帐”的事停止了 ,但有几个人因为受不了比自己强的对手带来的麻烦 ,就从公社里逃跑了。

在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组织里 ,我们热烈地讨论了这个问题 ,并弄清楚了许许多多这类无纪律生活的情况 ,弄清楚了个别人因为无纪律而遭受苦痛的情况。并且 ,最后我们利用了这种机会 ,开展了解释这一道德原则的一个大运动 ,说明纪律是个人的自由 ,最热忱地、恳切地、激动地赞成确定这一原则的 ,正是我从哈尔科夫车站收领的那些新人。他们一再申说 :没有纪律 ,是很难生活的 ,在这两周新生活中 ,他们通过亲身体验知道了什么是纪律。

这种情形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我们掀起了这一个大运动 ,展开了讨论。如果我们不谈论这一点 ,他们虽然能够感觉到无纪律生活的一切苦痛 ,但是要明白这一点 ,那就不可能了。

从这些由于流浪环境的无政府状态而遭受苦痛的孩子中 ,我们培养了最拥护纪律的人 ,培养了纪律的最热情的保卫者 ,培养了纪律的最忠实的宣传者。如果我回想起在教育集体里曾作过我的主要助手的那些青年的话 ,那恰好正是在他们的生活中由于无纪律环境的无政府状态而受苦最深的那些孩子们。

道德理论方面的第三个论点是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必须向集体提出这个论点 ,应当使集体永远明白它 ,这条原则应当永远引导集体为维护纪律而斗争。对于我们苏维埃公民来说 ,这看来好象是

大家完全明白的道理。但实际上许多有知识的人、有学问的人、有文化的人,甚至有社会修养的人,都远不理解这个道理。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个人反对集体的地方,集体利益要高于个人利益。

但是到了实际行动时,往往正是用相反的原则来解决的。

在我的生活中,曾有过这样一件复杂的事情。在捷尔任斯基公社的最后几年里不设教导员,只有教师在那里工作,在集体里我们不再单设教导员,所有的教育工作都由年长的公社社员担任——主要是由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担任。同时,集体在编制上也有助于这样做。集体分为若干分队,分队设分队长。其中的一位队长负责管理集体在一天里的全部工作,这些工作是:整理工作、吃饭、接待客人、维持秩序、清洁工作、学校的一切工作、领取食品和生产工作等等。负这种全责的分队长叫值日队长,他带着臂带,有很大的权力,由他一人领导管理一天的秩序是很需要这种权力的。这种权力表现为,值日队长的命令应当无条件地去执行,只有到了晚上,他才对自己发出的所有命令提出报告。谁也没有权利坐着和值日队长谈话,应当站着说话,并且,谁也没有权利以任何的方式来反对值日队长。通常,总是由受人尊敬的、有了功绩的同学来做值日队长,所以不会和他发生任何的冲突。

有一次,值日队长是一个男孩子,我们假定他叫做伊凡诺夫。他是一个共青团员,一个出色的文化工作者,戏剧小组的组员,又是很好的一个生产工作者,受到大家的特别尊敬,也受到了我的尊敬。他是一个老流浪儿童,曾干过很多违法的事和流浪过很长时间,是我亲自在西姆费洛波里收容来的。

这个值日队长晚上作报告时向我说:一个男孩子梅贾克刚买的一台无线电收音机被人偷去了。这是公社里的第一台收音机。梅贾克花了70个卢布买了这台收音机,这是他半年工资的积蓄。他把收音机放在寝室的床旁边,就是在那里丢失的。寝室是不锁的,因为公

社里不准用锁。但白天是不准去寝室的,并且公社社员们也不会去寝室,因为他们都在忙着工作。

根据我的提议,召集了全体大会。在大会上,值日队长分析了收音机可能藏在什么地方问题。他说话很有分寸,指出谁可能进屋拿这件东西等等,并提出了若干可疑之点,建议选出一个委员会,请大会务必把这件事彻底弄清楚,因为,梅贾克是很可怜的。接着,他警告了这种不好的行为——盗窃一个人用自己积蓄了半年的工资所买的東西。

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现,于是大家也就睡觉去了。梅贾克是十二岁的小孩子。

早上,有几个小男孩——少先队员来找我,他们说:他们5点钟起床,巡查了全公社,在剧院的舞台下找到了收音机。他们请求免除他们的工作,以便到那里去守候,看会发生什么事情。

他们在那里守了一整天,然后来到我这里并直截了当地说收音机是伊凡诺夫偷的。因为,他们看到他一个人好几次走到舞台的题词处,站在那里听着什么。他们没有更多的证据。只是因为他已经不是值日队长了而还站在题词处听,如此而已。

我冒了一次险,把伊凡诺夫叫来说:

“你偷了收音机,没问题!”

他脸色发白,跌坐在椅子上说:

“是,我偷了!”

这件事情成了全体大会讨论的对象。共产主义青年团把他开除了,并把这件事情交由社员全体大会处理。全体大会是在被称为“罗伯斯庇尔”的一个男孩子主持下举行的,他总是重复着一个意见,赶出公社去。这次大会也作出决议把他赶出去,决定要真正地赶出去,——打开门,叫伊凡诺夫滚出去。

我是反对开除的,我曾提醒可能有各种情况,特别强调说:大家也会开除你,大家也会开除你,但还是无可奈何。

我打电话给内务人民委员部 ,说全体大会有这样的决议——赶出去和用某种方式象征性地赶出去。他们回答说这样的决议他们不会批准 ,并要我想办法取消这个决议。

我在社员中是有很高威信的我 ,想做的事 ,有时候是很困难的事情也都能做到。但这一次我完全没有办法了 ,他们禁止我发言 ,这是公社成立以来的第一次。

“安东·谢妙诺维奇 ,我们禁止您发言 !”

那就只好这样了。但我仍然告诉他们 ,在接到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批准之前 ,他们是没有权利开除的。他们同意了我的意见 ,同意把这件事延迟到明天解决 ,等到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代表来了时 ,他们再当着代表的面坚持自己的决定。

我遇到了伤脑筋的事 ,上面指责我没有能取消决议。第二天 ,到公社来了几个重要的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 ,大家这样问他们 :

“你们为什么来 ? 是来为伊凡诺夫辩护的吗 ?”

“不是 ,是为了求得公正处理。”

当时在社员和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之间展开了关于纪律的辩论 ,这种辩论 ,就是现在也还能作为我处理纪律这一极重要问题的参考。

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在全体大会上这样说 :

“你们想用你们的决议来作什么呢 ? 伊凡诺夫是你们的先进分子 ,是你们的积极分子 ,你们都信任他 ,把全社委托给他 ,你们绝对服从他的命令。但是现在 ,当他偷窃了一次 ,你们就要把他赶出公社。那么 ,这以后 ,他该到哪里去呢 ? 那就是要流落街头 ,而这样就只有去作盗贼了 ! 难道你们就这样软弱无力 ,不能够再教育伊凡诺夫吗 ?”

这时候 ,伊凡诺夫本人——这个“盗贼”——整天象得了疯症似的。

医生比共青团员更关心他。

医生指着他说 :

“人是病倒了。你们是多么强有力的集体 ,你们改造了多少人 ,

莫非你们害怕他会给你们坏的影响吗？要知道你们是 456 个人，而他只是一个人。”

这是顶利害的理由，这是顶利害的逻辑。

社员们并不是什么有经验的人，但却是肯为自己的集体负责的人，如象“罗伯斯庇尔”等人。他们对医生的回答是这样的：

“如果伊凡诺夫要完蛋，是的，就让他完蛋好了。如果说他偷了什么东西，那只是一方面的事情。但他是一个值日队长，我们把全社委托给了他，他在全体大会上当过主席，并请求我们。说自己所知道的。这里并不是什么盗窃行为，这是他一个人受了 70 卢布的引诱，厚颜无耻地反对全体，反对我们，也反对梅贾克——梅贾克从自己的工资里每月积蓄 10 卢布，一连好几个月。如果他要完蛋，我们也不可怜他！”

“其次，我们当然对付得了他。我们并不害怕，但我们对这样的事情是不感兴趣的。因为我们能把他赶出去，所以我们就对付得了他。如果我们不把他赶出去，那么，再有这样的第二个人也就赶不出去了，那时候，我们的集体就要失掉力量，也没有办法对付任何人了。我们是要把他赶出去的，象他这样的人就是有 70 个，我们也是有办法的。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要赶走他！”

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反驳说：你们总归是损失了社员，他要是完蛋了，这是你们集体的污点。社员反驳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说：请看看那样的工学团，看看没有纪律的工学团，它一年中要损失多少个人，那里一年就要逃掉 50%。这就是说，如果我们这样严格地维护纪律，那么，损失就会小一些，我们同意损失了他，但这样就只好对付其他的人了。

争辩进行了很久，整整搞了一个晚上。最后，社员们停止了反驳，甚至为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的讲话鼓掌，因为他们讲得很好。但当进行表决时，主席说“谁赞成开除伊凡诺夫”，大家立刻都举手了。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又发言，又进行说服。我看看他们的脸，他们都

在微笑,因为他们知道反正伊凡诺夫是要被开除的。到了晚上 12 点,作了决定:仍照昨晚上的决定开除——打开门,教他滚出去。我们所唯一争取到的是:不把他一个人就这样赶出去,而是派人护送他,把他送到哈尔科夫。

大家就这样把他开除了。当然,以后我又和别人设法把他送到其他的工学团里,但谁也不让知道,因为,一年以后他们要是知道了这件事,那就会质问我为什么要破坏全体大会的决议。他们会说:我们把他开除了,而他却会走门路、请求照顾。

这件事,对我说是一种刺激。在这件事情以后,我考虑了很久,所谓集体利益应当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究竟该作到怎样的程度?现在我倾向于这样一种想法:尊重集体利益,应当坚持到底,甚至于可以达到无情的程度,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会有真正的集体教育和个人教育。

关于这一个题目,以后我还要说到。现在我只是想再说说所谓达到无情的程度,事实上只是说在逻辑上应该无情,这就是说,在肉体上也可能就不是无情的,也就是说,应当这样把握无情的行为:把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但同时也不使个人陷于极困难的不幸处境中。

最后,还有第四个定理,这是应该向儿童暗示和提出的一个重要理论,这就是纪律能美化集体。纪律的这一方面——纪律的美,纪律的美学——是非常重要的。据我所知,在我们的儿童集体里,恰恰就是这一方面作得很不够。用流浪儿童的话说,有时候我们的纪律是一种束缚人的、枯燥无味的纪律,是一种空谈的、督促的、说得令人厌烦的纪律。如何使纪律成为愉快的、有吸引力的、活泼生动的,这纯粹是一个教育技术问题。

我在自己的工作过程中,并不是很快就达到这种美的纪律的完满形式的。同时,这里当然也有发生偏差的危险——要使纪律不单单成为外表的装饰。真正需要的,是要使纪律的美产生于纪律的本质。

无论如何,我自己最近已经在纪律美学方面制定了比较复杂的计划。为了举例说明,我想举出若干办法,我利用这些办法,已经不是为了培养纪律,而是为了检查和保持美感。

例如拿迟开早饭来说。因为厨师或值日员或某一个同学的过失,因为他们睡过了时间,起晚了10分钟,晚发了吃早饭的号令。这就发生问题了,接着下去该怎么办呢?晚吹10分钟的工作号,推迟工作时间呢,还是放弃吃早饭?事实上,问题是十分严重的。

我这里有很多雇用人员——工程师、技工和指导员,约有200个人,他们也都珍惜自己的时间。他们8点钟来工作,我应当在8点钟鸣汽笛。而现在早饭晚了10分钟,社员们还没有出来,结果,我就得耽误工人和工程师的工作时间。许多人住在城外,会有赶不上火车等等事情。一般地说,这里是有严格遵守时刻的规则。

最近几年来,我从来没有因为该怎么办而迟疑过,孩子们也没有迟疑过。早饭开晚了。我还是在8点正鸣汽笛,许多孩子奔跑起来,有一些孩子刚开始吃早饭。我走到食堂里说:早饭时间结束了。我知道得很清楚,我这样做会使他们吃不上早饭,我也清楚地知道,这对于身体是很不好的,对其他方面也是很不好的。但是,虽然如此,我还是从来也没有迟疑过。如果我这样做是对待一个没有感觉到纪律之美的集体的话,那就有人会对我这样说:

“怎么啦!要教我们挨饿吗?”

任何人从来都没有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大家都清楚地知道应当这样做,知道我可能来到食堂,向大家提出要求,我要求大家不吃早饭,这正是表明我相信集体。

有一次,值日员们来找我,说:孩子们在寝室里拖拖拉拉的,不赶快到食堂里去,耽误了吃早饭。对这样的事情,我从来不作任何理论上的讨论,也不对任何人说什么。我只是第二天到食堂里去,和站在我旁边的一个人谈话,谈的完全是另外的事情。所有耽误了吃饭时间的100到150个人——多半是年龄大的学生,都走下楼梯,不转向

食堂,一直到工厂里去了。“您好,安东·谢妙诺维奇!”谁也不表示出误了早饭的样子。只是到了晚上有时候才说:

“呵,您今天可把我们饿坏了!”

有了这样的基础,我就可以作以下的练习。大家在等待放映《波将金号》的电影,影片运来了,大家都坐在大厅里。演到第三部分时,我说:

“第四、第二和第三分队到大厅外边去。”

“这是怎么回事?”

“我得到消息,有些可疑的人在公社周围走来走去,请检查去吧!”

“是,进行检查。”

他们并不知道有没有可疑的人在公社周围,只把它当作试验。但如果有谁说这是作试验,那么,其他的人就会来指责他。他们出去检查,再回来,这时候心爱的电影已经放映了一部分,但谁也没说什么,谁也不说放过了一场好电影,而是回到大厅继续看下去。

就是这样的一种练习。可以有很多这样的练习。尤其是大家都知道,哪一分队是集体中最好的,它就有更多这样的机会。我们有一个传统,当分配清洁扫除工作的时候,总是把最繁重的、最让人不愉快的工作委托给最好的一个分队。清洁扫除工作是相当紧张吃力的工作,因为,公社里每天都有一些代表团来,公社应当保持整洁,要达到一切都发亮的地步。

“我们的哪一个分队最好?”

“第六分队。”

这就表示,最让人不愉快的清洁扫除工作,是由第六分队来做的,因为它是最好的分队。正因为这一点,你也应该完成最不愉快的工作。对我们来说,这是一种非常自然的逻辑。这是最好的分队,那就委托它做最繁重的工作。

或者象在行军中,常常会遇到需要花费体力、速度和毅力的那种艰难情况。这时候,该派哪一分队去呢?派最好的分队去,同时,被

派的这一分队也以此而自豪。有时候很难看出哪一个是最好的分队时,我就不好意思给它过重的负担、额外的任务。可是相反地,我所以没有任何犹豫、不说任何多余话就把这样的任务委托给某一分队,也正因为这是一个好分队,而它也能感觉到这种信任。在这种信任中,它感觉到了特殊的美,感觉到了特殊的美感。

这种美感,是纪律化方面的最后的一个极细致的工作。这并不是每一个集体都能够办得到的。但是,如果集体能够办到这一点,如果逻辑是你越值得尊敬对你的要求就越高,如果这个逻辑是真实的、生动的逻辑,这就表示,纪律化和教育的问题,达到了一定的令人满意的境地。

最后,应当谈到关于纪律的最后一般理论原则。我认为有必要以儿童所能理解的简单形式尽可能经常地向自己的学生提出这个原则。这个原则是:如果一个人需要做自己喜欢的什么事情,就是没有纪律他也会经常去做的;所谓有纪律,正是一个人能够愉快地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纪律原则,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也必须尽可能经常地着重指出这条原则。

这是对一般行为理论——道德——的简短叙述,应该把这种行为理论作为确定的知识告诉儿童,应当经常谈论、经常强调指出这种理论,并且要使儿童理解这些理论和原则。因此,只有在这种一般的理论化的情形下,纪律才能成为自觉的纪律。

在纪律的所有这些定理和定则中,必须经常着重指出主要的和基本的东西,这就是纪律的政治意义。在这里,我们的苏维埃现实生活是能够提供出许多光辉的范例的。我们历史上的最大的成就和最光荣的篇章,都是和纪律的灿烂光辉相联系的。请回忆一下我们的北极探险队、巴巴宁探险队,回忆一下所有的苏联英雄的功绩,请看看集体农庄运动的历史,看看我们工业化的历史。在文艺作品中我们也看到了光辉的范例,你们可以把这些范例作为苏维埃纪律的范例介绍给我们的学生。苏维埃纪律正是建立在纪律

的这些原则上的。

总之,我已经说过,这样的自觉性,这样的行为理论,应当伴随着纪律,应当和纪律平行,而不是纪律的基础。

纪律的基础是什么呢?

为了不陷入心理学探讨的深坑里,我简单地说,纪律的基础就是不需要理论的一种要求。如果有人问我,怎样以简单的公式概括我的教育经验的本质时,我就回答说:要尽量多地要求一个人,也要尽可能地尊重一个人。我确信这个公式是苏维埃纪律的一般公式,也是我们社会的一般公式。我们的社会与资产阶级社会的区别,正是在于我们较资产阶级社会更多地向一个人提出要求,而且我们的要求范围也宽得多。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可以开商店,可以剥削,可以搞投机事业,可以不劳而获地靠高利贷生活。那里,对人提出来的要求要比我们少得多。

我们向每个人提出严格的、切实的和一般的要求,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对个人也表现出极大的、有原则的尊重。这就是把对个人的要求和对他人的尊重结合起来,这二者并不是两件不同的事,而是一回事。并且,我们对个人所提出的要求,表现了对个人的力量和可能性的尊重,而在我们的尊重里,同时也表现出我们对个人的要求。这种尊重并不是尊重外表的什么东西,并不是尊重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的东西,也不是尊重令人愉快、美丽的东西。这是对那些参加我们的共同劳动、共同工作的同志的一种尊重,这是对活动家的一种尊重。

当然,如果对个人没有要求,那么,无论建立集体,无论建立集体纪律,都是不可能的事情。我是主张对个人要有要求的,我拥护对个人提出一贯的、坚定的、明确的、不予修正和毫不放松的那种要求。

你们当中读过我的《教育诗篇》的人,就知道我是从这种要求开始做起的,就知道学生札陀罗夫挨打的那件事。这些打人的事件,首先表明我作为一个教师的修养是很差的,表明我对教育技术的掌握是很不够的,表明我的神经不够健全,表明我悲观失望。但是,这并

不是惩罚,这也是一种要求。

在我开始教育工作的最初几年里,我提出的要求达到了最高的限度,达到了强制的地步,但从来不会因为过失来惩罚我的学生,从来不那样残酷地、极端地使用惩罚。我所叙述的我的那种过失,并不是惩罚,而是要求。

我不希望你们重复我的经验,因为,现在不是1920年了,而是1938年;又因为在你们当中,在你们所领导的同志中,未必有人会处于我当时所处的那样艰巨、孤独和困难的境地。但我敢肯定地说,如果没有要求,那就不可能有教育。要求不应该是模棱两可的,应当布尔什维克式地达到可能的极限。

当然,组织要求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但这根本不象许多人想的那样需要意志。我个人并不是意志坚强的人,也从来不具备那种坚强个性的长处,完全没有。我是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一个普通的教师。我只相信我没有权利卖弄我的文化教养,而有的教师卖弄自己的文化教养,往往是因为不懂得应该确定的那种方针。我相信,应该确定的这种方针就是一种要求。

当然,要求应当是发展的,但我相信发展的途径总是相同的。如果你们愿意以没有纪律的儿童集体或只是表面上有纪律的儿童集体为例,那自然是不会发生任何争执的。然而,你们应当从对自己个人提出要求开始做起。

有时候,为了让孩子对你们让步,为了孩子能照你们所希望的去做,只要提出坚决的、不容打折扣的和不高声下气的要求就可以了。这种情形是常常有的,甚至在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这样的。这里有一些暗示感受性的成分,也有一些感觉到你们是做得对的成分。以后,一切全靠你们的智力了。决不可以提出不合逻辑的、可笑的、跟集体的要求无关的粗鲁的要求。

我很担心我会做出不合逻辑的事情来,我特地为自己规定了这样的原则:凡是我没把握断定能不能要求什么,要求得合理或不合理的

地方,我就装作什么也没有看见的样子。我在等待这样的时机,那就是,在我看来是显而易见的时候,并且凡是有健全思想的人都明白我是做得对的时候。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就坚决地提出专断的要求,因为这样的要求由于显而易见的真理显得更为合理了,于是,我干起来也就更勇敢一些,孩子们知道我做得对以后,也就更容易对我让步了。

我认为,要求的这种逻辑,在最初就应当成为一种法则。凡是任性的教师,凡是在集体看来是刚愎自用的教师,凡是提出集体所不理解的要求的教师,是不会得到什么成就的。

我对自己的第一个集体没有提出不许偷窃的要求。我知道,在最初,我无论在哪一方面还都不能够说服他们。但是,我要求他们在应该起床时起床,要求他们完成应当完成的工作。至于他们仍旧偷窃,那我就对这种偷窃行为,暂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在任何情况下,如果没有真诚的、坦率的、有说服力的、热忱的和坚定不移的要求,那就不可能开始对集体的教育。谁想从动摇不定、迎合迁就的劝说开始,谁就要犯错误。

道德理论的发展应当和要求并行不悖,但道德理论的发展,无论如何不应当代替要求。当你们有机会谈理论时,对儿童说应该做什么的时候,那么你们自己就应该这样去做。但是,当你们应当向儿童提出要求的时候,那你们就不应该引用任何的理论,而是应该要求,设法做到达到你们的要求。

我曾到过许多学校,大部分是基辅的学校,特别使我吃惊的是在这些学校的儿童集体里存在着这样可怕的现象:大喊大叫、恶作剧、不严肃、发狂、在楼梯上跑跳、打碎玻璃、打破鼻子和头等等。

我忍受不住这种喧嚷叫喊。我的神经是很健全的,健全到能够在儿童的环绕中、在人群中来写《教育诗篇》。谈话是妨碍不了我的。但我认为这种呼喊,尖叫和奔跑,儿童是不需要的。

但同时,我又听到了教育家们的这样一些论调:儿童就应当跑跳,应当喊叫,这是儿童天性的表现。

我反对这种理论。儿童根本不需要这样。在学校里的这种齐声喊叫,永远恰恰只能伤害神经,此外是不会有any好处的。相反,我根据自己的经验,深信在儿童集体里,可以顺利地进行井然有序的活动,可以使儿童有所抑制,尊敬他人,爱护财产、门窗等等。

在公社里,你们是不会看到这种喧嚷吵闹的。在街道上、在广场上、在房间里,社员们的活动是井然有序的,我已经做到了这一点,我要求的就是活动要井然有序。

在我们的学校里,要求做到秩序井然是一点也不困难的。如果现在给我一所学校,我就要把自己放在组织者的位置上。我就要把全体学生集合起来,对他们说我不希望再看见这样乱哄哄的。不需要任何的证明,不需要任何的理论!以后,我自然要对他们讲理论的,但在当时,谈理论只能有害无益。我就是要采取坚决的方式,使我不再看见这样的事情,使我在学校里不再看见任何一个叫喊吵闹的学生。

以不许反对的方式提出这种要求,在每一个集体的初建时期是很有必要的。如果没有各个组织者的这种冷静的要求态度,竟能够使松弛不振、嚣张吵闹的集体遵守纪律,这是我不能想象的。以后,一切就容易得多了。

当第一、第二、第三、第四个积极分子接连着转向你们这方面来的时候,当自觉地愿意维护纪律的男儿童组织在你们周围的时候,这种要求就发展到了第二个阶段。

我是急于要求达到这一阶段的。我并不在意这些男儿童也有许多缺点,我努力设法更快地团结那些积极分子,他们在全体大会和小组里用自己的要求和发言,用自己的意见来支持我的要求。当我的周围已经有了这些积极分子所组成的核心的时候,这就是要求的第二个发展阶段。

最后,当集体提出要求的时候,这就是要求的第三个发展阶段,这是由于你们在第一阶段付出不同程度的劳动而得到的一种报酬。

当集体提出要求并且有了一定的步调和作风的时候,那么,教师的工作就会象数学那样地精确,而且是有组织的工作。

最近五年来,我在捷尔任斯基公社已经不提出任何要求了。相反地,我已经成了集体要求的阻碍者了,因为,集体一般地已经赶到前面去了,往往向个人提出了过多的要求。

当集体已经提出要求的时候,你们也就有了展开道德理论的余地。每一个人都知道,当每一个学生向自己提出要求,并首先注意自己行为的时候,道德的要求——政治道德的要求,就是要求的一种基本的和一般的总结。

这是由组织者的专断要求到个人基于集体要求来向自己提出任意的要求所应经历的途径。我认为这一途径就是苏维埃儿童集体发展的基本道路。我确信这里不可能有固定不变的方式。一个集体处于要求的第一个发展阶段时,需要有专断的教师,并应尽可能地迅速过渡到任意的集体要求的阶段,过渡到个人对自己提出任意要求的阶段。

当然,不能仅仅限于一种要求。要求是使集体纪律化的必要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因素。其实,所有其他的一切因素实际上也是种种的要求,不过没有以这样坚决的方式表达出来。除了要求以外,还有诱导和督促。这两种方式似乎是要求的一种柔和的表达方式。最后,较普通要求更加有力的方式,就是威吓。

我认为,应该在我们的实践中采用这些方式。

什么是诱导呢?诱导也一样要经过若干发展阶段。用礼物、奖品、奖金或个人的某种享受进行诱导,这是一方面;用行为美学,用行为美的内在本质进行诱导,这是另一方面。

督促也是这样的。在最初阶段里,督促可以采取比较简单的方式,也可以采取证明或说服的方式。在比较更成熟的阶段上时,督促就可以用暗示、微笑和幽默的态度来表示。督促是教育儿童的一种很有价值的、很重要的方式。

威吓也是这样的。如果在集体发展的最初阶段上,你们可以用惩罚和令人不愉快的事情来威吓的话,那么在集体发展的最后阶段上,就不需要这样做了。在发展了的集体里,这样的威吓是不容许的。在捷尔任斯基公社里,我就不允许自己用“我要怎么样怎么样处分你!”这种办法来威吓儿童。如果这样做的话,那就是我的错误。我曾用过把问题提交全体大会评判的办法来威吓,提交全体大会来评判,是社员们感到最可怕的一种事情。

督促、诱导和威吓在集体发展的过程中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捷尔任斯基公社在最近几年来,当学生因为生产上、品德上和生活方面的各种成绩而受奖的时候,有这样三级的奖励办法:奖品、奖金和最高的奖励。最高的奖励就是以命令的形式当众宣布嘉奖。当众宣布嘉奖并没有任何的奖品和任何物质上的奖励,但最好的分队都在努力争取这种嘉奖。为什么要争取呢?为了在这一天,大家都依照规定专门穿上有白领子、缀花纹字的礼服,全社的人员都遵照规定在广场上列队,出动了乐队,全体教师、工程师和指导员都出场,另排成单独的行列。发出了口令:“立正!”出旗,乐队演奏礼乐,接着,我和受嘉奖的人走出来,于是宣读命令:

“根据公社全体大会的决议,为了某某事情,对某某人予以嘉奖。”

这是最高的奖励。这种嘉奖还要记载在分队日记和公社日记里,并公布在红榜上,说明某一分队或某一个人在某一天里受到了嘉奖。

这种最高的奖励,只有富有情感、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和自尊自爱的集体才可能得到。但是,争取这种奖励是可以的,而要从这种奖励开始却是不行的。在个别的情况下,应当从比较简单的诱导开始,应当从若干物质的或其他方面的满足开始,例如看戏等等。当然,当一个好的教师能够同时应用诱导、督促、威吓和要求时,是可以发现每一种情况下的许多详情细节和细微的活动的。

应该要求什么?这是问题之所在。这里,我要提出一个公式,这个公式也许甚至于是不会变更的,而且应当永远如一。首先应当提

出的唯一要求就是服从集体。在这一方面 ,社员们教导了我。他们在发展自己的集体的过程中 ,获得了非常有趣的方式。

近几年来 ,我们没有因为偷窃惩罚过学生。对我来说 ,这也是有些意外的。我忽然遇到了这样的一件事情 :有一个社员 ,一个十六岁的小伙子 ,从柜子里偷了同学的 5 个卢布……

大家把他请到全体大会上 ,他照规矩应当站在中间。在我们公社的许多传统中 ,有这样的一个老传统 ,在类似大厅而较大厅大一些的一个地方 ,沿墙放一圈沙发 ,大家都坐在沙发上 ,中间的位置空着。谁要向全体大会作报告 ,谁就要走到中间 ,正站在枝形挂灯的下边。谁应当站在中间 ,谁不应当站在中间 ,是有具体而明确的规定。例如在把某个人作为证人询问时 ,这个人是不需要走出来站在中间的。如果队长代表分队时 ,可以不走出来站在中间 ,如果队长代表自己个人 ,他就应该走出来站在中间。我不记得有不这样干的事。拒绝走出来站在中间 ,就被认为拒绝服从集体。他可能犯某种小的过失 ,受一点小小的惩罚也就可以放过去的。但是 ,如果他拒绝走出来站在中间 ,那大家就会把他看作对抗集体的最严重的违法者。

偷钱的小伙子走出来站在中间 ,大家问他 :

“你偷了?”

“我偷了。”

“谁有话要说?”

在中间应当立正站着。

有一个人说了话 ,这又是那个“罗伯斯庇尔” ,他老是要求赶出去。他说了话 ,他突然说 :

“我们能把他怎么办呢?他是个野东西 ,他怎能不偷呢?听着 ,你还得偷两次!”

大家很赞赏这个说法 ,都说 :

“不错 ,他还要偷两次。让他离开中间吧。”

这个小伙子抱怨起来 :

“我怎么还会再偷两次？我起誓再也不偷了。”

“罗伯斯庇尔”说：

“你听着，大家给你说的什么。你还要偷两次呢！”

小伙子走了。他晚上到我这里来说：

“天晓得是怎么回事！他们甚至没有惩罚，就是嘲弄，说我还要偷两次！”

我说：

“你报告他们嘲弄你了。”

想不到过了一个礼拜，他又从人家的柜子里偷了一把切削器，并不是为了卖，而是准备去拧锁等等。于是，他又站在中间了，主席问他：“你偷切削器了？”这时大家都哈哈大笑。“罗伯斯庇尔”站起来说：

“我给你说过，你还要偷两次，你果然又偷了。你还有什么脸在公社里走动？还抱怨什么？你还要偷一次！”

小伙子走了。他忍住了一个月，但一个月以后，又走进厨房偷了一个包子。

当他又站在中间的时候，大家都高兴地以同情的眼光看他。“罗伯斯庇尔”说：

“怎么样？这是最后一次了吧？”

小伙子请求发言，他说：

“现在我敢说这是最后一次了。”

大家又原谅了他，以后果然成了事实：他再不偷了。

这件事很合大家的意，竟变成了一句习惯语。当发生了偷窃事情时，我们就要用这一句有纪念意义的话：

“你还要偷两次！”

我说：

“你们是怎么想的！你们说，你还要偷两次！要知道我们公社里有450人，如果每一个人都要偷三次，那我们的公社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大家说：

“您不必担心！”

事实上,当真用不着担心,因为,这种集体信念的力量是这样的厉害有力,竟使所有的偷窃行为都停止了。如果再有人偷东西,他就要苦苦地请求不让他站在中间,保证再也不偷了。要不然,大家就要说:他还要偷两次!而这话却是他从前自己也说过的。

象小偷小摸这种过失,我们是不惩罚的。大家认为这是不健康的人,他有旧习惯,他无论如何改不了。

其次,我们也不因为粗野,不因为有些流氓倾向就给以惩罚,如果这些现象是发生在不久前才到我们这里来的新人的身上的话。

要惩罚的是象下面这一类事:例如,有过这样的一件事情。有一个女孩子,是个老社员,分队队长,共青团员,是公社里一位很好的、生龙活虎的女领导人,她依仗着自己受到的普遍的尊重,有一次在休假后没有返回公社住宿,她的朋友打来电话,说舒拉病了,留在她那里住宿了。

值日队长在电话里得到这个消息以后,来向我报告说:舒拉病了,留在某处住宿了。

我吓了一跳。我告诉现在作公社医师的以前的学生维尔什涅夫,让他到那里去看看是怎么回事。他去了,谁也没有碰到,既没有舒拉,也没有她的朋友。第二天,舒拉站在中间了。

一方面,这是女孩子的一种窘迫;另一方面,这又是另外一种情绪。她说:

“我想去看戏,害怕不让我去。”

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有那么一种羞涩的、愉快的微笑。

但我没有看到这种微笑,大家也没有看到,这里没有微笑的气氛。“罗伯斯庇尔”和从前一样,主张把她赶出公社,因为,如果每一个分队长都进了城就“害病”,那我们就将派出许多医师和干一些诸如此类的事。

我看了看说：“该怎么办呢？”

“要表决。”主席说。

我说：“你们糊涂了。她在公社这么多年了，而你们竟要把她赶出去……”

“罗伯斯庇尔”说：

“是的，我们是有点过火了，但应该禁闭她 10 小时。”

就这样决定了，禁闭 10 小时，然后共青团组织再来处理她。晚上，在共青团大会上她“洗了一场蒸汽浴”，党组织应该出来过问，不要使她受到开除团籍的处分。因为，大家说：还是让她偷东西好，不然，她又是共青团员，又是分队队长，而忽然打电话给值日队长说自己病了，实际上并没有病，她到哪里去了，她撒谎，撒谎是犯罪。

这样的逻辑并不是一下子能得到的，而是随着集体的发展逐渐形成的。

最大的要求应当在一个人在某种程度上自觉地对集体对抗的时候提出来。对那些由于本性、由于品质、由于不能自制、由于政治上和道德上的无知而产生的行为，要求就不能太严厉了。这里就可以依靠经验的积极影响，依靠习惯的逐渐形成。但是，只要个人有意识地对集体，不承认集体的要求和权利，就必须坚决地、彻底地提出要求，直到个人承认必须服从集体为止。

现在来谈一谈有关惩罚的一些意见。我们对惩罚所持的态度并不完全都是对的。一方面，我们已经承认惩罚往往是必要的、有益的，认为惩罚是可以允许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有这样的一种看法——纯粹是我们知识分子的一种看法，当然，主要是教师们的一种看法——这就是：惩罚是允许的，但是，最好还是不用它。纵然惩罚是可以用的，但如果你惩罚了，那你就不是一个好教师。只有不用惩罚的教师，才是好教师。

我认为这样的逻辑，会弄得教师无所适从的。必须正确规定什么是惩罚。我个人相信，惩罚并不真有那么大的好处。但我坚信下

面这样的事实：凡是需要惩罚的地方，教师就没有权利不惩罚。在必须惩罚的情况下，惩罚不仅是一种权利，而且是一种义务，也就是说，我深信教师可以用惩罚或不用惩罚，但是，如果教师的良心、教师的熟练技术、教师的信念说明他应当惩罚时，他就没有权力拒绝使用惩罚。惩罚也和其他的一切方法一样，也应当用一种当然的、通常的和合乎逻辑的方法来提出。

必须坚决地摒弃对于惩罚所持的那种基督教态度——惩罚就是一种允许的罪恶。把惩罚当作由于某种原因而被允许的一种罪恶的看法，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是既不合乎逻辑观点，也不合乎理论观点的。凡是应用惩罚能带来好处的地方，凡是不能使用其他方法的地方，那教师就不应该谈论什么罪恶，而应当感到应用惩罚是自己的一种义务。认为惩罚是一种允许的罪恶的那种说法、那种信念，会把教师变成仿效虚伪的对象。任何的虚伪都是不应该有的。无论哪一个教师，都不应该故作姿态，说什么：我是圣人，不使用惩罚。

真正看到应当使用惩罚的人该怎么办呢？！他坐着悲叹：看，某某教师是不用惩罚的，人家会怎样议论我呢？……大家会说我是第二流的教师。

我认为这种虚伪态度是必须抛弃的。凡是必须使用惩罚的地方，凡是使用了惩罚能够有益处的地方，教师就应当使用惩罚。

但是，这完全不是说，我们赞成在任何的情况下、在任何时候都使用惩罚。

什么是惩罚呢？……我认为，正是苏维埃教育学才有可能在惩罚的领域里找到许多新的东西。我们的整个社会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我们非常尊重人，我们对人非常人道，这使我们有可能找到关于惩罚问题的能得到美满结果的标准。这种标准应该是这样的：惩罚应当解决和消灭个别的冲突，并不再造成新的冲突。

旧式惩罚的一切祸害在于它消灭了一个冲突，而同时又制造出另一个冲突，这另一个冲突必须用更复杂的办法才能解决。我确信

能彻底消灭冲突的惩罚办法,还没有研究出来。显然,惩罚在一种情况下是有意义的,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就没有意义了。

苏维埃式的惩罚和其他种类的惩罚到底有什么区别呢?第一,无论在任何情况下,苏维埃式的惩罚决不当造成苦痛。一般的逻辑是这样的:我惩罚你,你受痛苦,其他的人看到就会想:“看,你受痛苦啦,我们要抑制住这种行为。”

任何身体上和精神上的苦痛都不应该有。惩罚的本质是什么呢?惩罚的本质是一个人受到集体的责备,知道自己的行为有了错误,也就是说,在惩罚里并没有压制,而是有对错误的感受,有对见弃于集体的感受,纵然是极轻度地见弃于集体。

因此,只有当问题在逻辑上已经很明白的时候,只有当舆论一致赞成惩罚的时候,才应当使用惩罚。凡是集体还没有站在你们这一方面的时候,凡是你们还没有把集体拉到自己这一方面来的时候,是不可以使用惩罚的。凡是你们的决定可能为大家所否决的地方,使用惩罚就不会产生益处,只能造成有害的影响。只有当你们感觉到集体和你们站在一起,集体所想的和你们所想的完全一样,集体所指责的和你们所指责的也完全一样的时候,才能使用惩罚。

这就是有关惩罚的本质。

现在,谈一谈什么是惩罚的方式?

不管什么样的定型的惩罚方式我都是反对的。在惩罚的领域里,虽然可以有限制惩罚权利的一定的规定和方式,但是,惩罚总是应当完全适合于个别人的一种个别性质的东西。

我在自己的实践中,认为首先可以使用惩罚的,或者是整个集体——集体的全体大会——或者是集体全权委托的一个人。要是有一十个人可以有权惩罚的那种集体,我不以为那是健全的集体。

在捷尔任斯基公社里,我领导着生产、生活和学校,只有我一个人能够使用惩罚。这是很必要的。必须使惩罚有一致的逻辑,必须使惩罚不成为频繁的事情。

第二 对使用惩罚的人来说 在惩罚中也应当有一定的传统和标准。

在捷尔任斯基公社里 有这样的一条规定 每一个新来的人都称为学生 等到大家都认识了他 等到大家看到他不对抗集体 能和集体一致行动时 就称他为社员了 给他佩带上刻有“ФЗД”字样的证章 这个证章就确认了他的社员身份。

我可以这样惩罚学生——让他们担任勤务工作。这是半小时的工作 主要内容是帮厨、扫除以及花房里的工作 但不是生产方面的工作。其次是禁止节假日外出 不给零用钱 也就是说 不发给他们所挣得的零用钱 而是以他们的名义存在储蓄所里 而从储蓄所里取钱 没有我的签字是不行的。此外 可以使用的一种最可怕的惩罚 就是免除生产工作 调到事务工作上去。

我可以使用的惩罚 我有权使用的惩罚 仅仅是对学生而已。

对于社员 我是没有权力使用这些惩罚办法的。对社员只有一种惩罚 这就是禁闭。但对学生是不能禁闭的。禁闭是我对社员所能使用的唯一的一种惩罚方式。

这一项制度是有重要意义的。每一个人都竭力想快一点得到社员的称号 等到得到这一特权——社员称号——就成为可以受禁闭的人了。我是毫不吝惜用禁闭的：为了细故小节 为了小小的过失 为了象扣子没有扣这样的事情 就要禁闭一小时。惩罚社员时 我是没有权力坐下来的 我应当站着说：

“某某人 禁闭一小时。”

受禁闭的人就会说：

“是 一小时禁闭。”

我给的禁闭惩罚可以一直到 10 小时。这是什么意思呢？

在休假日里 受禁闭的人一定把皮带交给值日队长 走到我的办公室里来说：

“我来坐禁闭。”

他既来了 我就不能放他走。因为 全体大会在 1933 年剥夺了

我免除禁闭的权力。今天我免除了,明天我再惩罚,那算什么规矩呢?因此,我是不能免除的,他也有权利坐下来,在我的办公室里工作起来。只有我能和他谈话,此外谁也没有权力和他谈话,而且在这里还不能谈他的过失。如果我和他谈起他的过失,那就是愚蠢的、粗俗的。他坐禁闭,是他“自作自受”,如果要谈论这件事,那是最不成体统的。

通常,我们谈论的是公社中的、生产中的各种事情。我没有权力提醒他是在坐禁闭,也没有权利老看表,看他已经坐了多长时间,我认为他自己应当适当地安排自己的禁闭。把这件事委托他自己处理,对我是很合适的。

你们不会知道这是什么样的禁闭。这就是整整一天的休假日坐在我的办公室里和我谈话。

试试看徒然给以惩罚吧,谁都不肯来坐,虽然这是一种愉快的禁闭。被惩罚的人会跑到全体大会上申诉。大家会认为这是侵犯了被惩罚者的个人权力。

女孩子们对禁闭是怀着某种恐惧感的,她们认为坐了禁闭,就是在全体社员面前丢了脸。因此,有了证章的女社员,通常总是不受禁闭的。不要让女孩子去坐禁闭。

有一次,我把一个很好的、很聪明的小女孩——一个分队队长禁闭了两个小时,她就整整地在我的办公室里哭了两小时:以后还怎样在全体大会上露面呢?现在,她成了哈尔科夫剧院的演员了。

所谓禁闭,就是使用我所说的某种定理:尽量多地要求一个人,也要尽可能地尊重一个人。禁闭是一种很神圣的事情。

有一次,我接到基辅来的一个紧急电报,限我在一小时内由捷尔任斯基公社到基辅去。这时候,我可以支配的时间只有半小时,以便向我领导了八年之久的集体告别。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说什么的,无论我,无论大家,都是很为难的。女孩子们哭了起来,情绪是很激动的,但是,条件反射仍然起了应有的作用。我看见钢琴上有

了尘土 ,于是终止了告别的话 ,我说 :

“谁是剧院的值日 ?”

“第一分队。”

“禁闭第一分队队长五小时。”

第一分队的队长是我的老战友 ,他和我在一起整整有八年了。但为什么有了灰尘呢 ?他没有照管到 ,因此就要受五小时禁闭。

我走了 ,两个月以后我回来检查工作 ,第一分队队长来到我的办公室说 :

“我来坐禁闭。”

“为什么 ?”

“为了钢琴上有灰尘。”

“你为什么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坐禁闭呢 ?”

“我要等到你回来的时候再坐禁闭。”

于是 ,我必须陪他坐五小时 ,一直等到他坐完了禁闭为止。

这是属于形式上的一种惩罚。

当集体有了共同的步调、互相信任的作风时 ,如果由全体大会处以惩罚 ,那就会变成新奇的 ,有趣的事情了。

在全体社员大会上 ,发生过年长的共青团员骂指导员的事情。虽然那位团员是对的 ,但他不礼貌地骂了人。全体大会作了决定 :“让年龄最小的少先队员基连科向这位共青团员解释 ,在这样的情况下究竟应该怎么办。”

这是很严肃的一个决议。在作出决议以后 ,值日队长请来基连科和那位共青团员 ,对他说 :

“请坐下听。”

基连科解释了 ,自觉地完成了自己的义务 ,而那位共青团员也自觉地倾听了。

值日队长在全体大会上报告说 :

“基连科已经完成了大会的决议。”

“基连科给你说的话,你都明白了吗?”

“明白了。”

“去吧。”

一切就结束了。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一个男社员和一个女社员一同去散步,看见人群中在打架,他忍不住,也参加打架了。大闹了一场而告终。

大会的决议是:

“在下一个节假日的3时5分,某人要检讨自己的行为,并将检讨报告给队长。”

这就不得不动动脑筋。因为,事实上必须说出来所想的是什么。这就硬逼着一个人要整整想一个礼拜。结果,他终于检讨了,来作了报告。

这样的惩罚,实际上并不是一种惩罚,这只是集体以轻松幽默的办法来表示集体的力量,起一种推动作用。但是,在我的实际工作中,惩罚当然不是主要的东西,个别性质的谈话才是主要的东西。

### 第三讲 个别影响的教育方法

今天我打算向你们提出个别影响的问题,即个别影响的教育方法问题。用特殊的方法从集体影响转向个别影响,从组织集体转向组织个人,在我最初几年的教育经验里,对于这一点的理解是错误的。我当时以为第一应当注意对整个集体的影响,其次是对个人的影响,作为对集体发展的一种校正。

在我的教育经验的发展过程中,我获得了深刻的信念:教育方法不是由整个集体直接转向个人,而只是通过为了教育目的而特别组织起来的基层集体的媒介转向个人的,以后的事实也证明确实是这样。

我以为,未来的教育学理论,应当特别注意基层集体的理论。所谓基层集体,应该作怎样的理解呢?

一个集体的各成员在工作、友谊、生活和思想上固定地结合在一起,这样的集体就可以叫做基层集体。有一个时期,我们的教育学理论曾把这样的集体叫做核心集体。

在我们的学校里,自然也存在这样的集体,这就是班级;它的缺点可能只是在我们学校中没有起基层集体的作用,也就是说它没有能起个人和整个集体间的联结环节的作用,而往往成了最高的集体。在某些学校里,我看到班级成了学校集体,而整个的学校集体,有时候反而看不见了。

我的条件是比较有利的。因为,我的公社有宿舍和生产部门,而我的公社社员在逻辑上和事实上又有许多理由去关注公共集体的事业,关注公共集体的利益。但是,我这里没有象班级那样的自然基层集体。我应当建立这样的集体。以后,我的十年制学校扩充了,我就可以依靠班级形式的基层集体来进行教育了。我所以没有这样做,是因为考虑到这样的问题:班级在不断的日常工作中团结了儿童,而由于过分倾心于此,很容易把这样的基层集体引导得脱离了公共集体的利益。班级有充分理由把自己囿于各个班级的利益范围之内而脱离公共集体。所以,最近几年来,我不赞成建立班级形式的基层集体,甚至不赞成建立生产队形式的基层集体。我以班级和生产部门这样有力的结合形式来建立公社基层集体的企图,得到了可悲的结果。这样的基层集体因局限于自己的小圈子,经常有脱离公共集体利益和囿于自己的基层集体利益的倾向。在这样的情况下,基层集体也就失掉它作为基层集体的价值,成了侵蚀公共集体利益的东西,于是,要转向公共集体利益就更为困难了。

通过犯错误我获得了这样的看法:这些错误,曾经影响过我的教育工作。因此,我有权说,有许多学校过分用基层集体的利益来限制学校的利益,也必然会得到同样的教育结果。

只通过基层集体(核心集体)是无法进行集体教育的。因为在这样的集体里,日常生活中长期的友好合作把儿童团结在一起,他们

成天见面,出现了小圈子,结果就会获得不能称为完全的苏维埃教育的那种教育。只有通过大的集体——这种集体的利益不是仅仅源于单纯的交往,而是源于更深刻的社会结合——才有可能过渡到广泛的政治教育,这时候,集体也就意味着整个苏维埃社会了。

把儿童封闭在一个友谊集体中的危险性,也就是小圈子教育,而不是广泛的政治教育的危险性……

在我的教育经验里,我获得了这样的组织:基层集体既不限于班级利益和学校利益,也不限于生产利益,而成为从各个小组中汇集学校利益和生产利益的一个基层组织。这就是我最近采取分队的组织形式的原因,我把不同班的学生和不同生产队的工作者都编在一个分队里。

我知道得很清楚,这种组织的逻辑是不足以使你们凭信的。我没有时间作进一步的详细阐述,但可以简要地指出若干情况。例如,实际上,这样的问题最使我关心,我曾从统计、活动和行为方面研究过这样的问题。拿年龄问题来说,我在开始工作的初期,也是主张以年龄为标准来建立基层集体的,其中一部分的原因是以学校利益为出发点的。但是,以后我就知道这是错误的。

跟年长的儿童隔离开来的年幼儿童,看起来好象是处于最合理、最自然的一种境地。这样年龄(十一、十二岁)的儿童,应当在一个集体里,有自己的兴趣,有自己的机构,我以为,这就是最正确的教育观点。我所以有这样的看法,是受了认为年龄是教育的决定因素之一的那种教育著作的某些影响。

但是,我看到跟其他年龄的儿童隔离开的年幼儿童,会陷入一种人为的不自然的境况里。在这样的集体里,没有年长的儿童的经常影响,没有世代的继承,没有由兄长们,由更有经验、更有组织、特别是在某些方面可以作为年幼儿童榜样的一些人们的言行所产生的那种道德的和美感的动机。

我试图把年幼的和年长的各种不同年龄的儿童结合在一起,试

验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后来我就采取了这样的方式。在最近七、八年来,我的分队一定是由最年长的、最有经验的、在政治上最开展的、文化程度最高的共青团员和我的公社社员里年龄最小的儿童组成的,其中也包括若干中等年龄的儿童。由各种不同年龄的儿童组成的这种集体,一方面使我获得了极大的教育效果,另一方面在我的手下又有了自己的很容易领导的、更活泼和认真的集体。

由同一年龄的儿童组成的集体,经常有局限于这一种年龄所具有的共同兴趣的那种倾向,它跟我这个领导者、跟公共集体都疏远了。如果所有的年幼儿童,譬如说,都喜欢在冬天滑冰,那么,这种滑冰的爱好,自然而然就使儿童局限于某种个别的和孤独的环境里。但是,如果我的集体是由各种不同年龄的儿童组成的,那么,这个集体里的爱好是各种各样的,基层集体的生活也就更复杂,要求各个成员,无论是年龄大的还是年龄小的,都要作更多的努力,向所有的成员提出更多的要求,因而也就能发挥更大的教育效果。

最近,我组织包括各种年龄儿童的这种集体,是依据“谁愿意和谁在一起的原则”进行的。起初,我自己也担心这种原则是否适当,但以后我就发现这是最自然、最正确的一种办法。在这样的条件下,即在这样的自然的基层集体里,我就能有各个小组和各个学校生产队的代表了。

最近几年来,我一贯地主张组织这样的基层集体。

每一分队有10人至12人,根据自愿的原则组织起来。当然,这样的结合是逐渐形成的。但公社里总有一些男孩,谁也不愿跟他们联合。这种情形使我感到很方便,我立刻就能知道谁最不容易加入公共集体。在500人之中,这样的男孩子大约有15至20人,哪一分队也不肯自愿地把他们吸收到自己的组织里。大家不肯吸收到基层集体里的女孩子是比较少的,这样的女孩子在150个人中,不过有3—4个人,虽然平常女孩子之间的关系总不如男孩子友好。所以有这样的差别,是因为男孩比女孩原则性强一些,因此,有时候就会发

生种种偏向,不愿意接受某某人。“他会损坏我们的冰鞋,他会欺侮年龄小的孩子。”这都是借口。女孩子对教育上的希望比较乐观、比较温和,因此,也就很容易同意接受那些本来对她们有些怀疑的儿童进自己的集体里。

个别儿童不能参加基层集体,发生了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办呢?我把他们带到全体大会上,在会上我说:

“这里有 15 个人,哪一个分队也不愿意收容。比方说泽姆利亚诺依,他想到第一分队去,第一分队拒绝了;他想到第二分队去,第二分队拒绝了;他想到第十五分队去,第十五分队也拒绝了。这该怎么办呢?”

通常,辩论是这样进行的,某一分队的代表站起来说:

“第一分队为什么不愿意要他?第二分队和第十五分队为什么也不愿意要他?为什么他们都不肯容纳他?他们应当说明理由。”

说明是很简单的:

“如果你们这样说,那就到你们第十四分队里去好了。你们对他负责去,你们和他打交道去。”

这时候,又有了这样的说法:

“我们和他没有关系,他是在你们那里的。他和某人是血肉相连的。你夸口说对他有办法!”

事情很明白,哪一分队也不愿意收容他。

这是我的教育上的一种“收获”。我对他们该怎么办呢?自然,不愿意收容泽姆利亚诺依的分队也感到难受和不愉快,而且,谁也没有提出任何的指责,只说让其他的分队收容。不过,这样一来,泽姆利亚诺依站在那里成为集体不愿意接纳的人。

泽姆利亚诺依开始下决心,发誓言,保证以后干好事,取得成就。事情总是应该设法结束的。这时候,通常是领导人、共产主义青年团委员会委员和队长们开始发表意见,表示最好某一分队能收容了他。不过,这样的意见,一般地说,也不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

以后轮到伊凡诺夫、罗曼琴科和彼得连科,尽量把这 15 个人分配到各个分队里,每队各一个。

这时候,就开始了另一个过程。每一个分队都希望从这 15 个人里边选择勉强还可以的人。这时候大会宣布休息,休息以后,某一个分队的队长开始说:

“我要某某人。”

还可以过得去的那个人已经成了各分队所属意的人物了。于是,谁也不愿意收容的那个泽姆利亚诺依,现在成了各分队所争取的对象了。因为,还有彼得连科和沙波瓦洛夫,他们比泽姆利亚诺依还要差一些。

第一分队接受了泽姆利亚诺依,这时候我们就说:

“你们担保他。你们要的是他,你们要为他负完全的责任。”

接着轮到了第二个人。第二个又是其余的 14 个人里比较好些的,因此,为了他又要引起一场争夺。这样继续下去,一直到剩下最后两个人,沃斯科博伊尼科夫和沙波瓦洛夫。每一个分队又都想从这两个人里努力争取比较不太坏的一个。

这一分配过程,使我能够了解所有这 15 个人。对于我来说,他们是一个特殊的小集团,我把他们记在专备的本子上,这个本子每天我都随身带着,我知道这 15 个人是我的最危险可怕的成员。虽然他们没有犯过,但是,大家不愿意让他们参加集体的这种集体的意见,我是很重视的。

儿童们组成分队时,非常清楚地了解彼得连科的本质,如果他们不愿意接纳他,这就说明我应当特别注意他。

以后,我在这一方面获得了成效,收容彼得连科的分队,自然而然地要对他负责。

基层集体就是这样组成的。当然,这里还需要有很复杂的方法,以便使这样的基层集体能产生更大的益处。这种益处就包含在分队组织的步调和作风上。

什么是基层集体(分队)呢?在我们的实践里——在高尔基工学团和捷尔任斯基公社里——我们采取了这样的一种原则:作为公社中心的我以及所有的公社机构,共产主义青年团委员会、队长会议和全体大会,都尽力设法不和个别人发生关系。这是形式。我很难对大家证明这个逻辑。我把这个逻辑叫做平行教育影响的逻辑。这一点我很难作解释,因为,关于这个问题我从来没有写作过,因此,我没有寻找,也寻找不到合适的措词来表达。

什么是平行教育影响呢?

我们只和分队发生关系,我们和个人不发生关系,这就是正式的说法。实际上,这正是影响个人的一种形式,但表达方式和本质是并行不悖的。我们事实上和个人是发生关系的,但我们要确信我们与个人无关。

怎样才能得到这样的结果呢?我们不愿意使每一个人感觉到自己是教育的对象。我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我以为一个十二岁至十五岁的人活在世上,他应当以生活为乐,应当从生活中得到某种快乐,应当具有生活上的某些印象。

这样的儿童,对我们来说是教育的对象,而就儿童自身来说,却是一个活人。如果要使他相信,他不是一个人,而仅仅是未来的人;让他相信,他是教育的现象,而不是生活着的现象。这样做,对我说不相宜的。我竭力要说明,与其说我是个教师,不如说我是在教他,使他有文化,教他在生产部门工作,我要说明,他是生产过程的参加者,是公民,而我是在他的帮助之下,在他的参与之下领导他的生活的一个长者。我决不愿意让他相信他自己仅仅是个学生,也就是说,仅仅是教育的现象,而不是社会的和个人的现象。然而,事实上,对于我来说,他确实是教育的现象。

分队也是这样的。我确信分队是小小的苏维埃细胞,它具有重大的社会任务。它担当着社会的任务,要努力使公社尽可能地达到良好的境地。它帮助以前的公社社员,也帮助来到公社并需要帮助

的以前的流浪儿童。分队是社会活动家,是社会工作和社会生活的基层组织。

为了使儿童感觉到自己首先是个公民,为了使儿童感觉到自己首先是一个人,我和我的教师同事们深信接近个人的方法应当是非常复杂的。这种方法在我们以后的工作中就成了一种传统。

彼得连科去工厂晚了,晚上我得到了关于这件事情的报告。我把彼得连科所属的分队队长叫来,对他说:

“你的队里有人上工迟到了。”

“是的,彼得连科迟到了。”

“以后不要再有这样的情形。”

“是,以后不会有了。”

彼得连科第二次又迟到了,我把全分队集合起来。

“你们分队里的彼得连科第二次上工迟到。”

我批评了全分队,他们回答说,以后不会再有这样的情形了。

“可以走了。”

此后,我就注意着会有什么样的情形发生。全分队的人都来教育彼得连科,并对他说:

“你上工迟到了,这就等于说我们全分队都迟到了!”

全分队以后就要把彼得连科作为本分队的成员,作为全集体的成员,向他提出更高的要求。

我们要使对分队的这种要求达到完善的程度。例如拿队长会议来说。出席队长会议的有分队长,有全体大会选出的代表,有队长会议指定的人。但我们有这样的规定:分队长出席队长会议,或者由分队里的其他人员代理出席,完全是一样的。我们所要检查的是看各分队是不是都派出了代表。第一分队有了代表吗?有了。但不是分队长,而是另一个人,因为分队长没有工夫。那么,出席的这个人就有权参加会议,并且和分队长一样,也有表决权。

例如,沃尔科夫偷了东西,这时候,对沃尔科夫本人自然要进行

个别的工作,但不是针对着沃尔科夫一个人,而是要针对全分队提出意见和指出缺点。沃尔科夫偷了东西,分队要对此负完全责任。

又如,在分队里大多数都是优等生。12个人中有了10个优等生,该分队就列为第一名,能获得一定的优先权——奖金或娱乐,例如去歌剧院里看几次戏。我们每天都有几张戏票,全体分队队员完全一样,大家一同去。优等生去,成绩普通的也去,甚至成绩很坏的也去。全分队所得到的权力,每个成员都可以享受。

这样做,看起来好象是不公道的,而实际上却有很大的好处。例如拿彼佳来说吧,他跟着10个优等生到剧院里去的时候就感觉到怪难为情的。他自己没有争取到,而享受了自己的同学所争取到的权力,对于他说,这是一种无形的道德约束。下一个月,他就会拚命努力,会变成优等生。

有时候,彼佳之类的学生走来对我说:

“把我调到另一个分队里去吧!这里都是优等生,我不愿留在这里。他们到剧院里去时对我说:‘这里有票,反正不能丢了,走吧!’”

经过分队的督促所获得的这种个人的前进,对我们是很有帮助的。

如果一个分队里有12个人,其中五个是优秀的,工作得合乎标准,而有7个人不好,把分队拖累得降到最后一名,那么,全分队就要对这样的现象负责任。

我们有35到45个分队。每一个月,各项指标全部优良的分队宣布为第一名,成绩最坏的分队宣布为最后一名,都明确地标示在图表上。每月二日举行全体大会,在大会上,上月成绩最好的分队,在全体面前,在“立正!”的口令下,把优胜旗授给本月成绩优秀的分队——胜利者。这是特制的富丽堂皇、鲜艳夺目的一面旗帜,由得旗的分队悬挂在寝室里。此外,也可以举行其他的竞赛,例如生活秩序竞赛、纪律竞赛,或其他竞赛等等。每六天总结一次,最好的前七名分队,可以得到戏票。我们在剧院里每天有31个座位,是这样分配的,最好的分队得七张票,其次是六张票,再其次是五张票、四张票、

三张票、二张票、一张票,依次递减。这就是说,得第一名的分队,6天之中每天可以得到7张票,第二名的分队每天得到6张票,依此类推。我们并不在意这些票究竟分给谁,也不在意推动分队前进或拖累分队的人去不去剧院。因为,这不是我们的事情,这是分队的事情。有票的人都去,每天都准备有大汽车,持票的人去坐汽车时,值日队长检查他有没有票,服装是不是整齐,有没有买点的钱。这里,对去剧院的人有三个要求,那就是票、服装和钱。任何人也不问你在分队里是最后一名还是第一名。

在所有其他的一切情况下,分队都有这样的作用。例如当分配清扫工作时就是这样的。公社里没有清洁工,而房舍却需要保持清洁,因为,公社社址在交通要道上,我们又要常常接待许多本国的和外国的代表团。在1935年一年里,仅仅国际旅行服务社就给我们送来200个参观团。这就促使我们不得不经常把公社整理得焕然一新。但是,保持清洁、擦洗地板、拭铜门把和镜子、经常布置新鲜的花草,就需要进行大量的工作,这样的工作,绝不是光靠一两个人,光靠清洁工就可以完成的,而是要全体动手的。每天早晨从6点15分到6点45分,500个人全体参加工作。

要做好这样的工作,组织工作是很困难的。这需要有一定的工作经验。要进行这样的组织工作,就应当在半年前就分配好各分队应担任的工作,经常调换工作是不可以的。一个分队使用刷子、水桶和抹布,另一个分队使用擦洗地板所需的一切东西,担任清扫厕所的分队,使用另外的用具,担任清扫演剧大厅的分队,使用擦洗地板和灰尘所需的一切用具。其次,在分配工作时,要注意到是哪一个分队,注意到是好分队还是坏分队。例如好分队担任厕所清扫整洁工作,需要12分钟,而坏分队担任清扫演剧大厅的工作,这个工作要做好就需要很长的时间,因此,大家就要出一身大汗。通常,由最坏的分队担任清扫最清洁可是面积最大的地方,而且清扫工作做得不好,只是分队长受禁闭,我们并不注意谁没有揩拭暖气管子上的尘土。

分队长受到禁闭,他为了分队所做的事情而受到惩罚。

在生活中的各种情况下,分队处于这样的地位:作为公社首长的我和它发生最紧密的接触。但是,要细致地考察分队的动态,对我来说还是很困难的。这里和分队更接近的教导员要起首要的作用。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再谈。

我本来可以再多谈些关于基层集体的意义方面的问题,但可惜没有时间。不过,我还想讲一讲这一方面的事情。在我们的学校里,很少能有这样的基层集体。那里应该用某种其他的方法。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相信下面的事实:第一,基层集体不应当排斥公共集体,也不应该代替公共集体;第二,基层集体应当是跟个人接触的基本方式。这是我一般的定理,至于说到更详细的办法,公社适用某一种,而学校适用的就完全是另一种了。

只有经过这样的基层集体,我们才能正式触及个人。这就是适当的方法,而事实上,我们也总是首先注意个别学生的。

我和我的同事们是如何对个别学生、对个别的人进行教育工作的呢?

为了对个别的人进行教育工作,应当了解他、培养他。如果在我的观念里充满了一个个的个人印象,和一粒粒的豌豆一样,没有集体的关系,如果我不以集体的尺度来接近个人,那我就无法应付了。

我有500个人,当时的情况是很严重的。我是一个初当教师的人,在第一年里犯了通常易犯的一种错误。我只注意脱离集体的个人。我有一个错误的观点——专门注意最危险的地方,也专在这种危险的地方下工夫。自然,使我特别注意的就是这些事情了:谁偷了东西,谁耍无赖,谁反对集体,谁想逃跑,也就是说,专注意脱离集体的个别的人。自然,我对于这样的人就特别加以注意了。我是这样做的,我相信自己是一个教师,相信自己能够进行教育个别的人的工作,也就是说,我把每一个人叫来,和每一个人谈话,说服每一个人等等。

最近几年来,我改变了工作方法。我看到在我的工作中,最危险

可怕的分子并不是使我最注意的人,而是躲避我的人。

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想法呢?这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了15期毕业生,我留心注意这些毕业生,结果发现其中有许多人,我原来认为是最可怕、最不好的,而在生活中反而是积极的,按苏维埃方式工作着,有时虽然也犯错误,但一般地说,他们作为教育成果,完全能使我满意。而躲避我的人,在集体里不为人注意的人,往往在生活中完全成了小市民,早早结了婚,操办“小家庭”,利用各种投机取巧的办法找到了工作,退出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失掉了一切的社会关系,变成了灰溜溜的人。象这样的人,说不上是什么样的人,也说不上他们“将有什么可能”。而在某些情况下,我甚至看到了缓慢而深刻的腐化现象,有人开始建造房子了,有人开始养猪了,不参加会议,不读报纸,而有的人,看吧,从事小的投机事业去了。

在我最初几年的工作中,我看到了这样的一些情况,我就深深地相信正是躲避我的人,正是竭力不让我看到的人,才是最危险可怕的对象,对这样的人物,我应当特别注意。

同时,公社社员们也推动我这样去做。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直截了当地肯定,有的人蹲在自己的队里死啃书本,但不肯参加会议,不发表意见,甚至有了火警也坐着不动,死不放书本,或只埋头修理无线电收音机。这样的人,是最有害的人,因为,这样的人过于聪明了,过于“机灵”了,不肯出头露面,贪图平静,成为一个原封不动的毫无教养的人进入社会。

我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我不再为偷窃和流氓行为提心吊胆了,这时我才明白,我的教育工作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教育好两三个小偷和流氓,我的教育工作的积极目的,是培养一定类型的公民,是为了培养战斗的、积极的和富有生命力的那种品质。这样的目的,只有当我教育的是全体里的每一个人,而不是仅仅教育好个别的一个人时,才能够达到。

这样的错误学校里的一些教师也犯过。有的教师认为他们的责

任就是忙于教育捣乱的学生或者落后的学生,而对于所谓“标准”的学生是任其自流的。但是,他们会到哪里去?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这就是问题了。

在术语问题上公社社员们也帮助了我。对集体经常进行分析,把分析情况记录下来,让全公社都知道,这样的工作不是由我来做,而是由队长会议来做。全体公社社员,在我看来一共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现在的积极分子,第二种是后备的积极分子。

现在的积极分子是大家都知道的领导公社的人,他们对每一个问题都能充满感情、热情洋溢地作出回答,并且有自己的见解和要求。一般来说,他们领导着公社。一旦到了紧要关头,有了大的运动或对待某种争吵的时候,经常有后备积极分子——还不是积极分子,不是分队长,形式上还没有正式的地位——立刻来帮他们的忙,这是永远可以替代现在的积极分子的后备的积极分子。

其次,我还发现一些优秀的非积极分子。这些人年纪还小,但参加了小组,参加了体育活动,参加了摄影小组,也参加了墙报的工作,他们顺从地跟着年龄较长的社员走。

我们还有几个腐化了的积极分子。他们是这样产生的:他是分队长,是委员会的委员,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委员会委员,但我们——我和孩子们却单从眼色上、步态上(不需要给我们举出事实)就可以看出他所具有的机巧手腕,这里面有阴谋,有诽谤,有逃避工作,自己不收起床,而让某一个小男孩收拾,第二天还是如此。腐化是从利用特权、逃避工作和摆老爷架子开始的。有时候,这种腐化的情况会达到很厉害的程度。看!有时候从他身上散发出酒味来,而我们对喝酒是采取绝不宽恕的态度的。公社里有这样的规定:第一次喝酒,赶出公社!问问他,为什么发出酒味?

“我在城里喝了一杯啤酒。”

喝一杯啤酒,倒没有什么了不得,但可疑的是到底是不是啤酒。

腐化的积极分子就是这样的。我们并没有正式登记人名,但共

产主义青年团委书记和两三个共青团员知道,某种腐化开始了。

其次,还有这样的一帮人——有些公社社员很形象、生动地把他们称为“无赖团”。这就是表示,小心口袋,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他们身上!他们可能撬开钱柜,爬进工厂偷窃零件。一般地说,这些都是新来公社的,年龄都比较大。这样的人约有15至20人。他们什么也没干,但谁都知道他们是“无赖团”,如果一不留神看不见他们了,那他们一定是在捣什么鬼。

最后,还有这样的一帮人——用法国大革命时代的术语说,这就是“沼泽派”,约有50人。他们漫不经心地走来走去,马马虎虎地完成定额,但是,他们到底关心着什么?他们的脑子里和肚子里究竟装着什么?他们对公社的态度如何?谁也不得而知。

监督这些分子,监督他们的活动,是特别愉快和令人惬意的事。例如我们看到沼泽派里有彼得洛夫这样一个孩子,我们对他说:“你是我们的沼泽派里的,你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关心,什么也不感兴趣,你是苦闷的、委靡的,什么也不能使你激动。而以后分队继续督促他,让他积极起来。结果,他慢慢地在某一方面表现了自己,关心起了什么事情。如果他能够再有所表现,那就会转变为后备的积极分子或优秀的非积极分子了。”

我们的全部任务,就在于完全消灭这一帮“沼泽派”分子和“无赖团”分子。

跟“无赖团”要进行短兵相接的斗争,不能有任何的遮盖掩饰。对“无赖团”应采取直接的迎头痛击,要跟他们谈每一件小事,把他们召到全体大会上。这项工作要求很高,若要做好它,必须具有坚忍不拔的精神。

至于说到对待较难教育的分子,即沼泽派和腐化了的积极分子,那就要进行各种各样的个别的教育工作了。

现在我们来谈个别的教育工作。这里,教师集体是一个最重要的机构。要以某种准确的说法来解释教师集体的工作是很困难的。

也许这就是我们教育学上最困难的问题。我们的教育书籍中，“教导员”一词常常用单数，例如，“教导员应当是这样的人”，“教导员应当这样做”，“教导员应当这样说”等等。

我并不认为教育学指望的是孤立的一个一个教导员。当然，没有有才能的教导员，没有善于领导、眼光敏锐、具有坚毅精神、聪明、有经验的教导员，一句话，没有优秀的教导员，对我们来说，是有困难的。但是，在教育我们的3,500万儿童和青年的事业中，我们能单单指望这样的教导员的偶然情况吗？

如果单单指望个别的教导员，那就等于有意识地承认好教导员能教育得好，坏教导员就教育得不好。谁去计算过，有多少有才能的教导员，有多少庸碌无能的教导员呢？其次，我们还要解决这个问题——教导员本身也应当受教育。教导员应当怎样受教育？教导员的本质怎么样？教导员遵循着什么？教导员关注的是什么？不及格的教导员有多少，谁也不去计算……可是我们现在却要专指望孤立的个别教导员了。

因为在我的实际生活中，我必须主要依靠教育目的和教育任务，所以，把自己没有受过教育的教导员分配到我这里来，我为此感到苦恼。我曾经浪费了好几年的时间，白做了不少工作，因为，我极其糊涂地希望这样的没有受过教育的教导员，会给我们教育出什么样的人来。但以后我就深深地相信，最好干脆没有教导员，也比有本身没有受过教育的教导员好得多。我以为，一个集体里有四个有才能的教导员，要比有40个庸碌无能、没有受过教育的教导员好得多。这样的庸碌无能、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在集体里工作的实际例子，我亲眼见过。这样的教育工作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呢？只能瓦解集体，其他的结果是不会有。

因此，选择教导员就变成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怎样选择呢？根据什么标准选择呢？不知因为什么，我们对这个问题总是不够注意。我们总以为任何一个人，不管是难，只要指定他担任教导员的职

务,只要付了薪金,他就能够进行教育工作了。其实,这是一桩最困难的工作,总的说来,可能是责任最重大的工作,因为它要求一个人不仅极其勤奋努力,而且要求他有极强的能力和才干。

任何人也不会象坏的教导员那样有害,任何人也不会象坏的教导员那样有损于我的工作,任何人也不会象坏的教导员那样把多年来上了轨道的工作引入歧途。因此,最近几年来,我采取了这样的坚定的方针——在完全没有教导员的情况下进行工作,和只用真正能担任教育工作的教导员。这是我的计划中的意外增补。

以后,我索性不再用专职的教导员了。我通常只依靠学校教师的帮助进行工作,不过,为了教会他们进行教育工作,也要作很大的努力。我相信,教会他们进行教育工作,就象教会算术、教会朗读或教会一个好的铣工和施工一样的容易,我就这样做了。

这样的教学的要点是什么呢?首先是教师性格的培养,教师行为的训练;其次是教师的专门知识和技巧。没有这样的知识和技巧,任何一个教师都不可能成为好的教师,都担当不起教师的工作,因为他不会运用声调,还不善于和儿童谈话,也不知道在怎样的情况下该说怎样的话。没有这样的能力是不可能成为好的教师的。凡是不善于摹仿,不能运用必要的面部表情或者不能够控制自己情绪的人,都不会成为好的教师。教师应当善于组织,善于行动,善于运用诙谐,既要快乐适时,又要生气得当。教师应当能让自己的每一举动都能起教育作用,并且永远应当知道此时此地自己所希望的是什么,所不希望的是什么。如果一个教师不了解这一点,那他还能教育谁呢?

我相信在高等师范学校里,将来必然要教授关于运用声调、姿态、运用器官、运用表情等等课程,没有这样的训练,我无法想象如何进行教师工作。当然,声调的运用所以具有意义,倒并不是仅仅为了能够优美地唱歌,悦耳地谈话,而是为了能够更准确地、生动地、有力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有关教育技术的问题。

例如拿声调来说,就应当知道该怎样来申斥,该在怎样的程度内

表示出自己生气和愤怒,应当知道你们是不是应当表示生气和愤怒,如果应当,那又该怎样表示才适宜。这是教师经常应有的表现,这也就是所谓教育工作。学生所以了解你们的心理和思想,并不是因为知道了你们的心里有了什么念头,而是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行为,听见了你们的言语。如果我们到剧院里观剧,欣赏演员的精湛表演,那么,这种表演,就是我们的一种美的欣赏,而在学生面前,这里也呈现出同样的活生生的人来,但这不是进行表演的人,而是教育的人。

我不能过多地停留在这一问题上。教师应当成为积极地从事活动的一个人,应当自觉地致力于教育工作,这是很重要的。

第二,无论哪一个教师,都没有权力单独行动,不能作个人冒险,不能要求个人负责。凡是教师没有结合成一个集体的地方,凡是集体没有统一的工作计划,没有一致的步调,没有一致的、准确的对待儿童的方法的地方,那里就不会有任何的教育过程,那里就应该有一个教师的集体。因此,如果有五个能力较弱的教师团结在一个集体里,受着一种思想、一种原则、一种作风的鼓舞,能齐心协力地工作的话,那就要比10个随心所欲地单独工作的优秀教师要好得多。

这里,可能会有各种曲解。你们大概知道有受爱戴的教师这一现象。例如有人会有这样的想法:我是学校的教师,我想我是受爱戴的教师,而我的所有的同事们,都是不受爱戴的。这样,我不知不觉地就按一定的路线走。学生们爱戴我,我也努力去争取这种爱戴,努力使学生喜欢我。总之,我是受爱戴的,而其他的人都是不受爱戴的。

这是什么样的教育过程呢?一个人已经脱离了集体。这样的人以为学生爱戴他,因此,他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来工作。

我尊重自己的助手,我这里有的人在教育工作上简直是天才,但我要说服他们,教他们知道并不需要争取作被爱戴的教师。我个人从来不追求儿童的爱戴,并且我认为教师组织这种爱戴来使个人得到满足是有罪的。也许有些公社社员会敬爱我,但我只认为在我教育的500个人之中,应当培养出公民,应当培养出真正的人,为什么

此外还要对我以及对我的工作计划 ,附加上一时冲动的某种爱戴之感呢 ?

这种轻率态度 ,这种对爱戴的追求 ,这种对爱戴的吹嘘 ,对教师、对教育都极为有害。我使自己和我的同事们都相信 ,这种多余的附加物.....在我们的生活中是不应该有的。.....

要使爱戴无形之中产生 ,不必经过你们的特别努力。但是 ,如果一个人把爱戴看成目的 ,那就只能产生害处.....如果一个人没有获得学生的爱戴 ,那么 ,他无论对学生、对自己 ,可能都是严格的、公正的。

应该有这样的教师集体 ,这样的集体有共同的见解 ,有共同的信念 ,彼此间相互帮助 ,互不猜忌嫉妒 ,不追求学生对个人的爱戴。只有这样的集体 ,才能够教育儿童。因此 ,我热烈地欢迎报纸上所登载的这一报道 ,我们的教育人民委员部现在郑重地提出了关于加强校长和教导主任的影响和权力的问题。这一措施 ,会促进发展教师工作中的集体性。

不久以前 ,《苏维埃作家》出版社编辑部给我送来莫斯科的一个教师写的一部稿子。在这部稿子里 ,叙述了在学校里工作的一个女教师 ,叙述了学年中工作进展的情形 ,叙述了其他教师、学生和学校。书是用第一人称写的。

编辑部对这部稿子的意见是分歧的。一部分人说这是低级庸俗的东西 ,另一部分人却说这是杰出的作品。我被推选为评判人。

如果说这本书值得出版 ,那只是为了一个目的 :叫人看看书里描绘出来的一个那样可憎的女教师的形象。老实说 ,为了让人们读了这本书以后能感到女教师是不对的 ,倒是很有益处的。但是 ,作者却大为赞赏这个女教师。

这是教师中的骗子 ,她只知道追求学生的“爱戴”。书中的父母都是可怕的人 ,她极其轻蔑地把他们称为“老爷子”和“老娘” ,她说“父母——这是平庸的人” ,而她自己呢 ? 看吧 ,是了不起的教育家。所有其他的教师也是不中用的 ,这一个骄傲自满 ,那一个漫不经心 ,

还有一个阴险诡诈,另一个是取巧偷懒的家伙,校长既无能、又痴笨;只有她自己一个人呱呱叫、有天才。

同时,这部作品又完全是以极卑俗不堪的笔调写成的。说到一些教师,“他们太不够检点,有工作能力,而很少有天才”。作者随时随地都在摹仿韦尔比茨卡雅风格,矫揉造作地叹息。作者追逐着爱,对学生作这样的描述:这个女孩子“在晴朗的日光下,投射下自己的倩影”。其次,作者特别注意,而且是不健康地注意性问题。

或许,全部内容就包括在这里:某一个男孩子瞧了某一个女孩子一眼,某一个女孩子写了张字条儿,而女教师以教育家的身分,怎样天才地破灭了这些爱的企图,大家怎样感谢这位女教师。

教师中的这类骗子,在学生面前、在社会面前,惯于卖弄个人的才智,决不能教育任何一个人。所以,要想使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员成为善尽职责、严肃认真的教师,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把他们团结在一个集体里,团结在教师集体里的一定中心人物——校长——的周围。这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的教育家应该特别注意。

如果对一个教师要求得如此严格,那么,对把教师团结成集体的人,对他的要求就要更为严格了。

教师集体组成的时间的久暂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以为我们的教育家对这个问题注意得还很不够。如果我们公社里的社员在公社里平均生活五年的话,那么,一个教师在公社的平均年限,也不应当少于五年。这是一条法规。因为,一个集体如果要能真正地生活在一起、团结在一起,那么,每一个新成员——不仅仅是学生,连教师也是一样,都应当当作新人来看待。如果以为今天新来的教师就可以进行教育工作,实在是一种错误的看法。教师的成功与否,决定于他是集体中多老的成员,决定于为了领导集体他在过去花了多少精力。如果教师集体比学生集体年轻,自然,教师集体的力量就会弱一些。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教师集体里,只需要聚集一些老头子。这里,我们的教育家应该研究老教师和新教师的作风上所具有的特点。教师

集体不应当是偶然集合起来的,而是要合理地组织起来。应当有一定数量的有经验的年长教师,也一定要有一个刚刚从高等师范学校毕业、还没有工作经验的女青年。这个少女是必须有的,她所以非有不可,是因为这里能发生一种教育学上的神秘作用。因为,当这样的女青年参加了老的教师集体和学生集体和学体集体的时候,就开始有了不可捉摸的微妙的神秘作用,这种神秘作用,可以决定教育上的成就。这样的女青年,会向老的教师学习,也会向老的学生学习,而她要向老的教师学习这一点,正说明老教师有责任帮助她正常工作。

在教师集体里,究竟需要多少女教师、多少男教师呢?这个问题需要解决。这个问题应当慎重地想一想。因为男教师占优势的时候,会造成一种不好的风气;而女教师过多了,也会形成某种片面的发展。

我可以这样说,单单教师的外表,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当然,最好是所有的教师都是美丽的,但是,至少必须有一个年轻漂亮的男教师,一个年轻漂亮的女教师。

我就是这样做的。我有 22 个教师,有一个缺额。我看到所有的人都和我不一样,因此还需要用集体中的美来吸引儿童。让他们能多少有所爱,这种爱,应该是最好的一种类型,同时又不是性爱,而是赏心悦目,具有某种美学因素。

应当研讨一下这个问题,在教师中,愉快乐天的人应该有多少?抑郁不快的人应该有多少?由抑郁不快的人所组成的集体,我是想象不出来的。纵然只有一个乐天愉快的人,纵然只有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也比没有强。在未来的教育学里,关于建立教师集体的规律应当有成卷的论述。

我有一个教师叫捷尔斯基。我很担心,唯恐他离开了我,他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人。他的强烈的快乐情绪感染了我,也感染了学生。他是个不容易集中精力的人,但我终于使他成了真正的好教师。他

有时候也惹人恼怒。他已成家。有一次我们去剧院,他抱着一个周岁的孩子,我问他:“为什么要把孩子带到剧院里?”他回答说:“这是需要的,要让他从小就习惯听音乐。”

我说:“带着吧,当没有社员的时候。”

但是,他以后成了一个非常出色的人物。他一分钟没有快乐就连什么事情也不能做了。并且,他又是善作种种揣想和画谜等的惊人能手。例如,他绘的一幅画谜有半面墙大。我实在惊奇这个人的天才,惊奇他怎么会想出这么多的玩艺儿来,画幅上写满了各种各样的问题——短的、长的、带图画、带线条的和滑稽可笑的问题。不是他一个人想出这些问题,和他一起工作的有150个人——全部编辑人员,他们在杂志上寻找材料,剪剪贴贴,各人自己也想一些出来,等等。这里是一个完整的工作系统。悬出题目,每个题目能得1,000分。一个人解答一个题目,解答的人得1,000分,出题的人也得1,000分。如果100个人解答了同一个问题,那就每人得10分,因为这样的题目比较容易些。

他把所有的社员都团结在这些画谜的周围,他的火一样的热情和精力,也就不得不贯注到这一方面来了。

例如贴出这样的题目来:“我在假日里要到公社东北方向4公里的地方去,我的右口袋里,有一个很有趣的东西,谁找到了我,谁就得1,000分。”

于是,在假日这一天,全公社都出发到距离公社东北4公里的地方寻找捷尔斯基。孩子们准备了罗盘,准备了早餐,但捷尔斯基却无影无踪。我决定取消午餐。

“孩子们在哪里?”

原来,他们在公社的东北方寻找捷尔斯基。

这里究竟有多少趣闻趣事,简直不可能一一列举!画谜结束了以后,他又宣布说:“某日某时,需要解生产主任所罗门·鲍里索维奇·科甘的皮鞋带子,谁要能作得到,谁就能得多少多少分。”

科甘是个大胖子 ,身体结实粗壮。他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 ,并且动气了。3点钟的时候 ,科甘被全社社员包围起来。他说 :

“怎么啦 ?你们要压倒我吗 ?这是办不到的 !”

事实上当真是办不到的……需要用诡计来解开 ,想什么法子一下子就成功。

捷尔斯基是朝气蓬勃的 ,他善于随时随地引起孩子们的兴趣。

或者 ,捷尔斯基突然向全社社员宣布 :

“老实说 ,永动机是可以制造出来的。一定能够制造永远转动着的机器。”

他这样地坚信 ,这样地善于带头 ,看吧 ,连工程师和指导员们都受了他的影响 ,所有的人都开始来做永动机。我对他说 :

“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不可能做出永动机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但是 ,他回答说 :

“就让他们试试吧 ,也许有谁能够做出来。”

于是 ,我也几乎相信当真能制造出永动机了。

而从另一方面说 ,从来不笑的、对谁也不宽恕、大家不得不听从的那种特别严厉的人 ,也是需要的。

因为下面的事情 ,我感到很愉快 :今天值日的是一个女孩子 ,她昨天刚从师范学院毕业。全公社都动员起来了 ,因为 ,常常发现有打算欺骗她的学生 ,她是需要帮助的。

“利季娅·彼得罗夫娜 ,我上工晚了 ,因为我没有鞋子。”

完了 ,她完全没有办法了。但这时候 ,立刻会有一个人插嘴 :

“哼 !你撒谎 !”

这就是整个集体都动员起来了。

明天的值日是一个严厉的人。他整六时当值 ,打开了门 ,不让任何人再睡 ,只要他一沉下脸 ,大家就知道他是不会放松的。

在我的实际工作的经验中 ,我深信教师和教导员不应当有惩罚的权力 ,我也从来不给他们惩罚的权力 ,甚至连申斥的权力也不给。

这是因为：第一，惩罚是极困难的事情；第二，我认为惩罚权应该集中在一个人手里，以免步骤紊乱、相互干扰。因此，教师的工作是很困难的，因为他们首先应当具有威信。

说到威信，许多教师都相信威信或者是由上帝赐给的——有的人一生出来就有威信，大家一看就知道这是有威信的人；或者，威信是通过人为的安排产生的。因此，许多教师都说：

“为什么你们要当着学生的面对教师提意见？你们破坏了教师的威信。”

依我看，威信只能产生于责任感。一个人应当对自己的工作负责，如果能负起责任，这就是他的威信。他应当在这样的基础上特别有威信地掌握自己的行为。

教师的工作应当最能接近基层集体，应当和基层集体保持最亲密的友谊，应当有同志式的教育，一般地说，教育方法是很复杂的，又是要经过长期体验的。例如集体里的一个成员破坏了纪律，表现得不好，那我就要求教师首先设法让分队来处理。教师的工作，应当是鼓励分队的积极性，鼓励集体对个别人提出要求。

关于个别教师的工作方法问题，我不能再多讲了，因为，这需要很多的时间，但我要讲一讲我自己作为一个教师，如何对全体学生、对个别的人进行工作的。

关于对待个别的人的态度问题，我主张采用直截了当的当面批评的方法，同时我建议其他的人也采用这样的办法。这就是说，如果一个小孩子干了不好的事，干了极坏的事，我就对他这样说：

“你干了一件可耻的事。”

大家论述得最多的、人所皆知的教育机智，就在于你们的意见是否真诚。我决不隐瞒任何东西，我决不随便渲染粉饰，我想什么就说什么。这是最真诚、最简单、最容易和最有效的，但是，恰恰又是并不总能这样说。

我认为，谈话的效果是最小的。因此，当我看到没有必要谈话

时 ,我就什么话也不说了。

例如 ,一个男孩子侮辱了一个女孩子 ,我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应不应该谈一谈呢?在我看来 ,重要的是不进行谈话就让这个男孩子知道问题在哪里。我给他写好字条 ,装在信封里送去。

应当说明 ,我经常有这样的“通讯员”。这是十岁左右的男孩子 ,有苍蝇般的灵敏复杂的眼睛 ,他们总是能知道应当在什么地方去寻找什么人。通常 ,这样的通讯员都是很好的男孩子 ,能起很大的作用。我把信交给通讯员 ,信里写着 :“叶夫斯基格涅耶夫同志 ,请你今天晚上 11 点钟来。”

我的通讯员清清楚楚地知道字条里写的是什么 ,发生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我召唤叶夫斯基格涅耶夫等等。总之 ,全部底细通讯员都知道 ,只是不表示出来。我对他说 :

“把字条送去!”

我再不多说任何的活 ,我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结果。通讯员走到食堂里说 :

“你的信。”

“什么事?”

“安东·谢妙诺维奇找你。”

“为什么?”

“我就给你说。还记得吗?你昨天欺侮了谁?”

10 点 30 分钟的时候 ,通讯员又来找叶夫斯基格涅耶夫 :

“你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他在等着你。”

有时候 ,叶夫斯基格涅耶夫忍不住了 ,等不到晚上 11 点 ,下午 3 点钟就来找我了。

“安东·谢妙诺维奇 ,您找我吗?”

“不是 ,不是现在 ,是在晚上 11 点。”

他到分队里去了,同学们都问他:

“怎么啦?自作自受啦?”

“自作自受了。”

“为了什么?”

于是,在晚上11点以前,分队里就严厉地申斥起叶夫斯基格涅耶夫来了。到了晚上11点钟的时候,他到我这里来了,因为白天的经历而激动不安,脸色苍白。我问他:

“你明白了吗?”

“明白了。”

“去吧!”

再不需要多说任何的话。

在另一些情况下,我又采取不同的办法。我对通讯员说:

“让他立刻来。”

当被召唤的人来了的时候,我把我心里所想的完全说出来。如果这是一个很难缠的人,他不相信我,从感情上反对我,对我有怀疑,那就不和他说什么。我把年龄较大的召集起来,也把他叫来,以严肃的、殷切的语调和他谈话。对我来说,重要的不是我说些什么,而是其他的人如何集中视线来注视他。他可以抬起头来看我,却害怕看同学们。我说:

“同学们随后还有话对你说。”

于是,同学们把我事先教给他们的话说给他听,他就会以为这是同学们自己想出来的。

有时候需要用特别的方法。有时我邀请全分队,但是,为了不表示出来我请全分队是为了对付某一个人,我请全分队来喝茶,桌子上摆出茶、点心和汽水。通常,每一周总有一个分队到我这里来。一般地说,这个分队并不知道为什么请他们,因此特别感兴趣。当座谈时,喝茶时,打趣说笑时,社员们在思考着谁有了过失,但不表露出来究竟是谁犯了错误。如果他们在谈话中自动说出谁犯了什么过失,

那么 ,马上就对此人进行奚落嘲笑。茶会以后 ,大家都情绪愉快地回到寝室里去了。

“一切都很好 ,但是 ,看啊 !你一个人连累了我们。”

下一周 ,我再邀请这一分队来喝茶。队员们都知道这是一种检查 ,这是检查茶会。于是他们自己就会告诉我 ,说他们如何和他(犯了过失的儿童——译者)交谈 ,说他许了诺言 ,说他们给他指定了监护人 :

“不要担心 !一切自然会好的 !”

有时候 ,我邀请全班来参加这样的茶会。

因为 ,分队通常不知道什么时候将有茶会 ,不知道谁将被邀请 ,所以经常在作着准备 ,尽力要穿得整齐好看(他们有花露水)。一般地说 ,每一个分队、每一个队员 ,当他们的分队里出了什么毛病的时候 ,都担心忽然被邀请参加茶会。

有一次 ,有过这样一件事 ,茶会开始了 ,忽然发生了一项过失 ,竟使得值班队长决定停止茶会。这是应当遵办的。第二天早晨 ,全分队都很难受 ,因为 ,人家这样问他们 :

“噢 !作过客了 ?喝过茶了 ?”

“没有……”

这是个别教育方法的一些方式。来自学生自身的一些方式尤其重要。有时候 ,一个男孩或女孩走来对我说 :

“我需要和您谈点秘密。”

这是最友善的、最好的方式。

但是 ,在有些情况下 ,我允许自己改变正面出击而采取较为曲折的办法。这种办法是当整个集体起来反对一个人的时候应用的。这时候 ,正面打击一个人是不可以的 ,这样做 ,他就会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全集体反对他 ,我也来反对他 ,他会被毁掉的。

有过这样的事情 ,有一个女孩子 ,名字叫列娜 ,很温柔 ,很美丽 ,但曾当过流浪儿。有一个时期 ,她让我们感到很不好办 ,但经过一年

以后 ,开始改正过来了。突然 ,她的女友放在床头柜里的 50 个卢布丢了 ,大家都说是列娜偷的。我让大家去寻找 ,他们找了 ,但没有找到。我说事情就可以算完了。

但是 ,过了几天以后 ,在俱乐部的阅览室里 ,丢了的钱被找到了 ,是在窗帘下面发现的 ,钱藏在关闭窗户用的特制的插销里。孩子们都说他们看见列娜在这些窗户周围如何转来转去 ,甚至还看见她手里拿着什么东西。

队长会议把列娜叫去 ,孩子们都说 :

“你偷了 !”

我看到孩子们确实认为列娜偷了钱 ,并因此要求开除她。我看到没有一个人同情她 ,甚至于连通常在这样的情况下肯维护自己的女友的女孩子们 ,这时也坚决主张开除她 ,我看到钱确实确实是列娜偷去了 ,这已经没有一点疑问。

在这样的情况下 ,必须采用迂回曲折的办法。我说 :

“不对 ,你们没有证据能证明是她偷了 ,我不许开除她。”

大家奇怪地看着我。我说 :

“我敢相信不是她偷的。”

于是 ,当大家提出证明说是她偷了的时候 ,我就提出证明说不是她偷的。

“为什么您这样坚信 ?”

“我由眼色上就能看出来。”

他们知道 ,我确实常常能根据眼睛的神色 ,知道许多事情。

第二天 ,列娜到我这里来了。

“谢谢您 !您维护了我 ,他们攻击我是毫无道理的。”

“这是怎么回事 ?本来就是您偷的。”

这里 ,我以出其不意的转折把她问住了。她哭了 ,也承认了。但是 ,这一个秘密只有我和她两个人知道。我知道是她偷的 ,但为了维护她 ,我在全体大会上“说了谎” ,从而把她完全置于我的教管下。

这是谎话。但是,我看到集体被激怒了,可能把她赶出去。为了避免这一点,就需要运用这样的手段。我是反对用这种迂回曲折的办法的,这是很危险的一种方法。但是,当时列娜知道我为了她欺骗了全体大会,知道我们两人有了共同的秘密,这就能使她完全成为我的教育对象。但是,这种迂回曲折的办法是很难运用的,也是非常复杂的,只有在极少有的情况下才能下决心去应用它。

## 第四讲 劳动教育。集体的关系、作风和步调

我想简短地谈谈劳动教育问题,然后转到结尾部分——关于集体的作风和步调。

大家记得在我们革命的初期,我们的学校叫劳动学校,当时,我们的全体教师,与其说是受了劳动方法的影响,还不如说是受到“劳动”这个词和劳动原则的吸引。在工学团里,当然,劳动的可能性比普通学校多一些。但是,在高尔基工学团和捷尔任斯基公社的十六年的工作中,使我在这些方面——在劳动的发展方面,在我对劳动的教育作用的态度方面,在劳动过程的组织方面,以至于在对劳动方法本身的理解方面,都体验到这是一种极复杂的发展变化的过程。

在1920年,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捷尔任斯基公社在1935年至1936年那时候的劳动环境。

我还不能肯定地说我所采取的劳动组织及其发展方法,就是正确的方法。因为,在这一方面,我还不能够独立自主地进行工作,我还要参酌许多人的意见和观点,这些人一度接触我的工作,把自己的观点和程式带进我的工作中,并且改变我的工作。在整整十六年的过程中,我不得不适应我所处的环境,与之并行不悖地前进着。在高尔基工学团里,我主要是必须适应需要,必须从必要性中,从需要的实际情况中得出劳动原则。在捷尔任斯基公社里,我必须迁就我的上级的一些想法,甚至还必须和这些想法作斗争。

我认为 ,在我的集体的历史中 ,有若干时期我很有权力称为完全理想的时期。在捷尔任斯基公社里 ,大约 1930 年至 1931 年是这一理想时期。

为什么我把这一时期叫做理想时期呢 ? 因为在这个时期里 ,我的全体社员都已经参加真正的生产工作 ,也就是说 ,有了工业财政计划的组织 ,有了完备的制度 ,它包括设备完善的工厂所具有的各种部门 ,如生产计划部、定额计划部 ,确切点说 ,就是规定了每一种工作的定额、各个工作场所间的合乎逻辑的联系、非常精细的零件分类表——不仅附有零件生产数量 ,而且附有生产定额和质量定额……

当时 ,我们的生产已经完全是有余的了 ,不仅能供给个人支用 ,而且使公社集体的日常生活日渐富裕起来 ,有了积蓄 ,也就是说 ,我们有了真正的生产。在那时 ,社员是不支工资的。当然 ,这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 ,直到现在 ,这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不知道其他进行这种试验的机关的情况。

我当时是反对有工资的。从集体的利益出发来提高劳动生产率 ,提高持久的、充沛的劳动热情——不是一时突击的热情 ,也不是这一周或这一月的眼前目标的热情 ,而是预见到集体未来远景的稳定的热情 ;在这种热情的影响下 ,来完成那种要求教师动员精神上、肉体上和思想上的全部力量的巨大的工作……我认为这样的热情 ,就是最有价值的一种教育 ,并且 ,我深信 ,工资制度多少会损害或破坏这种精神上的顺遂。

我决不能够说实行工资制度就会带来某些额外的成就 ,因此 ,我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我可以指出 ,没有工资可以制作所需要的一切 ,可以提高定额 ,超额完成计划 ,并且在物质方面也有十分美满的生活。

但是 ,我完全被不懂得我的教育目的的有势力的反对者包围了 ,他们相信工资可以提高劳动强度 ,可以提高学生对劳动的兴趣 ,而我的上级又是那样地支持这种观点 ,以致我不可能也没有力量来和这

种倾向作斗争,因此,最近几年来,我也过着工资生活。

因此,现在我只能抛弃其他的各种主张,也许我还可以把这些主张看做劳动教育方面的有害主张。这种主张没有生产,没有集体劳动,而只有个人的努力,就是只有仿佛想进行劳动教育的劳动过程。

我现在不能想象脱离生产条件的社员们的劳动教育。也许,这样的教育也是可能的,这就是没有生产性质的劳动教育。我实施这样的教育,时间不长。在高尔基工学团的前几年里,因为没有生产场所,没有生产设备,因此,我就不得不满足于生产自给的现状,不得不满足于所谓生产过程的那种情况……在任何情况下我都相信,不注意创造价值的劳动,不会成为教育的积极因素,因此,即使所谓的学习劳动,也应当从由劳动所能创造的那种价值观念出发。

在高尔基工学团里,只是由于需要,我才急急忙忙转入生产,这是农业生产。在儿童公社的条件下,农业差不多是永远要亏本的。在两年的时间里,只是由于农艺师 H·Э·费列的专业知识和技术,我才得以把它变成有利可图的,这不是在谷物耕种上,而是在牲畜饲养上。养猪是我们的主要生产活动。最近几年来,我们已经有了近 200 头母猪和种猪,有几百头小猪。这种经营,是用最新技术装备起来的。专门建造的猪圈是很清洁的,也许并不亚于公社里的寝室。猪圈里有相当多的自来水管、水槽、阴沟和水龙头等冲洗设备,没有一点气味……饲养员穿得很整洁漂亮。就是这种用最新技术装备起来的并拥有饲料基地的饲养业,已经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收入,使我们可以过得比较富裕些了。我们不仅仅能够吃得好、穿得好,而且能够大力充实我们学校的经济,充实图书馆;能够建筑和装置很好的舞台。我们用生产收入的这些钱,为管弦乐队购置了乐器,购置了电影机,购置了二十年代我们靠任何预算都买不起的一切东西。

此外,我们也帮助我们以前的学生,这些学生一天比一天多起来了,帮助了从前学生中升入了大学的、经济有困难的那些学生,也帮助了许多结了婚的学生。有时也组织旅行,宴请客人,这都是很费钱

的事情。我们常常到剧院里看戏,一般地说,我们已经享受了完成了自己的劳动义务的苏维埃公民所应有的一切福利。

所有我说到的这些福利,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如此有效的一种刺激力量,甚至使我当时连工资问题想都没有想过。

当真,我承认学生需要有零用钱,一般地说,我也很赞成给学生零用钱的……一个人出世以后,应当具有个人开支预算的某些经验,应当会使用金钱;不应当进入了社会,还不知道钱是什么东西。但是,当时乌克兰教育人民委员会部坚决反对给工学团的学生零用钱,认为我给学生零用钱,就是在培养学生的商人气质。因此,只有我预先和学生说好不要告诉任何人时,我才能给他们零用钱。

但是,我给学生的这种零用钱,并不是根据各种具体的生产劳动,而是根据学生对集体的一般劳绩。

捷尔任斯基公社里的情况也是这样,但那里没有农业,只有工厂。那里,社员对生产的依赖更大了。高尔基工学团靠预算领经费,而捷尔任斯基公社连一个戈比也领不到,据我所知,从公社成立之日起,它没有得到过国家的任何钱。因此,不仅公社的额外福利,就是连社员的标准伙食、起码的温饱也完全要靠他们的集体劳动来维持。

在捷尔任斯基公社里,我不得不在极困难的环境中开始工作,这要比高尔基工学团困难得多,因为高尔基工学团毕竟还是有预算的。捷尔任斯基公社的建筑物很讲究,最初几年,是带些慈善性质的。为了永久纪念捷尔任斯基,建筑了一所非常漂亮的房子,是苏联最有名的建筑家的建筑杰作之一。就是现在,无论在房屋的平面图上、正面上,还是在房子的装饰、窗户的图样上面,都找不到任何不协调的地方。这里有漂亮的寝室,有壮丽的前庭,有澡盆、淋浴设备和漂亮的教室。公社社员穿的是很好的呢绒衣服,置备的衣服非常多。但是,却没有安装一部像样的车床。我们既没有菜园,也没有一块可耕种的土地,也没有固定的预算可领。当时,大家总以为会有什么办法的。

在最初几年里,公社靠扣除乌克兰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的薪资

来维持,扣除的数额是0.5%。这一笔款子,每月约有2,000卢布。但是,把学校计算在内,为了维持我们的日常开支,每月就需要4,000至5,000卢布。不敷的2,000至3,000卢布,我无法筹措,因为,没有地方开展生产。人民委员会一开始就错误地把自己的希望放在制鞋、缝纫和细木工等等作坊上。大家都知道,这些作坊(制鞋、缝纫和细木工)被认为是劳动教育过程的全部,实际上制鞋作坊里只有几对鞋楦、几只小凳子,有锥子和锤子,但没有一部车床,没有皮子,希望我们造就出工业的鞋匠来,也就是说,要我们培养我们目前绝对不需要的那种工人。

细木工作坊里的设备是若干长刨子、短刨子,打算让我们造就出可以用手工制作一切的好木匠来。

缝纫作坊也是按照革命前的标准建立的,准备让我们培养出良好的主妇来,必要时,能够做尿布,打补丁,给自己缝衣服。

所有这些作坊,当我在高尔基工学团的时候,就引起了我的憎厌。现在,我实在不明白究竟是为了什么要建立这样的作坊。因此,我得到队长会议的同意,在一周以后就把这些作坊关闭了,只留下我们自己所需要的若干部分。

在最初三年里,捷尔任斯基公社不得不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有时,我们一天只能吃到一块面包。我在最初的八个月里,没有领到分文薪资,还要靠养活社员的面包来养活我。从这一件事情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艰苦程度了。曾有过这样的时候,公社里没有一个钱,正象乌克兰人说的那样,不得不向人家去“开口借贷”。大家要知道,这种生活对开展劳动来说是一种很好的刺激,虽然我们是艰难地、受屈地度过的。肃反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总是不同意改为预算制,也不同意请求教育人民委员部帮助我们,拨款给我们来维持学生的生活。为了这一点,我是很感谢他们的。建立了公社,还是没有办法来维持孩子们的生活,这的确是可耻的事情。因此,我们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达到能自己挣钱——能挣钱维持生活这一毫不掩饰的目的。

第一年,我们在细木工作坊里干了很多活,我们制作了许多日用品,如椅子、柜子等。也有定货的人。成品质量很差,定货人纷纷提出意见,通常,我们总是要亏本的。材料、电力、钉子和胶的价格,合起来只相当于我们向定货人所要的价格,而我们的劳动力是没有报酬的。

一个很幸运的际遇帮助了我们。我们请到了生产主任所罗门·鲍里索维奇·科甘,他在教育上是一个很没有原则的人,但是非常有毅力。我很感谢这位同志,我认为什么时候我应当对他进行专门的酬谢,因为他为我的事业带来全新的教育原则,虽然他在教育上完全没有原则性。

首先,他的最初的一些话就震惊了我。这是一个肥胖肥胖的人,大腹便便,气喘吁吁,特别坚毅顽强。

他刚到公社就对我说:

“怎么回事?150个社员,300只手,还不能赚一碗汤喝喝?这怎么能成呢?他们都应当能够自己谋生,其他的办法是不可能有的。”

这是一个原则,我从前对这个原则是怀疑的。经过一月以后,他拿事实证明他是对的。的确,我在许多教育问题上,都不得不向他让步了。

首先,他在某种程度上开始冒险了。他走到建设学院的建设管理处去接洽订货:

“我给你们学院做些家具。”

他的提议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我们不会做家具,我们也没有制作家具的设备,没有车床,没有材料。我们只有一个所罗门·鲍里索维奇·科甘和150个社员。

幸好这些人是天真的、轻信的,他们说:

“好,请做吧!”

“那我们写定单吧!”

定单写好了,教室里使用的几千件各种用具,若干桌子、椅子和

柜子等等。当我看到这张 20 万卢布的定单时,我想,是不是需要请大夫?是不是需要给所罗门·鲍里索维奇·科甘量量体温?我说:

“您怎能接受这样的定单?”

他说:

“我们会制成的。”

“到底该从哪里着手?要知道,我们需要钱,但钱没有来源。”

他说:

“事情常常是这样的,当一个人没有钱的时候,总是说:‘没有钱,没有钱!’但以后就会从什么地方弄到钱的,所以,我们也可以弄到钱。”

“从哪里去弄钱?谁会给你?”

“难道世界上就没有会给钱的‘傻瓜’了吗?……”

你们看,想不到他真的找到了。在那个学院里就有这样的“傻瓜”(怨我的用词),同意了科甘的建议。所罗门·鲍里索维奇说:

“我们要做家具了,但做好了往哪里放呢?你们刚刚在打地基。好啦,我们很快将把家具做好,但往什么地方放呢?”

对方回答说:

“是的,当真没有地方放。”

所罗门·鲍里索维奇说:

“那么,我们可以设法放在我们那里。”

“你们有地方放吗?”

“没有,但我们可以盖仓库,这需要 5 万卢布。”

“就给你们 5 万卢布。”

5 万卢布拿到了,但是,无论我,无论社员,无论所罗门·鲍里索维奇,都决定不盖仓库。我们拿这笔钱买了木工车床,买了材料。所罗门·鲍里索维奇又预支了一笔钱,于是,生产开始了。但我们制作的并不是建设学院所需要的设备,而是能够在市场上出售的一切东西。所罗门·鲍里索维奇开始制作准备在市场上出售的普通椅子,

但起初做的椅子是粗糙的,简直不中用。但是他说:当一个社员还不会做椅子的时候,他可以做椅腿。他还实行了分工。我对他的作法是很怀疑的。

他进行了这样的分工:第一个人刨,第二个人锯,第三个人修正,第四个人磨光,第五个人检查等等。但是,并没有什么学习过程,社员们注意到了这一点,说他们什么也学不到。在全体大会上大家说,有必要为了公社从事这种工作,但是,需要的除了利益之外,还应该能得到知识,而作些木板条和腿,是学不到什么的。

所罗门·鲍里索维奇是自己这一行的真正能手,他把制作椅子分为十来道工序,由每一个社员完成其中的一道。由于进行了分工,我们开始制作出了许多椅子。

我们的整个院子,很快地就被椅子堆满了,老实说,质量是很差的。起初,所罗门·鲍里索维奇更多的是指靠修理工作,当椅子制成以后,他发明了一种用胶水和锯末制成的特别涂塞品,用这种涂塞品涂抹所有的孔缝,然后加以磨光等等。就这样,半年之后,他把5万卢布的基金变成了20万卢布。那时候他又买了车床和木材,开始制造剧院用的家具了。

以后,科甘退居次要地位,当了供应方面的负责人,这是最适合他的专长和才能的职务。又来了新的工程师,但我仍然相信,把劳动过程严格地分成各个很小的工序,还是很有益处的。骤然看来,这种劳动分工会使人感到难受,然而,经过一个时期,就不会有任何可怕的感觉了。当然,每一个男孩或女孩,在一定的时间内仅仅从事仿佛培养不出任何熟练技术的一种操作。但是,社员在公社里经过若干年以后,从一道工序转到另一道工序,在许多不同的工序上都工作过,最后就可以从事装配等等的最复杂的操作,真正成为技术很熟练的工作者——不是手工业生产者,而是广泛的社会生产所需要的熟练技术的工作者。

当然,如果我们就这样停留在木工作业上,那么,我们的社员也就

只能成为木工厂的生产者,而且是劳动分工很细的木工厂的生产者了。但是,正由于商业上的成就,即生产范围上的成就,才使我们能够有充分根据地满足我们的要求:在所罗门·鲍里索维奇来了一年以后,我们已经可以致谢肃反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并请求停止扣除他们的薪资了,再经过一年,我们在银行里的纯积余就有60万卢布了。

这就是我们的生产事业所给予我们的。有了60万卢布,我们已经不再是慈善机关了,而是成了能够信赖的真正的企业了。

于是,银行也向我提供了建设贷款。1931年,我们建立了第一所工厂,这已经是一所很有基础的金属加工厂,可以生产以前需要进口的很复杂的机器电钻了。虽然这种机器有发动机,有150种零件,有许多各种各样的齿轮,需要有铣床和齿轮铣床,需要有很复杂的装配和铸造等等工作,但是,我们很快地就掌握了它,我们终于能够利用干木工活时的劳动分工经验,很快地掌握了金属加工工作。那种从事制造一种木工零件并使这一制造过程达到完善程度的一个人的心理,在金属制造的生产工作上,也是有用的。为了掌握很复杂的车床,我们需要一个半月的时间,而且在车床旁边工作的是十三、四岁的社员们。

金属加工厂的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以至于我们开始建造起照相机工厂了。这是很复杂的工厂,完全是用我们自己的设备建造起来的。公社现有的照相机工厂,是我们自己的工厂,你们在这里可以见到并非所有的工厂都有的各种车床,而且,这里还有很复杂的生产过程,准确度能到达微米的程度,也就是说,需要有很复杂的工具,需要选择工具,需要有科学地装备起来的、精细的检查技术,总之,这是一种极复杂的生产过程。

我相信,如果我们不从制造椅子开始,不从劳动分工开始,我们就不会有这样的成绩。我很明白,问题的本质并不在于从什么地方开始,而是在于以最新技术为基础的生产逻辑,这种逻辑就是劳动分工和生产计划。

不从事生产的人,很难理解什么是生产计划。生产计划并不只限于需要制造多少桌子和椅子。生产计划就是生产定额和生产关系之间的极细微的紧密联系。这是各种细节之间的紧密联系,是各生产部门之间的紧密联系,是车间之间的紧密联系。要事先注意到材料品质的适当选择,注意到材料的供应,注意到工具的配置、锉磨和补充以及监督要求等等。在组织得好的生产部门,监督工作同时也是关于工具、定额和条件的一整套工作。这是人的活动的最复杂的“装备”,就应当以这样的“装备”来培养我们的公民。因为,我们的公民,不是参加手工业的生产,而是参加用最新的技术组织起来的大规模的国家范围的生产。

当然,在捷尔任斯基公社有了这样的设备以后,我不仅不能想象制鞋作坊或缝纫作坊,也不能想象手工车床的木工作坊了。……

当我们的劳动教育逐渐转变为生产教育的时候,我自己还不能预期这种生产教育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但是,在最近几年来,当我们的十三、四岁的儿童能够管理万能铣床组的时候,我就毫不惊奇了(管理这种机床是离不开数学的,而且需要周密地思考)。

我还没有说到,担任这种工作应当懂得材料的品质、切削器的性能,看得懂得图纸等。和已经成为优秀铣工并能管理一个铣工组的十四、五岁的男孩一起工作的,你们还可以看到一个十六、七岁的男孩,他是车间主任,不错,可能是比较简单的车间,可是一个十九岁的青年,已经可以管理复杂的车间了。例如我以前的通讯员沃洛季卡·科济里,从前只会跑跑腿、找找人,而现在却可以管理复杂的机械车间了。

这一条道路,对成年人来说,也许需要十年的时间,但对从事生产的儿童来说,只需要一、二年。我所经过的这一条道路并不是那样轻松的,并且也很难立刻就相信男女儿童在生产上能获得如此精湛的熟练技术。关于女孩子要作一些修正,她们也能很快地达到斯达汉诺夫式的生产定额,不过,这不是在金属加工生产上,而是在装配

和安装工作上,是在不很费体力的生产工作上,特别是在制造光学仪器的生产上——如格外需要清洁和外部精确性的透光镜生产。在准确的动作和注意力方面,女孩子胜过男孩子。男孩子在设计才能方面占优势,而女孩子却在复杂的和责任重大的生产过程中具有高度的准确性和组织性。男孩子不能够对付透光镜的生产,所以,所有这一方面的生产工作,都转交给女孩子了。在装配精密的机器零件的过程中,不仅需要手和眼准确地动作,而且各个零件在桌子上也要有极严格、极准确的配置。这里,女孩子不仅在生产上,而且在组织生产上,都胜过男孩子。

一般地说,男孩子都是可靠的金属工,女孩子就不同了,她们对金属毫无兴趣。铁、铜和镍,永远能震撼男孩的心灵。女孩总是避开万能铣床和六角铣床,特别是那种油渍四溅、肮脏污浊的车床。

女社员从来也不打算在铸造车间里工作。

我的集体在最近一年来所从事的劳动的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的。如果以平常理解教育过程的那种观点来看这种劳动,也就是说,认为这一些人是学生,另一些人是他们的教师,那么,也许生产就会成为不合理的教育过程,但是,如果把这种生产看作集体中的生产,看作日复一日的生产,那么,它就很有吸引力了。

一切复杂生产的好处在于它能广泛地满足各种兴趣和爱好。

例如在“ФЗД”牌照相机的生产上,我们有很大的制图车间——在这里工作的有好几十个制图员,有计划部,有检查部,有规模很大的工具车间,有营业部。因此,每一个学生都能够有满足自己爱好的机会。设计局的工作人员(设计师和制图员)全都是公社社员。这就是说,谁爱好这样的工作,谁有能力做这样的工作,谁就可以到设计局来。

在工具车间里,能学到高度熟练的技术,也就是说,一个男孩子经过所有的车间和生产部门,最后在工具车间里完成自己的生产教育,在这里可以把他训练成一个模型制造工,也就是说,可以成为一

个具有高度熟练技术的工具制造工。

我看到参加这种生产过程的每一部分的工作,对于培养社员的性格起了很好的作用。我这里经常有离开公社进了高等学校的社员从城里来看我。这些人正在受着或已经受过高等教育。其中有历史学家、地质学家、医师、工程师和设计师等等,他们在认识上、习惯上和观点上,都有广泛性和多方面性的个性特点。

不久以前,有一个医师来看我。我还记得他从前是我们的巨大的研磨车床上的研磨工,每一个零件在这个车床上要做到最精细的程度,精确度要达到百万分之一米。他是这样进行工作的,工长对他说:

“请你作!要达到百万分之一米的精确度。”

他把零件放在车床上,不必作任何的检查,不用任何的测量仪器,接着就说:

“看吧!这就是百万分之一米。”

他的眼睛、手和车床,已经能做到那样的协调一致——不必进行检查就可以工作了。运用车床的灵敏完全到了纯熟的程度。这个优秀的研磨工现在成了医师,但是,在他的认识中,我现在还感觉到他对精确性是很重视的。因此,当我观察离开公社的社员们的时候,我立刻就能看出他们在他们所经历过的一切组织工作和生产工作上所获得的那种熟练技巧的反映。

拥有工厂并为工厂负责的集体,可以获得极多的组织者的技巧,也就是说,能够获得可能是苏联公民最需要的那些技巧。在每一次全体大会上,在每一次队长的生产会议上,在车间里,就是在各种集会和小组里,以至于在日常谈话的时候,经常能够练习这种组织者的才能。同时,集体也不仅经常要求每一个工作者,而且经常要求作为组织者的每一个社员承担责任。如果说你们应当了解生产的全部复杂过程的话,那你们就应当了解人与生产的全部复杂关系。在机器车间、光学仪器车间、各种装配车间和工具车间的学生都参加的全体大会上,有人提出某种零件不够的问题,于是,装配车间就要说明原

委 ,同时还要请和装配车间没有任何关系的人们来发表意见。那些人发表了意见 ,这就是说 ,他们知道那里缺少什么 ,他们是以组织者的身分来发表意见的。

当车间正在工作的时候 ,能够得到更多的机会来练习组织者的才能。管理铣床组也需要专门组织者的能力。

我知道 ,组织这样的生产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但是 ,也决不能够只说容易办的事情。我组织这样的生产 ,曾花费了十六年的辛勤劳动 ,通过了十六年的艰苦斗争。这是没有办法的。我相信任何一个儿童集体如果想转向真正象样的生产事业 ,它所花费的时间也不会少于十年。并且 ,前几辈的人要为建立这种生产事业而奋斗 ,还等不到享受全部的幸福就离开了这个集体 ,能够享受全部幸福的是后来的人 ,这是必然的。

不应当以为前几辈人会委屈地离开集体 ,要知道 ,这是为了未来的既定目标而斗争 ,即使在培养熟练技巧和教育的意义上说 ,这也是很有价值的。在这整个发展过程中 ,集体的斗争 ,前进的志向 ,向明确的既定目标迈进 ,也许就是最主要的东西了。

我感到很幸福 ,因为 ,在我们的集体面前总是明确地摆着困难的目标 ,集体向着这一目标前进。而且 ,不只是在空间前进 ,而要克服困难 ,甚至要克服贫困和集体内部的磨擦。在向着明确的既定目标迈进的时候 ,如果能自觉地提出“向着明确的既定目标前进”的口号 ,那么 ,工资问题就已经没有那么重要的原则性的意义了。在有经济事业的集体里 ,劳动的成就是十分显而易见的 ,应享受的福利也是非常清楚的 ,在这里 ,储存每一个卢布都是为了将来 ,因此 ,在这样的集体里 ,已不需要用个人的工资来刺激集体里的每一个成员。

后来 ,我这里也实行了支付工资的办法 ,但是 ,我顺利地保持住了集体的作风 ,并消灭了工资对年龄小的儿童可能造成的那种害处。至于有家庭的成年人、对家庭和孩子负有责任的成年人支领工资 ,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在儿童集体里 ,为了孩子们的衣着 ,我忙得不亦

乐乎。我要负责让孩子们穿得好,让他们温暖,让他们学习。因此,工资不过是某种额外的满足。而在好的集体里,没有工资也可以达到这种目的。我设法做到了这一件事情,全公社所有的工资,都由我统筹支配。这是全体大会的决议。社员们所关切的,与其说是自己到手的钱,不如说是为了将来生活而储存在银行里的钱。

关于工资,最近采取这样的办法。首先,每一个社员由自己的工资里扣除10%作为队长会议的基金。这并不是是一件小事,工资的10%是一宗很大的数目。

因此,我们很快地就筹集了一笔数目很大的基金。这笔基金由队长会议管理,基金不属于每一个社员。基金主要用于加强文化事业和帮助以前的社员。

当队长会议作出这样的决定的时候,你们不可能想象到出现了什么情况:

“万尼亚·沃尔琴科有很好的音乐才能,送他到音乐学院里去学习,每月再给他100卢布,一直到他由音乐学院毕业为止。”

在捷尔任斯基公社里,获得这种助学金的学生,有好几十个。在我离开公社的这一年,领到助学金的人已约有100个了。获得了助学金的高等学校的学生,如果和家庭有联系——能得到父亲和母亲的帮助,那就完全够用了,如果是单独一个人,助学金还不够用,公社就根据他的成绩和年级,每月再发50至100卢布的助学金,这样,我们就作了一件很有益的事。

从这种基金里也拨出一部分钱去救济生活贫困的社员,如果证明这种贫困确实是由于现实的原因造成的,而不是仅仅由于懒惰的话。这种基金使公社可以把所有社员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一直到他们能完全独立生活为止。

这就是社员工资支配的情况。无论哪一个社员,在和我一起度过的这些年里,对于扣除自己工资的10%作为队长会议基金这一件事情,无论暗地或公开,从来没有表示过不满。请注意,此外还可以

用这种基金象办“嫁妆”一样给毕业的每一个社员送床、被子、大衣，衬衣和制服等等东西，好象儿女离家时家庭给他们送东西一样。

因为有了这样的基金，使公社有可能管理社员的生活。这样的基金要比我们的未经经验证实的1 000条教育理论更珍贵得多。

社员工资的其他部分，一般都存入储蓄所，估计每一个社员离开公社时，在储蓄所里的存款应不少于1 000卢布。这笔钱，当社员在公社时是不能支用的，一般地说，没有我的签字是不能发给他的。有些社员能储蓄到2 000至2 500卢布，这是在公社的五、六年的光阴中积蓄下来的。最后，社员手中还留一小部分工资作为零用钱。我们每年都举行旅行，我很重视它，因为这并不单纯是一种旅行，而是一件盛举。我们公社里进行过六次旅行，这些旅行是这样进行的：坐一程火车，必须步行80至100公里以上的路程，进行宿营，回来时仍然步行一程，再乘火车。这样的旅行，规定在秋季开始举行。我认为，这如同你们向自己提出的夏天的前景一样，是很重要的。提出夏天的前景，你们就会考虑夏天到哪里去度假，幻想着，作着准备。集体也是这样准备旅行的。在工厂停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将如何度过暑假。

对我来说，这种旅行有很大的意义，因为在整个的一年里，我为了准备旅行，把每一个人、把整个集体、把一切物质条件都动员起来了，并进行了文娱和其他一切准备。例如为了要到高加索的伏拉基卡夫卡兹、梯比里斯和巴统去旅行，就需整整一个冬季进行准备工作，就需要派侦察员去了解什么地方可以住宿，什么地方可以用饭，可以跟什么样的人交涉等。这种侦察工作，是派社员去担任的。在最近几年里，我们对旅行的准备已精细到这样的程度，例如500人的一个集体由哈尔科夫出发，我们知道在多少公里的地方，在哪一个路标旁，社员伊凡诺夫应该把低音乐器交给社员彼得洛夫。这个乐器应当沿着整个格鲁吉亚军用公路一直携带着。伊凡诺夫不能一个人带400公里，当需要的时候，他来演奏，而带乐器的是全体学生，每人

带 10 公里。所以 ,大家都准确地知道在哪一个路标旁 ,应当把乐器交给哪一个社员。

甚至于象这样的小事都应当事先估计到 ,以免旅行变成服苦役。至于坐火车、宿营等等 ,那已经是更为重要的事情了 ,要注意到有房子住 ,傍着水 ,靠近人烟众多的地方 ,以便和居民们交谈 ,举行群众大会。这一切 ,也需要派人事先侦察。

我们最大的一次旅行是由哈尔科夫出发 ,经下诺夫戈罗德、斯大林格勒、索奇、敖德萨 ,再返回哈尔科夫。这一次旅行 ,费了一个半月的时间 ,要进行大量的准备工作。我们沿着伏尔加河航行了 15 天 ,船长每天问社员们 :

“前进呢 ? 还是停下 ?”

社员们回答他 :

“赶快去卡马 ,然后回奥卡 !”

只要经过我们的允许 ,船长甚至于还可以喝酒 ,他是一个可怕的醉鬼 ,当他把船搁浅在萨马拉附近的时候 ,我们就把他请到全体大会上。这虽然使大家非常高兴 ,但我们还是要求他在旅行结束以前不要再喝酒。

每一个社员都为旅行作准备 ,都在积攒零用钱 ,因为 ,预计在旅行当中会有许多珍奇的东西可买。通常的情形是这样的 :并没有什么特别珍奇的东西可买 ,只买了皮夹、钱包 ,只喝喝汽水 ,吃吃糖果以及买点在哈尔科夫也可以买到的其他东西。但是 ,在乌里扬诺夫斯克吃到的糖果 ,好象比在哈尔科夫吃到的糖果味道要好一些。

每一个社员所积攒的钱 ,并不存放在自己身边 ,而是放在我带的钱柜里。我在旅行当中总是经常带一整提箱钱 ,钱数约有 5 万至 6 万卢布。

所有这些办法 ,可以减少对钱和对工资的贪欲 ,这种贪欲 ,在生活完全有保障的集体里 ,很可能成为教育过程中严重的和令人不快的包袱。

我忘记告诉大家在关于学校与生产的关系以及生产与学校的关系问题上,我是一贯反对两者之间互相配合的,因此我曾经遭受过不少的攻击和责难。就是现在,我仍然这样主张,我深信,如果在我们的区里或工学团里有一所能够符合教育人民委员部所提出的一切要求(这种要求是与日俱增的)的十年制学校,那么,我认为学校和生产不仅不需要互相配合,而且不配合还要更有益些。

我深信,现在所流行的那种学校和生产互相配合的宣传,是相信单元教学法的流毒,我是始终反对这种单元教学法的。因为,我认为应该让联想的自由教育起某些作用,并且,只有这样的自由教育才能够广泛地发展个人的独特性。不过,这里也要注意,凡是我们的单单在联想方面致力使个人积极化的地方,我们也就只能在那些地方造就出抑郁无聊、兴趣索然的人来。

因此,在我的实践中,我曾作过和我的信念相左的一件事情,这就是我在学校的每一班里,添加了两小时的制图课程。至于在其他的方面,我们学校也和其他的一切学校一样,是由校务会议来领导的,和生产并没有任何的关系。在知识、学习和教学各方面,我们有自己的规程、要求和目的,并且,这些要求应当同等地去满足每一个人。

结果获得了最健全、最自然的配合。教育出来的人,懂得生产,懂得生产组织,也懂得生产过程,此外,还是一个具有中等教育水平的有教养的人。

在一些理论家反对我的时候,我对他们说中等教育和七级铣工的技术,这就是最好的结合,不需要对这种结合再添加任何东西。如果一个人能够操作车床,那就不应该再抱怨了。

一般说来,我认为违法者的品质改造和再教育工作,只有在受了完全中等教育的条件下才有可能。我曾向大家说过,不完全的中等教育决不会获得象完全中等教育所能获得的那种成效。

现在,该讲到我的报告的结论部分了——关于一个教育集体里

应当培养起来的个人的基本面貌和性格的问题。

我认为,在这一点上,我们作教师的还没有周详地考虑到一切问题。我深信,我们苏维埃人的个人品质,原则上是跟资产阶级社会所培养的个人品质不同的,因此,我们的教育,也应当在原则上不同于资产阶级的教育。

资产阶级社会的教育是一种培养个人去适应生存斗争的教育。因此,很自然地,就应当使这样的人养成进行这种生存斗争所必需的种种品质,那就是,诡谋机巧和为了自己而进行个人奋斗的品质——为了自己而进行个人奋斗的战士的品质。

因此,在旧时代的学校里,在所有的资产阶级学校里就培养着资产阶级社会所必需的那一套的人的依存关系,这是非常自然的。在这样的社会里生活着的人,就处于和我们完全不同的另一种依存关系之中。

请你们回忆一下,象我们这样的老头子是怎样学习的。人们并没有时刻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依靠有产阶级,要依靠沙皇官吏,但是,这种事实却渗透了我们教育的整个本质。甚至在说到富人应当帮助穷人的时候,在这种似乎漂亮甚至悦耳的要求下,实质上还是包含着一种明确的指示——说明了存在于富人和穷人生活之间的那种依存关系。至于富人帮助我们穷人,这是说明富人有钱,有力量帮助我们,而我们只依靠富人的帮助和施舍。我们穷人是富人行善施惠的对象,我们在生活中所能遇到的那种依存方式的深刻暗示,就包含在这种关系里。依赖社会地位,依赖善良意志,依赖财富,依赖施舍和残忍,这就是人们准备好了的一连串的依存关系。

我们的学生也要培养起一定的依存方式。认为摆脱了资产阶级社会的依存方式,也就是说,摆脱了剥削和财富的不平均分配以后,学生就一般地摆脱了一切的依存关系,这是一种最可怕的误解。在苏维埃社会里,有另外一种依存关系,这就是社会成员的依存关系,这些成员并不是简单地聚集在一起的一群人,而是过着有组织的生

活,追求着一定的目的。就在我们的这种组织性里,有决定我们苏维埃人的道德和行为的过程和现象。

我们大家是在苏维埃社会里生活和成长起来的,我们是作为集体的成员成长起来的,也就是说,是作为有一定的依存方式的人们成长起来的。

我不知道我是否能把我在这方面的工作做到底,但是,教育的这一本质,是最使我感兴趣的。关于这一点,当提到纪律的时候,已经谈过一些了。

为了更明确地说明这个问题,我们要来看看工作过程中的集体——真正的集体,而不是一群人,也就是说,是在自己面前具有一定的共同目标的那种集体。在这样的集体里,依存关系是很复杂的,每一个人应当使自己个人的志趣跟他人的志趣一致起来:第一,要跟整个集体的志趣一致起来;第二,要跟自己的基层集体——最接近的小组——的志趣一致起来;要一致到个人的目的跟共同的目的不会对立的程度。因此,共同的目的应当决定我们的个人目的。这种共同目的和个人目的的一致,就是苏维埃社会的性质。对我来说,共同目的不只是主要的、占优势的东西,而且是跟我的个人目的联系着的东西。很显然,儿童集体只能这样地建立起来。如果不是这样建立起来的话,那我就敢肯定地说这不是苏维埃教育。

在集体的实践中,常常发生个人目的和集体目的对立的问题,也常常发生使个人目的和集体目的一致的问题。如果在集体里能感觉到共同目的和局部的个人目的之间存在着这种对立,这就说明这种集体不是苏维埃的集体,这就说明这种集体组织得不够健全。只有个人目的和共同目的一致的地方,只有个人和集体没有任何不协调的地方,那里才会有苏维埃集体。

但是,如果脱离每天的日常实际工作细节,要解决这个问题是不可能的;只有在每一个社员和每一个集体的实践中才能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实践就是我所说的工作作风。我认为,关于教育工作的作

风问题,值得写几篇专论来研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例如我们拿社员之间的关系、同学之间的关系这种小事情为例。这好象并不算一个新问题了,但是,我们的教育理论对这个问题却解决得不够好。这个问题,在革命前的教育学里差不多是不可能存在的。在革命前的教育学里也跟在革命前的社会里一样,把人与人的关系看作个人与个人的一种关系来处理,也就是说,看作两个自由独立的東西之间的一种关系来处理,因此,所谈的只是好人教育、善人教育和其他什么人的教育。

在我们的教育学里所谈的是关于同志的教育,是关于一个集体的成员与另一个集体的成员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些成员,并不是无拘无束的,并不是在真空中交往,而是把自己对集体的义务、关系、职责、荣誉以及行动等等互相联系在一起。这种一个集体的成员与另一个集体的成员之间的有组织的关系是教育过程中最具有决定意义的东西。

什么是集体呢?这并不象儿童学者所讲的那样,只是相互有关系的一些个人的简单聚集。集体是具有目的的个人集合体,参加这一集体的每个人是被组织起来的,同时也拥有集体的机构。凡是有集体组织的地方,那里就有集体的机构,那里就有受集体委托的那些全权代表人的组织存在,这里,同学之间的关系问题,并不是友谊问题,并不是爱的问题,并不是一团和气的問題,而是责任攸关的问题。甚至当同学们处在相同的情况下,在同一支队伍里并肩前进,起着大致相同的作用时,他们也不是仅仅用友谊来维系,而是以工作中的共同责任,以共同参加集体工作来维系的。

不在同一支队伍而分别在不同的队伍里的同学之间的关系是特别重要的,同时,依存关系不平等——一个同学服从另一个同学——的这种同学关系,也是特别重要的。这里就存在着儿童集体里最难掌握、最感困难的问题,这就是建立服从关系,而不是建立平等关系。这就是我们的教育家们最害怕的事情。一个同学应当善于服从另一

个同学——并不是普普通通的服从,而是要善于服从。

此外,一个同学也要善于命令另一个同学,也就是说,要善于委托另一个同学,并要求那个同学执行一定的任务,负一定的责任。

这种善于服从同学,并不是服从财富,并不是服从权力,也不是服从人情或恩惠,而是服从集体里的同等成员。这是一个极不容易解决的问题,不仅儿童集体如此,成年人的集体也是如此。如果旧社会的残余仍然存在的话,那么,这些残余就会包藏在上述的那些地方。而特别困难的是命令和自己同等的同学,为什么呢?惟一的原因就是因为受了集体的全权委托。在这里,就包含着一种最复杂的整体观念。只有当发命令的人感觉到对集体应负责任的时候,只有当他知道自己发命令是在执行集体的意志的时候,他才能善于命令同学,善于委托同学,善于鼓励同学从事工作,善于为同学承担责任。如果他没有这种感觉,那他所剩下的就只有个人的优越感、权力欲、功名心和不是我们这个时代里所应有的一切其他的感受和倾向了。

我对这一方面是特别注意的,因此,我在集体里采用了很复杂的依存和服从的原则。例如拿同一个男孩子说,他当了值日队长,今天他领导着集体,而明天自己又服从新的领导者,这个值日队长,就是这种教育的最好例证。

在这一方面我取得了比较大的成绩,努力使集体的各个全权代表之间的依存关系,尽可能地交织在一起,使得服从和命令尽可能多地相遇……

这就是我建立一长制的基层集体制度的原因,我把一长制的权力交给了自己的队长。我设法把集体分为分队,每一分队10个人,为了使队长的人数尽可能多一些,我设法建立尽可能多的委员会,但在最近一段时期里,我却采取了这样的方式——委托个别的人。

为了利用这种方式,我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现在举我记得的一个例子来说。例如由于来了新的孩子等等事情,需要把孩子们由某一个寝室搬到另一个寝室,需要重新编排寝室,因为,新来的孩子

总是编入老的分队里去。队长会议决定在某一时刻迁移寝室,只允许随身带被褥,其他东西象床、桌子、画片和柜子等,一律不准带。为了使迁移寝室的工作能做得符合规定,指定专人负责指挥监督,例如我们指定科济里。不过,开始的时候,这个工作并不是那么容易做好的。大家不服从科济里,挥拳舞掌地不听指挥,科济里自己也不知道怎样才能使400个人服从自己。

最后,我不仅使这样的工作成功了,而且也使科济里和其他的人都能知道各人应当怎样做。科济里站在走廊上,只用手指、眉毛和眼睛的动作来指挥应当做的事情,大家也都很清楚地知道事情做得成功不成功,科济里要负完全责任。如果某一个人把好的画片拿到自己的寝室里去了,而他忽略了,没有注意到,那么他就要对此负责。

譬如,我们需要从夜车上接收20个流浪儿童,队长会议经常派5至6人的特别混合小队担任这个工作。假定队长指定泽姆良斯基担任这个小队的队长,那么,他就清楚地知道自己是小队的队长,队里的这5—6个人也都会立刻服从他的一切命令。这样,小队的队员会感到某种满足,因为他们看到他们自己有了中心,这个中心在领导他们,也在对他们负责。

泽姆良斯基本人知道这次行动的一切责任,都落在自己的肩上了,全小队也知道,在火车站上,要从车顶上、车厢里拉下流浪孩子,要在那里挑选优秀的孩子,也就是说,要挑选具有斗争性的、可以信赖的孩子,不挑选流口水、流鼻涕的脏孩子。他们就挑选了那些具有斗争性的孩子,泽姆良斯基完成了这样的任务。我不能够照管这些事。他应当完成这个委托,并应当对完成情况作出报告。

我的时间是不够用的,但是,不管怎样晚,不管怎样困难,我总是不放过机会去听报告,不放过机会去了解工作是否满意,此外不作任何决定。

在公社里不会有这样的一天,在这天中发生的一件事情会找不到负责人,各分队里会有几个人不去帮助负责人。小伙子们争

吵起来不肯罢休,要立刻指定一个同学去了解争吵的始末,对他们进行调解,并报告完成任务的情况。

培养一种认真的责任心是解决许多问题的教育手段。当然,从整个的分队来说,这一切办法仍然是属于补充性质的。这象个真正的参谋部,它对工作负责,而不是仅仅在表面上表示表示就算完了。

我曾见到某些儿童之家注意到了组织这种工作,但没有注意到工作上的精确性和严格的责任心。而事实上,没有责任心就不会有真正的工作。同时,无论在生产上,无论在课堂里,无论在学校里,无论在混合小队里,都需要有责任心,这是很重要的。甚至于象在洗澡的这种情况下,那也表示今天洗澡,今天就要为洗澡负责任。这种责任心应当和整个集体的责任心一致。如果没有这种一致的责任心,如果没有负责人之间的完全协调,那么,所能得到的只是游戏,而不是真正的事业。

从这一切的委托中,从这一切的措施中,就建立起了工作的作风——集体的作风。我已经说过了,关于作风问题是需要写专论的。

我认为以下两点是苏维埃儿童集体的作风所具有的特殊标志。

第一,愉快的情绪。我认为这个品质是最重要的。这就是经常朝气蓬勃,没有任何愁眉不展的面孔,没有任何郁郁不乐的表情,经常准备着去行动,具有快乐的情绪——真正乐观、愉快和朝气蓬勃的情绪,而完全没有歇斯底里的现象;准备进行有益的活动,准备进行有趣的活动,准备进行有内容、有意义的活动,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也不干出乱七八糟的事,不尖叫和呼喊,不作出动物般的愚蠢行为。

象动物般地吼叫和追逐,这种行为我是坚决反对的。捷尔任斯基公社有500名男女儿童,在那里你们永远听不到叫喊的声音。同时,你们却会在他们的生活,在他们的情绪中经常看到朝气和信心。

当然,这种愉快的情绪是不能用特别的方法制造出来的,这是我所说过的集体的全部工作的自然结果。

作风上的另一个特点是自尊心。当然,这个特点不可能在一天

之内养成。这种对个人的信心产生于对自己集体的价值的认识和自己集体的自豪感。

如果你们到公社来,你们就会受到非常殷勤有礼的接待,永远不会出现在你们身旁走过却没有发现你们的那种情形。你们碰到的第一个人,一定要对你们行礼并且说:

“您好!请问您想作什么?”

每一个孩子都是殷勤的:

“您是谁?您有什么事?”

谁也不会对你们抱怨公社。我在公社社员中看到一种惊人的现象。例如一个社员刚刚受了申斥,他非常颓丧。忽然他遇到了来访的客人,他就完全变了,他会愉快地、殷勤地带你们去可以去的一切地方,如果不可以去的话,他就会说:“走吧!我们去取通行证!”

他虽然满肚子苦楚,虽然想的尽是自己的过失,但他能抛开这一切,无论如何不会表示出他刚刚遇到了什么不快的事情。如果问他:

“生活得怎么样?”

他就会说:

“生活得很好。”

他所以要这样说,完全不是想讨谁的欢喜,而是因为他感到自己对集体应有的责任,是因为他为了自己的集体而自豪,甚至连受了惩罚的人也要这样做。

例如某一个儿童因为行为不好刚刚受了申斥,这时候来了参观团,有人说:

“多么好的孩子!他在你们这里怎么样?”关于他犯了过失、受了惩罚这类事,谁都只字不提。大家认为,对外人说自己同学的过失是愚蠢的,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不能把这样的事情告诉别人。

这种自尊的态度,是很难培养起来的,当然,这需要几年的工夫。对每一个客人,对每一个同学,都应当彬彬有礼、殷勤备至,这是不成问题的。但是,一方面殷勤有礼,一方面还应当经常对抗一些外来的

游手好闲的分子(特别是敌人)侵入公社、侵入集体。因此,在公社里虽然有礼貌地接待和引导来公社的人,但是首先必须问:

“您是谁?来干什么?”

如果看到来客确实没有什么事情,那就会很有礼貌地说:“不行,我们不能接待您。如果您有什么事情,那自然是没有问题的。”

想来公社里逛逛看看的人是经常不断的。这种和蔼有礼就是从我们应当在每一个公民身上培养起来的那种很重要的能力中产生出来的。这种能力就是确定方向的能力。大概,你们一定看见过在儿童集体里或在人群里常常缺乏这种确定方向的能力的事实。一个人总是看到眼前的东西,背后的东西是看不到的。

这种能力可以感觉到谁在自己的周围,谁环绕着自己,这种能力也感觉到自己所没有看见的一切,感觉到其他房间里在干些什么,感觉到生活情况和日常情况。这是确定方向的能力,要培养这种能力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在这里要作出很大的努力,要经常不忘记培养这种确定方向的能力。儿童集体里常常有的那种叫喊的现象,这首先就是由于完全缺乏确定方向的能力,由于只感觉到自己、感觉到自己的活动、而没有感觉到周围环境的缘故。真正的苏维埃公民是应当精神贯注地,几乎是下意识地就能感觉到自己周围发生了什么事情。当你处在自己朋友中间的时候,可以保持着某种态度,这是一种情形。当你处在新社员中间的时候,当看到这里有了昨天刚来的孩子的时候,这就是另外一种情形了。如果一个社员看到了这种事实,他就不说这些孩子不应当听的话。当社员看到妇女或女孩从自己旁边经过的时候,情形就又有不同。往往这个妇女与这个社员并没有什么关系,但他仍应改变行动的态度。如果我在旁边,社员就应当而且必须知道和感觉到我是集体的中心,感觉到我就在大家的身旁。如果是另外一位教师、视导员、工程师和学校中心的代表,那么,就应当对每一个人采取不同的态度。

这并不是说要迎合迁就和故意做作,这是说要有这样的一种感觉——知道自己在集体里居什么样的地位,知道由于这样的地位自己在行为上应该承担什么样的义务。

我曾看到许多儿童之家和工学团的大部分儿童用一种非常令人讨厌的态度接待来访者。不管来了谁,他们就开始抱怨教师,抱怨总务主任,也彼此相互抱怨,并不在意来的是什么人。我已经做到了使社员们不对外来的人诉苦。自我批评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象“爱流泪”或者象社员们所说的不管在什么人面前总是“诉苦”或“纠缠不休”,是不能允许的。

社员们常常会一会儿不满意这一个人,一会儿不满意另一个人,一会儿又不满意第三个人。有了这样的情形,他们可以在队长会议上说,但从来不允许当着外人的面发怨言、“吱吱叫”,因为对外人来说,我们的集体是一个整体。随意抱怨,并不是自我批评。这是感觉到自己在集体里是不幸的那一些人的一种情绪,这是集体和个人的爱流泪、好哭泣的一种表现。集体中尤其需要有受保护的观念,这种观念应当使集体的作风美好起来。凡是有集体自豪感的集体,凡是对每一个人有要求的地方,也就是说,凡是每一个人感觉到自己不受欺压、愚弄和讥嘲的地方,就应当建立起这种受保护的观念。

这种受保护的观念,是由经验中产生出来的。我曾使最年幼的、最软弱的男女儿童(十岁至十二岁)不感到自己是集体里的幼小成员。在劳动中、在作业上,他们是幼小的成员,但在自我感觉上、在自信上,他们却能感觉到他们是受到很好的保护的成员。因为他们感觉到无论谁都不能欺侮他们,凡是受了欺侮的人,不仅仅能得到自己的分队、生产小组和我的保护,而且还能得到首先看到他们受欺侮的那个同学的保护。

很显然,这种受保护的观念,仍然是不会自动产生的,还是需要创造、需要下一番工夫的。要在集体的这种作风中培养出经常愉快的情绪,培养前进、努力和行动的能力,同时也要培养起克制的能力。这恰

恰是一般的教师比较不容易做到的。克制自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特别是在童年时代。克制自己的能力不是产生于单纯的生理作用，只有通过教育才可能产生出来。如果教师不注意培养学生的克制能力，那学生就不会具有这种能力。随时随地都需要克制自己，应当使这种行为变成一种习惯。社员们也很清楚地知道，一个人如果不能自行克制，那就是一架“坏机器”。这种克制能力，在每一种生理的和心理的活动中随时都能表现出来，特别容易表现在辩论和争吵的时候。儿童们所以常常争吵，正是因为他们没有这种克制能力。

培养对同学让步的习惯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由于考虑到集体的利益，我特别努力使儿童养成让步的态度。我设法在儿童争吵之前，预先防止，于是争吵渐渐就不发生了。因此，我得到的结果就是公社里整月整月地没有发生同学间争吵，尤其是没有打架、诽谤和互相倾轧的现象。我所以能获得这样的结果，并不是强调同学们谁对谁不对的问题，而完全依靠同学们克制自己的能力。

你们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这有关于生活的哪些方面，这可能会有怎样的结果。当然，集体的作风上的这一切特征和特点，完全是在集体的各部分的生活中培养起来的，但这些特征和特点，也是在外部分行为的规则和准则中培养起来的。许多人看了我的工作，加以嘲笑，表示不同意的那种地方，就是外部行为的准则。

我直到现在还认为以下的这些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条件，那就是：社员不应当扶楼梯的栏杆，不应当靠墙，跟我和其他人谈话时也要这样，永远要挺胸、精神饱满，腰上紧束着皮带；为此，社员对我和队长的一切命令，必须回答“是”，如果没有回答“是”，那就表明他没有明白命令的意思。

所有这些，都有很重大的意义，我们一向就是这样做的。例如今天泽姆良斯基被指定作社务工作的队长，于是他就说：“尼古拉，去给我把纸和铅笔拿来。”

如果尼古拉跑着去了，他就说：“你是怎么走路的？”

“是,去拿纸。”

这种外表上的规矩礼节,这种形式感,就可以决定行为的内在的实质。泽姆良斯基和尼古拉以后可以整天玩棒球、踢足球,但现在泽姆良斯基是尼古拉的队长,因此,他们之间的关系上就应当有一定的表面形式。

如果我惩罚了谁,而受惩罚的人没有回答“是”,那我就认为他没有接受惩罚。

在工作关系方面规定这种礼貌形式是非常有益的。它可以动员意志,可以使一个人感觉到自己是集中精神的,它强调一种类型的工作关系,可以教人区分什么是友谊,什么是亲近,什么是相爱,什么是交好,而什么又是事业。这种礼貌的形式,也可以培养出对事业的特别尊重的态度。

我想,没有工作关系方面的这种礼貌形式也许是可以的,但这是真正教育工作的最经济有效的方法,是工作关系上的一种表面形式,而这种表面形式往往能决定行为的本质。

以后,这种工作关系方面的礼貌形式,在公社里完全成了一种日常的、自然的现象,甚至于到了非如此不可的程度。就是最年幼的孩子在礼节方面的举动,也是那么的自然,无论谁都永远不会认为他们是在开玩笑,做游戏。他们一旦和其他的人发生了工作上的关系,他们自然而然地就会对这种工作关系作出反应。

例如一个孩子在广场上玩耍,正玩得兴致勃勃。但是他偶尔从自己的值日队长身边溜过时,听到队长在发命令,命令干的并不是什么大事,他也必须马上立正。我认为,这种做法是非常重要的、非常有益的。

如果没有也不去培养一定的共同的作风,那么,这一切外部行为的准则就毫无意义了。凡是想具有这种外表的地方,如果确定方向的能力、克制能力、责任心、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一长制和保护观念等等都没有培养起来的话,那么,这样的外表形式在这里当然

就不会有的了,换句话说,它就完全失掉意义了。只有具有共同的作风、并且这种作风是以经常的集体活动和集体内容为基础的,才能有外表上的有礼貌的形式。当然,这种表面形式也许有点近于军事化,但一般地说,还没有越出少年先锋队活动的原则,这种外表形式是必须的、有益的,特别能美化集体。当表面的礼貌形式美化集体时,它就起着辗转重复的作用,就已经使集体在审美方面具有吸引力量。

儿童愿意生活在这个集体里,并以这个集体而自豪,而这样的集体从外表方面来看却不是美观的,这样的集体我想象不出来。决不能够忽视生活中的审美方面。而正是我们作教师的,在审美方面常常犯一些虚无主义的毛病。

衣服,房间、楼梯和车床的美,其意义一点也不比行为美的意义小。什么是行为美呢?这就是具有某种形式的固定行为。这种形式本身就是具有高度修养的标志。

因此,这里还应该注意另一件事实,我们把美学作为作风的结果、作为作风的表现来看待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就开始把这种美学作为本身具有教育能力的一种因素来看待。

我不能够向大家列举美的生活的一切标准,但必须有这种美的生活。同时,儿童的美的生活,又与成年人的不同,儿童有自己的感受形式,有自己的精神活动上所有的表情的程度。因此,儿童集体里的美决不能够重复成年人集体里的美。

例如拿游戏来说。儿童集体里必然有游戏,不做游戏的儿童集体就不是真正的儿童集体。游戏不应当只限于儿童在操场上跑和踢足球,而应当表现在这些方面:儿童在自己生活的每一分钟里稍微玩玩,他在玩的过程中进行一定的想象和幻想,他扮演某一个角色,感觉到自己高大一些了。想象只有在有游戏的集体里才能得到发展。我是一个教师,我应当和儿童们一起作些游戏。如果我只是教导、要求和强制,那我就成为一种外部力量,也许这可能是一种有益的力量,但不可能使儿童感到亲近。我必须和儿童们一起作些游戏,同

时,我也要求我的所有的同事们都能够这样做。

当然,我现在和大家讲话,完全是一种不同的身分,但我和儿童们在一起的时候,就应当增加一些愉快的情绪,应当机警灵活、满面春风——不是要装出笑容来,纯粹是一种和蔼可亲的笑容,是具有足够的想象的一种笑容。我应当成为集体里的这样的成员:不是仅仅管理指导集体,而且也要使集体愉快起来。我的外表应当能够合乎审美观点,因此,我从来不会穿没有擦干净的皮靴或者不系好皮带就出外的。我的服装应当比较讲究些,当然必须根据我的力量和可能。我也应当象集体一样地愉快。我从来不让自己有忧愁的神色和抑郁的面容。甚至我有不愉快的事情,我生病了,我也不在儿童面前表示出来。

从另一方面说,我又应当善于生气。去年我在你们的教育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讨论应当用怎样的声调和学生谈话,文章里这样说:教师跟学生谈话,应当用平静的声调。这是为了什么呢?为什么要用平静的声调呢?我想结果只能使人人都讨厌这个教师。这种观点是不对的,我认为教师应当是快乐的、朝气蓬勃的,如果学生不守规则,就应当严加申斥,让学生感觉到教师一旦生了气,那就是真正生气了,而不是又象生气,又象在作教育上的说教。

对所有的教育工作者都应该有这样的要求。我毫不惋惜地解聘了一些很好的教师,只是因为经常散发出这种抑郁气氛。成年人在儿童集体里应当善于克制自己,应当善于把自己不愉快的心情隐藏起来。

集体应当在外表上予以装饰,使它美化。因此,甚至当我们的集体还很困难的时候,我仍然把建筑花房作为首要的任务。而且,这并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个花房,而是能种一公顷地的花的大花房,不管要花多少钱都不计较。这里必须有好的花草,不是平平常常的花,而是菊花和玫瑰。我和我的孩子们对这些花关怀备至。我们确实有一公顷地的花,不是随随便便的什么花。而是真正名贵的花。不仅在寝

室里、食堂里、教室里和办公室里有花,甚至在楼梯上也有花。我们用白铁做成特制的花篮,楼梯的两旁都摆着花,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各个分队取花,完全不必开什么条子,只要花谢了,就可以直接去花房里再取一盆或两盆。

这些花,整洁的衣服,清洁的房间,干净的鞋子,这就是儿童集体里应该有和应该做到的事情。皮鞋应当经常刷干净,办不到这一点事情,那还能谈到什么教育?不仅牙齿应该刷,皮鞋也一定要刷。衣服上不当有一点尘土,也要经常理发。头发的样式可以随便,但是必须好好理发。卫生委员会值日员每月拿着推子剪刀到寝室里走一次,谁没有理发,照头就是一剪子:“到理发馆去”所以,所有的人总是经常把发理得整整齐齐。

对于这种清洁的要求,应当十分严格地执行。在我离开捷尔任斯基公社半年之后,有一次由基辅到那里去视察。当然,所有的人都跑出来了,握手寒暄,大家非常亲热。我走到了寝室,看见情况有点不同了,有了尘土,我的最优秀的队长亚诺夫斯基的手帕丢在一边,柜子敞开了——从这里可以拿出一大堆脏东西来。我当时就完全不用平静的声调说话了,我严肃地说:“禁闭十小时,我再不去任何地方了,明天早上我要亲自来扫除。”第二天早上四点半钟,他们派车到哈尔科夫来接我,我来了以后,找不到一点灰尘了。我问他们:“你们什么时候收拾好的?”大家说:“没有睡觉。”我明白了,我的要求是这样的,而其他人有其他的要求,只要稍微降低要求,就既没有集体的格调,也没有集体的作风了,这一点应该记住。在教室里上课的时候,卫生委员会值日员首先就对教师说:“您对我们教室里的清洁满意不满意?”

这样,教师的处境就困难了,说“满意”吧,而卫生委员会值日员却可以找到上千处的缺点。教师满意了,但有的地方有脏东西,有的学生的指甲没有剪,有的桌面划破了。因此,每一个教师自然而然地就不得不要求班上清洁了。

我不允许教师上课时衣服穿得不整洁,所以,穿着好衣服去工作已经成了我们的习惯。我去工作的时候,总要穿我自己最好的衣服。因此,所有我们的教师、工程师和建筑师的服装都是整洁而且漂亮的。

这一切是非常重要的。例如拿餐桌来说吧。也许有人认为可以铺上一块漆布,很好看,很卫生,什么都可以随便放,然后一擦洗又干净了。这是不行的,必须用洁白的桌布,只有用洁白的桌布才能养成吃饭仔细的习惯。如果用漆布,那就可以漫不经心了。在最初的一些日子里,桌布总是很肮脏,到处有油渍,但经过半年以后,自然就会清洁了。如果你们不用洁白的桌布,你们就不可能培养仔细地吃饭的习惯。

因此,对各种各样的小事都应当随时随地提出严格的要求,例如对书籍、钢笔和铅笔等等。铅笔杆用牙齿啃了,这算什么呢?铅笔应当削得好好的。钢笔头锈得不能写了,墨水瓶里有了苍蝇——有了诸如此类的事情,这还象什么话?在你们的教育目的上,加上这样的多得数不清的小事情吧。当然,靠一个人注意这些事情是不行的,只有当集体注意到这些,只有当集体能知道这些小事情的价值时,才能把这些小事情处理得完全得当。

在公社的门口有站岗的,拿着枪,穿着整齐的制服。站岗的要监督每个人擦鞋。不管哪一个人,如果没擦鞋,就不能够进房间去,无论院子是干燥的或是泥泞的,都必须这样做。负责这件事情的站岗的社员,清楚地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大家每天都要打扫尘土,如果把鞋擦干净了,那么,房间里就可以完全没有尘土了。因此,对社员是用不着提示这点的,而外来的人往往会吃惊起来:“我为什么要擦鞋呢?我是从干净的路上走来的。”

于是社员就应当向他解释:

“不错,是这样,不过,你还会给我们带来不少的尘土。”

或者,象手帕这样的小事情也是一样的。怎能不给每一个人干

净的手帕！怎能不每天都换手帕！我曾看到过有的儿童之家，一个月才换一次手帕，这就是专门要教孩子用脏布来擦鼻子。其实这是很小的事情，一条手帕值不了几文钱。

再拿痰盂来说。每个角落里都放痰盂，这看起来好象就是表示卫生方面的某种成绩。人为什么要经常吐痰呢？孩子们会这样说：

“你想吐痰吗？到医院里去躺着吧，你病了，你害了一种骆驼病（骆驼病比喻流鼻涕口水——译者），身体好的人是从来不吐痰的。”

“我吸烟。”

“你是什么样的吸烟者？戒烟吧，好的吸烟者是从来不吐痰的。”

如果还有人继续吐痰，大家就会拖着他去找医生：

“这怎么啦？老是吐来吐去？”

医生总是会帮助解释的，让吐痰的人相信这只是一种生理上的习惯反应。

我看到过在有些儿童之家里放着痰盂。痰盂只是表示这是可以吐痰的地方，实际上，痰都吐在靠近痰盂的墙壁上。

在集体生活中，象这样的小事是很多的，集体里所应有的行为美，就包含在这些小事情上。不吐痰的孩子，不用两个指头擤鼻涕的孩子，就已经是有教养的孩子了。并且，这些具有原则意义的小事情，不只应当做得彻底，而且应当经过深思熟虑，使跟一般的原则一致起来。这里不可能列举许多的小事，但是，所有这些小事情，都能跟集体的一般活动结合起来，做得非常漂亮，非常好。

我的讲话就此结束。我认为，我跟我的同事们所做的，也是苏联许多人所做的。我跟其他的人所不同的，只是在这一点上，我感觉到有要求所有的人都这样做的那种需要，也就是说，我感觉到有传播这种普通的道理——不是我个人提出的，而是苏联许多教师所提出的那种普通道理的需要。

我认为，也有必要把这种普通的道理系统化起来。我在我们的许多学校里，看到过很好的经验，我们有有组织、有中心、有作风、有

妙处的优秀集体。我想,这种经验是需要加以系统化的。如果这种经验——伟大的苏维埃的二十年来的教育经验——将要失掉的话,那是很可惜的。正因为这样,所以,我认为我有责任尽可能多写点东西。当然,我可能常常会认识不清,可能常常犯错误。但是,这种事业是应当向前推进的,这种事业就是宣传和推广苏维埃教育经验。

我认为,采取某些措施,总结这种经验并宣传先进的苏维埃教育制度,这一切尤其是教育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的责任。

## 教育的目的

在教育理论中,最可怪的是教育工作的目的几乎变成被遗忘了的范畴。在最近召开的全俄罗斯教育科学会议上,对于教育目的却一字不提。好象科学的教育学与这问题无关似的。

在专门的教育学论文里,不容许只谈论一些教育的理想,只有在哲学论文里这样做才是合适的。对教育学理论家的要求不是解决理想问题,而是解决达到这个理想的方法问题。这就是说,教育学应当研究教育目的和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

我们同样不可以只关心新生一代的职业教育。我们也应当考虑在工人阶级专政的时代,在建成没有阶级的社会的时期,如何来培养苏维埃国家所需要的那种类型的品行、性格和个人品质。

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是怎样的情形呢?

革命初期,我们的教育界的著作家和演说家,在西欧教育的跳板上纵身一跳,跳得很高,而且很容易地就“抓住了”象“和谐的个性”这样的理想。后来他们又用“人——共产主义者”来代替和谐的个性,同时他们在灵魂深处却以“反正都是一样”的这种现实的想法来安慰自己。又过了一年,他们把理想扩大了,宣称我们应当培养“具

有充分主动精神的战士”。

无论是宣传家、学生和旁观者，一开始就都懂得，这样抽象地提出“理想”问题，反正谁也无法依据这个来检查教育工作的，所以宣传这种理想是不会有什麼危险的。

教育的活动场所愈来愈变成了儿童学的财富，到 1936 年，留给教育家的极狭小的“领域”只有分科教学法了。

儿童学几乎并不隐瞒它对于我们的目的漠不关心的态度。儿童学除了注定地追随生物学和遗传学的谬论以外，从“环境和遗传”中能得出什麼目的呢？

儿童学者们在玩这一套手法的时候，巧妙地保持着江湖术士的神气，但我们竖起耳朵听他们说法，不由得使人惊奇。这些人为什么这么渊博啊？其实，不仅是使人惊奇，人们还模仿呢！A. C. 布勃诺夫在他那篇载于《共产主义教育》（1936 年 5—6 期）的文章中提到这样一个情况：科学教育学的活动家加米涅夫和平克维奇曾在普通教育学的教学大纲说明书中写道，“教材排列的方法并不受个别抽象的‘目的’、‘题材’、‘问题’……等的支配，而是受一定年龄儿童的教育和教学的支配。”

如果年龄是教育学唯一的指导性的原则的话，那末，目的这个名词自然可以加上含有讽刺意味的引号了。但我们有权来问：为什么在我国人们突然喜欢用年龄、生物学、心理学等观点来看待新一代的教育呢？为什么对目的性这个观念这样蔑视？

对于这个问题可能有各种不同的答案。也许，这些原因只不过是对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目的漠不关心。但是，很可能，问题在于故意糟蹋我们的教育工作，使这个工作变成只限于个人自身的能力范围内的冷淡而空洞的个人训练：如果这个人有能力学会读书的话，那好极了，就让他去学吧；那个人有运动的嗜好——也不坏；如果一个人没有任何的爱好的话，那正合儿童学家的口味，——这是“不堪造就”的人，可以随便怎样对待他都行。

儿童学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最重要的方面——青年的教育工作——带来了难以估计的损害。这里所指的是理论的病症,并且甚至不是理论的病症,而是为儿童学所迷惑的、竟至于连看见理论的真实来源的能力都丧失了的那些理论家的病症。在这个意义上,这种病症是不能使人同情的。这种病症的本质,不仅在于保留到今天的儿童学原理的数量方面,不仅在于儿童学的权威所形成的某些空白,而在于我们思想的中毒。甚至在诚恳地批评儿童学的科学思想中仍然含有儿童学的遗毒。

这种毒害的传染是很深的。早在革命前在实验教育学的巢穴里就开始传染上了,实验教育学的特征就是对于儿童的研究与对他的培养之间的脱节。二十世纪初期,资产阶级教育学分裂成许多学派和“革新派”,它们永远在极端个人主义和不固定的、非创造性的生物学观点之间摆来摆去;当时资产阶级教育学摆出革命的科学的面孔,因为它打着跟官办学校的军事化的教育以及官样文章的虚伪作斗争的旗帜。但是,对于头脑清醒的人说来,当时就已经有根据来极度怀疑这种没有真正科学基础的“科学”。在那个时候已经可以看出它那非常可疑的生物学倾向,这些倾向本质上就显然企图修正马克思主义对人的看法。

每一个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教师,都非常厌恶实验教育学以及后来的儿童学的生物学的倾向。如果有人认为我们的教师都被儿童学弄糊涂了,这种想法是毫无根据的,谁被它弄糊涂,谁就不配当教师。

只有在一个条件之下,就是要坚决地改变对于我们国家和社会的政治目的的漠不关心态度,我们才能够执行党关于“恢复教育学和教师的权利”这一号召。

1937年4月,在全俄罗斯教育科学会议上曾有过一次专题报告:“教育工作方法的原则”。在这个报告中关于教育目的讲了些什么呢,如何根据这些目的找到教育的方法?

听了这个报告使人觉得,好象教育目的是报告人和听众早已熟

悉了的,只要谈谈达到这些目的的方法和手段就够了。只是为了作一个与其余的叙述部分显然有别的郑重其事的总结,报告人才宣称:

“它们(诸项原则)的基础,就是共产主义方向性这一原则,这是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辩证的教育原则,因为它能够决定整个教育工作的内容、方法和组织。”

而在结尾说:

“这个原则要求教师在工作中具有党性、政治警惕性,对于教育目的、手段和条件的深刻了解。”

在以前的教育学论著中,所遇见的也正是这样的结论。对于教师永远要求他们具有高度完善的修养,理论家总是喜欢说“教师应当”这几个字。而理论家本身的义务是什么呢?他本身对于“目的、手段和条件”有“深刻的了解”吗?也许有的,但为什么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他要把自己的财富秘而不宣呢?为什么他不把自己渊博的学问公诸听众呢?为什么他有时只在“快要落幕的时候”才朗诵似地说一些什么目的和条件呢?为什么报告的本身却使人看不见和觉不出这些目的呢?最后,究竟到什么时候,这种理论家才不说我们的教育应当是共产主义的教育这句人所共知的话来敷衍呢?

我在我所著的《教育诗篇》里,反对教育科学所存在的一些弱点,之后,四面八方都来责难我,说我不尊重理论,说我的教育方式是手工业方式,否认科学,轻视文化遗产。在我面前就有一份向专业科学会议提出的关于教育方法的报告。在报告里没有提起任何一个学者的名字,没有引证任何一种科学的原理,没有应用任何科学逻辑的企图。这篇报告实际上是普通的家常话,是从一些处世哲学和祝福中吸取来的东西。在报告的某些地方却露出著名的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的狐狸尾巴,顺便说一下,沙皇官方教育学认为他是所谓教育性的教学的倡导者。

这个报告一开头说道,我们的教育虽然有所改进,但我们还有缺点。这些缺点是:

- (1)在教师的教育工作中,没有可靠的制度和一贯性;
- (2)教育工作做得不经常,多半是当学生犯了个别过错时才偶然进行几次;
- (3)在教育工作的组织中,常有与教育脱节的现象;
- (4)儿童的教育、教学与领导的脱节;
- (5)有漠不关心的现象。

如果我们在这些缺点上再加上一种缺点,即对这种没有系统和没有一贯性的、偶然存在的、有许多“脱节”和“漠不关心现象”的教育工作朝什么方向、朝什么目的“进行”这一问题模糊不清,那末,不夸张地说,这些缺点就非常令人吃惊了。

作者承认:“教育工作实际上带有预防性质,在于跟学生不良的行为表现作斗争,也就是说实际上是在实现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教育理论的一个提纲。”“……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在学生犯了过错之后,教师的教育才开始发生作用。”

这样说来,我们只有羡慕那些犯错误的儿童。他们毕竟还能受到教育。作者似乎并不怀疑,对他们进行了正确的教育。我却愿意知道怎样来教育他们,对他们的教育是受什么样的目的支配的。至于没有犯错误的儿童的教育工作,就不知道“进行”到何处去了。

在报告时,报告人用了四分之三的时间叙述缺点,然后才提出自己的正面主张。这个正面的主张是四平八稳的:

“教育儿童,这就是说培养他们的优良品质(诚实、正直、诚恳、责任心、守纪律、爱学习、社会主义的劳动态度、苏维埃爱国主义及其他),并在这个基础上纠正他们的缺点。”

这个可爱的“科学的”清单中的一切都使我不胜狂喜。使我最喜欢的是“及其他”。因为在这些“优良品质”的前面是“苏维埃爱国主义”,所以就能够指望“及其他”也是不坏的。可是这些概念是多么的微妙啊:一方面是“诚实”,另一方面是“诚恳”,而“正直”,被那棉花似的美德包将起来填在两者之间。真是堂哉皇哉!当然,在最

初的时候,有哪个读者听见连“爱”都没有被忘记而不感激涕零呢,当然啰,第一步是“爱学习”。再请大家看一看“守纪律”这一条是费多大劲才写出来的吧。要知道这一条是郑重其事地写出来的,因为它前面是“责任心”。

不过宣言是一回事,而日常的工作是另一回事。在宣言中是共产主义教育,但在个别的场合,则是受了儿童学毫无生气的宿命论所毒害得一塌糊涂的玩物。

请看这就是去年“共产主义教育”杂志第三期“问答”栏里对涅姆琴科同志的解答:

“当儿童或者少年们犯了校规或者做了学校所不许做的事而必须和他们谈话的时候,谈话必须心平气和。应当使儿童感觉到,即使教师采用训育办法也决不是出于恶意,使儿童不把这看成报复行为,而只是看作教师为了儿童的利益来履行职责。”

这样忠告的目的何在呢?为什么教师应当装成神情冷淡的训导员那样,用“平静的”声音来教训学生呢?谁不知道,正是这种除了“职务”以外心灵空虚得一无所有的教师才最能引起儿童的反感,他们的“平静的”语气使人产生最可憎的印象呢?用这种冷淡的态度来对待学生,可能培养出什么样的优良的个人品质呢?

给波兹尼亚科夫同志的回答就更有趣了。在这个回答里用十分柔和的色彩来描写教员发现学生偷了同学3个卢布的事件。教师没有把他的发现告诉任何人,他只是单独地和偷钱的学生谈话。“班里没有一个学生晓得是谁偷了钱,并且连被偷的女孩子也不晓得。”根据“问答栏”的说法,犯了偷窃行为的学生,从那时候起就勤勉地学习和很好地遵守纪律。

“问答栏”赞叹说:

“你用同情的态度对待他,没有使他在全班的面前受到耻辱,没有告诉他的父亲,因而这孩子对你的同情是很感激的……要知道没有必要用偷钱的学生们的行为来教育你班上的学生,如要这样就会使

这个孩子遭受痛苦的内心创伤。”

为了要弄清这种“慈悲的”教育方法距离共产主义教育究竟多么远,值得对它讨论一番。首先要指出,类似这样“同情”的伎俩,在任何的资产阶级学校中,都是有的,而这在原则上是跟我们没有任何共同点的。这是一个教师、一个学生面对面地单独进行道德教育的一个平常例子。“问答栏”断定说,这样就是进行了良好的教育。也许是的,但这是什么样的教育呢?

我们来看一看那个犯了偷窃行为而向集体隐瞒的孩子吧。据“问答栏”的意见,这孩子“感激这种同情”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是不是这样呢?这孩子当时会这样想:他不受集体舆论的制裁,对他有决定意义的是教师的基督教式的宽恕。他没有体验到自己对集体的责任,他的道德是在同教师个别算账的方式中开始形成的。这不是我们的道德。这孩子在自己的一生会遇到许多人。难道他的德性也将建立在与这些人们的观点的偶然结合上吗?如果他遇到托洛茨基分子的话,他将拿出什么方法来抗拒这种遭遇呢?孤独意识的道德最多不过是“善良的”人的道德,而多半却是两面派的道德。

但这不只是关系一个儿童的问题。还有全班,就是说,还有一个集体,犯了偷窃行为的人是这集体中的一分子。按“问答栏”的意见,“没有必要用这个儿童的行为来教育全班学生”。这是很奇怪的事。为什么没有必要呢?

在集体中发生了偷窃,而教师认为对这样的事不动员舆论也能对付。他叫全班去随便猜想,随便怀疑某一个人偷盗,归根结底,教师是在班里培养学生对于这类事件完全漠不关心的态度;试问我们的学生将从什么地方获取和集体的敌人作斗争的经验呢?他们将从什么地方获得这种热情和警惕的经验呢?怎样使集体学会监督个人呢?

如果教师把偷窃的事件交给集体去审查,我甚至建议交给集体去解决,那时候每一个学生必定积极地参加集体的斗争,那时教师就有可能在全班学生面前展开一幅富有道德意义的图画,使儿童认识

正当行为的优良榜样。每个学生在解决问题和进行谴责时都体验到某些情感,从而他就得到道德生活的经验。只有在这样的集体生活中才可能有真正的共产主义教育。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整个集体和每一个学生才能感觉到集体的力量,确信它的正确,才能以自己的守纪律和诚实而自豪。自然,要采用这样的办法,教师必须有很大的机敏性和很高的技巧。

在这极其表面的分析中,我们逐步地确信:我们的教育活动,在个别的情形下不是朝着共产主义个性发展,而是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因此我们在培养个性、培养新人的个人细节的时候,应当高度地谨慎并且要具有敏锐的政治敏感性。这种政治敏感性是我们的教育技巧的首要特征。

此外,我们应当永远记住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人,作为最抽象的概念,在我们心目中无论多么完整,然而作为教育的对象来看,人毕竟是非常多种多样的材料,被我们所制成的“产品”也将是形形色色的。个人的一般品质和个别品质,在我们的设计中能够形成很错综复杂的形态。

最危险的事情就是畏惧这种复杂性和多样性。这种畏惧可能表现为两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力图对一切的人都一视同仁,把人硬套进一个标准的模型里,培养一系列同类型的人。畏惧第二种形式是消极地跟每一个人跑,毫无希望地企图用零零碎碎单独对付每一个人的方法来对付千千万万的学生群众。这是一种偏信“个别”处理法的病症。

这两种畏惧都不是苏维埃的,以这两种畏惧作为指导的教育学,不是我们的教育学,因为第一种畏惧使教育学接近于旧时代的官定规格,第二种畏惧使教育学接近于儿童学。

只有创造一种方法,它既是总的和统一的方法,又是使每一个单独的个人能发挥自己特点、能保持自己个性的方法,这样的组织任务才无愧于我们的时代、无愧于我们的革命。如果没有早已解决了个

人和集体问题的马克思主义,那么这样的任务决不是教育学所能担得起的。

在着手解决我们局部的教育任务时,显然,我们不应卖弄小聪明。我们只应很清楚地了解新人在新社会中的地位。社会主义社会是建筑在集体的原则上面的。在这个社会是不应有孤独的个人,时而像脓泡一样的突出,时而像路边灰尘那样渺小,而应当是一个社会主义集体的成员。

在苏联不可能有置身集体以外的个人,因此就不会有与集体的命运和幸福相对立的孤独的个人命运、个人道路和个人幸福。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这样的集体是很多的;广大的苏维埃社会团体完全是由这样的集体所组成的,但这并不是说,教师就没有责任在自己的工作中去找寻和发现完美的集体形式了。学校集体就是苏维埃儿童社会的细胞,它首先应当成为教育工作的对象。在教育单独的个人的时候,我们应当想到整个集体的教育。在实践中,这两个任务只有同时用一个共同的方法来解决才行。每当我们给个人一种影响的时候,这影响必定同时应当是给集体的一种影响。相反地,每当我们涉及集体的时候,同时也应当成为对于组成集体的每一个个人的教育。

实在说来,这些原理是众所周知的。但在我们的文献中没有对集体问题进行过认真的研究。应当有关于集体的专门研究。

应当成为我们教育的第一个目的的集体必须具有完全确定的性质,这种性质显然来自集体的社会主义性质。在这篇短短的文章里,所有这些性质,也许不能一一列举,我只举出主要的谈一谈:

(1)集体不只是用共同的目的和在共同的劳动中把人们团结起来,并且要在劳动的共同组织中把人们团结起来。这里所说的共同目的并非是在电车上或在戏院里个人目的的偶然巧合,而是整个集体的目的。在我们这里共同目的和个人目的的关系不是对立的关系,而只是整体(就是说,连我在内)与局部的关系,而这种局部一方

面只是我的,同时它又以特殊的方式归纳到整体里面。

个别学生的每一行为,他的每一成功或失败,都要看作共同事业的一种成功或失败。这种教育的逻辑应当真正地渗透在学校的日常生活里和集体的每一活动中。

(2)集体是苏维埃社会的一部分,同一切其他的集体有机地联系着。集体首先对社会负责,首先对整个国家承担义务,集体的每一个成员,只有通过集体才能参加社会。苏维埃纪律的观念就是从这里产生的。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学生都会懂得集体的利益,理解义务和荣誉的概念。只有在这样的结合中,才有可能培养个人和集体利益的谐调一致,培养荣誉感,这种荣誉感与旧时代骄横的强暴者的自大截然不同。

(3)达到集体的目的,集体的共同劳动、义务和荣誉,不能够成为个人偶然任性妄为的表现。集体不是乌合之众。集体是社会的有机体,因而,它拥有管理机构和协调机构,这些机构首先负有代表集体和社会利益的责任。

集体生活的经验不只是同别人做邻为伍的经验,这是有适当目的的集体活动的复杂经验、指示、讨论、服从多数、服从同志、责任心和一致性在这些活动中占有最显著的地位。

苏联学校中教师的工作有着光明而广阔的前景。教师的使命就是建立这种模范的组织,爱护它、改进它,把它传给新的教师。这并非在两个人之间讲道德,而是机智、聪明地领导集体正常的成长。这就是教师的使命。

(4)苏维埃集体是站在全世界劳动人民统一的原则性立场上的。这不只是人们日常生活的结合,而是世界革命时期人类战线的一部分。如果我们在集体里没有体验到有历史意义的斗争的热情,那末,所有上述的集体的特性是不会表现出来的。集体一切其他的品质,也应当结合这种思想来培养。集体随时随地都应当是我们斗争的榜样,它应当永远感觉到在它的前面有领导它走向真正幸福的

共产党。

从这些关于集体的原理中,就产生了个人发展的一切细节。在我们学校里,我们应当培养出精力充沛的和有思想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成员,他们任何时候都能在自己生活中毫不动摇地为个人的行为找出正确的准则,同时他们能够要求别人也有正确的行为。我们的学生,不论是谁,在生活中从不作为某种人格完善的体现者出现,只作为一个善良的或正直的人出现。他首先应当经常表现为不仅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且也对同志的行为负责的集体成员和社会成员。

纪律是特别重要的,我们教育家在这方面犯的错误最多。直到现在为止,我们有人把纪律看成人的很多特性之一,有时仅仅看成一种方法,有时只看成一种形式。在肃清了一切神秘的道德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里,纪律再不是技术上的东西,而必须是道德的范畴。因此,强制性的纪律,对于我们的集体说来,是绝对背道而驰的,但是现在还有许多教育家因为某种误解,把这种强制性的纪律当作教育工作的万应灵丹。只用禁止的方法来表现的纪律是苏联学校道德教育最恶劣的方式。

在我们学校的团体中,应当有在我们党内以及在我们整个社会中所有的那种纪律,即应当有向前运动和克服困难,特别是克服存在于人们之间的那些困难的纪律。

在报纸中,很难提供长篇大论的文章论述人格教育的细则,这需要有专门的研究。显然,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革命给这种研究提供了最详尽的材料。我们的教育学,只要一放弃从儿童学得来的对于教育目的的那种惰性,必然会很快地表述出教育的目的。

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教师大军的日常工作中,虽然甚至现在还有儿童学的残余,但已经积极地表现出合乎目的的思想。每一个优秀的教师,每一个诚实的教师,都看见了摆在自己面前的公民教育的伟大的政治目的,并为达到这个目的而顽强地斗争。正是由于这一点,我们的造就了如此卓越的青年一代的社会-教育工作,才获得

真正具有世界意义的成就。

因此,把理论思想也加进这种成就里面来,那就更适当了。

## 苏维埃学校里的教育问题

如果某一个学生有了某种不良行为,使家庭、教师、甚至民警机关苦恼得没有办法的时候,一般地说,通常总是要发生这样的争论的:

“当然,这是因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对学校的帮助不够。”

“那么,少年先锋队组织呢?工作得也不算好……”

“请问,校长是干什么的?他实际上只是一个总务主任,财务、取暖设备和修缮等总务方面的工作,整天把他忙得不可开交,谁还来管纪律方面的事情呢?”

“父母也够好的!他们什么事情也不管。”

“请原谅,难道教师就尽了责任了?教师只埋头看练习本,简直就不管教育方面的事情。”

但是,必须恢复苏维埃学校的名誉,必须使苏维埃学校免受不应有的指责——责备它软弱无能是完全不应该的。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通常只有当发生了令人遗憾的事故的时候,只有当刑法要来“帮助”的时候,一般地说,教育问题才被真正当作问题来看待。如果没有发生事故——学生没有从电车上摔到轮子下面,没有用弹弓打伤同学的眼睛,那就不会想起教育问题来。学校教育学的任何一部分,都不象正常的教育工作方法那样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教育理论家们认为,一切教育措施只是提高学业成绩的一种辅助性的办法——不过如此而已。

有一些实际教育工作者,对于没有结合成完整的教育系统的许多经验性方法认识不清。我们的优秀教师对于培养苏维埃儿童的意

志和制定苏维埃儿童的内在行为准则的极重要的方法都知道得很清楚,他们在这一方面有了独特的发明,有了重大的创造。但是,教育行政机关对此鼓励得很不够,研究得尤其不够。

学校教育工作中没有确定的方针、教师力量涣散和害怕大胆的创造,这些情况甚至会使最有才能的教师的效率降低。至于那些没有卓越的教育技巧而又独立进行工作,因而找不到需要的方向路线、不能够掌握自己学生的班主任的工作,自然就更差了,这样的班主任在我国有成千上万。然而,拙笨的、沉默寡言的理论家们却带着愁眉苦脸的面色“清算”了儿童学的错误,并很后悔地从教育文献中抛弃了伪科学的尘渣,因此,一直到现在,对于学校的实践丝毫没有提出积极的意见,虽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教育思想和列宁斯大林的言论、著作,已经给教育指出十分明确的方针,并使教育上的创造性工作有了广泛的发展可能。直到现在,他们也没有帮助教师懂得,一个教师集体,要有统一的工作方法,要不但能集体地为“自己的”班级负责,而且能为整个学校负责;如果没有这样团结一致的教师集体,那么,所谓正常的学校教育工作是很难想象的。

值得我们国家自豪的我国学校网,在教师方面是一群涣散的教师个体,在学生方面是一大批零星的班级,只是因为在一个共同的校舍里,彼此接近,才机械地有了联系。无论我们的教师、儿童、家庭和苏维埃社会团体,还都不知道学校应该是一个统一的集体,应该是一个整体的机构。许多不幸的根源,都隐藏在此。

例如一个孩子在莫斯科第 575 学校读书,575 这个没有个人名称的天文号码,是不会引起他的任何情感的。一个学生在一大群同学中间(在学校里和他一起学习的,往往有 2,000 名左右的儿童)会有些茫然不知所措。他只知道自己的班级。在一个班集体和苏维埃社会之间,没有作为联系环节的一个较大的集体,没有一个作为统一的社会有机体的学校本身。

教育理论只注意一些无关紧要的琐碎事情,却顾不上研究这一

重要问题。其实,很显然,每一个学生不仅应当关心自己班级这个小圈子的利益,而且也应当受到学校的共同目的的鼓舞,应当能亲身体验到学校的共同快乐。

通常,学校里的学生集体不应当超过1 000人。应当把大规模的学校划分开,以便每一所学校都能有自己的面貌,儿童都能互相认识,教师在走廊上都能认识他们所教的学生,整个学校集体在学校的节日里、文艺晚会上和各种小组里能够友好地交往,整个集体在共同的创造性工作中能够相互友爱和尊重。只有建立了统一的学校集体,才能在儿童的意识中唤起强有力的舆论,舆论是起调节和约束作用的教育因素。

对儿童采取个别对待的方法,并不是意味着整天为教育孤独任性的儿童而奔忙。不能以个别对待的方法为借口,搬出庸俗的个人主义教育来。有这样的教师,姑息学生的缺点,盲目地放纵学生顽皮任性,不去培养和改造学生的性格,只是一味地迁就儿童。这样的教师是软弱无力的。教师要善于对这样的儿童提出坚定不移的要求,因为儿童对集体应负有一定的责任,儿童对自己的行为也应负责。对儿童采取个别对待的方法也是为了适应儿童的个性特点,把他们培养成自己集体的忠诚的、可靠的成员,培养成苏维埃国家的公民。

当我们渴望有良好纪律的时候,我们却害怕真正纪律化的过程。实际上,我们还是有点相信那种声名狼藉的自我纪律。学校从开学的第一天起,就应当向学生提出苏维埃社会的那种坚定不移的、无可置辩的要求,就应当教学生懂得行为规范,教他们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该受奖励,什么要受惩罚。

有很高威信和值得敬爱的学校集体的舆论所起的监督作用,能锻炼学生的性格,培养学生的意志,能使学生养成使个人的行为有利于社会的习惯,能培养学生为自己的学校、为自己是这个光荣集体的成员而自豪的精神。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儿童的行为才不至随外部环境而转移——在好的儿童中间,自己就是好儿童;在捣乱分子中

间,自己就成了流氓无赖。这时候,儿童就能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做,就能知道自己所尊敬的集体为什么夸奖自己,又为什么申斥自己。这样,就能使儿童具有经过锻炼的那种坚定的和不屈不挠的性格,这样,就能够培养起儿童的公民荣誉感和责任感,就能够使儿童认识自己对别人应尽的义务。

儿童集体里的舆论的力量,完全是一种物质的、可以切实感触到的教育因素。我在领导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公社的时候,有一次我曾派了50个学生(以前的小偷和流浪儿)去参加克拉马托尔工厂的开工庆祝会,当时我并没有担心。我知道,公社给予他们信任和荣誉,他们是不会辱没公社的名誉的。我们的社员有这样的一条规定:乘电车时不占座位,因为,在车上经常能遇到应当给让座的人。如果有人揭露某一个社员破坏了公社这一条尊老扶幼的道德训条时,他就会羞愧得无地自容。

只有在缺乏有组织的舆论的学校里,才能有一筹莫展的教师,他们给不听话的学生作了如下的评语,因而也就侮辱了自己:

“捣乱调皮,弄脏东西,打破玻璃,说话粗野,在同学的脸上抹颜色,由于自己的无赖行为,不仅损害了同学的名誉,而且也损害了教师的名誉……”

这样的评定是有诽谤性的。被描绘成戏剧中的恶棍的学生,也损害了教师的名誉。

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实际上就等于给自己作了判决,证明自己是庸碌无能的。而只谈理论的教育学又不敢研究教育措施和制裁在学校日常生活中相互作用的问题,其实,制裁如能适当地应用,也具有同样的教育作用。

教师们甚至连“惩罚”这两个字也害怕起来,这是很奇怪的。在我们的学校里,甚至连警告都不知道。有一些马尼洛夫式的教师们,在梦想着这样的事实:如果用不着采取任何的影响措施就能提高纪律性,那该多好啊!

直到现在,一些理论家们还把类似的虚伪的人道主义当作一种漂亮的论调。然而,这种没有原则性的含糊说法,对学校是有很大害处的。教师们害怕使用惩罚,是因为担心会使旧时学校的作风复活。但是,谁能说合理使用的合理惩罚,能够使我们受到沙皇学校恐怖的威胁呢?要知道,在我们的教师和学生之间,在我们的学生和学校领导之间,不存在社会的鸿沟和对立。在旧时代的学校里惩罚变成了暴力,不能解决冲突,而只是加强冲突,埋下了祸根。我们的惩罚制度,本质上和残酷地侮辱学生人格的那种惩罚办法根本不同,我们的惩罚制度,毫无疑问会起积极的教育作用。

合理的惩罚制度不仅是合法的,而且也是必要的。这种合理的惩罚制度有助于学生形成坚强的性格,能培养学生的责任感,锻炼他的意志和人格,以及抵抗引诱和战胜引诱的能力。

学校集体的社会性因素的积极作用,教育措施和惩罚制度的结合,都要求必须加强学校的教育中心。只有校长才是这样的中心,他是学校里责任最重大的一个人,他是由国家委托的领导人。我们的校长们都是过多地注意学校里的总务方面的事情,其实,校长首先应是学校中唯一的、绝对有权的教育者。所有其他的学校工作人员,都应在校长的直接领导和直接指示下进行工作。

但是,校长的教育技巧不能仅限于单纯地做行政工作。校长的教育技巧正在于:在保持严格的从属关系和一定的责任制度的原则下,给予学校的社会力量、舆论、教师集体、学校刊物、个别人的积极主动和广泛的学校自治制度以广阔的活动范围。

现行的班长制(只是高年级里有),还不能够保证学生都能积极参加学校生活的各种组织。然而,学生的自治组织,却能成为最积极有效的教育手段。

在有学校舆论和得到全校学生自治机构支持的全校纪律的情况下,教师的教育工作就容易得多了。

对学校学生自治机构的领导应当是校长首先要注意的事情。应

当抛弃旧时代教师的阴郁面孔,抛弃“成年人”过分严肃的态度。现在这一点较为容易做到,因为我们的少年先锋队组织早已想出了许多很好的、具有社会目的的、并且适合儿童自然需要的办法。儿童的自然需要就是想用游戏的因素,用表示隆重的东西——证章、旗帜、音乐等来点缀生活。对于能想出新办法的教师来说,在这里有着广阔的、能取得巨大成效的活动余地。

我们的祖国有权要求苏维埃学校作出更大的努力来巩固千百万学生的自觉纪律。

## 学校里学生的性格教育

3月23日《真理报》上刊登的《苏维埃学校里的教育问题》这篇供讨论的文章,引起了广泛的反响。讨论这一问题的信件和文章,还在不断地收到,写信的人主要是家长、教师、党的工作者和校长。只有教育学教授,那些首先应当关心教育问题的人,却没有寄来任何一句评语。这种异常奇怪的沉默该怎样解释呢?

《教师报》对这篇文章也没有评论。关于这点,伊凡诺夫市第40中学化学教师伊林同志这样写道:

“《教师报》的独特做法就是不说学校中的缺点,但却就同一方面来描写一些相同的奇迹:学生x耍流氓,在课堂上捣乱,打同学,破坏学校财产,侮辱教师。女教师了解到他喜欢军事时,介绍他认识了一个中尉。转瞬间这个学生既在学习成绩上,也在行为上都变成了优秀生。可怜的编辑部它就没有注意到,只有不走运的报刊工作者和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才会满意地、张着嘴听这种报导……”

重视我们学校和我们儿童前途的人们,对《苏维埃学校里的教

育问题》这篇文章,都发表了评论,这是值得高兴的事。首先应当指出的是,这些评论反映出对教育问题有了深刻的认识,懂得我们学校的实际情况并善于对它进行分析。许多人在他们的信件里所提出的种种意见,要比教育杂志里的许多文章更合乎道理,更具有苏维埃的智慧。

根据这些信件,可以直截了当地肯定说,在我们的社会里,对于学校教育问题,并没有分歧的意见。大家一致认为我们的学校有做出出色工作的一切条件,认为我们的儿童都是教师们可以培养的好材料。但是,虽然有这样幸运的条件,我们学校里的教育工作,却常常是做得很不好的……

所有的写信人对学校的情况都有一致的认识,都赞同他们对学校教育提出的要求,这些要求就是:要有全校教师和学生的统一的集体,把学生过多的学校分成较小的学校,加强教育中心,向学生提出坚定不移的要求,培养学生的意志和责任感,要有固定的生活制度和纪律,要有惩罚制度,要使学校里的舆论起积极作用,要使学校和国家社会生活有更多的联系。

在这些信件里,对于学校教育工作的个别细节,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意见,我不可能在这篇文章里详细地叙述它们。其中,有的人指出在争取优异成绩方面所发生的许多明显的偏向,这些偏向是:在竞赛思想上存在有麻木不仁的官僚主义,一味地追求数字和表报。其结果,就成为欺骗行为得到发展和学生及整个班级学风日益不正的起因。

另一些人指出,对儿童学的恐惧有时显得荒谬:否认儿童有懒惰的可能,害怕说研究儿童,忽视某些儿童实际上只有中等能力或能力不高的事实,甚至于不允许有这样的想法:在某些情况下,让儿童留级是有益的也是必要的。

这些意见是完全正确的。任何的工作也不象教师的工作那样需要有随机应变的灵活性。不允许对各个学生使用任何的刻板公式。

当然,这完全不是说学校应当变成一种“个别对待”的涣散的集合体,象我们现在常常看到的那样,没有任何东西联系着。争取成为模范的苏维埃学校,不应当是争取死板不变的“绝对方法”,而应当是争取在我们的学校里树立真正的苏维埃作风。

不管多么令人失望,却不得不承认,我们的教育思想直到现在还没有想到把斯大林同志关于革命胆略和工作中求实精神相结合的著名的公式应用到学校工作中。

我同意对《真理报》那篇文章发表评论的许多人的意见,可以肯定地说,在我们的每一种教育活动中,在我们的各种组织措施里,充分而又彻底地贯彻斯大林同志这一纲领性的原则,就能使我们把我国学校提高到资产阶级学校的任何革新所不可能达到的那种高度上去。

“俄国人的革命胆略是能消除顽固习气、守旧思想、保守主义、思想停滞和盲从老旧传统态度的一种消毒剂。俄国人的革命胆略是一种兴奋的力量,它能唤起思想,推动前进,破坏旧物,开展前途。没有它,便不能前进一步。”

斯大林同志指出,如果不把革命胆略和工作中的求实精神结合起来,那么,革命胆略就可能堕落为空洞的“革命的”马尼洛夫精神……

我们可以确信,正是在我们的教育领域里,可以找到这种马尼洛夫精神的许多实例。

俄国人的革命胆略,应当使我国学校不同于任何其他国家的学校。我们的对人的态度,拟定教育工作必须达到的伟大目标,进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教育,培养社会主义社会的积极活动家,培养出经过锻炼、忠于革命、愉快而又严肃的整代整代的活动家——要进行这些工作,难道没有革命胆略就能够达到目的吗?

在我们的教育工作中,还存在着许多缺点:不够严肃认真,不够坚定有力,没有合理的根据,没有明确的目的,工作细节还不尽合乎

逻辑。正因为此,当时曾“幻想杜撰”式地想出了这样空洞有害的公式:“惩罚培养奴隶。”可是,谁也没有在实际工作中检查过这个公式究竟对不对。其实,能培养出奴隶来的恰恰不是惩罚,而是任性妄为和毫无节制的专横无礼,这种态度会使我们的某些教师培养出流氓无赖来。

关于惩罚问题,许多教师认为是一个最困难的问题。它所以显得困难,是因为一提到惩罚就会令人想起旧时代的学校,而关于惩罚方面的新的经验我们又没有。

一方面,要坚决抛弃在惩罚问题上的一切恐惧心理,另一方面,又要坚决抛弃以某种形式沿袭沙皇时代学校旧作风的一切企图。那时候,只要一提到惩罚,就会使听到的人毛骨悚然,胆战心惊。

有些人顶多是同意学校里采用惩罚是合适的,但同时就会加上许多注解,结果,实际上还是和不赞成采用惩罚一样:只有在极其例外的情形下需要惩罚学生,99%的学生是不能惩罚的,因为他们已经够好的了,并且,目前我们已经是有惩罚的,例如批评、警告、请家长来谈话等等。

最后的说法是正确的,但是,有时候是在一种意想不到的情形下才是这样。现在搞几段读者的来信看看:

“紧急通知家长到学校里来,对他说:

‘你的儿子是个无赖,玩钢笔尖,拉女孩子的辫子,必须开除。’

不幸的家长回家去了,满脸阴沉。

过了几天以后家长又来问:

‘喂!我的儿子现在怎么样?’

‘很不错,现在已经安静了。’

家长附在教师的耳朵上,报告了他的‘教导’情况。教师不好意思地笑了。于是,一切都没有问题了。”(鄂木斯克市,П·布拉齐克)

“老实说,只是对破坏秩序的学生才存在不惩罚制度,而对好学生我们却毫无局促地借落后学生的手十分粗暴地(唾吐、推撞、辱

骂、制造不能进行正常学习的条件、喧哗、叫嚣、上课时骂街等等),而且毫无理由地,在找不到任何过错的情况下加以惩罚。然而,马尼洛夫式的教师却不愿意看到这一点。”(伊凡诺夫市, B·伊林)

“我的女儿每学季的成绩都是很好的,已经连续四年了。但是,今年有的男同学常使她苦恼,常常对她‘友好地打打闹闹’,这使我很感不安。我和教师、教导主任谈过以后,他们对我说:‘既然你女儿是优秀学生,那你就白白地担心了。’”(喀山铁路亚那乌尔车站,季莫欣)

换句话说,如果学校里没有惩罚,就必然会使一部分学生失去保障。难道这种情况就是无法解决的难题吗?

其实,我们可以拟定一些影响学生的措施,这些措施同时也就是一种惩罚,例如单独地批评,在班上批评,在学校全体大会上批评,学校发布命令提出警告,收回学生证等等。

惩罚是一件非常细致的事情,不能够把它交给每一个教师。因此,只有校长才能有惩罚权。当然,对校长来说,这个担子是很重的。但是,这一条规章本身所具有的权威性,无疑地是很有益的。一般地说,在惩罚以前,不应当对学生使用压制手段,需要的是跟有过失的学生单独谈话,在其他的同学在场时和他谈话,要求他在全体大会上作解释,不过,在全体大会上只应以判定某一同学是不是有过失为限。

确定整个惩罚制度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尽可能多地尊重一个人,也要尽可能多地要求他。

如果不能保证有合理的集体组织(各部分间明确的相互关系,校长的坚定意志、舆论、自治机构的积极工作和校外活动等),如果学生不以自己的学校而自豪,不爱护学校的良好名誉,那么,任何一种惩罚制度也不会带来好处,当然,这是无须证明的。成功的秘诀不在惩罚而正在这里,但是,在惩罚中要能体现出对学生的要求。

只有遵守这一切条件,我们的工作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我们工作的内容就是要积极地、有目的地培养学生的性格。

以布尔什维克的精神来帮助教师从事培养千百万苏维埃学生的

性格的工作 ,是各教育人民委员部 ,首先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部和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必须承担的义务 ,而这两个机构 ,对于儿童和青年的教育问题 ,目前仍然还研究得很不够。

## 我的教育经验中的若干结论

亲爱的同志们和同事们！

……今天我们只谈教育方面的问题 ,如果大家同意的话 ,我就不说别的 ,只极简短地谈一谈我的经验中的若干结论 ,并请你们作为专家和我的同事来注意我的这种经验……

我在乌克兰和莫斯科的时候 ,经常和教师团体发生接触 ,但我记得还没有遇见过教师的观点和我在《教育诗篇》里所持的观点有绝对分歧的情况。

但是 ,直到现在我还没能看到这样的十年制或七年制学校 :在那里 ,我的教育主张能够象在儿童工学团和公社里——特别是象在我领导的公社里——一样深刻地得到体现和被人们所了解。

教导曾经流浪过的儿童的工作方法跟教导正常儿童的工作方法 ,在某些地方很可能有所不同。但这只是可能罢了 ,实际上我直到现在还是不相信这一点的。为什么不相信呢 ? 因为按我的工作逻辑 ,我从来不是从违法和流浪性这一因素出发。我认为 ,如果我确定自己的逻辑方法 ,是以违法或更进一步以犯罪性质为主要前提的话 ,那么 ,我因此就会脱离我们苏维埃的思想体系 ,而要接近龙勃罗梭的思想体系了。因此 ,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 :儿童既然犯了罪过 ,性格上就会向犯罪这一方面发展 ,从这一点出发 ,就应当采取相应的办法。我所以没有这样想 ,是因为我对人的信任 ,或者更确切地说 ,是

因为我对人的热爱。

有一些批评家们这样指责我：“为什么你那里所有的男女青年和所有的人都是美好的呢？”这样的指责使我非常吃惊，我反过来问他们：“难道一般地说，所有的人都不美好吗？”的确，最低限度我认为青年人是美好的。要说青年男女是丑恶的，那是很难想象的……如果青年受到了合理的教育，能合理地生活、工作和娱乐，他们就会永远是美好的。

我认为，每一个苏维埃教师，每一个苏维埃人，都应当要求每一个正常的苏维埃公民和儿童有正常的行为，只有在肉体上和精神上有了损伤的那些人，我们才认为他们是不正常的人。

我在自己的实际工作中，对我的学生提出了范围广阔的和不折不扣的要求，我认为这种要求应当成为正确的苏维埃教育学的规律，这就是坚定的、明确的、直接的和绝对的要求。

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有人以为这种要求有时候（可能是永远）会有冒险性。因此，害怕提出这样的绝对要求。理由是：如果一个人大嚎大哭起来该怎么办？如果一个人“跑去上吊”该怎么办？正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害怕心理，儿童学和儿童学的倾向才能发展起来。儿童学和儿童学的倾向是什么呢？这就是不要提出任何冒险性的要求，而要应用这样的一些方法，使谁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使用这些方法，并且要使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无法确定谁有了过失。形式上是教育了一个人，结果造就出来的完全不是我们需要的人。能够向建立这种方法的教育学教授提出要求吗？不可能。那么，能够向教师提出要求吗？也不可能。因为，这里没有任何的行动，只有对行动的讨论，只是想提出论据。

这样，只要我们拒绝了由我们的公民要求所产生的那种逻辑，那我们因此也就拒绝了教育工作。

我的基本原则（我认为这不仅是我的个人的基本原则，也是所有苏维埃教师的基本原则）永远是尽量多地要求一个人，同时也要尽

可能多地尊重他。实在说,在我们的辩证法里,这两者是一个东西:对我们所不尊重的人,不可能提出更多的要求。当我们对一个人提出很多要求的时候,在这种要求里也就包含着我们对这个人的尊重,正因为我们向他提出了要求,正因为他完成了我们的要求,所以我們才尊重他。

如果这个原则应用在教育工作的各方面,那么我们就看到教育工作开始有了严格的和明显的组织形式了。我再重复说一遍:提这样的要求,总是会有些冒险性的。

不久以前,《真理报》登载了若干论述生产中的冒险问题的文章,也许大家已经注意到了。应当说:对我们作教师的说来,当然,这样的问题看来是很可担心的。

可以拿物资来冒险,可以拿产品来冒险,虽然在与物资有关的事情上去冒险是犯罪的(难道当我们制造飞机或坦克时,也可以冒险吗?)。但是,如果我们要在冒险中力求达到正确的苏维埃的目的,那我们就不害怕冒险。

在教育过程中,可能有这样的冒险吗?

如果我们向坐在书房里读书的人提这个问题,那么,他就会回答说:“在教育工作中是不能够冒险的。”如果来问实际从事教育工作的我——教导着好几十个生龙活虎的人的我,那我就回答说:“必然要冒险的,因为拒绝冒险,那就等于拒绝创造。”在我们的教育工作中,我们有权利拒绝创造吗?不能够,我们决不能拒绝教育工作中的创造性。因此,我确信在教育工作中,教师和所有其他的工作人员一样,也有权利勇敢行动,甚至有权利作冒险行为。

我们就举一个简单的平常事例来说吧。其实,甚至不必举任何的事例,只拿教育杂志里所登载(虽然是三年以前的事)的一个问答栏里的问题来谈就够了。教师提出问题:“应当用怎样的语气跟破坏纪律的学生谈话呢?”问答栏的编者象对全苏联的人回答问题似地说:“所有的人都应该用温和平静的语气和他谈话,以便学生知道

你们所以指责他 ,并不是因为你们对他生了气或动了怒 ,而只是因为你们应该这样做。”对破坏纪律的学生应用这样的方法 ,当然不会冒任何的险。这里怎会有冒险可言呢?不管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譬如学生以后又破坏了纪律 ,如打破玻璃 ,侮辱教师和同学 ,逃学 ,耍无赖等) ,如果我们来问这个按问答栏编者的意见办事的教师 :“为什么你那里会培养出这么无赖的孩子呢?”那他就会回答说 :“我也不知道。我应用了正确的方法 ,我和他平心静气地谈话 ,我曾对他表示出我并没有生气 ,我已经作了我应作的一切。”但是 ,如果因为学生破坏了纪律 ,破坏了集体的利益 ,这个教师动怒起来(因为有一些学生的行为常常能够引得教师发脾气的) ,对学生表示出他生了气 ,不能够再平心静气地讲话 ,那么 ,这样就能制止住这个学生 ,使他不重复恶劣的行为。而这样做就会有冒险性。会有什么样的危险呢?会有因为缺少所谓教育机智而招来的危险。现在 ,你动怒了 ,向学生流露出你生了气 ,他有了某种变化 ,他的心里开始有了转变……

但是 ,我深信 :无论冒险问题 ,无论教育机智问题 ,只依靠这两方面——一方面是教师 ,另一方面是学生——是解决不了的。我和儿童学者、旧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者之间的一切争辩 ,都是由教师和学生这两方面的概念产生的。我重复说一遍 ,只有教师和学生这两方面是不行的。应该有什么呢?应该有学校、组织、集体和整个工作的共同作风。如果在你们的学校里有了正确的作风、正确的步调、正确的集体 ,那么 ,任何的冒险都是不可怕的 ,而且 ,一切的冒险都是必要的和可能的。

我的理论的第二个原则是 :任何的方法都不能够从教师和学生这两方面的概念里得出来 ,而只能由学校和集体组织的共同概念里得出来。

在这种情况下 ,想通过向每个教师介绍个别对待学生的方法来解决教育工作中的问题是不可能的 ,只有介绍整个组织的形式、作风和步调 ,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在我们苏维埃教育中所需要的第一个这样的形式就是集体。我们的教育任务就是要培养集体主义者。我们从这里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到现在为止，许多人只作了这样的结论：对学生应当讲集体，要在政治观念和政治思想方面教育学生。但是，只有当你们能够在实践中遵循这些思想和原则的时候，才能正确地领会它们。而为了使我们的政治教育实际上能够立即在我们的学生和教师的生活中体现出来，没有集体是绝对不可能的。如果我们在逻辑体系上一笔勾销了集体的话，那么，我们苏维埃的教育逻辑就将不堪一驳。

那么，我们就要提出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是集体呢？

我们不可随便拿一群个别的人作为集体。集体是活生生的社会有机体，它所以是一个有机体，就因为它那里有机构、有权能、有责任、有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依赖，如果这样的因素一点也没有的话，也就没有集体了，而有的只是随随便便的一个人群罢了。因此，我在自己从事苏维埃教育工作的十六年中，把主要的力量都用在解决集体和集体机构的建立、解决权能的制度和责任的制度等等问题上。

同时，我又得出一个结论。如果没有教师集体的话，是不是可以培养出集体——或者最低限度培养出一个儿童集体呢？对这一点，我过去和现在一直不能想象。其实，毫无疑义，如果有十五个教师每人都根据自己的能力和意愿来进行教育工作，那是不能够培养出集体来的。因此，也应当有教师集体，这是很明显的。

可是，关于教师集体我们写过些什么东西呢？我们——和你们大家——关于教师集体能知道些什么呢？如果从科学的观点向我们提出关于教师集体的问题，我们是连一个字也回答不出来的，虽然我们都清楚地知道，哪里有集体，那里的工作就进行得很顺利，那里也许连纪律问题都不会发生。

我再进一步来讲。我准备来分析这样的问题：关于教师集体形成的时间长短问题，关于每一个集体成员从事教育工作的资历问题。

因为,如果你们的集体是由从事教育工作仅仅一年的教师构成的,那么,不成问题,这将是一个力量很弱的集体。因此,还有教师适当配置的问题,即应当有若干老教师,有若干新教师,这也是一个科学的教育学问题。

我在工作中,曾遇到过这样一件不好解决的事情:我们学校有一个教师缺额,该请谁来担任呢?上级机关常常给我介绍人:“请用我们给你派来的人吧!”我问道:“你们为什么偏要派这个人呢?”“正好有这样一个人。”教师集体的调配上的这种随机原则,有时是成功的,有时又是失败的。

同志们!我是把你们作为我的同事向你们讲话的,因为,关于这些事情是需要长时间去写、说和筹划的。不过,在实际工作中,有时候根据自己的主观判断,不去请一个有经验的教师,而去请一个年轻的女教师,往往还会更好一些。这样的事情,是所有负责的校长所熟知的。

原来,教师集体和儿童集体并不是两个集体,而是一个集体,而且是一个教育集体。同时,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教育个别的人,而要教育整个集体,这是正确的教育的唯一途径。我自己从十七岁起就当教师,我曾长时间地想过:最好先把一个学生管理好、教育好,然后再教育第二个、第三个、第十个,当所有的学生都教育好了的时候,那就会有一个良好的集体了。可是,后来我得到一个结论:有时不应当跟个别学生谈话,而要向大家公开讲话,要采取这样的方式——使每个学生都不得不参加共同的活动。这样一来,我们就教育了集体,团结了集体,加强了集体,以后,集体自身就能成为很大的教育力量了。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使我相信这一点的,并不是在高尔基工学团(我在高尔基工学团的时候,许多方面都是一个独裁者),而是在捷尔任斯基公社。在捷尔任斯基公社里,我已经获得了这样的成就——集体本身变成了非常有创造性的、严格的、确实的和有教养的力量。这样的成就,不能够靠命令取得。这样的集体,不可能在两三

年内就建立起来,而要经过好多年才能够建立起来。这是可贵的、非常可贵的东西。但是,当这样的集体建立起来以后,那就必须小心地爱护它,那时候,整个的教育过程也就能够很容易进行了。

然而,这里又产生了一个问题,我们教育学的问题,怎样保护集体呢?请想象一下,你们,一个教师小组,集体的教育者已经建立了传统,制订了大家都相信的法规,已经做到了使每个人在自己生活的每一分钟里都深切地感到集体的存在。于是,你们就面临一个任务:怎样才能做到不使这些成果丧失呢?集体是最娇嫩而又有力的东西。一旦遇到任意胡为的人,就可能使它瓦解,败坏,搞乱它的某一部分。怎样才能使集体免遭任意胡闹的人的危害呢?要知道,这种人是可能从任何一个角落里跳出来的,他向你拿出委任状,并对你说:“一定要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而这里需要的却是我们的共同形式,我们苏维埃的一般传统。它们在我们这里也已经培植起来了。现在,在很多情况下这些东西还不大健康。但我相信,我们不久就将具有这样一些教育工作的传统,它们不是很快就能被毁坏的。它们虽不很多,但我们已经有了,它们正在干着自己的事。

这就是我关于集体方面所要说的话。在这里,也就发生了关于纪律的问题,这是我们教育方面今天最重要的问题……

除了集体以外,还要提出教师的技巧问题。老实告诉大家,无论过去和现在,我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一个多么有才能的教师。我说这话,完全是真实的。但是,我工作了很久,过去和现在我一直认为自己是具有工作能力的,我终于掌握了教师应有的技巧,起初我甚至不敢相信是不是真的有了这样的技巧——或所谓教育的才能。但是,我们真能够依靠这种才能吗?我们能有多少这样有特别才能的教师呢?为什么要让一个孩子在没有才能的教师手下受罪呢?我们能不能依靠才能来建立我们苏维埃全体儿童和青年的教育呢?不能够这样的。我们应当只谈技巧问题,也就是应当谈教育过程中的实际知识,应当谈教育能力问题。我根据自己的经验,得到了这样一个信

念 :以能力和熟练的业务水平为基础的技巧 ,才能够解决问题。

但是 ,这里我又获得了一些新的看法 :我认为 ,高等师范学校应当用其他的方式来培养我们的教师。如怎样站、怎样坐、怎样从桌子旁边的椅子上站起来、怎样提高声调、怎样笑和怎样看等等“细枝末节” ,在我的实际工作中 ,对于我和对于你们这许多有经验的教师一样 ,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谁也没有教过我们这些事情 ,但这是可以教也应该教的事情 ,这里就有很多的技巧 ,也应该有很多的技巧。这里 ,我们就会触及众所周知的演剧方面以及舞蹈方面的技巧 :运用嗓子的技巧 ,音调、视线和动作上的技巧。这一切 ,对教师说都是很必要的 ,如果没有这些技巧 ,那就不能成为一个好教师。有许多技巧上的特点 ,有许多真正的习惯 ,有许多不同的方法 ,这些都是每个教师和每个教导员必须了解的。

大家都知道 ,在我们的许多学校里 ,某一位教师上课时 ,学生很安静地坐着听讲 ,而在另一位教师上课时情形就会很坏。这决不是因为一个教师有才能 ,另一个教师没有才能 ,这只是因为一个教师有教育上的技巧 ,而另一个教师没有教育上的技巧。

不仅仅要给教师以知识 ,而且要培养教师的技巧。不管我们给教师受过什么样的知识上的教育 ,如果我们不培养他们的技巧 ,那么 ,我们自然只有依靠教师的才能了。

除了技巧以外 ,还要对组织本身有足够的了解。在我们的教育理论里 ,是不是会有象学校中心这样的“细枝末节”问题呢 ?还没有。而其实学校中心的作用 ,学校中心的个别因素的依存关系 ,多半能解决纪律问题。

我不知道在学校里应该怎样处理这样的情况 ,但在我的公社里是有中心的。第一 ,这个中心设在固定的适当的地方 ,第二 ,这个中心永远不会没有负责人。每一个公社社员都知道当我不在公社的时候 ,就有另一个对公社负责的人在我的座位上 ;所有的社员都知道有一个使公社的工作不至于中断的中心 ,知道经常有一个负责召唤的

人,有一个有事可以去请求的人。全权代表公社的人,就是由这个中心产生出来的。值日队长就是我在公社里的这样的全权代表人物。值日队长是一个很普通的孩子,一个月里值日两次。这个孩子平时并没有什么权力,但当他带上值日带的时候,就有很大的权力了。如果你们的集体里已经有了确信这样的“首长”是很需要的那种传统,有了确信值日队长的这种权力是有益于集体的那种传统,如果你们在集体里培养好了对全权代表人的尊敬心理,那时候,你们的值日队长就能解决很重要的事情了。值日队长是对工作日、对工作日中的每一件事情负完全责任的人。在学生集体里,如果值日队长这个普通的孩子能够善于运用作为集体权力的自身权力,不放弃这种权力,不辱没这种权力,也不允许任何人辱没这种权力,只要做到这些,那就会起巨大的推动作用。

公社里的值日队长有权发命令,有权发绝对的命令。我们是不害怕这样做的。譬如一个十五岁的值日队长,可以命令一个年龄大的共青团员:“把拖把拿去!”虽然以后在共青团支部里能够对他“发泄”,但是绝对不能拒绝执行命令。

我们再继续谈下去。值日队长的全权是非常受尊敬的,甚至全体大会都作过这样的决议:值日队长的报告,绝对不能检查,要完全信任他的报告。如果值日队长或生产组长来找我,在我的旁边谈论了一些事情,我是可以进行调查的;但是,如果他在一定的庄严的场合给我作报告,这时,他不只是代表个人,而是作为集体的全权代表来说话,那大家就公认值日队长是不能说谎的,而事实上一点也不假,不管他怎样想说谎,也是不能够说谎的。这种具有很大职权和严格责任的全权代表的概念,难道不就是以后集体概念同它结合起来的这样的一种概念吗?这都是有关组织中心的问题。

我不打算拿也许不适合于学校的那些事情来难为大家。希望大家注意这样的问题:谁是你们的中心?这些全权代表有什么样的依存关系?这决不是很简单的问题。

请注意 这个中心的职能涉及教育学的另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这一方面早已得到我们大家的承认和尊重 ,但在堂堂的国立学校里倒并不经常重视。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对儿童游戏的观点。我们认为儿童应当游戏 ,我们的玩具应当是足够的 ,但同时我们不知为什么又认为要作游戏 ,就要有单独的地方 ,这样 ,游戏对教育过程的参与就会受到限制了。然而 ,我总是相信 ,游戏应当渗透在儿童组织里。请注意 这里谈的是儿童的年龄 ,儿童有游戏的要求 ,也应该满足这种要求。所以要这样做 ,并不是因为该工作时工作、该游戏时游戏的缘故 ,而是因为儿童现在怎样游戏 ,将来也就怎样工作的缘故。我主张一切的儿童集体组织都必须有充分的游戏 ,而我们作教师的应当亲身参加儿童的游戏。

当教育人民委员部的视察小组到我这里视察我们的报告制度时 ,我的心当然就凉了下來 ,因为 ,我很清楚地看出他们看着我并在想着 :“看起来是个有办法的人 ,看起来不象是个傻子 ,但你们看他作的是什么事情!”我说 :“是!是!是!是!是!”我已经这样“游戏”了十六年 ,这还不仅仅是在这个场合 ,而是在许许多多的场合 ,在人家“指责”我的轰动一时的军事化——队长和敬礼等办法——的时候 ,我都是这样做的。在“射击小组”里 ,有真正的军事化 ,这其实是一种游戏 ,我也参加这种游戏。我所以参加这个小组 ,是因为我深信没有这种游戏 ,要建立真正愉快健全的集体是比较困难的。而且 ,我可以满意地指出 ,这种“游戏”是逐渐深入的。例如拿炮兵学校说 ,那里已经多少采用了这样的游戏。这并不是专门的学科练习 ,这是儿童集体里所必需的一种专门的美学。

你们以为我和你们不是在做游戏吗?我们是在做游戏。你们看这些领带、别针、小猫、小狗 ,这也是游戏。看来这好象是极平常的东西 ,而实际上我们是在做游戏 :有时候我们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正经地做游戏 ,有时候斯文地做游戏。当我们布置书籍的时候 ,以为这是我们的图书馆。我们把书陈列起来 ,把新到的杂志放在书架上。这不

是我们在做图书馆游戏吗？是在做游戏的。我们在客厅里难道就不做游戏吗？我们是在做游戏，我们也做餐具的游戏，也做用小刀削柠檬和柑子的游戏，虽然我们从来没有用这样的小刀削过任何的柠檬和柑子。为什么偏偏要儿童们那么样的过于严肃正经，那么样的道德、道德、学习、学习呢？玩一玩吗？教师就说话了：“休息时玩。走走跑跑，但要小心，不要打破玻璃，不要弄脏衣服，不要碰伤鼻子！”

因此，我认为把游戏放在儿童集体里是完全必要的……

当内务人民委员部问我打算给公社社员做什么样的制服的时候，我有点不好意思说，但对你们说我就没有顾虑了，我估计你们不会对任何人说。我在这样想：为什么女人要带鸵鸟毛？为什么只有她们可以带鸵鸟毛呢？在我看来，应当从她们的身上拔下鸵鸟毛来，给学生们带上。无论如何，在衣服上——也许不只是羽毛，而且还有什么样的扣子，什么样的花边，什么样的样式，都是应当包含游戏成分的。我们知道，不仅孩子们做游戏，而且成年人也做游戏。许多人穿了制服，而许多人就在想象什么时候会穿上制服，这里是有某种愉快的。比方说，一个人穿上了铁路员工的制服，那么，这对学生说，就更加重要些了。而且，做制服并不需要用任何的贵重材料，也不必说什么我们没有呢绒，那完全是多余的话。

最后，我还想说两件重要的事情，这就是惩罚和劳动。

也许你们还记得，我给《真理报》写了两篇关于惩罚的文章，其中有一篇题为《惩罚》。这篇文章写好了，但是，不知为什么，结果在《真理报》上讨论得并不怎样热烈。我没有提到惩罚在学校里是多么的需要，请不要认为我的话是在推荐某种惩罚。我说的是我用了什么样的惩罚，以及由于用了这样的惩罚得到了什么样的好处。我可以私下对大家说，我个人确信惩罚在学校里是会有好处的。

所有我的公社社员分为两个部分，绝大多数是社员，其他的是没有得到社员称号的学生（“我们正在教育你，而社员已经受过教育了”）。我有权惩罚学生——“派服勤务”，按我们那里的说法：我能

够分派学生担任额外的勤务。

什么是“派服勤务”呢？勤务是各种各样的不同工作，这些工作甚至与我没有关系。我有权指定勤务，由值日队长登记下来，例如某人有两个勤务，某人有一个勤务。并且，无论谁从来也不要去寻找服勤务的人，但有这样的情形：没有工作，但“值勤人”已经准备好了。譬如下了雨，需要接水桶，那就去接水桶；或者，需要去城里取钱，那就去城里取钱；或者，需要收拾厨房，那就去帮忙收拾厨房。

我能取消学生的休假，不让学生在假日到任何地方去。给学生发零用钱，是由我掌握和限制的，即不发给他们工资。而是把工资存在储蓄银行里，没有我的签字，他们从储蓄银行里是一个钱也取不出来的。

我不能而且无权对社员给予这样的惩罚。对社员只有一种惩罚，这就是禁闭。而对于学生，我是不能用禁闭惩罚他们的，他们还没有到那样的程度。社员不经批准就可以休假，只要报告在几点钟以前回来就可以了。社员可以当选为全权代表，而学生就没有这样的权利。

社员还有一种权利，这就是我有相信社员所说的话的义务。如果我不相信社员说的话，那就很不妥当、很没有礼貌了。

这就是说，对社员只能够用禁闭来惩罚。什么是禁闭呢？跟派勤务的情形一样，我只能给以禁闭，而且，这时我应当站起来，也就是说我不能坐下或躺在沙发椅子上说：“禁闭两小时！”而社员也必须向我敬礼回答：“是，禁闭两小时！”这已经成为公认的一种定规了。如果社员不说什么话，那就表明他不接受我的惩罚，他不同意我的惩罚，这时候，我就有权把问题提交全体大会来解决。但应当给大家说明，这样的情形，我记得还没有发生过。需要惩罚的时候是很少的。社员受过禁闭以后就走了，从来谁也不记载这样的事情。关于勤务，值日队长要记载下来，并要注意勤务执行的情形，而禁闭就不必这样作了。社员自己应当记清楚，应当自己选择适当的时间来受

惩罚。到了时候,社员就到我这里来说:“来受禁闭!”所谓禁闭,就是应该到我这里来,在我的办公室里坐一定的时间。其实,禁闭只是一种表面上的惩罚,而主要的在于:办公室是个中心,工学团的全部生活都通过这里,如由这里打电话,订货人要来到这里等等。坐禁闭的人就会了解我们的生活是怎样进行的。并且,我应用了一个很重要的办法:我所谈的一切,总是插入专属于社员受禁闭一方面的事情。如果社员打碎过玻璃,那么,我和某人在谈话中就说:“如果你进城去,就请买一箱玻璃,那我们就不怕打破玻璃了。你说没有钱吗?怎么会这么巧?没有钱那我们该怎么办呢?”等等的话。如果社员触犯了女孩子,或侮辱了女孩子,那就要为这件事情绕不少的圈子。我从来不许自己当面过分地指责犯过失的人,说:“你做了些什么,你多么不好!”等等的话。公社里有这样的一个规矩:一受惩罚就要说:“是!”因此,就用不着再多说关于犯过失的事,这样做,就认为是无礼的。在惩罚以前,我们要开会研究,会上说什么都可以,但是,一经有了决议,一经给予一定的惩罚,那么,再谈论已引起惩罚的过失,当然就完全是无礼貌的、不尊重人的一种态度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传统,这个传统,能使受惩罚的人避免对他的任何嘲弄。

这就是关于惩罚方面的事情。

但是,我在这里还要作这样的修正。有人这样提问题:“当然,惩罚是需要的,但是……”我认为这种提法完全是不正确的。有了这个“但是”,结果就是:第一,应当尽量设法不惩罚;第二,好教师是从来不用惩罚的。这就是等于力求不用惩罚来获得“教育机智”,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这就是要附带说明,如果你完全是无用的教师的话)再来用惩罚。问题决不是这样的。首先,不好的教师,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是不应当用惩罚的。在我的工学团里,只有一个人有惩罚权,惩罚权应当集中在几何式的一个中心里,这是为了求得一致。当需要惩罚的时候,就经常要惩罚,无论如何,决不能用普通的谈话来代替惩罚。

如果需要惩罚,如果惩罚在当时的情况下是有利的,那就表示惩罚是应该使用的,逻辑就是这样的。在我们经常使用的意义上,应加引号的这个“教育机智”究竟是什么?所谓教育机智,往往是逃避教育工作、逃避责任的一种特殊方法罢了。实际上,教师是既没有权利躲避工作,也没有权利躲避责任的。

虽然如此,我个人认为过多的惩罚是不应该有的。那是根据另一个逻辑,惩罚不应当妨碍整个集体的发展,不应当成为集体中的一种生活方式,惩罚要很少使用,少到整个集体都对所给予的惩罚特别注意。因此,必须不经常使用惩罚。如果我的集体里发生了什么混乱的情形,这时候,在我没有改变主意之前,毫不犹豫地立刻用惩罚予以制止。

按照规定,我是作为集体的全权代表来使用惩罚的。但是,最严重、最厉害的惩罚——象开除出集体的这种惩罚——我总是认为必须通过全体大会来实行。

这里,我要说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这就是全体大会。我不知道全体大会在学校里是不是这样需要,我实际上并没有试用过,我还有怀疑,因为在学校里,儿童年龄上的差别是很大的。此外,在学校里,年龄大的儿童和年龄小的儿童之间的接触也是很不够的。我不知道在学校里可能有什么样的全体大会,但我相信:如果说学校里有团结一致的集体,那一定是可能的。

在工学团里,我有权开除学生,但我从来没有不经过全体大会来擅用这种权力。当然,你们了解,在全体大会上,应当获得你们认为必要的那种决议。如果集体尊重你们,了解你们,那么,全体大会就会永远站在你们这一边。那时候为什么还需要全体大会呢?我认为所以需要全体大会,与其说是为了要给以正确的惩罚,不如说是为了使全体大会的每一个成员知道自己对决议负有责任。在集体里培养这种责任感,是要经过很大的努力的,但是,反过来说,这种责任感一经培养起来,它就能创造出奇迹。这种责任感是要由工作上的巨

大正确性和明确性来养成的。

在公社里,全体大会制定了这样的规则:发言只能持续一两分钟。那就是说甚至在这件琐事上,也培养着责任心。

培养责任心主要地还可以靠委托个人工作的办法。这就是说,在任何一种情况下,都可以委托某人作某件事情,并且必须在大会上作报告,必须进行检查。如果不完成委托的工作就要受到惩罚。我不打算在这方面详细叙述来麻烦大家,我相信每一位校长和每一个教师集体,经常会发现应该委托学生去作什么样的工作的。

最后,希望大家还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以一个人作中心的重要性。我个人深信:学校教育集体的领导人,应该是全权代表学校的校长。我在自己的实践(我在经营规模很大的工学团里工作了十六年)中,有权聘请教务主任,可是我从来没有请过。我认为,一切的教育和事务权力必须集中在一个人手里,不管这里有怎样的困难、怎样的阻碍。如果这样地进行工作,经过一年之后,校长就会感到大为轻松了:他把一切工作掌握在自己手里,他了解一切。一般地说,在儿童教育集体和教师集体里,把责任中心分散在几个负责人手里的那种逻辑我是不理解的。我认为一个人同时是教师,又是经济管理人员。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不管怎样困难,总还是最好多费些时间和精力,而要保持着良好的儿童集体。

同志们,这就是我要说的最主要的基本问题……

此外,为了建立这样一些组织形式,是要经过若干年的,这是要请大家多加注意的一个重要之点。无论如何,决不能以为在几天之内就能获得、发明和实现这些组织形式的。但是,如果有人问我:在正规的学校里,我从哪里开始做起呢?那我就回答说:我不是从形式开始,也不是从建立传统开始,我是从良好的全体大会开始的。我在全体大会上,真诚地直接向孩子们说明:第一,我希望他们什么;第二,我要求他们什么;第三,我预告经过两年之后,他们将会怎样。我确信好好地对孩子们讲一些务实的、坚定的话,是有很大大意义的。也

许在组织形式上,我们还会犯许多错误,因为,我们还不善于经常认真地和孩子们讲话。我们要善于这样说话:使孩子们从我们的话里感到我们的意志,感到我们的修养,感觉到我们的个性。这一点是需要学习的。

最后,我衷心地祝你们在自己的工作上取得成功。我相信,你们的思想和才智并不次于我,我只不过是多写了几本书,而你们,也许是在保持沉默,虽然你们每一个人都有很有趣的小说题材。

## 结 束 语

我想,用不着作任何的结束语,我只是简单地回答口头和书面的问题。

有一张条子涉及一个极重要问题,即有关冒险的问题:“列宁格勒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一个学生得了不好的分数之后,曾经企图自杀。遇到这样的事情该怎么办呢?”

提出这个问题是完全正确的。但是,问题本身就包含着答案。给学生评了不好的分数,这里会有什么样的危险呢?这完全是一种合法的、正常的和普通的作法……这是一种最没有危险的作法,而学生仍然对评给不好的分数这件事作了不正常的反应,这说明什么呢?这正是说明即使比较没有危险的某些其他的作法也终归会得到以下的结果:评给不好分数这件小事情,恰好成为忍受的最后限度了。这是常常会发生的最不应该有的一种冒险。我们在自己的工作中,积累起完全没有冒险可言的种种微小影响,我们相信其中的每一种都是没有危险的。如果我们一味和蔼地对待儿童,那么,我们就会因为学校里的喧嚷和叫声伤害儿童的神经。也许,由于我们的“温和平静”的声调,使儿童对生活起了嫌厌之感,接着就把完全没有危险的作法——评给不好分数——又加在这种嫌厌情感之上,于是,儿童们的反应就更不好起来。我想,实际上在我们的那种逆来顺受的迁就

态度里 ,往往正包含着极大的冒险 ,这比起在跟儿童发展中的若干倾向作直接的、真诚的和坦率的斗争中所包含的冒险要大得多……

请注意以下这个极重要的情况 :如果你们的学生知道您——校长 ,您的所有的助手、教师以及整个教育集体都是坦率赤诚的人 ,都是正直纯朴的人 ,那么 ,在这样的学校集体里 ,就不会产生自杀的念头。不管你们的行为举止怎样 ,学生永远会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知道你们所作的是什么 ,知道你们是每一个学生都了解的真诚坦率的人 ,于是 ,学生就经常会产生你们是正确的想法 ,向你们请教 ,和你们谈谈、计划计划自己应该作的事情。但是 ,当你们拿温和平静的声调来躲闪地对付学生的时候 ,他们就永远不会接近你们 ,会把最秘密的、最可怕的体验对你们隐藏起来。能强使谁接近声调温和平静的人呢 !

我在八年中从捷尔任斯基公社毫不惋惜地开除了约有 10 个人 ,而且开除的时候不作任何的掩饰 ,直截了当地对被开除的人说 :“ 我们开除你 ,是因为你是没用的坏东西 ,留你在这里 ,会侮辱和妨害我们。干脆说 ,你简直够不上作一个人。”你们怎样想呢 ? 你们在想着我要好几夜抖颤不安 ,盘算这一切究竟会有怎样的结果吗 ? 不错 ,我抖颤不安了 ,但是 ,我内心里感觉到需要这样做 ,我的良心是支持我的行动的。而你们也知道 ,所有被开除的人 ,以后经过五、六年或六、七年 ,都给我来了信。

当然 ,如果一个集体很软弱 ,那么 ,每一个坏蛋都会嚣张捣乱的 ,在这样的集体里 ,要开除人就不得不用笑颜温和的办法 ,而不能根据充分的理由。但是 ,你们如果要从强有力的集体里开除人 ,就是当有人真正反对集体的时候 ,你们的这种作法 ,对你们所开除的人也会产生极大的影响 ,使其清醒。

此外 ,说到冒险问题 ,我一开始就这样说过 :集体越有力量 ,集体组织得越正确 ,那你们也就越能有力地支配集体 ,冒险的事情也就越少。但是如果在很软弱的集体里 ,如果在组织得不好的集体里 ,那我

就敢说:你们的每一种行为举止都是有危险性的。如果没有一般的制度,那你们就对任何事情都负不了责,你们就不能够说什么地方对你们会有危险性,什么地方没有危险性。

其次,我还有一个不同的意见。我并不是说我没有技巧。我是说我没有才干,技巧我是获得了。技巧是可以获得的东西,正象可以作一个有名的施工,可以作一个出色的医师一样,教师也应当并且一定能够成为一个呱呱叫的能手。

我相信我和你们,都是一样的人。我已经作了三十二年的教育工作。每个某种程度上长期作过教师的人,如果不是懒汉的话,就会成教育能手。你们都是青年教师,如果不抛弃我们这一行事业的话,将来一定会成为能手。至于,那时候究竟对技巧能掌握到如何的程度,那就全靠个人本身的努力了。

现在来谈一谈关于教师动怒的问题。请不要以为我在号召大家不要用温和平静的声调,而要用拳头使劲打桌子,大声喊叫等等。这种作法,是不会得到什么效果的……

什么是动怒呢?一切事情都应当辩证地来理解。在掌握了技巧的条件下,动怒的意义自然是不同的。如果你是一个能手,那你就体验到生气是怎么回事,但你的动怒并不能采取任何违反教育学的方式。这是你的真正的人的情感之真诚表现,但这并不是一般人的情感表现,而是出色的教师的情感表现。

不仅动怒跟温和平静的声调是对立的,而且,我认为人的一般的真实体验跟温和平静的声调也是对立的。应当了解到由单纯的不满到动怒的整个过程。我应该说,我在这里也是不得不学习的。我知道用冷静沉着的口气说“你好”和用安详温和的口气说“你好”究竟是表示什么意思,我知道用严厉冷淡的口气说“没事了,可以走了”和用稳重而柔和的口气说“没事了,可以走了”,究竟是表示什么意思。所有这些,都是实践问题。如果你们向自己提出这样的若干有趣的问题,并进行练习的话,这样做并不是不好的。我常常教我的同

事们作这样的练习。我有时候说：

“我是校长，你是学生，你犯了过失。因此，我要和你细谈一番，而其他的人来听我们谈话。”

请回答我，你们将怎样发问呢？

你们是说：“说吧，这是你干的吗？”还是说：“这是你干的，我知道！”就请试一试吧！要知道，正是无关重要的普通问题，才随时能够遇到。这里，没有适当的声调的运用，没有适当的脸部表情，是什么也作不好的。

你们这样巧妙地运用声调，决不只是表现在极端的动怒和喜悦中。

这里给你们举个例证。雷日科夫问诺日克：

“你为什么要努力呢？”

“我喜欢……”

“你也喜欢查哈罗夫吗？”

“噢！非常喜欢查哈罗夫！”

“你为什么这样喜欢他？”

“为了那个……为了一件事情。”

诺日克的机敏的大眼睛眯成细缝，他微微地摇了摇圆圆的头说：

“有过这样的一件事情，简直是奇迹，不象是事实。从那时候起，我就喜欢他了。有一次我们的电灯灭了，全工学团的电灯都灭了，甚至于整个城市的电灯都灭了，发电站出了什么事。我们都走到办公室里，大家都坐下来，有许多孩子们，所有的沙发上都坐满了人，有的坐在地板上。大家都谈论战争的事。查哈罗夫也谈起来，还有一个人……马连基也说话了。以后，阿列克赛·斯捷潘诺维奇说：

“‘这多么讨厌！需要工作，但没有亮！真正岂有此理！’

然后，他坐了一坐，又说：

‘我需要电灯，真糟糕！’

我们都笑了，而查哈罗夫忽然这样地高声抢着说：

‘马上就要有电！看！一、二、三！’

‘三’字刚说出口,就立刻有了电,周围都亮了!我们当时又笑又鼓掌,查哈罗夫也笑了,他说:

‘这要有本事,而你们,孩子们,你们就不会!’”

诺日克说话时的表情是很机灵的,他接着又张大了眼睛,添了一句:“你明白了吗?”

“有什么明白不明白的?”利日可夫轻蔑地说:“怎么啦?你以为他能指挥电灯吗?”

“不是。”诺日克愉快地拉长了声音:“为什么要指挥?不过凑巧吧了。但只是……换了别人就不会这样做。”

“别人也会这样做。”

“不行,不会做。别人就要担心害怕。他会这样想:他说了一、二、三,而电灯不亮,那时候该怎么办呢?那孩子们就要笑了。而你看,查哈罗夫,就说了。他是运气好的人,还能给你说什么?他走运了,电立刻来了。如果一个人能走运,我就喜欢他。”

雷日科夫惊奇地听着这一个难以理解的含糊说法,他判断不清楚诺日克是在开玩笑呢,还是在说正经话。雷日科夫对这种谈话是很不满意的,他说:

“你以为他走运了?走运不走运与你有什么关系?”

“他走运了,这就与我有关系,我跟着他就也走运了。好极了!我喜欢这样。”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不过是巧合:没有电了,有一个人说:“马上就会来电。”于是,电果然一下子就来了。象这样的小事情,都能够为你们树立起长久的威信。已经过去三年了,而关于这件事情,还有人在继续谈论着。这是什么缘故呢?这就是因为声调语气的关系,因为有力肯定的说法的关系。

这就是不需要温和平静语调的原因。如果你们是能手的话,你们就能知道什么时候该克制自己,不要生气,什么时候应该生气。如果在需要生气的时候,生气甚至比和颜悦色更有效力。因为,你们在

生气中所表现出来的是公民,是机关的代表,是思想方面的代表,是权力方面的代表,你们是在坚持着某种更重大的事情。当你们一味和和气气地对待儿童的时候,你们运用的是什么样的“教育思想”,这是连你们自己也不明白的。

现在来谈集体和家庭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这里的许多孩子也是从家庭里来的。并不是我想出了什么定理并提供给你们,这是生活本身提出来的。有时候家长(父亲和母亲)来了,对我说:“不能够设法把我们的儿子带走吗?”如果问:“为什么你们要把他交给我们呢?”回答是:“是的,您要知道,他不在家里过夜,骂母亲,偷收音机,卖公债票……”等等的活。当我接受了某一个孩子时,我就说:“我接受好了,但是,既然您把小孩子管教得偷光了您自己的东西,那就说明您已经不能再进行教育工作了。我们这样约定吧:我来教育他,您等待成果好了。”

交给我的这一个孩子,是有一定的“造就”程度的。我开始教他具有这样的思想:他应当把我的国家观念传播到家庭里去。因此,我不期待家庭带给我它所具有的某种思想,我相信我的学生,我教育的儿童一定会把国家观念传播到家庭里。当学生放假回家时,我就对他们说:“要特别尊敬父亲,要特别尊敬母亲,要亲切有礼。一定要帮助父母亲!明天起床以后就问:‘我可以做点什么事情?’你们必须给自己的父母留下深刻的印象,明白吗?”学生们的回答是:“明白了。”于是,孩子们就走到父母跟前问:“该给你们做些什么呢?可以洗洗什么吧?”这时候,父母亲也就会明白了,明白自己以后如果有孩子,应该用另外一种方法来教育。

我有这种一种信念:我们教师代表着国家的社会主义机关,代表着社会主义部门,自然,我们的学生,也就是这个部门里的成员,因此,他们就应当把我们的正确的文化思想和道德思想传播到家庭里去。如果家庭的文化教养很高的话,那它就能永远赶向前去,会和我们有一种共同的思想,如果家庭的文化教养很低的话,那它就不会被自己

孩子的影响所支配,而是被我们的集体、我们的组织的影响所支配。

现在要谈到这样的问题:应该怎么做才能使儿童把国家观念传播到家庭里去,这涉及你们的技巧和其他一切方式、方法。但是,有时候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只要给儿童说明:你们应该怎样怎样就足够了。因为,我想象不出捣乱的儿童的问题会成为严重的问题。不,捣乱分子是不可能有的!

我所以这样肯定地说,是由于有以下这样的事实:不久以前,我曾到过儿童法庭。那里坐着五年级的五个学生。据说他们抢了商店,把蜜柑到处抛撒,大抢大吃,因此坐在被告席上了。学校的教导主任也在场,法官问教导主任说:“你可以说一说事实的情况吗?”教导主任指着一个孩子说:“可怕的孩子,一个捣乱分子!他上课迟到,自己抽烟不算,还教别人也抽。还把绳子带到班里来。”“绳子”两个字,立刻使我吃惊起来:是多么厉害的一个“恶家伙”,竟把绳子带到班里来。接着,法官叫:“谢妙诺夫”。他站了起来。法官是个女的,一个风度很好的女布尔什维克,她问道:

“为什么你的耳朵发红了?”

“有些难为情。”他含着眼泪说。

“你是少年先锋队队员吗?”

“少年先锋队队员。”他局促地说。

“红领巾在哪里?”

“在口袋里。”

“为什么放在口袋里?”

“我害羞……”

“坐下吧……”

法官说:“一切都明白了!”

但是,教导主任却不明白孩子的耳朵由于害羞而发红了,不明白孩子局促不安了,不明白孩子的眼睛里要流出眼泪了。他能算个什么捣乱分子呢?您教师,对这样的“捣乱分子”可以这样说:“以后不

要再这样做,明白了吗?”可以肯定地说,这样的事情以后是不会再有的。但是,当您看到他手里拿着绳子就举起手来,那么,他以后吸着烟的时候,就要向您的眼睛吹烟了。象这样的“捣乱分子”,正是将您的正确的道德思想向家庭里传播的适当的对象。您可以把他叫来说:“你是我们的光荣的学校里的学生。家庭是你的最接近的亲人,因此你要告诉家庭,你应该有怎样的行为举止。”这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情。但是,要这样做,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当有了集体,有了技巧的时候。

我建议在学校里采用什么办法呢?

我什么办法也不建议,我也没有权利来建议。但是,如果我在学校里的话,我就要用禁闭的办法,不过,只有好学生才能在我的办公室里受禁闭(笑声)。是的,同志们!一般地说,不应当禁闭坏学生,而应当禁闭好学生,坏学生应当加以原谅,不过,必须让大家都知道:我对最好的学生是连一点点小事情也不放松的。请大家惩罚学生的时候,不要为了最厉害的过失,而是为了最小的过失。

……当然,这样的惩罚办法初次是不能用的,先应当使集体知道,在惩罚里,同样也有尊重的成分存在。无疑的,这是很难很复杂的一种哲学,目前甚至于可以先不必试用它。

其次,有人向我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你们和十年制学校有什么样的关系?”

我们有自己的十年制学校,我就是校长。

下一个问题是:“在我看来,儿童工学团就是一种实验。”

什么实验?我们那里的人都是生气勃勃、生龙活虎的。当然,我们可能会冒险,但未必就是一种实验。

“如何保持已经建立起来的集体?”

这是很简单的:第一,要保持集体的生动活泼的核心,要注意经常有经过训练的一辈去接替前一辈,也就是说,要有若干水平日益提高的集体成员——有教师也有学生;第二,要遵守规章和传统。

大家都知道,从前我们的命令上曾写着:“从早晨起要遵照队长的吩咐工作。”现在早已不待吩咐就去工作了,但命令上还写着:“从早晨起要遵照队长的吩咐工作。”

另一个传统是:宣布命令的时候要站起来。也许,这样做并没有什么好处,但还是遵照传统一直保存着。这种保存传统的办法,是一个很重要的逻辑。

还有一个问题是:“您有什么样的创作计划?”

“创作”这个词本身我就不喜欢。如果我们和孩子在一起的话,创作计划是要有的,现在我不过随便写写罢了。我计划先完成《父母必读》第二卷和第三卷,然后再从事写作一部较大的著作,写这部著作时,大概有人会供给我资金的。我准备在三年之内,写一本关于共产主义教育的重要著作,这已经不是文艺作品,而是真正供教师用的书籍了。

“如果全权代表,或者象你们所称的队长违反了规章,那该怎么办呢?”

首先也是“禁闭”,但最主要的是要让他们知道对全体大会所负的责任,而尤其重要的是他们应当具有集体的荣誉感和自豪感。

其次,有一位同志指责我,说我的思想往往隐藏在陈旧过时的术语里边。这个指责是很正确的。的确,象惩罚就是老的、有损名誉的术语。但是,那该怎么办呢?我是不能够杜撰术语的。

“应当怎样对待家庭、朋友、大娘和大爷呢?”

对这个问题我想这样来回答:许多教师都给我送来他们的作品——有短篇小说,也有中篇小说——,往往都是些写得很不坏的东西。他们的这些作品里,不知从那里得来这样的一种语调:谁也不写“父亲”和“母亲”,大家都一致写“大爷”和“大娘”,这真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这样的词汇使人有生疏之感。我想对父亲和母亲,应当有很多的话要谈,应当很好地谈谈,但最主要的,还是要通过他们的孩子去影响他们。

同志们！很感谢你们的关切和注意。如果我讲的若干原则有陈述得不够好的地方，就请多予原谅。这是因为在一个晚上，当然是不能够把所有应讲的都讲出来的。最好能听一听你们的意见，我相信你们都有话可说，我也会有所收获的。因为，每人的经验中，都会有些宝贵的东西，如果你们每人都能象我这样顽强地坐下来写书的话，那就会写出有益的好书来的。

同志们！祝你们成功。

## 论共产主义道德

毫无疑问，为了预防共产主义教育中的任何失败，无论如何，为了使广大的教育工作更完善并取得高质量的卓越成就，我们的面前摆着两个重大的任务。

第一个任务就是在确定和解决共产主义教育与共产主义行为的一切理论问题方面进行规模宏大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工作。不言而喻，单纯列举正确行为的特征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对我们的社会说来，迫切需要的不是道德标准的简单名目表，而是严正的和能够付诸实践的完整的道德体系，它一方面表现出对哲学的认真的研究，另一方面表现出社会伦理传统的体系。按其严整性、对广大群众的明朗性、说服力和吸引力来说，按其与我们生活和发展的实际需要相适应的程度来说，这样的伦理体系应当毫无疑问地远远地超过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一切道德法典。并且这种思想的严整性和共产主义伦理的纯洁性使我们更易于战胜和加速战胜资本主义的残余。

第二个重大任务就是消灭这些残余。在这方面，在同残余斗争方面，我们做了很多工作。那些已有的成就，应当归功于我们的生活和共产党的力量的影响，归功于我们革命事实的本身，归功于我们二

十年来自由的历史,归功于我们集体的努力和我们一起胜利的经验。可惜的是,这样丰富的和宝贵的经验还缺乏用哲学思想和教育思想对它进行分析。

对于怎样和旧的残余作斗争的问题,我们很少做专门的研究,更少去认识和确定这些残余,很少统计这些残余。直到现在,我们只得满足于非常一般的、可供日常生活参考的那些说法……并且我们有一种倾向:一切坏的东西,一切损害我们的关系、工作、神经的东西,歪曲我们生活、使我们遭受痛苦的东西,都笼统地认为是资本主义的残余,于是就不再去分析它了。

事实上,问题自然并不是这样容易而简单。我们生活上和我们性格上的某些缺点是由于我们的过失,由于我们对于新的伦理体系以及对于新的道德传统缺乏研究而产生的。许多缺点是由于完全健康的原因而发生的,即由于我们的蓬勃成长、我们历史的年轻而发生的。某些缺点的产生还有一个原因这就是在我们生活中到处可见的高涨的激情。当人们没时间去认真思索时,而想把已开始的事做完,不管这刚开始的事证实了人们对它的理解还有点粗浅,在这种情况下,正是由于这种激情,导致了狂热、急躁、沉溺、匆忙、热烈,有时甚至是莽撞。所有这些缺点,有时非常恼人,有时甚至是可悲的,但在前进中,它们会化为乌有,迟早会消失的。

真正的资本主义残余和一般旧的残余完全是另一回事。这些残余仍然大量地存在着,常常在社会中隐蔽地泛滥着,使人熟视无睹,深深地隐蔽在行为、意图、愿望的动机中。有时这些残余表现在那种和我们生活的一般风格显然不相调和的公开的活动中,但时常又相反地,它们很好地隐藏在模拟的苏维埃行为中,甚至隐藏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中……这些残余从不联结成为稍微大的或者惹人注目的现象,因为这些活的“带菌者”通常都是一些诚恳的苏联人,这些人甚至不晓得他们身上附着什么样的敌人。因此,要和每一个人身上这些残余单独作斗争,常常简直是不可能而且不经济的。我们的

生活过得这样精力充沛,我们有这样多的事要关心,我们的脑中留有这么多的印象,我们怀有这么多的志向,有太多的创举,以致不可能常常责备某个同志,怪他眼看着有人犯了旧的小毛病而不抗议。此外,这种与个人的斗争,软弱无力的抗议可能是无益而有害的,它会加强反抗性,增强残余势力的敌对性。

必须再一次指出,用什么方法与日常生活中、社会中的这一类残余作斗争,常常还是不清楚的。我们不知道在哪一种场合使用哪一种方法:坚决地镇压、抗议、恳切地说服,还是轻视的沉默以期残余的自然衰亡。我们的整个生活对于“带菌者”的影响愈大,这种衰亡的可能性就愈大。

大约,在每一种个别的情形之下,都要求个别地解决这一问题,但仍然可以断言,同这些残余的真正斗争应当在整个战线上有组织地进行,并且要考虑到一个重要的情况:这一切旧时代的残余并不是一些有害的遗传现象仍然的结合。它们形成一个体系,就其全部的复杂性来说,它们是过时的、但还有很强生命力的旧伦理的残余。这个体系的个别细节不是简单地相邻接,它们在逻辑上是有联系的,它们互相支持,并且整个体系的危害性比起个别残余的简单的数学总和要大得多。

直到现在仍然指导着很多人的行为的旧伦理是在宗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我不仅是指正教和天主教的伦理,并且还指犹太教和回教,——这一切都是历史上积累起来的阶级社会的伦理生活。这正是一堆可怕的残余,因为这就是阶级社会的道德。

表面看来,好像我们一点也没有留下旧的道德。而事实上却遗留下旧的道德经验、古老的行为的传统。这一切都作为复杂而隐蔽的残余继续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中,这种残余的真实本质并非常常是显而易见的,并且有时看来甚至是革命的。

说到宗教道德的体系,不仅应当把它理解为它所正式宣布的原理,而且要把它理解为它在各个时期所表现的历史形式,这些形式自

然是从这些原理中成长出来的。因此我们对于某些正统的教条完全不感兴趣。对于我们来说,宗教正式认为对的东西以及那些属于所谓旁门左道的东西,同样是重要的。这些旁门左道是和整个伦理体系血肉相连的,它们是在伦理体系的本质上奠定基础的。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这种道德经验的全貌,是这种道德经验的全部实际的伎俩。

如果我们来看基督教,那么在这儿行为的规则是在以剥削为基础的社会发展中成长起来的,首先对于更顺利的剥削过程是必要的。正因如此,基督教的道德便灌输到劳动者的意识中,它在这种意识中产生了行为的标准,而最主要的是,在历史的经验中它创立了行为的传统。并且要指出,这种伦理的体系构造得很巧妙。假如它象神话或者象教条那样构造得粗糙,我们现在就不会看见那么多的残余了。

基督教存在将近两千年了,但两千年来,认真相信神的三位一体,或者相信纯洁受孕,或者相信祖先的堕落的人并不多。他们即使打算相信,恐怕也不会怀疑到在剥削制度下牧师的真正的本质。无论在文学和在民间的创作里面,仿佛没有一个教会人士的形象被描绘成和他们的冠冕堂皇的神圣外表完全符合的。

在剥削社会历史的发展当中,教会的教阶制度是作为一种强制的和阶级奴役的机器而建立起来的。怪不得普加乔夫起义的那个时代,虽然正是宗教盛行的时期,但人民对神甫如同对地主一样地镇压。在宗教上对这种教阶制度的崇拜,教民们并不热心。而宗教的伦理体系,特别是基督教的伦理体系,却经历着完全不同的历史。毫无疑问,这种体系比起正式的教会产生要早得多,并且无疑是在悲惨绝望的时代,在被压迫和被奴役的阶级之中产生的。这是肯定自己作为人的尊严的一种企图,哪怕是能表示一点最小小的人类尊严也好。

对于不管是什么样的能代替自由生活的东西都丧失了希望之后,人们便决定去作自杀性的尝试:即从消极悲观的个人主义之中通过完全放弃斗争、放弃反抗来寻找自由。“完美”的道德就是拒绝幸

福,无止境的、反常的容忍让步,甘愿把自己交给第一次遇见的知心人支配,——这毕竟也算是肯定了“我”个人的力量,虽然这种力量只不过是用来压制自己的热情罢了。

这种基本的观念具有非常重要的特点,这些特点“幸运地”决定了这个观点两千年来的成就和生命力……

如果说到这种伦理体系的阶级面貌,那就需要承认它那惊人的多方面性:伦理的极限主义就是被奴役者最大限度地低首下心和不抵抗,它是剥削社会的产物,不可能有别的更好的东西来代替它。这种伦理象习惯、道德传统的体系、被经验所固定了的道德逻辑一样地富有生命力。并且它保证会长时期地存在,直到无产阶级革命消灭阶级社会为止。

虽然旧的道德处处都显得非常驯服,但仍然彻头彻尾是个人主义的。“正人君子”对于集体、社会、别人是毫无关系的。如果你打他的右颊,他就把左颊也让给你打,在这种情况下他只关心自己的人格是否完善,自己是否有功。他对于那个打自己的“邻人”的嘴巴的暴徒则丝毫不感兴趣。“正人君子”以那同样的热心准备去纵容造谣中伤的人,因为他直截了当地劝说:如果有人迫害您,“逼迫您和中伤您”,您不仅不应当伤心、报怨或者不安,相反地,您应当“高兴和快乐”,因为给您个人的“报答”由于这样的不幸而大大提高了,——“到天堂上有很多赏赐”。

不言而喻,实际上自愿完成这一类功绩的人并不多,而且问题也完全不在这里。在这里本质的东西是个人对社会的利益完全漠不关心,在狭隘的个人意向范围中来解决道德问题。因而,伦理的标准便完全由个人独自来掌握了。这种个人不是永远习惯于让人家打右颊或者左颊,可是他牢固地确信自己有权利使个人逐渐完善,从这里已经开始了许多个人主义的倾向。这些倾向甚至在我们的社会里还存在。有时这是一种个人自高自大的倾向,一种毫不想到社会利益的、孤独盲目的以自己的“完善”而骄傲的倾向;有时这是一种个人的娇

媚作态,是道德上的自私自利者在伦理上犯的一种羊癫风,对于这种人,个人的眼泪比大家的快乐还珍贵。

那种嫉妒的、浸透着个人精神上的贪欲以及利己主义的个人主义者的伦理,到处都使人脱离社会现象。“您不责备人,人家就不会责备您,因为您怎样责备人,人家也就怎样责备您。”这就是说您不要注意您周围所发生的一切,不要卷入麻烦的事情里,要遵守“各扫门前雪”这条规则。对别人抱着完全不抵抗的态度,这样的伦理标准,对追求完善的人提出的要求并不会很高。全部的完善就是消极,因此,这种伦理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它有一种万能的原理:无论在什么情形下,无论是对别人、对自己,都不要有任何的要求。“犯罪”虽然是不对的行为,甚至简直和伦理的标准相违背,但这并不可怕,随时都可以忏悔,经受一点新的屈辱之后,就可以安然地活下去,甚至还可以指望上天堂……

两千年来,这种人类道德经验数也数不清,看也看不完,这种道德经验的直接思想基础就是:埋头苦干,只管自己的事,离麻烦的事远一点,无论对别人和对自己,都不要有任何的要求,不妨多多地犯罪——什么时候都来得及忏悔的。

类似这样的道德体系之不可缺少,正是为了使阶级的镇压、普遍的以及任何东西都不能制止的剥削,可以同“纯洁的良心”和最大的成就同时并存……

共产主义的行为、共产主义的道德、共产主义的教育应当有另外的发展路线、焕然一新的标准和新的术语。在我们这儿,“好”和“坏”的分界线应当经过一些绝对新的地点。基督教的伦理不关心劳动和劳动光荣的问题。“您看看天上的鸟,它们不播种,不收割,不把粮食藏到谷仓里,可是它们活下来了。”我们这儿劳动是光荣的事情、豪迈的事情、英勇的事情。在我们的社会中,劳动不仅是经济的范畴,而且是道德的范畴。所以那些曾视为正常的东西——赤贫、求乞、漠不关心,我们这里都应当认为是直接的罪行。

我们道德法则的逻辑中心,决不可能是对社会现象漠不关心的孤立的个体。只应当用集体的和集体主义者的利益来衡量我们的行为。因此,即使名称相同的美德,看来好象我们以前曾经承认过它而现在我们还承认着的,但实质上却完全是不同的现象。“正人君子”的正直和共产主义的正直——是根本不同的东西。

正直往往从说“我不愿意”这句话开始的——我不愿意做违心的事,我不愿意做多余的事,我不愿意做不对的事。

我们的正直永远应当对自己和对别人提出积极的要求:我愿意并且要求自己和别人充分地注意公共的利益,充分地利用工作时间,有充分的能力承担自己的工作,充分地发展力量,具有充分的知识,我愿意并且要求更完善的更合理的行为。

在旧的伦理中,有很多放在道德标准界限以外的行为范畴,在我们这里变成了道德的范畴。所有那些加强或者削弱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的事情,因而也就是所有团结或者破坏集体的事情,在我们的社会中,不能认为是同道德标准无关的事情。在共产主义的社会中,例如精确性、守时、说话不含糊、明确地要求也很明白地答复,这一切必须用伦理的观点而不仅用事务的观点来检查。莫洛托夫同志的报告提纲中关于事务的观点,现在已经开始含有道德范畴的意味了:

“……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要求所有党的、苏维埃的、经济的和工会的组织具有:(一)灵活的手段和领导经济的事务才能……”

在旧世界中,事务才能是个别人的优点,由于这种优点,他们就获得更完善的剥削者的才能,沿着社会的阶梯往上爬。因此培养个人的才能就是培养个人的力量,这种力量必定和大多数人这方面的软弱无力成为对比。事务才能变成了少数人对于多数人的优越性了。因而,从我们的观点出发,这种事务才能在某种程度上是不道德的现象。

在我们的社会中,事务才能成为每个公民应有的优点,事务才能变

成一般正当行为的准绳，——事务才能因而也就成为道德的现象了。

我们不能在这篇文章中把我们社会中人的行为的各个方面都来做一番审查，要做到这一点，当然需要长时间的和专门的研究。但是我们已经看见，道德的和不道德的、合理的与不合理的准绳，在我们这里是新的了。并且我们的共产主义教育和旧世界的“道德”教育之间，不仅各种的道德标准不同，而且教育过程的性质也不同。例如，已经可以非常有把握地指出，共产主义的人的道德教育的基础首先是培养他的才能，发展他的力量以及他的建设的、创造的积极性。我们社会中的个人，完全不是阶级社会中的个人。在阶级社会中，为了使一个人比其他的人具有多得多的长处，有些才能是秘密地培养出来的，因此这些才能就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我们这里，才能应当成为教育学最广泛注意的对象。譬如，确定方向、组织、设计、鉴别以及其他许多才能都属于这种才能。

只有这样的人，用集体主义伦理教育出来的人，把自己的利益与公共的利益协调一致地联系起来的人，才能直截了当地理解“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个著名的公式的意义。个人主义者永远不会懂得这个公式的。在他看来，各人是按照他的贪欲取他所需要的东西的。

同时还有一些人两手一摊，惊讶地说：这怎么可以呢？如果各取所需，那每个人就会拚命去夺取社会的财产了。幸而事情并不是这样的。今天在我们的国家里已经有许多人能够按照这个公式来生活，并没有发生乱抓一气、把东西搬回家里去的事情。他们已经了解，如果不考虑到全社会的需要，就不可能确定个人的需求。

莫洛托夫同志的报告，指出了许多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途径，提高文化，把苏维埃公民的水平提高到懂技术的知识分子的水平，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守纪律。我们在共产主义教育方面已经做出了许多事情，特别是在广泛的教育过程上做出了许多事情，但在儿童的教育过程上就做得很少。我们前面存在着很大的困难。还需要对共产

主义教育问题作理论的分析 ,还需要为这个巨大的事业培养干部 ,但这个事业的基础已经奠定了。

我们面临着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积累共产主义行为的传统。我们有时会滥用“自觉的”这个名词。我们的行为应当是无阶级社会的人的自觉行为 ,但这并不是说 ,对于行为问题 ,我们永远应当求诸自觉。这就会给自觉以过重的负担。真正的、广泛的伦理标准 ,只有当它从“自觉”时期过渡到一般的经验、传统、习惯的时期 ,只有当这种被复杂的社会舆论和社会风尚所支持的伦理标准开始迅速地 and 精确地起着作用的时候 ,才能成为现实的伦理。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谈到了这一点 :

“……逃避这种全民的计算和监督就必然很难达到目的 ,必然只会是极罕见的例外 ,并且还可能受到极迅速极严厉的惩罚……于是 ,人们对于人类一切公共生活的简单的基本规则就会很快从必须遵守变成习惯遵守了。”

## 意志、勇敢和目的性

在莫洛托夫同志的报告提纲中 ,把劳动人民的共产主义教育问题作为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提了出来。我们现在看到我国社会普遍关心这个问题 ,这是令人高兴的。共产主义教育问题 ,不仅由于我们国家政治的发展而成熟了 ,而且它在日常生活中、在每一个苏联公民的平常的感觉中也成熟了。

我们清楚地知道 ,这个最重要的问题无论在我们社会的道德关系方面、在工业方面、在我们的财富、成长和我们在世界革命中的胜利的问题上 ,最后在我们的幸福以及全人类幸福的问题上 ,都具有决定的意义。

我们能懂得这一切,不仅是因为我们去思索、要求和希望。不是的,我们所以懂得,还因为我们看到共产主义教育并不是草案,不是一种预见,而是已经存在的现实。1939年的苏维埃人,我们时代的苏联人民群众和帝国主义战争开始以前的人极少有相同之点。我们的人民不只在公有财产、知识、发展、准备行动和斗争的决心等方面成长起来,而且在道德方面也成长起来,人民道德的成长是如此巨大,以致早已决定了我们在伦理上正向“新的品质”过渡。

我们到处都遇见我们社会对于人的完全新的要求以及人的行为与品德的完全新的规范。我国每一个儿童都知道许多优秀人物的名字,这些优秀人物是社会主义英勇精神、不屈不挠精神、忠于革命和党的最崇高的榜样。关于品行和对人的要求的新的规律这一概念,从这些实际的苏维埃伦理的高峰,广泛而深入地普及到人民中间,创造了我们思想的新范畴和行为的新传统。

千百万苏联人民群众的共产主义教育,是从革命的第一天起,从列宁所说的第一句话起,从国内战争的战线上最初的战斗起就开始了。而后来,在二十一年当中,共产主义教育几乎是不知不觉地、仿佛是顺便地、仿佛是在侧面的类似过程中进行的,而事实上却是有意识地和有目的地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的经验中进行着的。简直可以说:在我们的历史中,没有一个行动、一句话、一个事实,除了它自己在经济上、军事上或者政治上的直接意义以外,是没有教育意义的,是对新道德没有贡献的,是没有引起新道德经验的增长的。

这种道德经验,这些已经产生了的的行为规范,还没有归纳为严格的体系,还没有形成精确的原理和术语,最主要的是还没有扩大成全民的经验的传统。我们还经常看到新旧道德之间的某种斗争,还会听到关于各种行为细节问题的论争和莫名其妙的意见。关于爱、友谊、嫉妒、忠诚、荣誉,还没有提出不偏不倚的原则,这许多原则也还没有成为一定的准则,——这些细节问题在今天正是我们的青年所

关心的,他们渴望求得正确的解决,因为他们要求并且希望自己的行为合乎共产主义的标准。

意志、勇敢和目的性的培养问题,是具有头等意义的问题之一。虽然在整个世界史中都很难找出以全体人民都表现这样的行为品质为特征的时代,虽然我们的一切胜利都是我们强大的意志、我们奋不顾身的英勇精神、我们自觉地和不屈不挠地追求目的的结果,虽然有这些情况,也许正由于这种情况,意志培养的问题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最使人关怀的问题。尤其在今天,当我国正在经历着新的高潮的时候,当我国已走上了确定的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的时候,这些问题就更加重要了。

自然,在我们国家里,即使在今天也在处处培养着意志和勇敢。并且在这方面每天都在增加还没有统计进去的新的胜利。但是,另一种情况也是十分明显的。十分显然,我们必须以纯粹布尔什维克的精神,诚实地、坦率地承认,意志、勇敢与目的性的培养,有时处于自流的状态,在这一工作中缺少自觉性、组织性和确实的创举。

对于我们的学校尤其可以这样说。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不管怎样估计都不会过高。我们的学校教育着3,000多万的儿童和少年。这个数目比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军队都多出好几倍,比起许多国家的人口还要多些。但如果我们容许在这个最重要的教育事业中制造出哪怕是10%的废品,那么这就是说,在我们的社会里要增加300万个坏学生,也可以说是有害的青年学生。我国的人民教育事业在学生数量上已经如此巨大,这工作中的1%的废品,就会使国家遭受严重的损失。

面对着这个长期的政治问题最好问一问:在学校教育的组织方面做了些什么,现在又做着什么?而回答一定是可悲的。在苏维埃生活中,没有一个部门是象它这样地缺乏信心地、草率地、糊里糊涂地从事我们的苏维埃事业的。

虽然党不止一次地指出我们的教育部门情况不佳,但教育人民委员部这个巨人却“屹然不动”……

首先要有勇气公开承认:我们不晓得……我们希望培养什么样的人,我们不晓得,应不应当培养勇敢的精神?而这样做也许“不是教育”?也许对健康有危险?也许妈妈们会不高兴?

造成这种混乱的现象是谁的过失呢?试问,教育学家都到哪里去了,这些早就应当研究、考虑,解决共产主义教育问题的千百个教育工程师都到哪里去了?要知道任何地方也没有象在教育论文中那样经常提到这些字眼的。但是在这些文章里关于培养意志、勇敢、目的性的问题究竟说了些什么呢?

事实上这些问题也象许多其他的教育问题一样被取消了。这些问题被伪科学的花言巧语隐藏起来,被陈旧的、跟我们完全背道而驰的主张遮蔽起来,这些主张是,任何个别的教育问题都不会有的,教育和教学过程是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说老实话,甚至很难叫人相信,竟有人玩弄这样天真烂漫的把戏……这些人不肯认真踏实地去研究共产主义教育问题,却装出聪明的样子来声明:

“教育?这是为什么呢?教师既然教书,他同时也就是在教育。历史!你晓得吧,光是历史就可以起多大的教育作用,你简直不能想象……。”

历史,当然能教育人。可是文学和数学也可以教育人。但是,用课堂上的工作来限制教育过程,当然谁也没有这样的权利,就象建筑工程师没有权利提出这样的主张:在建筑房屋时只要研究暖汽炉和房顶的构造问题就够了……

为什么学校教育的组织者这样随随便便地对待这个问题呢?不是因为别的,只是因为他们自己与坚定的目的性没有任何关系。对任何目的,包括共产主义教育的目的也在内,他们都不特别感兴趣。

此外,还有这样的想法:总会有办法的,这又不是搭桥,桥经过几

个月也可能会坍塌。我们把学生送出学校门,自然会有人识别他们是什么货色的。总会有办法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家庭、少年先锋队……会做这些事。

但实际的情况却是这样:整个教育工作的事业,这个对国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业,交给分散的教师去管,他们之中有许多是年轻的和没有经验的,交给少年先锋队辅导员去管,他们之中没有一个是具有经验的……

人家常取笑我们教育界,这是不足为怪的,人们取笑我们常重复这句话:“这是教育的手段”,或者“这不是教育的手段”,不懂行的人可能以为教育的手段就是追求既定的教育目的的手段。错了!完全不是这回事!教育的手段正是追求唯一目的的手段,这目的就是:要诸事平安;“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不得罪任何人,总之,不许发生一点不愉快的事。

还有一种学校却象一个溺爱子女的母亲,她的教育方法可以概括成一个公式:“让孩子吃得饱饱的,不要让孩子着凉。”为了用“百分”成绩来装潢门面,她拼命地喂孩子,而且注意不要由于勇敢,或者假定说,不要由于富有目的性而把孩子弄伤风了。于是,就象真的母亲那样,她无暇去考虑:由于这种鼠目寸光的关心,我们在孩子的成绩和健康上损失了多少东西啊。

可是,这样可以活得平安无事。这样可以用百分比来统计我们的工作,并且可以忘掉这样一个事实:在苏联其他各部门人们正在寻找,大胆地尝试,发现,有时去冒险,但是永远在创造新的事物。

勇敢!请试一试认真地、诚恳地、热烈地抱定培养勇敢的人的目的吧。要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只是空口说白话已经不行了。不能够把通风的小窗户关上,用棉花把孩子裹起来,给他讲巴巴宁的丰功伟绩。这是因为在这种情形之下,您的敏感的良心是很清楚这样做的结果的:您培养出可耻的旁观者,别人的功绩,对他说来只是观看的对象,欣赏的因素罢了。

如果不把一个人放在可以使他表现勇敢精神的条件下——无论是表现哪一方面的勇敢：沉着、坦白、刻苦、坚忍、大胆，都是一样的，——就不可能培养出勇敢的人。如果事先不解决关于苏维埃意志与资产阶级意志的区别问题，就不能着手于意志的培养。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意志是人用来压迫他人所必需的东西。而坚定的目的性不过为了在社会中混一顿比较好的饭罢了。如果我们把整个教育学归结为所谓“个别对待”办法的话，会不会有用资产阶级的范畴来代替我们的范畴的危险呢？

没有在集体中的专门的练习，是不可能培养共产主义的意志、共产主义的勇敢和共产主义的目的性的。构成我们教育工作内容的东西，不是两人之间偶然影响的方法，不是顺遂的不抵抗的方法，不是温和与安静的方法，而是集体的组织，对人提出要求的组织，即把一个人的现实的、生气蓬勃的、具有一定目的的意向与集体的意向相结合的组织……

事实上我们并没有教育学生，我们除了为着自己的方便而对学生采取最简单的制止方法以外，我们并没有向他提出任何要求。我们做到了（并不是经常做到）使学生安安静静地坐在教室里，但我们没有提出任何良好纪律的目的。

我们的学生有时有守秩序的纪律，但没有斗争和克服困难的纪律。我们要等到学生犯某种过失的时候才开始“教育”他。没有犯过错误的学生是不会使我们注意的——他走向哪儿，表面看来似乎都很妥当，但究竟会发展成什么样的性格，——我们既不知道，也不善于发现。

我们的教师没有去注意一些最普遍的典型性格，譬如“老实人”、“道学先生”、守财奴、滑头鬼、委靡的人、粗枝大叶的人、献殷勤的人、爱占便宜的人、厌世的人、爱幻想的人、书呆子。有时我们也能看出他们的存在。但是第一，他们对于我们没有什么妨碍，其次，我们反正也不知道拿他们怎么办。而实际上，后来成为害群之马的正

是具有这种性格的人 ,而不是调皮捣蛋的人。

现在我们教育着 3 000 多万儿童 ,毫无疑问 ,这么宏伟的工作所取得的成就 ,并不决定于几百万教师各自为政的努力 ,而完全决定于作为一个整体的学校组织 ,决定于我们对儿童提出要求的方式和态度 ,决定于儿童集体的纪律和游戏的作风 ,决定于广泛组织各种经常的锻炼 ,即经常锻炼意志集中、勇敢、经常追求巨大的、明确的、所希望的目标。

这样的教育工作不仅非常有效 ,而且对于教师说来也是非常愉快的。现在我们的教师都由于自己方法上存在的缺点 ,如死气沉沉、枯燥无味、伪善的美德而深感痛苦。同时 ,还深受那些数不清的、不知从何而来的荒谬成见之害。例如 ,直到现在还认为 ,儿童的天性就是需要做一些下意识的、胡乱的、无目的的动作 ,把它看作是一个定理。在课堂上不用强制的方法 ,直到现在为止还有人认为确是一种“教育”的方法 ,哪怕这样做会破坏整个的课堂教学。到现在为止 ,我们的儿童甚至在一年之中 ,就有好几次从一个集体被调到另一个集体中去 ,——要知道 ,事实上再没有比这种顽强地教育一个“集体以外的”人更有害的了。

我们的学校生活 ,我们儿童的集体生活 ,应当是更生气勃勃的、更紧张的、更快乐的和更严肃的。只有在这种情形之下 ,学校才能完成共产主义教育事业的职能 ,永远根绝那种自满的道德教育自流的现象。

当然 ,这种工作需要教师花费很多的精力 ,具有很大的魄力 ,需要更诚恳和更大胆。这不仅是一付重担 ,同时也是一种满足。坐在办公室里发表抽象的、胆怯的议论 ,这样的素食是养活不了我们上百万的青年教师的。我们儿童的社会应当反映整个苏维埃国家的生活。我们的学校也应当象我们整个社会那样 ,以同样的意志、勇敢和努力来为共产主义而斗争 ,并且还应怀着同样的欢乐来斗争 !

## 共产主义的教育和行为

我们今天殡葬伟大的共产主义教育活动家、我们时代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克鲁普斯卡雅。她是创立布尔什维克党和人的行为的新时代的列宁的朋友。我请求你们为克鲁普斯卡雅起立默哀(全体起立)。

同志们,我并不觉得自己有特殊的权利来和你们谈论共产主义教育……我对这个问题所能谈的也和你们几乎每天所谈的一样。因此,你们不必期待我提出任何的定则或者真理,不必等待我发表什么了不起的意见。

可以这样说,这个问题对我们所有的人说来都是重要的、可贵的,这个问题使我们大家都感兴趣,又由于我们想使共产主义行为愈趋完善的诚意和真正强烈的愿望,所以来谈一谈这个问题是合乎时宜的。

我在你们面前所以有小小的发言权,是因为我有一些生活经验。我向你们讲讲这个权利是什么。革命、苏维埃生活把改造少年违法者的事业委托给我,我和他们一起工作了十六年,没有间断、没有假期、没有病假、没有休息日地工作着。这当然算是一个成功——在一个集体里面工作了这么长的时间。但当我开始这项工作的時候,我认为,我面临的是极微小的任务,矫正这些违法者的心灵,使他们适应生活,也就是给他们治病,在他们的性格上打补丁,只不过是做一些使一个人能凑合着过劳动生活所必需的事而已,我并不奢望取得什么大的成就。但是,我在工作过程中,并且随着我们集体的成长和富足,随着它成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集体,我便逐渐对自己的事业、对自己提高了要求,同时事业对我和对集体也提高了要求,而我对于矫正的问题已经不再感到兴趣,这种所谓违法者也不再使我感到兴

趣,因为我看到了没有任何特别的“违法者”,他们只是一些陷入痛苦境遇的人。我很清楚地理解,如果我在童年时代陷入这样的境遇,我也会变得和他们一样。任何一个正常的儿童流浪街头无人援助,没有社会,没有集体,没有朋友,没有经验,神经受着折磨,没有前途,——任何一个正常的儿童都会有他们这样的行为。

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就是没有违法的儿童,而有的只是那些和我一样充分享有幸福生活权利的人,有的只是那些和我一样有才干、有能力生活和工作、有能力成为幸福的和有能力成为创造者的人。这样当然就完全清楚了,摆在我面前的已经不可能是任何专门的教育改造任务。摆在我面前的不过是通常的任务——把一个人教育成真正的苏维埃人,教育成品行的模范。

因此,最后几年,我便没有矫正过任何一个人,我不过是完成普通的苏维埃工作,教育着普通的优秀的苏维埃人。我获得了成就,在这方面有了功绩,当然,这已经不是我的,而是我们整个苏维埃生活的功绩,也就是那些摆在我们面前的目标、那些我们大家都曾经走过的道路以及我们在生活中每一时刻都能发现的精力的功绩。

这就是为什么连我的工作、连我的集体的努力也都有了成就。因而我得出一些我所感到兴趣的结论。第一个结论就是教育是非常容易的事业,教育是幸福的事业,任何工作都比不上教育工作这样容易,这样能给予人特别可贵的、可以感觉得到的、实际的满足。

我经常这样说,但是很多同事,特别是教师同仁听了之后都嘲笑我。不过他们是没有权利取笑的。

不久以前我被邀请参加一个学校的纪念会……我认为这是一所杰出的学校,是莫斯科最好的学校之一,我便问道:“大概,你们都是工作满二十年的教师了吧?”——他们说道:“对了,校长在校二十年,这一位十五年,这一位十二年。”他们有很大的成就,因为在一个学校当了二十年的校长,这就是说献出他的一生。这样的事情是很多的。拿我来说,也和他们一样,献出了自己的一生,工作得很顺利。

我有权利断言,教育工作是非常容易的工作。所谓容易,并不是做一会工作,然后就可以出去散散步,然后就可以读读书,休息休息等等。不是的,教育工作也要支出很多时间,不过它是紧张的工作中比较容易的工作罢了。

最后几年我们有 600 个社员,但我觉得工作得很容易,甚至从 1930 年起,我们不设寄宿学校应设的教导员的职位也可以工作了。在学校里有教师,在工厂里有工程师,但是我们这个 600 人的儿童集体,在某种意义上说来,是独立地生活着的。早晨,我听见了起床号,并且知道在我的集体中没有一个人,但我并不耽心。我很清楚地知道,他们十分有理智,十分有经验,十分正直、守纪律和热情,已经不需要监督人来管理他们了。他们自己可以做这一类简单的事情,譬如按时起床,梳洗,按时扫除尘埃,擦地板,排好队,象迎接真正的领袖一样,用正式的庄严的致敬来迎接自己的值日队长。在这之后,他们就吹上班号,于是成年人——工程师、教师和我就到他们这里度过一整天。

当我知道,没有人监督时要你按时起床、按时擦地板是多么困难的时候,起初,我感到吃惊,但后来我便不再觉得奇怪并且看出这是寻常的集体的行为,寻常的人的行为,既然是寻常的人的行为,因而也就是最简单、最容易的行为。

这就是我能够向你们提出的结论,——这就是我确信共产主义教育是一个幸福的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就带来胜利,因此教育事业就是容易的和幸福的事业。

共产主义教育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它在二十多年以前就开始萌芽,对我们全民族说来,它从十月革命第一声炮响起,从列宁同志最初的几句话起,就开始萌芽了。共产主义教育——这并不是放在我们面前的事,而是早就培养着我们,并且在极大的程度上已经培养了我们。

我们苏维埃人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因为他有很大的新的特点。

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所有其他的民族,总之,每一个苏维埃人都具有新的性格、新的个人品质、新的行为品质。在这些品质之中,可以看出某些尽人皆知的优秀的品质。首先,我们的人变成了世界范围的人,整个世界都在他的思考中,他有远大的眼光,他观察、注视和关注整个地球上所发生的事情,他作为一个世界公民,体验到在西班牙、在中国所发生的那些灾难。我们眼看着苏维埃人变成了这样的世界公民,而在22、23、24年之前,他们仍然是俄罗斯帝国地方性的人。就是这种性质使他们变成了具有世界意义的人,与世界利益、世界问题有关的人——这是在共产主义教育事业中向前跨出的一大步。

其次,正是这俄罗斯人,苏维埃公民,过去曾经有80%的文盲,并且完全不懂技术,今天,他首先变成了技术家。我们这里七岁、九岁、十二岁的小孩,比起我们老头儿,老一辈的人更懂得技术。我们几乎完全不晓得什么是碳化器,什么是燃烧和什么是机器盖,而我们老头儿中有很多人当真以为六角转刀旋床是制造手枪的(六角转刀旋床俄文名 Револьверный станок,按字面翻译即“手枪车床”——译者)。可是我们的孩子们知道什么是机器盖,什么是燃烧。我特别幸运,能同这才不过10—14岁的苏维埃公民的技术的心灵接近。我自己也象所有的教师一样,认为应当让儿童做容易的工作,即让他缝个裤衩或者补双袜子,有时钉个板凳什么的。当我们叫孩子们修一张坏板凳,缝一双坏鞋子和凑合着缝一件衬衣的时候,我们认为这是有益的儿童劳动和儿童技术。我这样想,并且让我们的孩子们做这样的工作。但是同他们工作了12年之后,我却愿意给他们极贵重的车床,这种车床复杂到要用微积分来计算,我让他们制造“莱卡”照相机,苏联叫“ФЭД”照相机。“莱卡”是什么东西呢?这是有300种零件,精密度达到百万分之一米的照相机。这些零件的生产,是一种精密的、复杂的、困难的事情。最后,这种光学仪器的生产,原先只有德国人懂得,而在帝俄时代,根本制造不出准确的光学仪器的。

我不怕把这样的事交给孩子来做。连我自己也觉得奇怪,社员

能一天四个钟头站在自动机器旁边,站在六角转刀旋床、锯齿、研磨机床旁边……你们知道这是些什么样的车床吗?这是堂皇的、漂亮的车床,是贵重的车床。它全身发亮,它有铜制的美观的金属部分。需要保护它,照管它。而我们苏维埃儿童们也正是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它。他们不容许车床上有一点污点,不容许不把刨屑清除干净,更不用说损坏车床了!于是我发现,弄脏车床的问题就是道德问题,这就是伦理。这是新人的伦理,虽然新人还很年轻,但是他已经从我们社会中获得了这种伦理,获得了这种新人的灵魂,他在车床旁,在工作中给自己找到了行为的规范。我国的青年比任何其他各国的青年都高尚。

斯达汉诺夫运动是怎样发生的呢?我们还是年轻的苏维埃公民,但已经是一些天才的技术家、天才的自然征服者,这就是说,为着新的财富、新的生活而斗争的天才的战士。

作为我们受到的共产主义教育的结果,我们还获得了哪些品质呢?有些人诽谤我们说,俄罗斯人生来就是奴隶。说这样的话就是卑鄙地反对一切的改革和革命,就是公开地信仰保守主义和秘密地信仰自由主义,说是人只有当奴隶才可以工作。

这种臭名远扬的奴隶制度习俗在哪里呢?从鞑靼人的统治、农奴制度、专制政体那里遗留下什么呢?什么也没有留下来!苏维埃公民在自己身上发现了巨大的天才和巨大的才干。从前曾经有过奴隶制度,现在却是自觉的纪律。这是我们斗争的全部过程培养起来的新的品质,这是共产主义教育的结果。

那些在十月革命以前把印刷的纸张当作卷烟纸的文盲,现在这样的人不仅变成了读者,不管出版多少书籍也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而且变成了很好的读者。我经常和我的读者在代表会议上、在会见会和座谈会上见面,老实说,当我第一次来到这样的会议上时,我心里想道:这有什么?他们是读者,我们可以随便地谈一谈。反正他们不是批评家,不会用利剑和针尖来刺我。这些读者是一些善良的人,

他弄不懂的地方,他会放过去的。事实上全然不是这回事,那些批评家、记者、文艺家,无论是鉴别力或是判断力,判断什么做得好、什么做得坏、什么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有趣、什么没趣、什么有价值、什么没有价值的能力,大约都比不上我们苏维埃的读者。苏维埃读者——这是对于文学有丰富的鉴别力、有巨大的要求的人,而且是对于文学有巨大的分析能力的人,并且还有最主要的,他跟别的读者不同,他永远是俄罗斯知识分子中最优秀的部分,这就是他对待书的态度,犹如对待朋友、对待思想的范畴,而不是把它看成消遣品。我们苏维埃的读者是在书中发现智慧、学识、思想的人。这是要求严格的、有高度原则性的和高度文化水平的读者。二十年来,我们眼看着他变成了这样的读者。并且我所遇见的任何听众都是这样的。我在莫斯科出席过大会,在乡村、在外省也出席过大会,很难说哪里的读者高超一些。他所说的话,他所想的问题,他那样善于分析,他那样善于感觉,善于相信,——这是心灵有巨大文化修养的、人格有巨大文化修养的人。并且什么都比不上这种文化修养能使我高兴。甚至不能说,这只是学校的功劳。这是我们的全部生活、我们的一切运动所造成的。这也是共产主义教育的结果。

最后,谁也不会怀疑,我们公民的主要优点、主要品质就是我们的统一。在革命前这是可能的吗?上百个民族,上百种语言,俄罗斯、亚库梯、格鲁吉亚,这一大群被沙皇曾用铁箍捆住的民族怎能相处得融融洽洽呢?我们的铁箍就是尊重,就是我们的人道主义,当然,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

这就是我们的统一,全体人民的统一,全体公民的统一,这就是我们对布尔什维克党、对斯大林同志的无上的尊敬和爱戴,这是一种统一,尽管我们善于批评,有自己的意见,善于表达自己的意见,说这不喜欢,那讨厌等等,尽管我们人很多——19 000 万人,但这是统一的苏维埃人民的苏维埃灵魂,这是我们大家以及将来所有人类的幸福。共产主义教育的这种结果已经具有,已经是现成的。

这是不是说,我们已经受了共产主义教育,我们就再没有事可做了呢?我应当说,一般说来,真正的、宏伟的共产主义教育事业,只不过刚刚开始。因此,现在向自己提出下面的问题是合乎时宜的:什么是共产主义教育?什么是共产主义行为?

你们都知道,一般人在生活中并不常常深入地去理解一个术语,把一切看得都很简单,他以为,共产主义教育就是良好的教育,共产主义行为就是良好的行为。但是要知道,革命前人们也有好的和坏的行为。也许,连现在也是这样:某某人不酗酒,不打老婆,对自己孩子疼爱得很有分寸,不撒谎,不偷窃,这就算是好的行为,共产主义的行为了。这对不对呢?我曾经时常与年轻人和上了岁数的人谈论这些问题。常常遇到这样的见解:这是个好人,所以我们认为他是有共产主义教育修养的,这对不对呢?

我们大家对列宁的话知道得很清楚:

“道德是为破坏剥削者的旧社会、把全体劳动者团结到创立共产主义者新社会的无产阶级周围服务的。”

凡是服务于解放劳动者这个任务的、服务于革命任务的,都是道德的,不服务于这个任务的,都是不道德的。这是共产主义道德原理的一般标准。在这里我再谈一点特殊的情况,都是一些小事:“为什么你不做那件事?”——“忘记了,从脑子里面跑掉了。”第三个人说:“岂有此理,你为什么会的忘记呢?”而第四个人反对道:“喂,你们为什么要和他为难呢,他没有过失,不过是忘记罢了。”的确,人们常常记住某件事,可是记着记着,后来就忘记了。要知道,自然而然地就会忘记了。这是很自然的行为。这和列宁同志的定则有没有关系呢?当然有关系。我们的社会中确切地履行义务就是道德的范畴。

一个有家庭、妻子、孩子的人,后来他遇见了一个漂亮的女人就爱上了。抛弃了妻子、抛弃了孩子……

会有人这样说:“怎么谈得上这是反对革命的行为呢,恰好是革命把我从家庭的枷锁中解放出来,我已经是一个不带枷锁的人,我想

爱谁就爱谁。”我回答道：“不，我不是希望您有枷锁，我是希望您有共产主义的行为。”然而就有人和我争论起来，他们证实说，如果一个人在性格上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他就应当幸福地、自由地生活，不应当成为自己行为的奴隶或者自己妻子的奴隶。

我问道：但是他有权利成为自己感情的奴隶吗？

列宁同志的定则对我们是必需的，这是为了在每一个别场合，在每一步路上，在每一个运动中，都要用这个定则来检查自己的行为，善于辨别出，我的行为是共产主义的还是非共产主义的。同时也十分清楚，为了把这个定则扩大应用到我们行为最微小的细节中，就需要大家尽最大的力，需要思索，需要探求，需要分析问题。这还不够。还需要习惯于对新道德的新的要求，以便能自然而然地遵守这些要求，而不必每次都劳累我们的意识苦思探索……

我们向共产主义迈进，向“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则迈进。

可是“各取所需”是什么意思呢？

为了要弄清楚什么叫做“所需”，并且怎样才能真正满足这些“所需”，自觉地、聪明地对待自己的行为仍然是不够的。还必须养成正确行动的习惯。

我们的任务不仅是使自己养成对行为问题的正确的、合理的态度，同时还养成正确的习惯，就是要养成这样的习惯：我们之所以做得正确，完全不是因为坐在那儿想过，而是因为我们不可能有别的做法，因为我们习惯这样做了。而培养这种习惯比起培养自觉要困难得多。

在我的培养性格的工作中，形成一种认识是非常容易的。人毕竟理解和意识到应当怎样行动。但需要行动的时候，他做的又是另外一套了，特别是当行动是秘密的，没有人看见的时候。秘密中的行动——这是对于认识的准确的检查。当一个人没有被人看见，没有被人听见，也没有人来检查他的时候，他的行为会是怎样的呢？以后我对于这个问题应当多多地研究。我明白，有我在场或者在集体

的面前,教会人正确行动是容易的,但是当没有人听见,没有人看见,并且没有人知道的时候,要教会他正确地行动,这就非常困难了……

我好几次观察社员们在电车上是怎样行动的。一个社员坐在那儿。他没看见我。我看见一个人上了车,社员悄悄地让出位置,他走到一边,不让谁注意他。果然谁也没有发现他。同志们,这就是健康的行动、美好的行动。为自己、为思想、为原则而这样做——已经是困难的了。学会这样行动很难,教会这样行动也很难。例如你在河岸上走,有一个小女孩掉进水里,你跳下去,把她拉出来,你就走了。如果有三四个人看着你,向你鼓掌,这算得了什么呢?小事情。但是你希望有人对你这样。你们还记得莫斯科有一次失火的事件吧。有一个青年人坐电车经过火场,他看见四层楼上有一个女孩子,他爬上去,把女孩子拖下来,就不声不响地走了。谁也不知道怎样才能找到他。这是理想的行为,有正确思想的行为。每次遇见这样的事情,我就研究这个问题。我们每天擦地板。擦好了地板,大厅很漂亮,但是不知是谁穿着脏鞋子在地板上走过。这是件无关紧要的小事。说实在话,任何的偷窃行为、任何的流氓行为,都不会象这些脏的脚印那样惹我冒火。为什么弄脏了呢?因为没有人看见。要知道,也许正是那个要求别人行为正确,自己又是个突击队员的最好的社员留下的脚印。当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当什么人也沒有看见他的时候,他唾弃自己同志的工作,唾弃自己的舒适的环境,唾弃自己的审美和美观,因为没有任何人看见他。知道应当怎样行动和习惯的行为之间的矛盾就是这样的。在它们之间有一道小小的沟,需要用实践把这道沟填平。列宁同志所说的正是这种正确行为的习惯。

这就是共产主义教育任务的一般情况。这些任务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应当在最近的五年内走过这条共产主义教育的道路。谁来教育我们呢?当然是党、苏维埃的生活、学校、苏维埃的前进运动以及直到现在还在教育着我们的苏维埃胜利在教育我们。我们将要自己教育自己。

这是很有趣的。在《塔上旗》这本书中我描写了捷尔任斯基公社。这是一个很好的公社,模范的集体。我可以不带丝毫的虚伪的愧色说这样的话。批评家首先不相信。一个说:马卡连柯在讲神话。另一个批评家补充说:这是马卡连柯的幻想。而我在想:从批评家身上能期待什么呢?他们关在自己的研究室里,什么都看不见,听不见,让他们写去吧……

但是我收到一封第379学校学生们的来信。是一封长长的友谊的信。他们祝贺我,并且说:“我们读了你的《塔上旗》一书,我们非常喜欢它。不过在你的书中全是一些很好的社员,而人是有优点和缺点的,应当这样描写人才对。”

这是一种极流行的意见:人应当有优点和缺点。甚至年轻人和学生都这样想。一个人能意识到自己有优点,同时也有缺点的时候,那会过得多么“舒服”。并且他还会进而自慰道:如果没有缺点,那就成为公式,而不是人了。有了缺点,才有缺陷美。

但是,干吗应当有缺点呢?我说:任何的缺点都不应当有。如果你有二十个优点和十个缺点,我们不当对你放松:为什么你要有十个缺点呢?打掉五个。剩下五个的时候,再打掉两个,让它剩下三个。总之,需要对人要求,要求,再要求!同时每个人也应当对自己提出要求。如果我没有在这方面工作过的话,我永远不会这样坚信的。为什么人应当有缺点呢?我要把集体一直教育到没有缺点为止。可是你们是怎样想的呢?结果得出一个公式化的人吗?完全不是那回事!结果得出一个有充分特点的、有鲜明个性生活的美好的人。如果他是一个优秀的工作者,如果他是个卓越的工程师,但他爱说谎,他有时不说实话,这能算是个人吗?这是个什么呢:卓越的工程师,然而是个赫列斯塔可夫。

现在我们要问:什么缺点是可以保留的呢?

如果你们愿意用积极的方法来实施共产主义教育,又如果有人当着你们的面肯定说每一个人应当有缺点,那你们就会问:什么样的

缺点呢？你们看看人们怎样回答你们。什么缺点是可以保留的呢？秘密地拿东西——不可以，耍流氓——不可以，偷窃——不可以，做事不诚实——不可以。可是什么是可以做的呢？可以保留急躁的性情吗？为什么可以？在我们中间如果有性情急躁的人，他就会骂人，然后就说：请原谅，我的性子急。正因为苏维埃伦理中应当有一种对人要求的严正体系，并且只有这样才可以使我们首先发展对自己的要求。对自己提出要求，这是一件最困难的事情。我的“专长”就是能作出正确的行为，在任何情形下，我应当首先使自己的行为正确。对别人要求是容易的，而对自己要求——那你就碰上一种“橡皮钉子”，你总是想找借口原谅自己。我非常感谢我的高尔基工学团和捷尔任斯基公社的集体，因为它为了回答我对它的要求，他们对我也提出了要求。

例如曾发生这样的事情。我罚社员在我的办公室里坐禁闭。时常只坐了半个钟头，我就说：回去吧。我心里想，我是多么慈善的人啊，罚半个钟头就放走了。现在大家一定喜欢我。总之是一副好心肠。可是在全体大会上，有人忽然说道：“我们有一个提案。安东·谢妙诺维奇有权惩罚社员，我们拥护和欢迎这个权利。但是我们建议，他没有权利宽恕和释放。这象什么话呢——安东·谢妙诺维奇惩罚社员，但后来他又心软起来，人们请求他，他就宽恕了。他有什么权利宽恕呢？有时安东·谢妙诺维奇把手一挥，说：坐十个钟头的禁闭，可是后来，过了一个钟头就放走了。这是不对的。在没有宣布惩罚之前，你应当想好该罚几个钟头。不然，你说了十个钟头，而后来却宽恕了事。这非常要不得。”

全体大会决议：“首长有权惩罚，但无权宽恕。”就象一位审判官一样：宣读了判决词，过几分钟后，自己就不能再做什么了。判决后就成为定局，再不能更改了。于是我说道：“谢谢你们，不是因为你们提出了正确的议案，而是因为你们教育了我。”企图不闻不问：宽恕或者不宽恕，这是放纵自己行为的表现，不严守自己决定的表现。

我向我的社员学习怎样严格要求自己。每一个人也都可以向别的人学习,不过这是困难的事。

关于困难的事情,斯大林同志说:“我们切不可象那些逃避困难而寻找容易工作的懦夫。”

自我教育,共产主义的自我教育——这是困难的工作,但只有那些找容易事情的懦夫才办不到。

现在来谈谈跟资本主义残余作斗争的问题。

好,我们就拿嫉妒心来说吧——这是不是资本主义的残余呢?不久以前有三个一年级的大学生来问我:“我们争论了又争论,可是怎么也得出不了结论。嫉妒心——这是不是资本主义残余呢?从一方面说,好象是资本主义残余,因为我爱她,而她却爱别人。我好象是一个私有者,所以我拿出自己的私有权来。但从另一方面说,没有嫉妒心怎么能够爱呢,不嫉妒怎么能够爱呢。这不是真正的爱情。她对你看一眼,同时也对别的同志看一眼,你觉得无所谓,这算是什么爱情啊。”事实上,嫉妒心——这样的情感,把它归入资本主义残余里面去也许不是那么容易。但无论如何,这样的问题是可以提出来的……

再拿利己主义来说。同样,有人说,利己主义——无可怀疑是资本主义的残余。而另外一些人反驳道:利己主义是健康的现象。一个人如果不利己,这就是说,你想怎样对付他就可以怎样对付他。并且还有许多其他的现象,我们不知应该把它们列入什么地方。

总之,有许许多多的残余,它们是多种多样的。真正的资本主义的残余(经济方式的),我们恰恰看不到。很难设想我们的公民会幻想开个食物杂货铺。这样的现象我们早已看不见,甚至谁也不会偷偷地幻想这个。很难想象我们社会的人会想起剥削别人,有意识地去想这个事情。但是我们在生活中却会看见一个人无意识地“剥削”另一个人。前年我和一个同伴沿着伏尔加河旅行。他是我的好朋友。可是在全部旅途上,他整整“剥削了”我二十天。

定卧铺——他不会,到码头上买东西——也不会。他去买了一次黄瓜——买来的全是烂的。取开水、买票、找汽车——什么都不会。于是我就象个奴隶一样,整个旅行期间都替他做工。他“剥削了”我,安详自得地享受着我的劳动……

一开始由于没有经验,我认为公社社员中最主要、最操心的对象是小偷、流氓、侮辱者、强横的人、捣蛋鬼。这是一些无法控制的性格。他没有什么可借以教育的品质。但后来我明白我是错了,那个出言不逊、不愿意工作的人,那个从枕头底下拿走了同志三个卢布的人,并不是主要的难教育的对象,并且也不会因此而增加了社会上的敌人。可是有一种“老实人”,大家都欢喜他,他什么都做,善于察言观色,任何坏思想都不表现,这个“老实人”和15个同志同住在一个宿舍里,把自己的大箱子上了锁。

这就是我们首先应当研究的性格,因为这种“老实”人总是从我的手边滑过去,致使我既不能够保证他的思想,也不能保证他的行为。他毕业后投入社会,而我总是在期待着:他将要做什么呢?对待这种“老实人”我经常是特别小心戒备……

温情主义,优柔寡断,渴望由于做出好事而得到快慰,甚至高兴得流泪,不考虑这种温情主义会造成什么结果,——这在实际生活中会是最可耻的。这些残余还存在着。这种人很善良,什么都宽恕,这种人非常容易相处,非常柔和。真正的苏维埃公民认识到,所有这些软弱的“善良的”伦理现象,是同我们革命的事业相对立的,并且这些残余正是我们斗争的对象。

而主要的斗争应当是制定我们的共产主义行为的标准。接近实际生活,接近单纯的、健康的思想,这就是我们共产主义伦理的力量所在。

斯大林同志的话使我欢欣鼓舞。

“目前形势的特点就是我们在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上已经有了重大的成就,我们已经把社会主义从偶像变为日常实际工作中的平

凡事物。”

因此,用不着谈论理想、善良、完美的人格、完美的行为,我们应当永远不好高骛远,应该只去思考我们今天、明天的那些实际需要。我们越是接近简单而平凡的工作,我们的行为就越是自然和完美。

我们应当提出要求,但只能提出做得到的要求……任何过高的要求只会有害。

我们的伦理应当是平凡的、实事求是的、我们今天的和明天的寻常的行为的伦理……

譬如,就拿准确性这种道德标准来说吧。那些认为人们可能会有缺点的人有时会想,如果一个人习惯迟到,这不过是小小的缺点而已。

如果有一个人不慌不忙地迟到一两个钟头,并不在意,20个人坐着等他一个人。这是属于一般问题方面的准确性。现在再来检查一下说话中的准确性,表现的准确性,感情表现的准确性。这样的情形太多了,譬如说,一个人刚有点喜欢一个女人,他就说他爱上她了,把一切都交给她了。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就是因为不重视准确性。如果重视的话,那他不管怎样总要检查一下,并且立刻就会看出——是爱上了还是没有爱上。并且如果重视言语的准确性,就不说“我爱您”,而是说“我喜欢您”了。毕竟“喜欢”与“爱”不同,并且还应当想一想,你会不会喜欢得长久。归根到底,缺乏准确性非常近似一种叫作欺骗的完美缺点,生活中保持准确性就是道德的标准,就是我们的完美而斗争的伟大的行动。就拿最近关于准时上班这个极好的法律来说吧。很多人觉得,这个法律要求人们动作紧张,这未免太严厉了。而我很高兴,我看见了守时的传统是怎样建立起来的(鼓掌)。这个传统会变成习惯,经过十年以后我们就学会尊重它,每一根神经都意识到它,感觉到它,每一个动作都感触到它。

我可以自豪——在我的公社里历来就有这种制度:无论举行什么会议,吹号之后只等三分钟。然后就算开会了。如果有社员开会迟到了五分钟,主席就说:你迟到五分钟——就要罚值班五次。这就

是说 ,做五小时的额外工作。

准确性——这就是劳动生产率 ,这就是生产力 ,这就是物质 ,这就是财富 ,这就是对自己和对同志的尊重。我们公社中的生活不能没有准确性。在普通学校里 ,十年级生常说时间不够。而公社是一个完全的十年制学校 ,而且有一个每天要工作 4 小时的工厂。但我们时间却够用。并且还有玩、休息、娱乐和跳舞的时间。我们达到了真正道德的热潮——迟到就得受最大的惩罚。譬如 ,一个社员对我说 :我请假出去 ,到八点钟回来。他替自己规定了时间。但如果他到九点五分才回来 ,我就要让他坐禁闭。有谁拽着你的舌头吗 ?你可以告诉我九点钟 ,而你说八点 ,那你就应当照办。

准确性——这是一件大事。当我看见社员养成了准确性 ,我便认为他可以成为一个好人了。对集体的尊重是表现在准确性上面的 ,没有它就不可能有共产主义的伦理。

你们都知道斯大林同志是怎样谈准确性的。

在准确性中 ,表现出我们伦理的基本原则 ,这是关于我们集体的经常的想法。

再谈利己主义和忘我精神的问题。马克思说 :“ .....无论利己主义还是自我牺牲 ,都是一定条件下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必要形式。” .....在我去年检查过的一个工学团中 ,我看到社员们走出戏院的情形 :大家你挤我拥 ,没办法出去。于是我说 ,我来教你们怎样走出戏院 ,你们愿意吗 ?照你们现在这样 ,要 20 分钟才能走出戏院 ,请试试照我的劝告去做 ,——只要 5 分钟就能走出去了。很简单 :你们想出去——就得互相让路。的确这见效了。这样一来 ,对每一个人都有好处 ,每一个人的自私心都得到满足了。

我们在哈尔科夫曾经表演应当怎样进入戏院 :工学团 600 个人进入戏院 ,信号一响——一个一个地顺着右边跑步 ,于是 600 个社员只需一分钟便跑进去了。这只不过是一点智慧 ,一点逻辑 ,没有任何巧妙的地方。并且我们每个行为都可能符合这样的逻辑。如果全体

公民上电车的时候都互相让路,那就永远不会有人去拥挤,大家都上得去。个人之所以能得到好评,正是因为他替多数和多数人打算。我们共产主义的伦理应当是为千百万人的幸福打算,不仅是为我的幸福打算。旧的逻辑——我愿意做一个幸福的人,但其余的人们与我无关。新的逻辑——我愿意成为一个幸福的人,但如果我能使所有其他的人都幸福,这就是最正确的道路。那时我也是幸福的。我们一举一动都应当想到集体,想到全体的胜利,想到全体的成功。因此你讨厌见到贪婪的利己主义者,这种利己主义者想马上抓一把,抓到手后就吞食掉,但却忘记了,恰恰由于他这样的行为,在某种情况下抓到的不一定是幸福,而是痛苦……

任何一种不为集体利益打算的行为,都是自杀的行为,它对社会有害,也就是对自己有害。因此在我们共产主义的伦理中永远应当有理性的和健康的思想。不论遇到什么问题,哪怕是恋爱问题,也要用那决定我们一切行为的东西来解决。我们的行为应当是有学识的、有才能的人的行为,应当是对每一种行为都有清醒认识的懂得生活的人的行为。我们的伦理不能够没有学问和才能,不能够没有组织。对爱情也应当是这样。我们应当善于爱,知道必须怎样地爱。我们在处理恋爱时应当是自觉的、思想健康的、对自己负责的人,这样就不会演出爱情的悲剧了。

我的公社里有几百个青年男女,那些在恋爱的人,起先确信这是个人的交响乐,而我不由得看着他们并且想道:这个黑眉毛的女孩子对这个年轻人发生了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在最近期间可能表现为在学校中得到过多的“差”,很晚才起床,弄坏了神经。

我应当培养这些人的感情。

对于“恋爱——失恋”、“欺骗——遗弃”的伦理问题或者对于“爱上并且毕生不变心”的问题,如果不会最谨慎地确定方向,不会考虑和检查以及没有计划自己将来的必要才能,是不可能求得解决的。并且我们应当学会怎样爱。我们必须成为在爱情上是自觉的公

民,因此我们便应当抛弃旧的习惯和爱情观,说什么爱情是至上的灵感,爱情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的袭击,而人只是灵感的“对象”,如此而已。我恋爱了,因此我很晚才上班,我把公事箱的钥匙忘在家里,把钱忘在电车上。爱情应当使人感到自己更有力量,并且爱情的确正在使人丰富起来。我教导自己的社员在爱情方面也要检查自己,要想一想明天将要发生的事。

对待每一件行为都可以做这样理智的、精确的检查。就拿象不幸这样简单的范畴为例吧。要知道,按我们的旧习惯人们会说这不是他的罪过,是他倒楣。换句话说:这是一个不幸的人,他发生了不幸的事,应当可怜他,帮助他。不错,对于不幸的人当然要帮助,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求不要发生不幸。不应当有不幸和不幸的人。不要成为不幸的人。我们的伦理首先要求我们成为斯达汉诺夫工作者,要求我们成为优秀的工作者,成为我们生活的创造者,成为英雄,但它还要求我们成为幸福的人。而成为幸福的人却不能象赌博那样偶然赢得,——必须善于做一个幸福的人。在我们的社会中没有剥削,没有一个人对另一些人的压迫,这里人们的道路和可能性都是平等的,不应当有不幸。

不错,我们在这方面还想得很少。但是我根据个人小小的经验讲了上面的这种看法,并且我对社员们说:还有什么能比不幸的人更讨厌的呢?要知道,只要一看见不幸的人就把全部生活的欢乐绞杀了,把生存毒害了。因此,如果你感觉自己是不幸的,你在道德上的职责首先就是不要使任何人知道这件事。在自己内心找出微笑的力量,找出鄙视不幸的力量。任何的不幸常常都是夸大的。它永远是可以战胜的。要努力使它很快地成为过去,马上成为过去。要在内心找出力量想一想明天,想一想将来。当你一走上这条道路,你就走上了预防不幸的道路了。幸福变成了我们道德的义务,在共产主义时代不这样是不可能的。不幸只可以是不好的非共产主义道德的产物,也就是没有才能,不准确,对自己和他人缺乏尊重的产物。

同志们 ,我的话就要说完了。为了解决共产主义伦理的一切问题 ,必须在这方面多多地想、思索、写 ,必须朝这方面努力。必须在经常的道德行为上训练自己。我们的全部生活、我们的斗争 ,我们的建设、我们的紧张努力 ,都帮助我们在共产主义教育领域中成长。

请允许我结束我的谈话。